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讲义
(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

中卷

第三十五回 壮国威周恩来舌战日内瓦 收主权毛泽东辩论颐年堂

话说毛泽东得到刘少奇的报告，得知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高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不由得喘了一口气，仍表示高岗检讨后，要安排适当工作。谁知高岗拒不悔改，于半年后，也就是8月7日偷服安眠药自杀。饶漱石则被免去领导职务。这是后话，不必多说了。

这时宪法起草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毛泽东便准备返回北京，和周恩来一起研究一下出席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不料宪法起草小组成员陈伯达因为自己写的稿子没有被采用大闹起来，口口声声地要求去当小学教师，毛泽东让田家英劝了几次，陈伯达执意不听。毛泽东火了，大声说：“好吧，就让他留下当小学教师去吧。”陈伯达一听，立刻软下来，跑到毛泽东房里咕咕哝哝地检讨起来了。毛泽东最后原谅了他。从此，陈伯达对田家英怀恨在心，伺机报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适值周恩来去苏联访问。斯大林已於去年3月5日逝世，马林科夫担任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不久担任了苏共第一书记。1954年1月，也就是在解决高饶问题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开会，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最后达成协议，四国外长建议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中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这是建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要出席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即派周恩来去苏联访问，一是商量一下两国在会议上的合作和协调；二是从苏联那里学习一些国际会议上斗争的知识。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一直想着这件事。是啊，在战场上苦战三年，把美国侵略军赶回了三八线，如果在国际会议上输了分，这个胜利就要被大大地打一番折扣了。4月12日周恩来刚一回到北京，毛泽东就赶紧召见。

周恩来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见他脸色苍白，满脸疲惫，吃了一惊，从来没看见过周恩来这样疲累，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果然，还未等毛泽东发问，周恩来先检讨起来了：“主席，这次我在苏联犯了严重错误！”毛泽东冷静地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来。”周恩来喝了几口茶，心情沉重地讲起来……

原来周恩来这次出行确实不太顺利，飞机从北京起飞后，刚飞到蒙古国境内，发动机就出了故障，不得不在乌兰巴托紧急降落，因为情况紧急，来不及和蒙古国政府磋商。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很不高兴，以为中国不尊重他们，故意打电话到机场询问：“是谁的飞机？为什么飞来飞去，不打招呼？”周总理的翻译，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赶紧在电话里解释：“是周总理的飞机，本来没有计划在这里降落，因飞机发生故障不得不在这里紧急降落。”泽登巴尔这才明白，不由得为周总理捏了一把汗，继而想起应该去机场迎接，但是又没有准备，只好歉意地说：“我们事先一点也没有准备，不好去机场迎接周总理，请代问他好吧。”

紧急降落引起的风波平息后，飞机的故障被排除了，周恩来继续乘飞机旅行，顺利地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对周恩来的到来

十分重视，大家围着圆桌讨论了八、九天，达成了协作原则，对周恩来的要求，苏联方面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周恩来十分高兴，准备启程回国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汇报。

临行前的一天，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恩来。此人矿工出身，能喝善饮，他不断地和周恩来拥抱，旋转，表示亲近，又连举大杯，不停地要和周恩来干杯，周恩来也因为苏方这次合作得很好，心情愉快，不由得多喝了几杯。谁知周恩来这一年多来，格外操心，这次访苏，又是日夜连轴转，疲劳过度，不胜酒力，头重脚轻，竟至呕吐起来。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一时慌了神，手足无措。还是莫洛托夫有经验，赶紧把周恩来送回寓所，召来最好的医生诊治，周恩来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介绍，担心地问：“恩来，你酒后没有失言吧？”周恩来回答说：“我醒来后问了问师哲，师哲说没有失言，呕吐前也看不出有醉意，否则他早就扶我回寓所了。但不论怎样，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要向主席检讨。”毛泽东笑笑说：“只要没有失言就好了，何必检讨呢。这也是常有的事，不算丢丑。要这样检讨的话，那些大酒桶恐怕三日两头都得检讨呢。”周恩来说：“我还是要吸取教训。特别是这次出席日内瓦会议，稍有失误，就会给党和国家带来政治上的损失。”毛泽东说：“这也是，咱们研究一下吧，看看还有什么问题。”

就这样，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菊香书屋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敲定了谈判的各种重大问题。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又挑灯夜战，不断地召集代表团成员，检查、落实各项准备工作。忽然，周恩来桌上的电铃响了，秘书们笑了：“大姐在催了。”原来按照两人结婚时的协议，邓颖超从来不进周恩来办公室，见他工作时间长了，也只是在门外喊一声，太不方便。后来还是秘书们想了个办法，在周恩来桌子上装了一个小电铃，邓颖超要催周恩来休息时，只要按动电铃就行。

电铃一响，周恩来放下笔说：“大家休息一下，吃掉夜霄。”服务员送上夜霄，每人一碗肉丝面。这时国家对粮食已经实行统购统销，对城市居民按定量发放粮票。吃完夜霄，服务员进来收了每人三两粮票走了，周恩来继续忙起来。

周恩来在北京忙了几天，便准备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和留在那里的几个人会齐后再一起去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他也是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是代表，王炳南是秘书长，顾问有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倬如、雷英文，此外还有许多秘书，警卫，翻译，后勤等方面的人员，代表团共计约200多人，是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各国代表团中第二个大代表团。

离京前夕，李克农、师哲等人来西花厅向邓颖超辞行，邓颖超说：“祝你们一路顺风，杰出地完成工作。最近总理工作很忙，时常流鼻血，请你们经常关照他的健康和休息，你们也要自己注意身体，出国比不得在家里。”李克农、师哲说：“大姐交给了我们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总理工作起来简直是不要命，我们好几个人陪他都陪不起。不过大姐请放心，我们一定要照顾好总理。”

4月19日，周恩来离开北京，经两天飞行，4月21日到达莫斯科。大家会齐后，乘飞机从莫斯科起飞，4月24日下午抵达日内瓦机场。周恩来、张闻天等人身穿呢大衣，戴着礼帽从飞机上下来，风度翩翩地向汽车走去，等

候在机场上的几百名记者挤到周恩来一行的前后，拼命地拍照。周恩来看看照得差不多了，便对记者们说：“朋友们，我给大家带来了礼物。”吴冷西便从皮箱里取出周恩来的书面声明，散发给记者。记者们抢到了书面声明还不满足，又纷纷向周恩来采访。周恩来拉开汽车门，微笑地说：“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是寻求和平来的。谢谢大家。”说完钻进汽车，记者们一哄而散，纷纷向机场大楼跑去，争抢电话机。第一个抢到电话机的记者对着话筒吼叫起来：“日内瓦专电，题：迷人的周恩来。重要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长周恩来于今日下午抵达日内瓦机场，周穿着剪裁合体的毛式制服，显得年轻而又潇洒，他的迷人的外交风度使记者们激动不已……”

周恩来抵达日内瓦不一会儿，莫洛托夫率领的由30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也到了日内瓦，这也是各国代表团中最大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共有19个国家，其中有15个国家派兵参加了侵朝的联合国军。美国首席代表杜勒斯来日内瓦前，特地地下了一道禁令，不许美国代表团成员和周恩来握手，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碰到了许多困难。但是周恩来是何等地聪明能干，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9年时间，他都是在重庆、南京的谈判中渡过的，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美国大使赫尔利等人打过不少交道，有着丰富的谈判斗争的经历。经过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共同努力，再加上莫洛托夫的支持配合，会议开到第51天时，终于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

日内瓦会议开始以来，一直在讨论朝鲜问题。经过各国代表团协商，一致同意由苏联首席代表莫洛托夫和英国首席代表艾登担任会议主席。6月15日的大会，该由艾登担任主席了，周恩来有些担心，在侵朝的联合国军中，除美军外，英军最多，英国的政治态度可想而知。

会议开始后，首先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席代表南日提出六点建议，要求各国政府保证朝鲜的和平。这个建议合情合理，周恩来发言表示支持：“我们没有理由不在南日外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七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南朝鲜代表卞荣泰接着发言：“朝鲜的和平首先是外国军队的撤退问题……”一语未完，美国代表一声大吼，喝断卞荣泰的讲话，接着他站起来，指着卞荣泰的鼻子大骂，直骂得卞荣泰满脸通红，无地自容，连一句话也不敢说。美国代表骂够了，才坐下去，把双腿翘在桌子上，全无外交礼仪。比利时等国代表无不摇头叹息，会议主席艾登也面有不悦之色。

这时，莫洛托夫站起来了，提议说：“我建议与会十九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此语一出，会场顿时大乱，艾登只好宣布休会，美国代表立即拉着联合国军各有关国家跑出去商量去了。

复会后，美国代表史密斯首先发言：“我反对苏联的提议。”泰国代表接着站起来，宣读匆忙拟定的《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以人多势众压倒中苏朝，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泰国代表宣读完声明后，十六国代表一派喝采声。

周恩来等他们闹得没有劲了，又开始发言：“会议已开了这么久，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许多人被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会场上一阵短暂的沉默。比利时外长斯巴克站起来，环顾左右，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份，可以研究。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艾登主席立即接过斯巴克的话题说：“比利时代表队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上出现了空前的寂静，人们纷纷用点头的方式表示赞同艾登的话，艾登敲了一下桌子宣布：“通过。”

会场上突然一声大叫：“不！”大家循声望去，原来是美国代表，只见他仓惶地站起来，气急败坏，结结巴巴地说：“我请示我……的政府之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众人看着美国代表，又好气，又好笑，但那些十六国代表谁也不敢驳斥他。得罪了美国，就没有了美元的援助，那还得了。大家都转过头来，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缓缓地站起来，微笑地看了会场一眼，人人都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友谊、善良和坦诚。大家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的演讲：“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上静静地，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周恩来，就连美国代表也快速地记录着周恩来的讲话。突然周恩来的一句话使他们大为震怒，只听周恩来说道：“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美国代表还未反应过来，艾登主席敲桌子，宣布：“把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载入会议记录。”

美国首席代表杜勒斯原以为凭着自己的丰富的外交经验，一定可以在日内瓦把周恩来弄得狼狈不堪，不料入阵以来，被周恩来斗得连连败阵，一气之下，干脆回国了，让副代表史密斯代理首席代表的职务。杜勒斯叮嘱他：“你一定不要和周恩来握手，这是纪律。”史密斯说：“国务卿先生，你放心吧。”

杜勒斯走后，史密斯满腹心事，想着这差事怎么干，明明是强词夺理嘛，怎么能让人家十六国服，想来想去，决定应付完这个差事后，回国辞职，同时他也感到周恩来不简单，极想找个机会对他表示友好。散会后，史密斯来到休息厅，远远望见莫洛托夫和周恩来在谈话，各国代表端着杯子，不断过去和他们握手碰杯。他顿时想出个好主意，挤进去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拉拉周恩来的衣袖。周恩来何等聪明，立刻理解了史密斯的善意，端起杯子和他碰了碰杯，以表示回礼，史密斯连说：“谢谢。”

正当日内瓦会议上各国代表舌枪唇剑地争论时，奠边府大捷的消息传到日内瓦。此役法军被歼1万7千人，越南人民军获得空前大胜，法军被迫从越南撤出，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的问题达成协议。

日内瓦会议结束了，会议完全达到了中国代表团预期的目的，可是周恩来却累得流了几次鼻血。8月31日，代表团回到北京，刘少奇朱德等到机场迎接。李克农和师哲对邓颖超说：“大姐，给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好。”邓颖超拍拍他们的手笑着说：“这就不错了，你们真够辛苦的了，快点抓紧时间休息去吧。”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以后，邓颖超看看周恩来，心疼地说：“都瘦了一圈，

该喘喘气了，就是机器也得加加油了。”周恩来刚想回答，电话响了，是秘书来的，让他赶快到丰泽园去，毛主席有事要和他商量。周恩来放下电话，提着文件夹，对邓颖超作个滑稽的笑脸，便走了。邓颖超无可奈何地笑笑：“都这么大了，还那么调皮。”

周恩来赶到菊香书屋时，看到房里烟雾腾腾，真挚地劝道：“主席，你要少抽些烟，抽烟对身体不好。”毛泽东叹口气说：“是啊，银桥他们一再劝我，还给我买了些糖。可是不行啊，工作太辛苦，还得抽，这一辈子是戒不了啊。”

毛泽东把烟头掐灭，拿过一大叠文件递给周恩来说：“这是宪法草案，这是国家领导机构候选人名单，你先看看吧。”这些文件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多次，周恩来已经熟悉，但他还是认真地读起来。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最后是国家领导人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副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这些人选在党内党外多次进行了酝酿，大家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周恩来也没有新的意见。说完这件事，毛泽东问道：“今年，是多事之秋啊。9月要开人大，接着是国庆节。赫鲁晓夫要来访问，中央决定你和他会谈，收回旅顺军港。还有其他问题。当然，开场锣鼓还是由我来敲。我访苏时赫鲁晓夫地位还不高，每次和斯大林会谈，他都站得远远的，对他了解不多，你说说这个人怎么样啊？”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同志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从小家境贫寒，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容易感情冲动。和他打交道，比与斯大林、莫洛托夫打交道轻松得多。”

毛泽东听了，笑着问道：“他大概还能喝酒吧，上次把你灌得够呛。这次我们要好好招待他，让他充分品尝一下中国的美味佳肴。”

说话间，1954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9月28日正式闭幕。人大会议的成功为首都北京更加增添了节日气氛，真是政通人和，百业兴旺。

9月29日，赫鲁晓夫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到达北京，机场上举行了最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正步通过检阅台，礼炮隆隆作响。从机场到西郊万寿路国宾馆，沿途挂满了彩旗，几十万人手捧鲜花和中苏两国国旗，载歌载舞欢迎苏联党政代表团，赫鲁晓夫站在敞篷汽车上，高兴得眉飞色舞。

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典礼以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颐年堂开始了中苏两国最高级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及陈云、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李富春5位副总理。苏方参加会谈的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服务员不断地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香茶，赫鲁晓夫等人一面品尝，一边赞不绝口。

毛泽东首先说话了：“适值我国国庆之际，赫鲁晓夫同志率团访问我国，我们非常感谢。一般地说，我们之间的問題或意见都是随时提出，随时解决，没有积累下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有这个极好的机会，再交换点意见。现在国

际形势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这和苏联对我们的支持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朝鲜战争时期，斯大林同志应我们的要求，延期撤退驻中国旅顺口的苏联海军，我们非常感谢。现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将热烈欢送他们回国。”

赫鲁晓夫说：“帝国主义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动。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对中苏友谊将作出更大的贡献。”毛泽东反驳说：“帝国主义确实没有睡觉，但他们的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一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从前了。苏联海军撤出旅顺港不仅是适宜的，也是必要的，这将会大大增强中苏友谊，也将会极大地提高苏联在世界上的威信，提高赫鲁晓夫同志在世界上的威信。”赫鲁晓夫一听高兴了，点点头说：“既然中国同志考虑得这么周到，那就让苏联海军撤出旅顺港，军港设施都免费赠送给中国。”

这时服务员又端上来一道道食品和中外名酒，让客人品尝。赫鲁晓夫给自己倒满一杯茅台，一口喝光，连连咂舌赞叹：“好酒，名不虚传。”他高兴地问：“中国同志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要求，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稍停了一会儿才说：“你们搞那个东西干什么，我们这个大家庭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那个东西太费钱了，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说：“那么我们先进行科研，培养人材吧，请苏联先援助我们一个小型反应堆，这总可以吧。”

赫鲁晓夫面有难色，好一会儿才勉强答应下来：“好吧，我们为中国提供一个小反应堆，借这个条件培养干部。”他又建议道：“是不是中国同志可以考虑加入东欧经互会组织，这样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长，互相协作，共同繁荣。比如中国的农业人口很多，可以集中力量尽快发展农业，还可以尽快发展矿产生产。你们提供粮食和原料，我们供给你们机床和工业品，这不是很好吗？”

毛泽东一口否决，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个必要，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碍建设的发展。”

赫鲁晓夫一听，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不高兴地说：“好吧，既然中国同志不想加入，那我们也就不邀请了。”

赫鲁晓夫闷闷不乐地回到万寿路宾馆，问布尔加宁说：“你看今天会谈怎么样？”布尔加宁说：“毛泽东很精明，他知道怎样说服我们。”赫鲁晓夫把一杯伏尔加倒到嘴里，怒气冲冲地说：“中苏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有办法使他们留在大家庭内。”布尔加宁问道：“什么办法呢？”赫鲁晓夫打开收音机，然后在布尔加宁耳边嘀咕了一阵。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三十六回 害忠良康江诡设开会计 蒙冤屈潘扬忽作阶下囚

话说毛泽东在 10 月 3 日和赫鲁晓夫会谈，逼着赫鲁晓夫当场答应从旅顺军港撤走苏联海军，后来又接连和赫鲁晓夫会谈三次，终于使赫鲁晓夫同意于 1955 年，也就是明年 5 月正式把旅顺归还中国。接着周恩来又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和赫鲁晓夫会谈，双方签订了《关于将各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公报》、《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联合公报》、《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公报》、《关于修建从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联合公报》、《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

这里所讲的股份公司是什么呢？原来是从 1950 年以来，中苏两国在新疆省办的开采有色及稀有金属的合股公司、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合股公司、在大连办的建造和修理轮船的合股公司、中苏两国合股组织和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协议规定这些合股公司自 1955 年 1 月 1 日起完全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中国的苏联股份的价值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供应苏联通常出口货物的办法，在数年之内偿还。

此外，两国政府还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给予中国政府 5.2 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关于苏联政府帮助中国政府新建 15 项中国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协定规定的 141 项企业设备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10 月 12 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中苏举行会谈的公报》和上述各种单项公报。消息传来，中苏两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欢呼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就是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各共产党人，也都是热烈欢迎中苏联合公报的发表。这是中苏两国最友好的一个时期。

平心而论，在这次最高级会谈中，中国所要求苏联答应的东西，都是一些最起码的主权要求。旅顺港应是不待中国提出来，苏联就该主动地归还中国。修建国际铁路，那是对两国都有好处的，说不上是苏联的恩赐。至于 5.2 亿卢布的贷款，听起来多，但远远抵不上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费用。将近四年的朝鲜战争，中国至少花去了 62 亿人民币。三十六万志愿军战士在战争中伤亡，他们宝贵的生命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中国人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为中国、也为苏联换取了边界的安宁和一个长的和平发展时期，这个价值又是有多大。

但不论怎样，5.2 亿卢布的贷款总是一种友谊的表示。从此开始，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去苏联学习。李鹏、邹家华自 1948 年去苏联留学，现已进入大学，分别学水电和机械。中国政府又选派江泽民等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子去苏联留学。江泽民原是上海交大的学生，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搞学运。到苏联后他先是进大学学习，后被分派到工厂去实习。工厂里女工很多，姑娘们见中国留学生来实习，非常高兴，处处照顾他，下班后，大家又都拉着江泽民去跳舞，江泽民也非常尊重她们。姑娘们见中国大学生不抽烟，不喝酒，埋头学习，工作苦干，都爱慕得不得了，纷纷和江泽民合影留念。江泽民后来回国了，姑娘们把与他合影的照片保存好，以作为这段中苏友谊的纪念。

中苏联合公报发表后，赫鲁晓夫一行南下访问，沿途党政官员隆重迎接，盛宴招待，不觉又到广州，受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书记处书记赵紫阳的热烈欢迎。他们为客人们奉上了广东最名贵的粤菜龙虎斗，苏联客人们一

见菜盘中偃卧着两条狰狞可怕的蛇，个个大惊失色，文化部长福尔采娃等几个女宾竟吓得哭起来。陶铸一看不妙，赶紧让人把菜盘端开，好言解释了一番，福尔采娃才止住哭。除了这个插曲以外，苏联客人在中国的旅行非常愉快，这且按下不提。

再说赫鲁晓夫走后，毛泽东又忙着处理各种公文。根据康生的报告，潘汉年、扬帆和饶漱石关系密切，并且和1950年初在上海大轰炸有关系。康生要求将他们隔离审查，毛泽东想了一下，觉得有必要对他们审查一下，以弄清问题，便批示同意审查潘扬二人。接着他又看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将在年底召开，毛泽东已决定不担任政协主席，经和政协委员协商，大家一致同意推荐周恩来为政协主席候选人，宋庆龄、董必武、李济深、张澜、郭沫若、彭真、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李维汉、李四光、陈叔通、章伯钧、陈嘉庚、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包尔汉为副主席候选人。

公文太多了，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中宣部关于胡风上书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批阅了一会，端水去喝，茶杯里已经没有水了，他使用手指头捞起茶叶放到嘴里嚼起来。

忽然门一开，江青闪了进来。毛泽东抬头一看，江青怒气冲冲地，脸色很不好看。毛泽东奇怪地问：“你又怎么了？”江青把文件包往桌上一扔，骂道：“这个邓拓也太狂了。”毛泽东点起一支烟，抽着，等着江青汇报。江青说：“我到王府井《人民日报》社以后，对邓拓说了，希望他能在报纸上转载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你知道邓拓说什么吧？”毛泽东问：“什么？”江青说：“邓拓说，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一句话就把我给打发回来了。他又不是不知道，转载李、蓝的文章，以其引起对胡适派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是主席的意思，他打我的脸，就是打主席的脸哪！”

毛泽东还是没有作声，默默地抽着烟。过一会儿才说：“你把材料放这儿，我给政治局写封信。我就不信，没有他邓拓，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不起来了。告诉杨尚昆，从明天开始我不看《人民日报》了，让他们不要给我送报纸了。”江青答应一声就要走，毛泽东又叫住她，把一份批件递给她，吩咐说：“你把这份批件送给康生，潘汉年、扬帆可以先让他们来北京交待问题，审查期间生活上要予以照顾。”江青心中暗暗高兴，把文件给康生送去。康生接过文件一看，说：“好了，有了主席的批示，一切都好办了。不过，扬帆是公安局长，手下有很多人，得想个妥当的办法才好。”康生想了一下，眼珠咕碌一转，计上心来，对江青耳语一番，江青大喜，连连点头。

扬帆从巴尔维哈回来后，自知江青不会放过他，已做好了精神准备，但他万万想不到，这一天来得是那样的奇特。

1954年12月31日下午6时，扬帆和妻子李琼及6个孩子正在吃团圆饭，因为明天就是元旦，扬帆还破例为自己倒了一杯酒。大家刚在饭桌上坐定，忽然电话铃响了，扬帆拿起电话，原来是华东局公安部许建国打来的。只听他在电话里说道：“扬帆同志吗？你马上来，有个案子，车子已经接你去了。”扬帆是上海市公安局长，又是华东局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是他的上级，又是亲密战友，不知有多少次，扬帆被许建国从饭桌旁、被窝里叫去开会，研究案情。所以他一听许建国叫他去开会，以为发生了重要案子，没有多想连忙提起公文包向门外走去。

弄堂口果然停着一辆车，车上除司机外，还坐着一个警察。扬帆上车后，

车子便启动了，不过没有去市公安局，几分钟后在一幢花园洋房门口停下来。扬帆对这个地方太熟悉了，解放前这是军统的一个据点，解放后成为公安机关处理大案的一个地方，由于离他家不远，每次开会扬帆都是步行去的，何以今天派汽车来接，扬帆百思不得其解。

扬帆从车里钻出来，顿时看出今天这里气氛异常，楼前站满了武装岗哨，既有干警，也有公安部队。他刚从车里走出来，立即有几个干警站在了他的身后，华东公安部的副部长和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迎了过来，脸上冷冰冰的，没有笑容，没有握手，没有寒暄，默默地把他带上楼去。扬帆此刻一切都明白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许建国确实是在楼上等着他，不过不是在等他开会，而是向他宣布国家公安部的决定：“中央公安部来电，要你到北京把问题说清楚。”

扬帆就这样被拘留了。过了一天，他就被押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到北京后被拘留在一个四合院里。没有多长时间，公安部的几个干警走来，为首的一位负责人宣布：“扬帆，你被逮捕了！”扬帆问道：“为什么？”负责人冷笑道：“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与饶漱石是什么关系，上海大轰炸又是谁干的。”

扬帆正想分辨，负责人命令干警：“把铐子给他戴上！”两警察上来，麻利地捉住他的两手，“咔咔”两声把手铐铐在他的腕子上，扬帆的眼泪流淌下来，从1939年到皖南，为了保卫军队、党、人民，为了保卫新诞生的共和国，他出生入死，破过多少大案，有多少次，他“咔咔”地把手铐铐在敌人的手腕上，没想到，仅仅因为自己写了封揭发江青的信，竟被自己的战友戴上了手铐。

扬帆被捕的消息在上海市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中很快流传开来，潘汉年很清楚，扬帆一案完全是冤案，扬帆不但不是饶漱石的亲信，而且还差点被饶漱石“打发”了。那正是1943年，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有一个在上海工作过的人忍不了拷打，乱咬乱供，给扬帆栽了赃。康生正好想找机会整扬帆，好向江青讨好，立命华中局饶漱石逮捕扬帆。潘汉年当时是华中局情报部长，奉命审查扬帆，得知其中原委后，决心平反这个冤狱。恰好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开始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康生一看形势不妙，开始装病。中央查清扬帆一案纯属冤案，便电令华中局释放了扬帆，恢复了工作。

由于这样一段经历，潘汉年对扬帆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决心适当的时候，出来为扬帆说话，争取平反这个冤狱。他哪里想到，为了把扬帆扳倒，康生决心把长期在敌占区做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扳倒，再把扬帆和潘汉年扯到一起，那时叫他们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连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没有办法插手。康生当然知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道理，要搞情报工作，就得和敌人周旋，就得钻进敌人心里去。但也正因为这样，可以随便给他们扣上内奸、特务的帽子，谁能说清楚你当年没有给敌人送过情报呢。就在潘汉年想着如何平反扬帆冤狱的时候，康生的魔爪已经悄悄地向他伸过来了。

扬帆被捕以后，转眼间两个月的时间过去了，1955年的春天到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百花吐艳，群莺乱舞，上海的市民们纷纷乘车去苏州、杭州踏青。寒山寺里，笑语阵阵；西子湖畔，倩影双双。潘汉年一来情绪不好，二来工作太忙，就没有这个福份了。自饶漱石出事后，他越来越成为运动的重点，潘汉年满腹委屈不知从何说起，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个注定要

葬送他一生的冤狱之门已经向他张开了大口。

1955年3月15日下午2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坐着一辆黑色的雪亮的伏尔加轿车来到新落成的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为大厦的落成剪彩。与大厦前恭候的中苏两国官员和来宾握手见面后，他手持剪刀，剪断红绸，顿时军乐队奏起了欢快的歌曲，人们唱着《毛泽东——斯大林》的歌曲进入展览大厅参观。

潘汉年和苏联专家进入厅内，专家不停地用俄语向他讲解着展览的内容，潘汉年不时用俄语和他们交谈着。今天潘汉年显得额外精神，服装笔挺，皮鞋闪亮，风度翩翩，似乎是命运之神有意要他在告别人间的美好生活、进入地狱的瞬间，给人们永远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

秘书悄悄地走了过来，凑近他的耳朵轻声说：“潘副市长，北京来电话，要你去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潘汉年早知道今年要开全国代表大会，对高饶事件进行全面的清理。他对秘书说：“这事我知道。”秘书说：“北京来电话，要你先去北京。”潘汉年问：“什么时候？”秘书说：“今天晚上就走，车票已经给你买好了。”

潘汉年觉得很突然，有什么必要这么神秘，不过既然是中央的通知，那他也只有服从。

此日晚上，潘汉年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第二天下午到了北京。几个人已经在车站月台接他，他们不冷不热地接过潘汉年的皮包，让潘汉年上了等在月台上的汽车。潘汉年刚钻进汽车，从两边的车门里各上来一个人把他夹在中间。潘汉年顿时明白了，他已被捕了。汽车在北京城郊的一个独立小院里停住了，警察把他领进一间铺着红地毯的狱室，向他宣布：“潘汉年，从今天起，你被拘留了。”紧接着，一个警察用提盒送来了饭，然后警察们都走了，哐啷一声从外面把狱门锁上了。潘汉年坐了一夜的火车，肚子已饿了，但他一点也不想吃饭，只是用双手捂住脸任冤屈的泪水往下淌。

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中午，几个警察涌进来，命令潘汉年：“快收拾一下东西，给你挪挪地方。”囚犯有什么东西，不过是几件衣服。潘汉年跟他们出来，上了囚车，坐在前面的警察忽然转过身来，拿出一副手铐说：“潘汉年，戴上！”说着“咔咔”两声，把手铐铐在潘汉年的手腕上，潘汉年知道自己出狱无望了，对此已无动于衷。

就这样，扬帆和潘汉年在他们最愉快的时刻忽然被捕，被捕的方式又是这样的神秘和奇特，以至于他们在走向监狱时，还以为是去参加党的重要会议，竟连和妻子诀别的话都没有留下一句。

尽管如此，由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认真执行中央的有关指示，潘汉年、扬帆在监狱里还没吃太大的苦头，享受着单间狱室的待遇，伙食也比一般犯人好些。但罗瑞卿知道，再好的监狱还是监狱。他想象得出，扬帆、潘汉年在监狱里度日如年，祈盼着平反昭雪的凄苦心情。罗瑞卿知道扬帆是冤枉的，他在上海逆用台湾特务地下电台是报告了中央并得到批准的。但一则这个案子是政治局委员康生亲自抓，二则毛泽东已在1954年3月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点了扬帆的名，把他和饶漱石挂到了一起，自己不好说话了，真是爱莫能助。今后等待着扬帆的已不再是审查，而是无穷无尽的黑牢生活。想到这里，罗瑞卿心中有些不安，决定去阜城门监狱看看扬帆，让他对未来的厄运有点思想准备，也算是尽一点战友之情。

这天，扬帆正在狱室里写材料，典狱长打开牢门，朝扬帆喊道：“扬帆，

过堂！”扬帆跟着典狱长来到一间小会议室，只见会议室里一个大个子背朝着门站着，典狱长恭敬地向此人报告说：“扬帆带到。”待典狱长出去了，这位大个子才转过身来，原来是名震中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扬帆见到以前的老上级，很想倾诉委曲，但犯人的身份又使他把话咽了下去，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等待讯问。

罗瑞卿叹口气，指指沙发说：“坐吧。”扬帆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罗瑞卿故意厉声问了他几个问题，然后才轻轻问他：“你在巴尔维哈碰见谁了？”扬帆说：“蔡畅。”罗瑞卿又紧问一句：“还有谁？”扬帆明白了，答道：“还碰见了江青。”罗瑞卿意味深长地点头说：“对，还有江青。麻烦就在这里。1937年你向延安告了她一状，她现在可是要报复了。”扬帆激动地说：“江青在上海的那些事，文艺界是都知道的嘛，这些人还在，可以作证嘛。”罗瑞卿摇摇头说：“扬帆，我看你这个公安局长白当了。你怎么也不想想，谁会为了一个阶下囚，去得罪毛主席的夫人！”扬帆气呼呼地说：“我要向中央写信，向公安部申诉。”罗瑞卿叹口气说：“晚了，毛主席知道你的事，问题是有的大人物做了手脚，把毛主席欺骗了。毛主席已经讲了话，你的案子是翻不过来了。我今天冒这么大的风险来，就是给你亮亮底，你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罗瑞卿看扬帆低头不语，十分愁苦，又安慰了他一句：“你也不要压力太大，我只要当着公安部长，就不会让你在牢里吃苦，你可以走了。”

罗瑞卿看着扬帆步履沉重地被典狱长押回监狱，自己又无回天之力，不禁有些悲伤。他最清楚扬帆的功绩了。上海解放以后，陈毅任命陈赓为上海市公安局长。陈赓在三十年代率领特科，在上海镇压叛徒，收集情报，熟知上海社会政治情况，这一任命确实吓坏了许多暗藏的敌人。但陈赓这时已是强大的第四兵团司令员，奉命率部南下，哪有许多时间管上海的公安工作，所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工作实际上由副局长扬帆主持。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撤出上海前，布下了大量潜伏电台和匪特，又派出特务来上海行刺陈毅。在这解放前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亚洲第一大都会与匪特斗争，破获国民党特务电台网，谈何容易。但是扬帆知难而上，率领上海公安干警接连破获国民党特务组织，逮捕了大批特务分子，收缴了国民党特务电台，同时，扬帆又带领干警，取缔黑社会组织，封闭妓院，很快把乌烟瘴气的旧上海的污浊社会垃圾清扫干净。

罗瑞卿还想起了扬帆破获刘全德刺杀陈毅一案的过程。1949年上海解放后，台湾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上校特务刘全德来上海刺杀陈毅。扬帆事先获得情报，刘全德一登陆，就被盯上了。谁知刘全德十分狡猾，过去又长期在上海活动，熟悉上海，竟逃脱了干警的监视。扬帆果断地启用第2号作战方案，很快发现了刘全德的线索。扬帆亲自指挥，趁刘全德不备，一举拿下，押往北京公安部。

在那几年的共同战斗中，罗瑞卿和扬帆有多少次共筹大计，又有多少次共庆胜利。但是一夜间，扬帆成了囚徒，自己明知扬帆冤枉，但却爱莫能助，真是痛苦万分，因此，当康生催问案情时，他的心中十分不快，言语上也就有几分冷淡。

那是他从阜城门监狱回来后，还没有来得及擦一把汗，康生的电话又过来了：“罗部长么，你们公安部是怎么搞的。潘、扬一案为什么进展这么迟缓呀？潘、扬的问题的要害是以逆用敌台为名，实际上向敌人送情报，以及

扬帆在三十年代陷害江青同志。这个案子你要亲自督办，及时向我报告。”罗瑞卿回答说：“康老，我们在这个案子上投入的警力是最多的，但办案需要获取确实的罪证，这就需要时间。我们总不能仅仅根据一些传闻来定他们的罪啊！”康生语塞了，继而大发脾气说：“罗瑞卿，这个案子是主席讲了话的，该怎么办，你看着办吧。”说完“咔”的一声挂上了电话。

康生刚放下电话，江青就跑来了。只见她身穿名贵的连衣裙，手摇香扇，在自己少女时代的情人跟前搔首弄姿，卖弄风情。康生知道江青是又来催问潘、扬的案子来了，忙说：“潘、扬一案现在还没有大的进展。不过，你别着急，办案嘛，总需要时间。”江青不满地说：“你向来办案极其迅捷，怎么对这个案子没有办法了？”康生说：“你又着急了，我已经想出了个好办法。潘、扬都是高级干部，定他们的罪，毛主席、周总理不会不知道，这就必须把案子做死。扬帆历史简单，不好下手脚。潘汉年因为一直做统战情报工作，历史复杂，容易找到突破口。然后把扬帆和潘汉年绑在一起做，这个案子就做死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也翻不了案。”江青不以为然地笑笑说：“就他们现在这样，还想翻案？”康生老谋深算地说：“这可难说啊。俗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政治风云的变幻有时确实难以预料。不过你放心，我已经想好办法，撇开罗瑞卿，直接办这个案子，你就放心吧。”

两人正说着，报纸送来了。康生一看社论，拍手叫好，忙递给江青，指着社论说：“你看这篇社论，把俞平伯和胡风捆在一起批，这下子让那些北大清华的教授们够受的。江青同志，这次你又为主席立了一功。我看你的想法与主席很对路，主席对你很信任，你就在这方面多做些工作，将来肯定有大收获。”江青笑而不语，忽然收起笑容，对康生说：“这才是个开头，热闹还在后头呢。这次再不能像批《武训传》那样草草收场，要动真格的。”说着伸出双手，做了个铐的姿势，康生心里一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三十七回 辩红楼俞平伯获罪 上意见张光人入狱

话说康生听到江青透露的消息后，不禁大吃一惊，以为要对俞平伯动真格的了。江青连忙解释说：“不是，不是，那个俞老头儿不过是个老学究，孤零零的，抓他干什么。批俞平伯不过是他做个引子，对知识分子来一个思想教育运动，肃清胡适派唯心论的流毒。另外也是指着秃子骂和尚，批批这个人。”康生紧张地问：“谁？”江青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子上写了个人名。康生惊异地问：“怎么是他？”江青得意地笑笑说：“你不知道吧，我给你透露透露……”

俞平伯和扬帆、潘汉年不同，既没有掌握权柄，又没有写过告状信，长年累月，埋头书斋，研究学问，对《红楼梦》很有研究，写过许多文章，是一位著名的红学家。这位俞老先生又非常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抓紧时间学习党的各种方针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后，他又抓紧学习毛泽东选集，努力用毛泽东的思想指导自己的科学研究，用阶段斗争的观点对自己的专著《红楼梦辩》进行了修改。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重视，形成了红学。清朝时，中国还没有正式的出版机构，这部书被人们抄来抄去阅读，既不知作者是谁，也不知书中所写内容的时代背景。于是很多人猜测这本书大概是写的明末清初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故事。由于他们以这个时期的历史隐事去比对《红楼梦》中的人和事，所以人们把这个学派叫索隐派。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之从美国留学归来，用从美国学来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红楼梦》，这才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乃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曹雪芹。曹寅是汉军旗人，是康熙皇帝的亲信。江宁织造品位不高，却是个极肥的美差，曹雪芹在曹府里过着穿金戴银，钟鸣鼎食的贵族子弟生活，和江南织造李熙的女儿青梅竹马，产生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恋情。雍正登基后，整肃吏治，曹寅被抄了家。曹雪芹父亲携子来北京，又遭到一次查抄，彻底败了家。曹雪芹无处栖身，在西山盖了两间草房避风挡雨。他感慨身世，遂萌生写书的念头，经十载披阅终于写出《红楼梦》前八十回。这时曹雪芹贫病交加，告别人世。他的好友高鹗替他补写了后四十回，《红楼梦》终于成书问世。

五四时期，像胡适这样研究《红楼梦》的有一批人，由于这些人研究《红楼梦》方法新，成绩突出，弄清楚了很多人关于《红楼梦》的问题，人们把他们叫做新红学派。

俞平伯先生就是新红学派的一员。20年代，他和学者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兴致很好，后来他把这些信稿集录出版，名《红楼梦辩》。解放后，他把这本书作修订后，再次出版，名《红楼梦研究》。由于曹雪芹的身世和书中主人公贾宝玉的身世极为相似，新红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情场忏悔之作。确实，《红楼梦》一书深深地打上了曹雪芹家庭及身世的深深的烙印，但这本书出版后，却起到了揭露封建社会，批判剥削制度的客观效果。俞平伯先生在新出版的《红楼梦研究》一书中也开始用新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其实，《红楼梦》的内容非常丰富，远不是用阶级斗争这个名词可以完全解释得了的，但不管怎样，俞平伯先生是在努力跟上时代的潮流。

《红楼梦研究》出版后，山东大学的两个毕业生李希凡、蓝翎认为俞平伯的观点不对，便写了两篇批判文章送到《文艺报》。该报总编辑冯雪峰不愿意登，李、蓝又送到母校的学报《文史哲》，结果登出来了，这两篇文章不知怎么叫江青看到了，马上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又让江青送到《人民日报》社，不料被邓拓拒绝。毛泽东大怒，于1954年10月16日，也就是刚送走赫鲁晓夫后，提笔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了一封信，他提笔写道：

驳俞平伯和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以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的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信写好后，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叫来，吩咐了一遍。田家英办妥了毛主席交办的事后，三步两步赶回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和胡绳等人讨论几个历史问题。从1950年以来，田家英一直忙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前三卷已经出版，第四卷的校订注释工作也快完成了。胡绳经常奉命和田家英一起参加中央交办的文字工作，所以大家都很熟了，无话不谈。

田家英回来后，胡绳等几个朋友问道：“伙计，有什么新精神？透露透露。”田家英压低嗓门说：“还不是为批俞平伯的事，这次主席对真发火了。”“听说李、蓝的文章是江青同志首先发现的，然后推荐给了毛主席。”田家英点点头说：“是这样的，密斯是个很不安分的人。她动不动就装病，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其实她是一心想摆脱毛主席的控制，按自己的意思演自己的戏。如果不是在毛主席控制下，密斯是要跳出来胡闹一通的。”李锐说：“近些时来，主席同少奇、恩来对经济工作看法很不一致。看来主席对财经工作不熟悉，缺乏这方面必须具备的理论，在经济理论方面尤其没有钻研过。处理经济的问题，就远不如处理军事、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田家英赞同地说：“我也有同感，主席应当摆脱日常事务，总结一些重大经验，专心于理论的著作。这样，对后代更有意义。”

几个人正说着，突然“密斯”来了。大家赶快闭上嘴，“密斯”进来后，在房里看看，见田家英的房间又潮又黑，卧室又小，一床一凳，别无长物，

嘲笑道：“田家英，你的卧室简直是个狗窝。”众人一听，顿生厌恶，田家英气得面色苍白。“密斯”走了，大家又批评起“密斯”来：修养这么差，哪里有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事情过去了好几天，秀才们对“密斯”的盛气凌人仍愤愤不平。正言论间，报纸到了，大家一看，报纸上大字标题《质问 文艺报》，对俞平伯的批判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对俞平伯的批判敲响锣鼓，报纸上又开始批判起了胡风。批俞平伯是思想清理运动，既然毛主席讲了对俞平伯还要团结，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就省去了不少麻烦。但继之而来的批胡风运动却让罗瑞卿忙上加忙，好几天没有离开办公室，电话铃声也就响得更频繁了。

胡风也是文化人，本名张光人，三十年代参加了“左联”的革命文艺运动，站在进步力量方面，同国民党当局作过斗争，对进步的文化运动有过贡献，鲁迅先生颇为重视。

1954年7月，胡风写了30万字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通称为“意见书”），全面阐述了他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批评意见。按照正常的手续，胡风把“意见书”面交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转呈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毛主席看了非常生气，政治局其他人也认为胡风的有些观点不妥，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954年底公布胡风的意见书，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全国大小报纸又批俞平伯，又批胡风，很多机关都组织知识分子学习，交心。

俞平伯是个学者，长期埋头于书斋，社会交往不多，他研究的对象又是一本中国古代小说，实际上和现实的政治牵连很少。胡风不一样了，他是个作家，又办杂志，又组团体，朋友很多。他写的“意见书”直接牵涉到对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评价，又是直接送交毛主席的，所以中央对胡风的批判重视得多。原来和胡风比较接近的那些人也都被列入重点批判清理对象。批着批着，快到5月中旬时，事情又起了变化。

这天，毛泽东收到了有关方面送来的一沓材料。毛泽东一看，原来是胡风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件。细读之下，毛泽东大吃一惊，转而愤怒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进来，毛泽东一迭声地喊道：“快，快请少奇、总理，叫罗瑞卿也来。”李银桥赶快拨电话。刘少奇、周恩来不知何事，急忙奔到丰泽园来。罗瑞卿也同时赶到，进了菊香书屋。毛泽东不及让坐，就拍着那沓信件说：“你们看，这是胡风的一个朋友交出的胡风的信件。过去说胡风集团是一个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有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刘少奇、周恩来见问题这样严重，都接过信件看起来，刚看了两页，不禁都皱起了眉头……

胡风问题的性质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又和刘、周等人商议了几个重大问题。这个时期，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有许多大事要做。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衔制。从今年二月以来，经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毛泽东接连发布命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为在部队实行军衔制奠定了基础。二是根据去年赫鲁晓夫访华时达成的协议，驻旅顺口的苏联海军将在今年5月底完全撤走，这是一件大事，有许多具体问题要处理。三是国务院决定今年全部国家机关人员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四是国务院要在今年废除全部旧人民币，发行新人民币。除了这些事以外，最近五个科伦坡国家已正式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共中央已决定周恩来率领由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商议了半天，定下来了一些事项，又重点讨论了实行军衔制的问题。这件事涉及到全军几百万人，可不是一件开玩笑的事。周恩来和军委对军衔的授予办法已讨论了很长时间，现在正好把讨论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毛泽东作汇报。

周恩来说：“将军们在讨论中都提出来一个要求，希望主席能接受大元帅军衔，象斯大林一样。”毛泽东又摆手，又摇头说：“不要不要，我是不当什么大元帅的。不但我不当，恩来、少奇、小平你们也不要当，我们给全军树立个榜样，不要去争军衔的高低。大家都让起来，这事就好办了。”刘少奇、周恩来笑笑说：“我们原来就没想到要当什么元帅。”正说着，邓小平和林彪又一前一后地来了，他们是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见刘少奇周恩来说不当元帅，也连忙表态：“我也不当。”林彪也跟着表态不当。毛泽东笑笑对林彪说：“你还得当，军事方面的工作你要多做些。”林彪忙答应下来。

周恩来因为忙着要准备出国的事，便先告辞了。过了几天，周恩来准备率团出国，公安部免不了又要做许多安全方面的工作。这时，中国的民航飞机还不具备飞国际航线的能力，周恩来这次出国包租了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这架飞机当时正停在香港启德机场。临行前，中央决定周恩来先去缅甸访问，由那里直接飞印尼，故周恩来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了，中国记者和一些工作人员来到香港，准备乘这架飞机去印尼。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定于4月11日起飞。一早起来，机组忙着作出发前的准备工作，因为这次乘坐飞机的是和他们印度总理尼赫鲁一起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周恩来总理，不能马虎。

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的新华社记者沈建国等记者们已经登上了飞机，但是周恩来还没有来。预定的起飞时间到了，机长突然得到通知，周恩来总理因故，已改乘别的飞机去万隆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可以起飞了。

偌大的飞机，就坐了七八个记者，机舱里显得非常的安静，一种细微的“滴答”声隐隐从行李舱里传出来。可惜这些记者很少坐飞机，把这种不祥的滴答声误认为是飞机上的仪表走动声。再说，这些记者们为报道好万隆会议，查资料、听指示，写提纲，忙得团团转，都想抓紧乘机休息一下。因此，谁也没有对这异常的响声产生怀疑。

飞机起飞了，几分钟后就进入航线，下面是万顷碧波，令人赏心悦目。正飞着，突然一声爆炸，浓烟顿时从机身上冒出来，机组人员赶紧采取抢救措施，根本无济于事。瞬间，飞机已被大火包围。机长知道飞机无救了，他望望座舱里的这几名中国记者，只见他们面色苍白，神情冷峻，静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着死神的到来。机长遗憾地宣布：“先生们，由于不明

原因的爆炸，飞机已无法挽救，永别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紧接着拖着烟和火舌坠入大海。

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太平洋上空爆炸坠落的消息顿时成为世界各大报的头号新闻，印度政府出动飞机军舰寻找生还者，结果只救回了三名机组人员，乘客和其他乘务员全部遇难。与此同时，香港当局的警务人员也对飞机在启德机场停留时间内，接触过飞机的人进行侦察。机组人员获救后，讲了飞机爆炸、起火、坠毁的全过程，香港警方怀疑是有人企图谋害周恩来总理，在飞机上装了定时炸弹，遂进一步侦察，很快侦破此案，果然是有人做了手脚。此人姓周，系台湾特务，探知周恩来要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去万隆开会，便利用飞机在启德机场停留之际，在飞机里装上了定时炸弹，然后溜之大吉。

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之谜大白于天下之后，全世界人民都被这一凶残的暗杀阴谋所震惊，国内的人们都在睁大双眼寻找反革命，一个肃清内部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正在全国兴起。胡风及他的那些朋友们的信件马上被看成是反革命密信，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把这些信中的话摘录下来，以《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为题发表。他彻夜埋头疾书，为这些材料写了很多按语，指出这些语句的要害所在。

在此同时，公安部大院里一派出战前的紧张气氛，办公大楼里干警出出进进，一辆辆警车都进行了全面检修，将要出击的干警们都在反复熟悉地形、道路。

1955年5月13日夜，人们都进入了梦乡，突然，从天安门城楼对面的公安部大门里，一连驶出几十辆满载干警的吉普车，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从1月以来，胡风眼见报纸对他的批判愈演愈烈，不禁心情沉重起来。5月13日，《人民日报》忽然登出了他给一个朋友的信，把他们改称“反党集团”，知道事情不妙，但还没有想到有这么快。这天晚上正要入睡，忽然有人敲他这座四合院的大门。胡风问道：“谁呀？有啥子事情？”对方是居委会主任，回答道：“清查户口。”胡风打开门，五六个警察冲进来，“咔咔”两声给他戴上手铐，为首者宣布道：“胡风，你被拘留了。”接着把他押到书房里开始查抄。

于此同时，胡风的许多朋友也被逮捕，查抄到了大量的来往信件。

罗瑞卿把抄来的信稍加整理后，立即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一边看着，一边骂道：“芦甸在信里说要以攻为守，是了，胡风的上书言事就是这个策略。这又是一封，你们听他说些什么，‘那些封建潜力正在疯狂的杀人’，这些反革命分子对我们的镇反运动害怕了，骂我们了，被敌人骂光荣得很。这个张中晓是什么人，中美合作所特务，他的反革命感觉很灵嘛。我们的好些人，政治嗅觉大大比不上他，必须提高阶级警惕性。这一封写得更可笑，竟说革命力量是‘枯黄的叶子’，‘腐朽的尸体’，要‘呜呼完蛋’，哼，自己欺骗自己。我看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

毛泽东批点完了，把这些信件归拢到一起，指示秀才们把批点过的那些段落摘出来，编成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加上自己的按语，送交《人民日报》发表。

忙了一大气，毛泽东有些饿了，卫士送上一茶缸煮好的麦片粥，毛泽东刚接过去要喝，电话铃响了，卫士拿起耳机问道：“喂——你是谁？不行啊——主席正在吃饭——好吧，你等着。”他转过身报告说：“陈伯达的电话。”

毛泽东一手端着茶缸，一手拿过耳机，说：“我是毛泽东啊——你咕咕哝哝说些什么呀，我听不懂，你让秘书说。”

对方的秘书接过电话刚讲了几句，毛泽东气得把茶缸扔在桌子上，吼道：“好啊，邓子恢是吃了豹子胆啦，要搞独裁！”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三十八回 稳农社邓子恢遭贬 反冒进周恩来结怨

话说毛泽东放下电话，怒火中烧，立即打电话让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一趟。放下电话，毛泽东坐在沙发上气冲冲地等着邓子恢到来。

毛泽东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呢？说来话长。原来还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在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组织起来。他深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没有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只是推倒了皇帝，原因就在于农村没有一个大的变动，没有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在湖南领导农民运动，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立即改变土地政策，在所有的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农民，取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终于夺取了全国政权。

建国后，全国农村都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但是，农村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又立即开始了，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又会出现新的地主、富农，而因种种原因又重新贫困下去的农民会抱怨共产党见死不救，结果是工农联盟受到破坏，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必将受到损害。要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不仅是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共识。

但是，在如何实行和准备用多长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大家却产生了分歧，主持农业合作化工作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坚持要照顾农村小农经济现状，主张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仍然占主要地位，反对脱离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过快地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这与毛泽东的想法大相径庭，毛泽东认为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工作，但一则运动刚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二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也都觉得邓子恢的想法有道理，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用 18 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工作。

但是，毛泽东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他查了一下《联共（布）简明党史》，发现苏联完成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六年时间，苏联能做到，中国为什么做不到。在他的鼓励和督促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果然进展很快，从 1951 年开始试行农业合作化开始，到 1953 年春时，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数万家，但随之带来的是农业生产下降，耕牛大量死亡。邓子恢经过调查后，建议收缩，刘少奇同意缩减，于是在 1953 年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克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和强迫命令。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两次批评了刘少奇，批评邓子恢“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决定全国农业社到 1955 年初时要发展到 60 万个以上，结果超额完成了计划。毛泽东很高兴，于 1955 年 1 月主持中央会议，决定 1955 年使农业社的数目达到一百万个。

事情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因忙于批俞平伯，批胡风，实行军衔制等重大问题，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查问农业社发展的情况。现在忽然接到陈伯达的报告，说邓子恢一下子砍掉了浙江省的 20 万个合作社，毛泽东本来就对 1953 年春邓子恢砍合作社不满意，这时不禁雷霆大怒，立即把邓子恢找来，劈头就问：“子恢同志，听说你砍掉了浙江 20 万个合作社，可有这事？”邓子恢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连忙否认：“这话从何说起，不要说砍掉 20 万个合作社，全浙江的农业社一共不到 6 万个呢。”毛泽东紧逼一句：“你这可是实

话？”邓子恢说：“主席你是知道我的，你们长征走后，我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什么时候动摇过，我就不想早一点建成社会主义？”毛泽东气消了一些，问道：“你总是砍掉了些农业社吧，不然别人怎么会告你的状呢？”邓子恢回答说：“不是砍，是整顿。浙江省今年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和发展，原因有二，一是粮食工作没有做好；二是农业合作社发展过猛，如果不采取措施，我担心出乱子。经请示少奇同志，对浙江省1万多个确实办得不好的农业社进行了整顿。”

毛泽东这才明白，陈伯达谎报了军情，不过他对邓子恢的整顿仍然不太满意。既然邓子恢口口声声说浙江农村情况紧张，他决定去南方视察一下。此时正是6月酷暑，毛泽东大汗淋漓地沿路视察，和农民谈话，听省市委书记汇报，直到6月下旬，才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就把邓子恢找来，兴冲冲地说：“子恢同志，这次我周游列国，收获很大噢。你说浙江省农村形势紧张，我去看了一下，不是这样嘛。群众和干部对解散一万个合作社很不满意，有的贫农气得躺在床上不出工，说叫办也是你们，叫散也是你们。还有的农民骂我们是小脚女人，一步三摇。你看骂得多好！谁是小脚女人呢？子恢同志你就是一个。我看咱俩的分歧很简单，就是一字之差。”邓子恢问道：“哪一字之差？”毛泽东说：“上和下。我要赶快上马，你呢要赶快下马，不是一字之差吗？你呀，叫胜利吓昏了头脑。”

邓子恢听毛泽东批评自己是小脚女人，很不服气，还要辩解，毛泽东摆摆手说：“算啦，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咱们商量一下，是不是对今年1月定的发展100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来一个修改。”邓子恢以为要压缩数字，忙问：“压缩多少？”毛泽东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说：“你又来了，我说的调整，是要在100万个的基础上，再发展35万个，今年共发展135万个合作社，怎么样？”邓子恢一听，连忙摇手：“不行，不行，这太冒进了。发展100万个也就够勉强的了，再加上35万个，那不是乱了套了。苏联在农业改造中就犯过冒进的错误，我们不能学他们。”毛泽东生气地说：“但是苏联不是只用了6年就完成农业改造了吗？你怎么把这个忘了？”邓子恢毫不退让，反驳道：“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那么多的土地，那么好的条件，人口比我国少得多，可是农业生产到现在都没过关，这，主席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毛泽东瞪大眼睛盯着邓子恢，气得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好嘛，你把农村部这几年的档案整理一下送到我这里来。”邓子恢只好答应了。

回到农村部后，邓子恢立即召集办公室人员，清理工作档案。陈伯达忽然跑来了，左瞧右看，指手划脚。邓子恢奇怪地问道：“老夫子，这里又不是中央研究室，你到这里干什么？”陈伯达拍拍邓子恢的背，揶揄地说：“主席怕你这个小脚女人走路不稳，让我来扶你一把。”邓子恢未及答话，电话铃声响了。邓子恢拿起电话，只听对方说道：“子恢同志，我是中央办公厅。我们通知你，主席派陈伯达同志担任农村部副部长，以后农业合作化方面的工作由他主管。”邓子恢放下电话，半天没有说话，心里直翻腾，陈伯达咕咕哝哝地只会咬文嚼字，根本没有搞过农村工作，他来主管农业合作化工作，不乱了套才怪呢。

在陈伯达的督促下，农村部把这几年的工作档案都集中起来送到丰泽园去，毛泽东立即翻阅起来，陈伯达不时地在旁边咕哝几句。看完了，毛泽东

合上卷宗，下了一句评语：“子恢右倾。”陈伯达听了，心中暗暗高兴，正想咕哝几句，毛泽东吩咐他：“立即通知中央办公厅，7月底召开农业合作化会议，让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都来。告诉他们，来时都带上几篇本省区办得好的合作社的材料，交到这里来。”陈伯达连连答应，回去布置去了。

邓子恢犯了“右倾”错误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耳朵里，他们得到7月底来北京开会的消息后，立即让秘书们搜集挑选了一批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绩和经验的材料，带来北京，交给毛主席。

7月31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首先在大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批邓子恢及支持他的那些大人物：“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有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

“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讲得很长，书记们认真地记着，会后分组讨论，对邓子恢进行了帮助，批评他的右倾思想，使书记们对毛泽东的报告学习领会得更深刻了。大家认识到，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最重要的首先是热情、积极，于是会后，书记们都以最大的热情，最积极的态度去推动农业合作化。

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不到三个月，也就是在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全会讨论了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邓子恢，最后通过决议，把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错误”性质确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时，毛泽东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即将出版，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和一百零四条按语，这些言论以极其热烈的笔触，赞扬了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带头人，尖锐地批评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也批评了在其他许多方面“作怪”的“右倾保守思想”，扩大了“反右倾保守”的范围，国家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冒进”的苗头。

毛泽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此前已经直接传达到农村党支部，各地党组织都在检查工作时的“右倾”，重新部署合作化工作，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的浪头。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结束后，这股势头来得更为猛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呈现超高速发展的大浪潮。尽管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仍然审慎地预计，到1958年才能完成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即绝大部分农户参加初级社；以后再逐步分期分批地由半社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即绝大部分初级社转入取消土地分红的高级社；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仍为十八年，但是，在“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领导面对盲目发展的局面，大都是予以热情的赞扬和鼓励。这样一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农村，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到1956年底统计时，全国96.3%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全国87.8%的农

户加入了高级社，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骤然完成了。和原来预计的十八年时间相比，足足提前了十一年。

农业合作化的猛烈推进也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私营工商业主和部分私营企业中的职工，天天到政府门前敲锣打鼓，请求批准公私合营。中央原于 1955 年 11 月拟定计划，预期用两年时间将计划提前，采取一次批准，全国合营的办法。1956 年 1 月 10 日，北京市首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此年年底时，全国 99% 的私营工业户，82.2% 的私营商业户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 年底，全国 91.7% 的手工业人员参加了合作社。

至此，党对农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改造，即三大改造均告胜利完成。

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过渡时期结束，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三大改造中，党和国家充分考虑和照顾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合作化运动使占农村大多数人口、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困难的贫农下中农得到利益，或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而农业合作化得到贫农下中农的热烈拥护。富裕中农也从党和国家的教育中明确合作社生产的发展也会使他们得到利益，因此，富裕中农对农业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至少是随大流的。公私合营中，党和国家对民族资本家采取支付定息、吸收工作的办法，使他们既能为国家出力，又不致很大地影响生活水平。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号称“纺织大王”的荣毅仁先生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民族资本家的态度。他于 1956 年初对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回顾了民族工业在解放前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勒索、濒于破产的历史，畅谈了自己对建国后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深切感受，然后诚挚地谈了自己对公私合营的看法：“对于我，失去的是我个人的一些剥削所得，它比起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是多么渺小；得到的却是一个人人富裕，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物质生活上看，实际上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还是过得很好。”这就说明，人民群众广泛地拥护三大改造。在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民经济仍然稳定增长。这一切都表明了，党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是成功的。

在三大改造中，党对民族资本家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政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第一次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创造了一系列由初级到高级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办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许多政策和理论。凡此种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所作的重要贡献。

在三大改造中，人们也或多或少地觉察和议论到了一些有关改造的问题，如是否有限度地保留一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有必要？如何发挥公有经济中的各方面的积极性等。但是由于三大改造后期的进程过于急促，来不及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这些问题最后被遗留下来。成为发展经济的不利因素。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现在还是回到 1955 年 8 月吧。

毛泽东看到全国热火朝天地大搞合作化，非常高兴。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工作已酝酿成熟，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22 次会议通过了授衔的决定。9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将帅名单。

元帅十名：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大将十名：

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五十七名：

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韦国清、乌兰夫、邓华、叶飞、甘泗淇、吕正操、朱良才、刘震、刘亚楼、许世友、苏振华、李达、李涛、李天佑、李志民、李克农、李聚奎、杨勇、杨至成、杨成武、杨得志、肖华、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张爱萍、陈士榘、陈再道、陈伯钧、陈明仁、陈奇涵、陈锡联、周桓、周士第、周纯全、赵尔陆、洪学智、钟期光、贺炳炎、郭天民、唐亮、陶峙岳、黄永胜、阎红彦、傅钟、傅秋涛、韩先楚、董其武、彭绍辉、谢富治、赖传珠。

中将一百七十七名：

丁秋生、万毅、王诤、王必成、王近山、王尚荣、王宗槐、王秉璋、王恩茂、王道邦、王辉球、王紫峰、韦杰、文年生、方强、方正平、邓逸凡、孔从洲、孔石泉、孔庆德、甘渭汉、卢胜、田维扬、邝任农、皮定均、成钧、毕占云、匡裕民、朱明、朱辉照、向仲华、庄田、汤平、刘飞、刘忠、刘少文、刘西元、刘兴元、刘先胜、刘志坚、刘转连、刘金轩、刘昌毅、刘浩天、刘培善、刘道生、孙毅、孙继先、朵噶·彭措饶杰、杜平、杜义德、杨秀山、杨国夫、杨梅生、苏静、李耀、李天焕、李成芳、李寿轩、李作鹏、李雪三、肖向荣、肖望东、肖新槐、旷伏兆、吴先恩、吴克华、吴法宪、吴信泉、吴富善、吴瑞林、何德全、邱会作、邱创成、余立金、余秋里、张震、张藩、张才千、张天云、张仁初、张令彬、张达志、张池明、张贤约、张国华、张经武、张南生、张祖谅、张翼翔、陈康、陈仁麒、陈正湘、陈庆先、陈先瑞、阿沛·阿旺晋美、林维先、范朝利、欧阳文、欧阳毅、罗元发、罗舜初、周彪、周仁杰、周玉成、周希汉、周志坚、周赤萍、周贯五、冼恒汉、郑维山、胡奇才、赵镭、赵启民、钟汉华、钟赤兵、饶子健、饶正锡、饶守坤、姚喆、贺诚、秦基伟、袁子钦、袁升平、莫文骅、聂凤智、聂鹤亭、顿星云、晏福生、钱钧、倪志亮、徐立清、徐深吉、徐斌洲、郭鹏、郭化若、唐天际、唐延杰、陶勇、黄火星、黄志勇、黄新廷、曹里怀、常乾坤、崔田民、康志强、阎揆要、梁从学、梁必业、梁兴初、韩伟、韩练成、韩振纪、彭林、彭明治、彭嘉庆、覃健、程世才、傅连璋、温玉成、曾绍山、曾泽生、曾国华、曾思玉、谢有法、赖毅、鲍先志、詹才芳、蔡顺礼、廖汉生、廖容标、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赛福鼎、艾则孜、滕海清。

少将一千三百五十九人，由于人多，这里不能备述。

军衔的评定大致上是按建国时的军事职务划分的，元帅均为全军总部领导人及各大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大将为大野战军领导人或战功特别卓著的主力兵团主要领导人，上将为兵团主要领导人，中将为主力军的主要领导人。少将是战功卓著的军师的主要领导人，如朝鲜战争时首战告捷的邓岳、血战铁原的傅崇碧等。其中，李贞少将是唯一的解放军女将军。

9月27日，授勋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宋庆龄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入会场，将帅们起立热烈鼓掌。毛泽东望望会场，只见会场里元帅和将军一律身着海蓝色将帅服，分外精神。他

不由得想起了井冈山时期的艰苦生活，不知为什么，他对将帅们的海蓝制服总有些看不惯，一想到他们都要在肩上戴上两块硬牌牌，更是心里不舒服。穿着这么高级的呢料礼服，还能像在井冈山时期那样，把自己的衣服让给放哨的士兵御寒吗？肩膀上挂着两块硬牌牌，又怎么为房东老大娘挑水哟，毛泽东不禁微微叹口气。

兴高采烈的将帅们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心理变化，他们静静地坐着，准备授衔。

典礼开始，首先授元帅军衔。朱德率元帅们走上主席台，排成一行。毛泽东依次授予元帅肩章和证书，并和他们紧紧握手。接着十位大将走上主席台，毛泽东依次授予他们大将军衔和证书。

然后毛泽东为在京的将军们授衔。由于人多，授衔时间拖得很长。周恩来见毛泽东面有倦容，便关照工作人员按 20 人一组让将军们上来接受军衔。结果速度大大加快。只是两位中将军的勋章给错了，周恩来得到报告后说：“不要紧，会后调过来就是了，先授衔要紧。”

在授衔的同时，还授予朱德等 131 人一级八一勋章，授予朱德等 117 人以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授予朱德等 570 人以一级解放勋章。很多过去率军打仗，建国后转入地方的党政要员得到勋章。

中南海授衔之后，各大军区举行授衔典礼，授予师团职干部以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军衔，并授予有功人员以勋章。然后各部队授予营连级干部大尉、中尉、少尉、准尉军衔，授予士兵以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军衔。

授勋仪式结束后，工作人员马上给朱德送来元帅工资，朱德留下了自己原来的国家行政三级的工资，多余的钱都让退回去。工作人员惊讶地问：“这是国家规定的元帅工资呀，为什么要退回去？”朱德开玩笑地说：“我还要继续进步呀。我拿了这么高的工资，都快到国家一级工资水平了，我以后还怎么进步呀？”工作人员无奈，只好把多出的钱送回去了。

工作人员走后，朱德忙着看文件，这时中央已指定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率聂荣臻、刘澜涛等人访问东欧各国。这个代表团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东欧结束后将去苏联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届时中共中央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将直接由北京赴莫斯科。

1955 年 12 月 11 日，朱德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也是中共中央代表团离京出国访问，周恩来、陈云、彭真等到车站送行。朱德一行在东欧访问了罗马尼亚、东德、匈牙利、捷克、波兰诸国，一路顺利，1956 年 2 月 4 日结束访问到达莫斯科，邓小平率谭震林、王稼祥、刘晓也从北京赶来汇合，一起参加苏共 20 大。

朱德、邓小平一到莫斯科，就感到气氛有些异样。仔细观察之后，他们才发现斯大林的画像已从许多公开场合消失了，他们不禁感到惊异，莫非苏共政策有变？

赫鲁晓夫听说中共代表团已来到莫斯科，第二天便约朱德到克里姆林宫见面。大家落座后，朱德、邓小平便介绍了一下中国国内的情况。由于当时在合作化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间有分歧，中国同志特别请赫鲁晓夫介绍一下苏联合作化的经验。赫鲁晓夫不屑一顾地说：“苏联农业集体化没有搞好，粮食产量长期低于革命前水平，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农民。他除了在 1928 年去过一次西伯利亚农村外，再没有去过农村，他只从电影中了解农

村。”

朱德、邓小平一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对赫鲁晓夫产生了反感。斯大林在时，此人一天到晚高喊：“斯大林是我们的父亲”，怎么斯大林刚一去世，他就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赫鲁晓夫看中国同志态度淡淡的，也就匆忙结束了会见。

转眼间就到2月24日，苏共二十大已到了尾声，会议充满了反斯大林的火药味。24日夜，朱德、邓小平准备按时去参加会议，但苏方的接待人员却迟迟不来，打电话询问，得到的回答是今夜的会议不邀请其他兄弟党代表团参加了，所以也就不便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什么会议这么神秘，大家猜了一会儿，也想不出来，只有先去睡觉了。

第二天大家一早起来，据工作人员报告，苏共二十大会议开了整整一夜，到现在还没有散呢。朱德、邓小平听了，暗自揣猜，昨晚的会议定非寻常，说不定苏共的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议论间，工作人员报告说：“会议散了。”朱德他们从窗口望去，只见黎明的莫斯科冷气逼人，苏共高级官员的车队不断高速驶过大街，街口陡然增加了值勤的警察。朱德回过头来，严肃地说：“从现在起，大家都不要随便出去，静候事态发展。”于是中共代表团都在驻地休息，等待苏共方面的通知。

第二天，苏共派人送来了会议的记录稿，并简要说明了会议的情况。原来昨晚果然发生了大事，赫鲁晓夫在会议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整整讲了一夜。大家赶紧看记录稿，不看则已，一看不由大吸一口凉气，原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斯大林骂得一钱不值，全盘否定了斯大林。邓小平生气地把记录稿扔在桌子上，愤愤不平地说：“怎么能这样胡来，斯大林是国际人物，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嘛。”尽管大家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很不满意，但因为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不好表态。

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后心里很不踏实，其他兄弟党都好办，就怕中国共产党起来反对。他连日指示有关方面不断地宴请中共中央代表团，自己也专门抽时间陪他们饮宴，以示亲热，希望中共代表团能有所感动，说几句支持他的秘密报告的话。朱德、邓小平等人尽管谈笑风生，但就是远远地躲开了这个话题。赫鲁晓夫尽管不悦，但也知道他们没有得到国内指示，不好表态，所以没有放在心上。再说，他也不怕中共起来反对。中国自朝鲜战争后，一直被西方国家孤立和包围着，只能从苏联得到援助和技术，难道中共领导人吃了豹子胆，不怕苏联撤销援助，撤走专家；不怕苏联陈兵边界，大军压境？一想到这里，赫鲁晓夫感到自己底牌很硬，中国肯定会乖乖地跟着走，所以他放开胸怀，频频劝酒，希冀朱德邓小平回国后，对中共的政策施加影响。

毛泽东已从新华社的电讯和驻苏使馆的报告得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尽管他一直生斯大林的气，但不允许赫鲁晓夫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但这是一件大事，要和政治局的同志仔细商量，首先要听取代表的汇报，了解他们的实际想法。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朱德去苏联各地访问，邓小平率团先赶回北京。他一下飞机，就被接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握握他的手说：“辛苦了，我把你从机场抢到丰泽园，卓琳同志（邓小平夫人）不会有意见吧？”邓小平知道毛泽东是在开玩笑，也打趣地说：“就是主席不抢，我也要先到主席这里汇报。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没有想到，没有想到。”毛泽东忙让卫士端上茶水，邓小平连喝几口，缓过劲儿来，开

始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邓小平汇报完了，他才问道：“依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邓小平一拍沙发扶手，坚决地说：“必须要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那就得准备和苏联闹翻，准备着他们撤援助，准备着大军压境。”邓小平说：“那也比当儿子党好受。”毛泽东看着邓小平，点点头说：“小平啊，你是人才难得啊。”

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时，署名《人民日报》编辑部。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很满意，文章发表后，他连看了数遍，浮想联翩。斯大林不能全盘否定，但他毕竟犯了错误，怎样避免以后重犯斯大林的错误呢？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前，毛泽东就已着手总结建国以来的治国经验，作一些治国的探索。于是，中央各部门的重要负责人频频被毛泽东召见，丰泽园人进人出，非常热闹。经过几个月的思索研究，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报告，把大家的积极性都动员起来了。今后还要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要进一步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民主气氛，让人们敢于说话。

毛泽东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说一发表，果然社会上反应强烈，人心振奋。周恩来这时正在为经济工作中过高的指标而苦恼。他心里很清楚，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冒进政策，已经造成资金供应紧张，建筑材料与机器设备严重不足，生产和基本建设秩序开始混乱，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再下去如何得了。

为什么这时会出现冒进的问题，为什么对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严厉批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55年秋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对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批判后，毛泽东又在此年12月发出指示，要求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这个和平时期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切工作都要反对保守主义。当时，刘少奇召集在京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122人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座谈会，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按照刘少奇的传达，毛主席的意图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已不再是限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而是扩及到经济建设各个领域了。

毛泽东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一是毛泽东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1955年夏，国务院讨论编制（1953——1967）之间的15年规划，按照国务院所属各部的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毛泽东对这个设想不满意，后来他主持制定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发展前景规划的《十七条》提出1967年，粮食产量为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棉花产量为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的一倍多。

二是毛泽东对1955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此年，由于调整计划中，不适当地削了某些非生产性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减少，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也有较多的结余。

西楼会议之后，全国各方面都开始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各部份纷纷修改了原来提出的那些长远指标，其中，粮食为9500亿斤，增加了3500亿斤；棉花1亿担，增加了4400万担；钢2400万吨，增加600万吨。不少部门还把这些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又修改提早了5

年，即 1962 年完成。

显然，这些指标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休战这一和平时期，要尽快地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反应了中国人民想急切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但钢铁要一炉炉炼出来，粮食要一粒一粒从地里长出来。中国当时不具备实现这些指标的可能性。即使没有后来的破坏性的“大跃进”运动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7 年也达不到生产 2400 万吨钢的任务，实际上，我国的钢的产量直到 1983 年才突破 3000 万吨大关。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讲究实事求是的党在经济建设上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冒进，就必然会出现反冒进。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的执行问题，而这正是国务院的业务范围。因此反冒进的主要责任就势必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总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肩上了。

对 1955 年第三季度兴起的生产高潮，周恩来是欢欣鼓舞的，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以后，周恩来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各方面工作都是认识落后于实际的批评。当时周恩来还即兴做了一副对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1955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把冒进的《十七条》看成是一个推进力量，要求各部按此精神修改原批定的计划指标。

但是，国务院是经济计划的执行部门，周恩来很快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自己对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过于乐观。拿基建投资来说，当时各方面追加建设项目，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但是这些项目一要资金，二要材料，当时又没有那么多种建筑材料。周恩来和李富春、李先念二人通过努力，在 1956 年 2 月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把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 147 亿元。此年，也就是 1956 年 6 月，周恩来又发现这个计划仍然脱离现实，关键的问题是原材料缺口大。薄一波和李先念鉴于大家都已按 147 亿元的盘子铺开摊子了。乃向周恩来建议“剃一次平头”，周恩来也无更好的办法，要谁下谁都不干，只好剃一次平头，把投资额定为 140 亿元。

这时，刘少奇，周恩来都感到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股不顾客观实际可能的冒进势头，如果不及时对此加以制止，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为此年 6 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起草文件，编制预算报告。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要求中央宣传部为《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社论经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及刘少奇、胡乔木的修改。加重了反对急躁冒进的语气。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毛泽东接到社论稿子后，在上面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以示不满，但社论最后还是在 1956 年 6 月 20 日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

接着，国务院开始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周恩来、陈云、薄一波都坚决主张把冒进的钢产量指标降下来，否则，根本没有办法平衡，粮、棉产量指标也要降下来，要估计到农业生产中自然灾害的影响。但由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直接牵涉到 15 年长远规划指标，这些冒进的长远指标在此年，也就是 1956 年的一月已经毛泽东拍板，现在又要压缩这些指标，显然困难很大。但周恩来在陈云、薄一波的坚决支持下，坚持必须把计划建立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恰在这时，苏联通知中国，由于国内钢材供应紧张，工人罢工，他们

对中国“二五”期间要求苏联提供的设备要到1961年起才能开始供应。这样一来，过高的生产指标不降也得往下降。最后决定，1962年（即“二五”最后一年）粮食产量指标为5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为4800万担，钢产量为1050万——1200万吨。

《人民日报》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的报纸上发表时毛泽东这时正在外地考察，忙得不得了，当他读到“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这一段话时，不由心头大怒，这是直接朝着自己来的嘛。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三十九回 庆“一五”风调雨顺 开“八大”国泰民安

话说毛泽东在广州看到《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后，暗暗生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的气。可是当时的形势还不容许他立即作出反击，只好以后再算这笔帐。正在生气的时候，派往武汉探测长江水情的警卫队韩队长回来了。原来毛泽东到广州后突发奇想，要去长江游泳，公安部长罗瑞卿再三劝阻，毛泽东勃然大怒，罗瑞卿只好先派韩队长去武汉探察长江水情。韩队长本人也不赞成毛泽东去游长江，所以在江边上打听了一下就跑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不行，不能游。江边上的人都说，江里风大浪险，不能游泳。”毛泽东板着脸，盯着韩队长，逼问道：“你下水试了没有？”韩队长慌了，只好老实回答道：“没有。”毛泽东一听火了，斥责道：“你没有下水试，怎么知道不行？你走，我这里不要你了。”韩队长知道毛泽东的脾气，只好含泪离开了毛泽东。

韩队长走后，毛泽东又派卫士孙勇去探查水情。有了韩队长的教训，孙勇一到武汉长江边，就脱了衣服下水，一直游到对岸，又游回来，穿上衣服赶快赶回广州。毛泽东看到孙勇这么快回来，以为他像韩队长一样又是在江边上看看就跑回来了，很生气地问道：“你下水了没有？”孙勇连说：“下水了，下水了。我一个人游到对岸，又游了回来。长江完全可以游。”毛泽东高兴地对罗瑞卿说：“长江完全可以游嘛，孙勇游过去又游过来，胜似闲庭信步。你们哪，顾虑太多了。走，咱们游长江去，坐飞机去。”罗瑞卿赶紧劝阻道：“主席，中央有决议，你不能乘飞机，还是坐火车去吧。”毛泽东执意要坐飞机，罗瑞卿坚决反对。毛泽东叹口气说：“外面的人以为我当着国家主席，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呢，我吃碗红烧肉还得你们批准，想过坐飞机的瘾都办不到，这次非坐不可。”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又能坐飞机，又能游长江，毛泽东高兴起来。到了武汉后，毛泽东稍事休息，即带卫士们到了江边。只见大江东去，卷起千层浪，江里千帆竞渡，万舸争流。龟山、蛇山雄峙两岸，长江大桥飞架南北。不知怎么的，一看江山如此多娇，毛泽东一下子想起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渡过的那些日子来，心潮如江潮一样上下翻滚。

卫士们这时都脱了衣服，请毛泽东上船，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地说道：“先别急，我来考考你们的时事学习。”他指着即将竣工的武汉长江大桥，问道：“你们谁知道，武汉长江大桥是什么时候建的？我们为什么要修武汉长江大桥？”卫士们你看我，我看你，李银桥站出来答道：“武汉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的第一座桥，1952年开始修建，明年正式通车。通车后可以把长江南北更紧密地联接在一起。”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你们知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是多少？到现在为止，我们又完成了多少？”这个问题有点专业化，大家一时也说不清楚。毛泽东叮嘱道：“你们以后不能光是上岗下哨，还要学知识，学文化，要学习政治时事。一个是五年计划，一个是党即将召开的八大会议。下去看材料，准备发言。”大家答应了。

毛泽东在长江里游了一个多小时，有时侧游，有时仰游，有时干脆躺在水面上，极目远眺，只见天高云淡，水天一色，毛泽东心里惬意极了。

卫士们陪毛泽东游完泳，便利用下岗的时间搜集报纸，学习时事，互相开展讨论。毛泽东得知，非常满意，便亲自来考察卫士们的学习成绩。卫士们争着把自己的剪报资料和学习心得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逐一看去，只见

剪报资料里有《人民日报》记者陆灏写的系列通讯《建设鞍钢的人们》，新华社记者冯健等人写的有关大桥的消息和通讯，《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写的《渭河桥头》、《剑门关外别有天》等报道宝成铁路的通讯，《人民日报》记者林里写的《我们的塘沽新港》和关于长春汽车制造厂的通讯，《人民日报》记者商恺写的系列通讯《旅行在鹰厦铁路上》，华山写的治理黄河的报道《童话的时代》，柯岗写的报道康藏公路建设的《左浪嘎的征服者》，还有报道第一个火车女司机田桂英、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上海纺织女工裔式娟、山西西沟劳动模范李顺达，河北农业合作社先进人物耿长锁、王国藩等人的通讯。毛泽东看着看着，眼睛开始湿润起来。他问李银桥说：“银桥，资本主义的美、英、德等国从我国 1952 年那样的水平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用了多少年？”李银桥还没有能找到这方面的材料，只好摇摇头。毛泽东伸出两只手，一字一句地说：“整整十年，这还是快的。慢的用了 25 年。而我们呢，只用了 4 年多。万里长城大不大，可我们这几年建设中土石方工程量，相当于修筑了 56 条万里长城。我们两天就有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建成，四天就有一个大厂矿建成投产。照这样干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可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卫士们听了，一齐鼓掌。

毛泽东还要讲下去，忽然收发送来了报纸。李银桥一看报纸，赶紧向毛主席报告：“主席，报上登出来了一篇文章，说‘一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已经提前实现。”毛泽东拿过报纸一看，果然如此。李银桥建议说：“主席，这是件大好事啊，应该庆贺庆贺。”毛泽东欣然同意说：“应该庆祝一下，感谢全国人民的奋斗努力。”

于是，当晚的餐桌上，多了几瓶酒，毛泽东和卫士们团团而坐。毛泽东不善饮，喝了一小杯，脸就红起来。李银桥多喝了几口，有点醉意，“咯咯”地直笑。毛泽东不但没有怪他，反而和卫士们一起忙活着为他要醒酒汤，扶他在一旁休息。

“一五”计划由于准备充分，计划周到，工作细致，领导有力，人民苦干，在 1957 年全部完成或超额完成。工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等主要经济指标于 1956 年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一五”期间，经济和文教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484.9 亿元，其中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 273.8 亿元；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有 820 多个，建成 450 个；新增固定资产 492 亿元相当 1952 年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的 1.9 倍，这些成就改变了中国过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所造成的工业基础薄弱和残缺不全、互不配合的状态，使中国成为一个具有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效率蒸汽机车制造业、新式机床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冶金和矿山设备制造业及高级合金钢、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的国家。东北工业基地已经建成，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也都已经大为加强。同时，在华北、华中、西北三个地区，新的工业区正在形成。在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也开始了部分的工业建设。

1957 年，钢产量达到 535 万吨，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 6 倍，比 1952 年增长 296%；原煤产量达到 1.3 亿吨，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 2.1 倍，比 1952 年增长 96%；发电量达到 193.4 亿度，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 3.2 倍，比 1952 年增长 166%。

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新增的生产能力（即新增的年生产能力）为：天然石油 131.2 万吨，人造石油 52.2 万吨，合成氨 13.7 万吨，水泥 261 万吨，金属切削机床 8704 台，载重汽车 30000 辆，纱锭 201 万枚，织布机 5.5 万

台，机制糖 62 万吨，机制纸 25 万吨。“一五”计划期间，生产出来了许多种我国过去不能生产的工业产品，这些新产品有：高级合金结构、特殊仪表用钢、矽钢片、造船钢板、锅炉用无缝钢管、50 公斤的重轨、飞机（战斗机）、载重汽车、客轮、货轮、高效率蒸汽机车、容量 1.2 万千瓦的成套火力发电设备、1.5 万千瓦的成套水力发电设备、容积 1000 立方公尺的高炉设备、联合采煤机、200 种新型车床，自动电话交换机、全套纺织、造纸、制糖设备、化学纤维、各种抗菌素。1957 年，钢材产品已达 1400 多种，钢材自给率已达 86%，机械设备的自给率已达 60% 以上。

1957 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 29.862 公里，比 1952 年增加 22%；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25 万公里，比 1952 年增加一倍；全国内河通航里程达到 14 万余公里，比 1952 年增加 52%，其中有 3.9 万公里可通轮船，比 1952 年增加 29%；航空线路已经达到 2.6 万公里，比 1952 年增加一倍；新增船舶 41 万载重吨；新建和加挂长途电报、电话线路 11 万多对公里。

195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 783.9 亿元，超过原定计划 21%，比 1952 年增加 128.3%。

在农业方面，国家五年发放农业贷款 78 亿元，五年内扩大耕地 5867 万亩，完成原定计划 101%。新增灌溉面积 21810 万亩，相当于 1952 年全部灌溉面积。国营农牧场达到 710 个，有拖拉机 10177 标准台。国家对农村水利建设投资 40 亿元，建成大型水库 13 座；主要有河北省的官厅水库（后划为北京市）、安徽省的佛子岭水库等。河南省境内的黄河上的三峡水库已开始施工。

1957 年，粮食产量达到 3700 亿斤，完成原定计划 102%，比 1952 年增长 20%；棉花产量达到 3280 万担，完成计划，比 1952 年增长 26%。水产总量达到 312 万吨，完成原定计划 111%，比 1952 年增加 87%。1957 年气象台站达到 1600 多个，比 1952 年增加 4.2 倍。五年内，造林 21102 万亩，完成计划。1957 农业总产值达到 604 亿元（按 1952 年不变价格计算），完成计划的 101%，比 1952 年增长 25%。

科研、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五年内，高等学校共招生 56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招生 112 万人，普通中学共招生 875 万人，小学共招生 8,800 万人。1957 年全国共有科学研究机构 500 多个，研究人员 20000 多人，比 1952 年增长了 73%，全国中西医人数达到 55 万人。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57 年职工的平均工资（年平均工资）达到 637 元，比 1952 年增长 42.8%。国家为职工支出医疗、劳动保险金，福利 103 亿元，新建职工住宅 9454 万平方公尺。

现在还是回到 1956 年夏来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和卫士们吃完晚饭后，又聊了一会“一五”计划期间建设成就，卫士们便送毛泽东回房休息。毛泽东非常兴奋，浮想联翩。1956 年是个好年头。这一年，农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实现了集体化，“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下一步棋怎么走呢？三大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应该把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尽可能加快建设速度，慢慢腾腾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自然，这中间还会有斗争，刘少奇、周恩来肯定会反对“冒进”，但是，无论如何要加快建设速度，对思想右倾的同志要给以批评，在他们的背上击一猛掌。

想到这里，毛泽东躺不住了，坐到写字台前，打开墨盒，在一张白纸上写起来：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馥。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写完后，毛泽东吟诵了几遍，很晚才睡去。

由于八大会期已近，毛泽东结束了在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这时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紧张筹备中，毛泽东要来了八大文件，逐一审阅。这些文件的撰写都是由毛泽东组织领导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体现了自己和政治局的意图，他感到很满意。只是陈伯达写的开幕词扯得太远了，稿子不能用。政治局已决定由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毛泽东致开幕词。毛泽东向来不喜欢由秘书代笔，可是这段时间他太忙了，没有时间写。想了一下，毛泽东叫来秘书田家英，嘱他代写开幕词。

田家英果然不负重托，开了一个晚上的夜车，就把稿子写出来了，第二天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完，连连称赞。八大的文件全部准备就绪。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新建成的政协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和米高扬等五十多个兄弟党的代表团团长及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代表坐在主席台上。

会议开幕后，首先由毛泽东主席致开幕词。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宣布：“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会场上全体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毛泽东接着提议：“从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和辛勤工作因而付出了自己生命的同志和朋友，是很多的，我们应当永远纪念他们。”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

毛泽东主席接着致开幕词，他的话不时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打断。毛泽东致开幕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的报告。会间休息时，一些代表称赞毛泽东的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得意地说：“你们知道是谁写的吗？可不是我写的，是田家英写的。”正说着田家英和吴冷西过来了，毛泽东叫住吴冷西问道：“冷西，我要你们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你们怎么动作这么慢，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吴冷西连忙解释：“主席，开头我们思想有点保守，你上次批评后，我们丢掉了思想包袱，从国内调集了大批外语干部，已经建立了19个国外分社。”毛泽东摇摇头说：“太慢，还要加快，要尽快把地球管起来。”吴冷西连连答应。

离开毛泽东后，吴冷西又去找周恩来。这次大会的报道由周恩来亲自抓，

吴冷西向周恩来汇报了新华社对大会的报道工作之后，周恩来说：“我看了你们的报道。你们应该不只是报道会议的程序，会议的文件，还要报道文件产生的过程。八大的文件是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写的，写作过程中征求了许多人、许多部门的意见，作了反复的、大量的修改，所以开会前，全党对于这些文件已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然后开会时才能一致通过。你们以前光报道一致通过，而不报道协商讨论的过程，外国人就不可理解。这次一定要克服这个缺点。”吴冷西觉得周总理的指示很重要，连忙记下来。周恩来又嘱咐说：“你们的报道也不要光盯着英雄，先进人物，还要报道群众，报道他们的生活工作。”吴冷西答应说：“我们回去就组织报道。”

八大的政治报告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人们从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八大政治报告，都感到报告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个个兴高采烈，心情舒畅，埋头工作，愉快生活。恰好天气也来凑趣，要风有风，要雨来雨，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吴冷西回到新华社，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记者们立刻闻风而动，下基层采访，北京分社的几个记者一商量，何不乘人们熟睡的时候去采访那些深夜工作的人呢？主意已定，便分头行动起来。

这时百业兴旺，民风淳厚。南魏胡同托儿所值夜班的保育员，穿着白色的工作服在小床间来回地察看。有的孩子睡觉不老实，或是把手压在身子底下，或是把被子滚成一团。保育员们轻轻地把他们的手放好，把被子盖好。记者们又来到公共汽车公司和电车公司，只见司售人员还在检修车辆，擦洗座位。深夜四点，出早车的司售人员已经乘接班汽车出发了。

在北京市急救站，记者们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种紧张繁忙现象，这里电话铃声不时响起，只要铃声一响，急救车司机和大夫就赶紧跑步出房，登车出发。这个急救站九位大夫，三位护士日夜轮班抢救病人，从1954年11月建站以来，已经把两千多个危急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记者们从急救所出来，又走进长安街上的电报局。虽是午夜，但这里人出入进，依然一片繁忙景象，柜台后面，营业员们收着交发的电报，报务室里一片打字机声。

记者们采访了电报局，正准备去采访电影厂和人民日报社，只见一阵“叮，叮”的车铃声响起来，原来是洒水车和清洁车出动洒扫大街。宽阔宁静的大街上，不时驶过往各菜市场送菜的菜车。

电影厂领导得知记者来采访，忙带他们到摄影棚去，这里正在赶拍《祝福》的最后几个镜头。只见名演员白杨扮演的祥林嫂满头蓬乱的白发，手拄竹棍，目光呆滞地向“我”问道：“人死后是不是要进入地狱？”导演桑弧说声“停”，又开始拍下一个镜头。

记者们沿着长安街，又采访了人民日报社。这里正在出报，看大样，打字型，浇版，开印。同时汽车又带着纸型赶往机场，由班机把纸型运往上海、昆明、重庆、兰州、乌鲁木齐、沈阳印点印刷，让这些地方的读者也能当天看到《人民日报》。

最后记者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国庆就要到了，这里有不少人在实地排练

国庆游行。虽是深夜，广场上华灯齐放，映照着人们欢乐的笑脸。

采访完了，记者们肚子饿了，相约来到西四牌楼吃夜宵。这里灯火通明，美味馄饨、肉汤煮饼等风味小吃散发着香气。记者们要了几碗馄饨，几盘下酒菜，边吃边打腹稿，吃完了，稿子的眉目也出来了，立即赶回办公室去写稿。

9月27日，代表们一致通过了刘少奇代表中央所做的政治报告，选举了中央委员97名和候补中央委员73名，大会正式闭幕。9月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有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

八大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消息传来，人们争相购阅《人民日报》，奔走相告。这时正是国庆前夕，全国充满了节日气氛。

10月1日，北京循例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典。政通人和，万民欢腾，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也都非常高兴。将帅们都穿上了海蓝色的礼服，肩章鲜亮，绶带辉煌，分外显眼。阅兵式也格外隆重，只是士兵们戴的船形帽使毛泽东皱了几次眉头。

国庆活动结束后，毛泽东准备外出视察，忽然驻苏大使刘晓发来急电，报告苏联坦克正向波兰开进。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十回 中共整风倡和风细雨 民盟座谈成大鸣大放

话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国际上风云突变，接连发生了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苏共二十大召开前，波兰国内政治形势开始出现异常变化，一些地方的工人开始罢工，继而出现了总罢工。苏共二十大后，波兰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因病在莫斯科逝世，奥哈布代理第一书记职务，率代表团回到波兰。这时华沙局势紧张，接着波兹南发生骚乱，群众示威游行，要求苏军撤出波兰，波兰党内部意见趋向由已下台的哥穆尔卡担任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闻讯，不待波兰方面同意，立即去波兰访问，压迫就范。孰料波兰党对更换旧领导已形成明显趋向，赫鲁晓夫大为恼火，即调动坦克部队向波兰进军。哥穆尔卡一再警告赫鲁晓夫撤兵，并保证波兰继续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赫鲁晓夫这才下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并同意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党第一书记。

波兰事件刚刚平定，10月23日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党政机关遭到袭击，一些武装部队也参加了这一事件，布达佩斯街上发生了巷战，暴乱局势已成。苏联政府在同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商议后，即出动驻在匈牙利的苏军，平息了暴乱。

波匈事件不能不在我国发生影响。国内由于社会改造过于急促，而社会改造给予社会的变化又异常深刻。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虽然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但并未完全克服。这些国际影响和国内因素加在一起，使我国1956年秋冬出现了一些不安定情况。一些城市的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供应发生短缺现象，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升学、就业出现了一些困难；在有的城市中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了多起工人罢工和学生罢课的事件，参加罢工的工人大约有一万多人，参加罢课的学生也有一万多人。农村中的一些地区也接连发生农民退社、闹缺粮的事件。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新动向。自从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知识分子思想活跃起来，他们对文化、教育、科学等方面问题提了许多意见，有一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对一些干部作风上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在许多人看来，其中的一些意见相当尖锐，有的意见是错误的。似有山雨欲来之势。

对于1956年秋冬国内出现的这些新情况，许多党员和干部毫无思想准备，不知应该如何去认识和分析这些新的矛盾。有些党内领导干部则习惯地把群众闹事和那些错误的或尖锐的意见和批评视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是敌人的破坏捣乱，准备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镇压下去。各地政府纷纷致电中央，请求指示方略。毛泽东明白他们的意思，不外是要求授予他们相机行事的权利。毛泽东思考再三，感到有必要召开中央全会，就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这几个问题统一全党的思想。

要统一全党的思想，首先得统一政治局的思想。丰泽园的小会议室里，政治局委员们阅读着材料，交换着看法。不出毛泽东所料，许多政治局委员要求采取果断措施，把各地闹事压下去。毛泽东心里却另有主张，等到大家谈得差不多了，他才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现在问题这么多，不外乎是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苏共二十大问题，东欧事变问题，国内闹事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看是根本正确，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

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

毛泽东讲到这里，用眼睛扫视刘少奇、周恩来一眼，政治局委员们立即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情绪。林彪立即插话：“反冒进是右倾，要不是主席坚持，今年能实现合作化吗？没有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还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吗？”

毛泽东赞赏地看了林彪一眼，问道：“恩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不是还可以再增加些？这几年的实践证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是有无穷的创造力的。”周恩来感到这个问题真不好办，但当面驳主席的面子也不好，便提议说：“这样吧，今年我们还可以把资金集中到重点项目上来，实现一个跃进，这也叫多快好省嘛！”

毛泽东连连点头：“好一个多快好省，好一个跃进，这两个口号提得好！恩来，这是谁提出来的？我要给他颁发奖章。”周恩来笑笑，也不说话。由于他的机智，会议的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了。

毛泽东接着又讲下去：“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叫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匈牙利事件在国内也有反映，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

政治局委员们听了，齐声称赞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毒草长出来锄掉就是了，还可以作肥料。当然事物都有两个方面。现在有些地方闹事，是因为官僚主义作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那就要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现在国内大量的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要学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我们党应该进行整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要发动民主党派和群众帮助我们整风。”

政治局委员们同意 1957 年全党整风，但对发动民主党派和群众向党提意见尚存疑虑，怕这把火烧起来，不好收拾。毛泽东自信地说：“怕什么，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它几十万也不怕。《红楼梦》里有个王熙凤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谁犯了官僚主义，群众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大家一听毛泽东说得有道理，也就同意了，但心里总有点担心，怕出岔子。探索治国之道，真难啊！

1956 年 11 月，八届二中全会决定明年全党整风，会后中央又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讲了几次话，试图统一全党的思想。但没有想到干部们反应强烈。很多人写信给中央，表示对“放”感到担忧，怕一“放”，放出些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

冰、鲁勒四人在1957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 and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很少有人写了，这都是不对的；百花齐放，还是应该以提倡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又笑又气地说：“忠心耿耿，不识时务。”叫邓拓写一篇文章狠狠地批评他们几个一下。

1957年的早春乍暖还寒，但毕竟是春天了。北海湖面上的冰融化了，春风徐来，吹皱了一池春水。2月27日，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千八百多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发表演说，讲“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足足讲了一个下午，出席会议的许多党外人士屏息静气地仔细品味着毛泽东的演说，而一些中共高级官员则悄悄退出会场。毛泽东在台上，自然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不由在心里叹息，这些同志为什么就这么抵触自己的讲话呢？

叫毛泽东难堪的事还在后面呢。这么大场面的重大会议，这么重要的演说，《人民日报》竟然事后连一条消息都不发。这邓拓胆子也太大了，有的编辑沉不住气，悄悄跑来对邓拓说：“老总，你看人家《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都在鸣放，你怎么按兵不动啊？报纸销量最近有下跌的趋势。国务会议这么大事，又不发消息，主席是要生气的。”邓拓皱皱眉头说：“咱们脑子要多打几道弯，现在情况复杂得很，不要听见街上锣鼓一响就走出去。”编辑莫测高深，只好退出房间。

毛泽东在这次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这篇讲话的基本精神是这样：

矛盾具有普遍性，它既存在于每一事物中，也存在于每一事物运动的全过程。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反革命分子毒死了合作社的牛，那就要把他捉起来，但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就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公式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现在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和探索。在这个时候，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矛盾的新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同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遇到矛盾便视为外来的敌我矛盾的理论区别开来，毛泽东在讲话中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建国和中国工业化

道路等问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特点，系统地阐述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的方针和方法。

3月1日国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连看几天的《人民日报》，见报上没有登一个字，大骂邓拓：“这哪里是共产党的报纸嘛，简直就是死人办报。看来宣传问题不抓不行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国务会议结束后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3月10日毛泽东特别邀请参加会议的新闻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新华社社长吴冷西、《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光明日报》总编辑常芝青、《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参加了会议，新华社、《人民日报》都是从解放区迁来的，现在一家是国家通讯社，一家是中共中央党报。其他几家报纸原来都是民办报纸，前两年都实行了公私合营，《光明日报》成为民盟机关报，其他两家都成为公私合营报纸。

总编们见了毛泽东，纷纷向他问好。毛泽东极热情，和他们一一握手，但独对邓拓非常冷淡，理都不理。邓拓和常之青神色尴尬地坐在一旁。

大家坐定后，毛泽东笑着说：“听说你们一些人感觉到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低，在社会主义社会办报心中无数，所以想请大家来谈谈。我在五四时期也办过报，后来不办报了，但也常为报纸写文章，现在也想写，但没有时间，要写就得把主席的职务辞掉。所以我们是同行噢。现在我们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像过去搞阶级斗争了，心中无数是很自然的。无数并不要紧，慢慢就会有数。我看《文汇报》就搞得不错，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应有尽有，我也爱看。”

大家一听毛泽东表扬《文汇报》，立即把羡慕的眼光投向徐铸成。徐铸成乘机问道：“前段时间，我们在报纸上开展了对电影问题的讨论。电影局不理我们，批评我们鼓吹票房价值，我们感到压力很大。”毛泽东生气地说：“电影局怎么能这么做呢，不理是不对的。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

接着毛泽东表扬《新民晚报》也办得不错：“赵超构提倡报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要考虑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又表扬《光明日报》：“国务会议后，你们发了几篇文章，反应快，不像《人民日报》。”表扬了这几家非党报纸，毛泽东猛地把眼光转向邓拓，严厉地问道：“你给我说说，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消息，啊？你这是死人办报嘛！”邓拓脸色一下变得苍白，连忙答应马上发消息。

批完了邓拓，毛泽东又问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胡乔木当即推荐储安平：“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在上海办《观察》，批国民党批得很厉害，现在任新华书店总经理，他当总编辑很合适。”毛泽东知道储安平和《观察》的情况，一口答应。

在这次有党内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队伍的分析：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但还是爱国的；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对情绪的只是极少数。毛泽东再次指出，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

结合，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放”就是放手让大家提意见，让大家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宣传会议上的讲话对全国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传达后，激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刘少奇则分头南下，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这里就不细说了。

且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到胡乔木的通知后，即找《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等人协商。这些人向来知道储安平以敢言著称，欢迎他主持《光明日报》笔政。章伯钧虽有点不太高兴，但看见大家都没有意见，也就只好再说什么了。

储安平本来是靠办报起家的，建国后不办报了，担任中国新华书店总经理，虽然这个职务级别不低，但总觉得没啥意思，这时忽然接到通知，请他去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便欣然同意。朋友们知道了，都来为他道喜，特在餐馆开席一桌，祝贺他重掌笔政。酒过三巡，还未及畅叙，忽然一辆吉普车开来，原来是中宣部找他去开会，储安平只好向朋友们告罪一声，坐车走了。朋友们见此，个个艳羡不已，骤膺重任，又是毛泽东亲自点的将，真是前程似锦啊！

储安平果真不负重望，一到《光明日报》社，就一改报风，猛登鸣放意见。邓拓当头挨了批评，回到报社后，写了一条三百个字的小消息，报道毛泽东在2月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至于讲话的内容，一字都没有报道。他还要看看，所以当那些党外报纸大版大版地登鸣放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还是纹丝不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场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

中央指示一下达，各地党组织都开始了整风运动。为了切实把整风运动搞好，中共中央统战部奉命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在全国政协礼堂和国务院礼堂举行座谈会。5月8日，民主人士接到通知后都纷纷赶来参加，会场已布置好了，有茶有烟，统战部长李维汉简单地讲了几句，就请大家发言，帮助党整风。

这些人里面一些头面人物都已经参加了毛泽东于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的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民主人士揭露问题，帮助党整风。这些人看到共产党一而再，再而三地恳请党外人士揭露工作中的问题，都非常感动。共产党真是好。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家便踊跃讲起来。

座谈会结束后，李维汉立即赶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了说：“我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嘛，有些人就是顾虑重重。这不，座谈会提的意见绝大部分都是积极的和善意的嘛。傅鹰教授的话很尖锐，但态度是诚恳的。座谈会还要举行，多请些人帮党提意见。”

从5月初开始，形势开始复杂起来。在民主人士的座谈会上，各种意见越来越尖锐。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林希翎等活跃分子在校园里演说，一些党团员不同意她的意见，双方激烈辩论起来。《光

明日报》上满满地登着鸣放意见。毛泽东的菊香书屋里电话铃声不断，高级干部纷纷向毛主席请示，要回击那些反党言论。毛泽东告诫他们：鸣放中大部分意见都是对的，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要虚心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要硬着头皮听。

但是，瞧着报纸上大版大版的鸣放意见，毛泽东也生起气来，说了要和风细雨，怎么大鸣大放起来，共产党就没有一点好处？没想到这话传出去，反响更强烈了。李维汉接连几次汇报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的脸色一次比一次难看。其实不用李维汉汇报，毛泽东也都知道个大概，报纸上都登着哩，有些意见很有问题，什么国内形势一团糟啦，肃反运动偏差很大啦，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啦，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啦，党报是布告牌啦要允许私人办报等等。

5月中旬，李维汉又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座谈会的情况。这时毛泽东已经知道有的人已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气愤地对李维汉说：“这哪里是向党提意见，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嘛，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

话音刚落，电话铃响起来，毛泽东拿起电话，原来是北京市市长彭真打来的。彭真汇报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闹得很厉害，要搞“海德公园”，清华大学校长兼高教部部长蒋南翔有点受不住了。毛泽东大声嘱咐彭真：“转告蒋南翔，要硬着头皮听，不要有所动作。”

李维汉走后，毛泽东在书房里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果决地请政治局常委来研究形势。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北京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实地了解那里的情况，而且他劝其他常委们也都下去看看。常委们感到形势严重，需要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便都同意了。

深夜1点钟，人们都进入了梦乡。从中南海驶出来两辆小汽车，直向城西的海淀镇驶去。北京城的夜是寂静的，小汽车驶在空旷的马路上，不一会儿便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已经在校门口等候，小汽车一到，他们便钻进在旁边停着的自己的小汽车，几辆小汽车鱼贯进入校园，来到大字报区。校党委委员已经分别守在大字报区的各个角落。汽车停下后，从车里钻出一个戴口罩的人，人们簇拥着他，看起大字报来。

这个戴大口罩的人正是毛泽东，他沿着马路逐一看去，卫士在旁边跟着，用手电为他照明。这些大字报一张比一张厉害，有一张大字报还质问道：“为什么共产党自己整风就要和风细雨，现在不但要鸣放，而且要大鸣大放。”毛泽东看到这里眉头深深地皱了起来。

看完大字报回来，李维汉又来汇报来了。毛泽东已经听了最近召开的新闻座谈会的汇报，知道新闻界最近放得很厉害。《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虽然没有参加座谈会，可在报社里杀气腾腾地说：“我这次就是要和共产党唱唱对台戏，看看共产党的态度，我要试试，看能走多远。”有人劝储安平不要在报纸上光登那些骂共产党的话，也应该登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储安平一口拒绝：“我们是在野党，我们的任务是监督，解决问题是共产党的事。”现在李维汉又来汇报了，不知最近又放出了些什么。

李维汉今天不知怎么回事，没有往日汇报那样痛快。毛泽东一再追问，李维汉才说：“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今天又放了一家伙。”毛泽东紧问：“他说什么？”李维汉说：“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毛泽东未等李维汉说完，气得一拍桌子“好猖狂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十一回 反右派错定引蛇计 批文汇勉释阳谋说

话说毛泽东听李维汉汇报民盟及民主人士座谈会的情况，当他听到罗隆基讽刺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时，不禁勃然大怒，对李维汉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什么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于右派说来都是假的。右派的企图，是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他们自以为是‘国宝’，是动不得的。”

李维汉小心翼翼地问道：“既然如此，那座谈会是不是就不开了？”毛泽东一摆手说：“开！继续开。现在右派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再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人们说，怕钓鱼，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先不要钓它，物极必反。牛鬼蛇神只有把他们引出来，才能聚而歼之，不然，它们藏在深深的洞里，你怎么去捉它们。”

中共中央要反右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的两个座谈会继续开了下去，有人觉得座谈会的人不多，就去四处拉人来参加。有些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不愿意来，动员者晓以大义，责备他们对帮助党整风不热心，死气百赖地把他们一个个拉到座谈会上。

李维汉走后，毛泽东考虑了全国的形势，感到敌情严重，光是在北京“引蛇出洞”还不行，应该在全国各地都展开“引蛇出洞”，把右派都引出来。于是他打开墨盒，在一张白纸上写下题目：《事情正在起变化》，然后喝了口茶，奋笔疾书起来，全文精神如下：

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否认报纸的党性和阶级性，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赞成民主，反对集中。他们反对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必要的集中的领导、计划和控制。他们跟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气，亲如弟兄。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扣帽子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这顶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写好后，发给党内干部阅读。这是1957年5月15日

的事。

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也多次在党的一些文件中加以指出。但是，他们这时发动对党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毛泽东于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由党内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反击右派。党中央于5月16日发出党内指示，“指示”仍然肯定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正确的，接着指出最近一些天社会上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上去。中央指示决定从原来不主张“大鸣”、“大放”，改变为从右派手中接过这个武器，“大鸣”、“大放”，对于那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放”，原样地在报纸上登载，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

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迅速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蔓延开来，出现了和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接到中央通知后，有关部门赶快叫各单位、各个部门、各个组织都组织座谈会，要尽可能把教授、工程师、医生、民主人士动员来参加座谈会，动员他们积极发言。这些知识分子一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就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稍有头面的人物的发言立即第二天被登到报纸上。

比较起来，还是北京的鸣放最热闹，梁漱溟、俞平伯都接到参加座谈会的通知。梁漱溟1953年和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吵过一架，俞平伯曾被严厉批判，人们本来以为他们会借此一吐怨气，谁知两人根本不来参加会，任你说破嘴皮，两人就是不去，动员者无奈，只好作罢。

5月12日午夜1点钟，周恩来招待泰国艺术团的晚会结束了。他送走客人，问身边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刘华和狄辛：“你们住在哪里？远吗？”刘华回答说：“剧院的宿舍，在史家胡同，不太远。”周恩来说：“走吧，到你们的宿舍去，去看看。”演员们一听，高兴极了，陪着周恩来向史家胡同走去。午夜的马路上静悄悄，周恩来和演员们呼吸着夜风送来的清香的空气，边走边谈。他们谈工作，谈生活，也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问题。

虽是午夜，演员们大多没睡，有的刚点上香烟抽着，让心情平静下来。周恩来轻轻地敲开他们的房间，演员们都惊诧地张开了大嘴。周恩来和大家握手谈话，大家都争着向总理汇报自己的工作，周恩来逐一看望了演员们。谈话中周恩来指着宿舍里的一盆花说：“你们年轻人，今天的条件太好了，你们也应该多吃些苦，多讲工作，少谈享受，不要动不动就嫌这嫌那。温室里的花朵是经不起风雨的，你们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要经受一些艰苦的锻炼，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要由你们来完成。”

周恩来讲这些话时，表情非常严肃。大家都静了下来，深深地品味着这些话，难道周总理百忙之中，深夜到此，就只是为了看看大家吗？有些人联想到当前鸣放、大轰大嗡地向党提意见的情况，品味出一些意思来了。

由于中共中央已经接过了大鸣大放这个口号，准备反击右派，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李维汉这时得到报告，说胡子婴从西北考察回来，黄炎培从外地考察回来，他怕他们出问题。赶紧请孙起孟给他们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乱讲了。黄炎培还不太高兴，别人能讲，我为什么不能讲，不过既然中央统战部不让

他讲，那也许有道理，也就不讲了。

转眼之间，就到了五月底，座谈会也接近尾声。参加座谈会的人们发现，会开了这么长时间，竟然忘了请储安平来会上鸣放。于是，马上派人去请。储安平因忙着出版报纸，不愿意来，但许多人一再请他来会上放一炮，储安平只好答应了。

6月1日，储安平来到了全国政协，参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大家都请储安平发言，储安平从提包里拿出一篇发言稿子，清清喉咙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还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储安平的话惊得会场上的人们个个面容失色，有的人吃惊得张开了大嘴。章伯钧罗隆基也没有想到储安平竟敢直接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开炮，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其实让他们吃惊的还在后面呢。

储安平从众人大惊失色的表情中知道自己这一炮取得了轰动效应，便继续讲下去：“问题的关键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

当天，李维汉即把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言向毛泽东汇报了，毛泽东气愤地说：“他们这是要夺权了，什么政治设计院，什么轮流坐庄，什么党天下，都是一个意思，要共产党把权交出来，交给他们。什么小和尚，老和尚，我看他们才是和尚。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再让他们放，不要反击，硬着头皮听。”

座谈会中间，也有些人觉得章伯钧、储安平的话讲得不对头，不顾事实，不像提意见，而是骂共产党，便出来说了些公道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劝大家说：“提意见是对的，但党群关系有些不融洽，双方都有责任，应该大家一齐动手，从两面拆、填，双方都要主动。我同共产党员就相处得很融洽，中间没有墙和沟，我们不应混淆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削弱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卢郁文正讲着，突然“哐啷”一声，众人看时，原来是有位老兄不小心，弄翻了茶杯。于是大家都忙着帮助此位老兄收拾杯子，擦地，大家乱纷纷地忙着，卢郁文也无法讲下去了。

第三天，卢郁文回到家里，发现信箱里有一封信，笔迹、地址都很陌生，连忙拆开信看起来：……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先生所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不会饶恕你的……

卢郁文再往下看，没有署名，原来是一封匿名信。卢郁文想了想，把这封信交了出去，这时已经是6月初了。信件很快转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向李维汉问了一下民革中央扩大会议的情况，便把刘少奇、周恩来请来，把出现匿名信的情况向他们作了简单的介绍，然后严肃地说：“现在右派猖狂到了极点，只许他们骂共产党，大鸣大放，不许别人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意义十分严重，我们都应该想想，这是为什么？说卢郁文‘为虎作伥’，那共产党就是右派心目中的虎了，这岂不是太过分了吗？物极必反，现在反击右派的条件成熟了。”刘少奇、周恩来也同意立即反击，首先由《人民日报》发

一篇社论，对匿名信事件作一个评论，题目就叫《这是为什么？》，同时由李维汉在两个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指出座谈会上的一些发言有严重错误，毛泽东则负责起草一篇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毛泽东为党内写的指示也同时发了下去，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在全国猛烈开展起来。然而许多教授没有看到这个形势突变的信号，还在那里埋怨《人民日报》肚量小，依然在座谈会上发言。直至6月中旬，他们才发现形势变了，报纸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右派！声讨右派罪行的文章大篇大篇地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各学校、机关党委组织群众同向党提过意见的那些人展开了说理斗争。这些前几天还在悠闲地喝着茶，吸着烟，提着意见的人们，一夜之间就陷入了被强大的组织力量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似的革命群众的批斗之中。

在北京，各民主党派都按照统一部署，进行反右派斗争。新闻记者协会召开了第二次座谈会，批判五月间座谈会上一些人提的意见。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批批《文汇报》。

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人自然是反击的重点。《光明日报》社连续召开会议，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动办报路线。《新民晚报》也赶紧进行检讨。唯有《大公报》运动期间沉稳，王芸生也没有跑去鸣放，现在是平安无事。《人民日报》由于邓拓把得紧，没有在报上鸣放，当然从5月8日起也登了许多鸣放的意见，不过那是直接奉命刊登的。《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思前想后，不禁有些后怕，要不是邓拓当时压着，现在还不知出多大的乱子呢。

反右派运动以雷霆之势向前发展着，毛泽东很关心运动的进展情况，便把李维汉叫来了解情况。毛泽东问道：“民主党派对反右派有什么反应吗？”李维汉小心翼翼地回答道：“许多人对反右派表示不可理解。黄炎培、陈叔通、邵力子、史良都找我谈过，认为不能因为响应党的号召，对党提了意见就作为右派。邵力子还说，得人心很难，失人心很容易，表示对民革中央的反右派斗争来个沉默抵抗。”毛泽东冷冷地说：“他们的意思是说反右派是个阴谋了？”李维汉回答：“没有敢这么说。”

李维汉走了，毛泽东还在考虑这个问题。是的，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明确的回答，必须驳倒这种谬论，叫民主党派没有话说。但是，这得找个题目，不能突然来一篇文章去专门解释。他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好主意来。卫士正好送进报纸，毛泽东打开报纸，一眼就看到报纸上登着《文汇报》的检讨，毛泽东心头一亮，有题目了，立刻提笔疾书，写完后又修改几遍，叫人送到《人民日报》社去，自己随后动身去青岛。预定的省市书记会议要在那里召开，中央要在会上全面部署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精神如下：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自本报编辑部六月十四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报纸了。

文汇报写了检讨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写了许多反映正面路线的新闻和文章，这些当然是好的。但是还觉不足，好像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

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太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而且帅上有帅，并包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员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绝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这两个党在这次惊涛骇浪中特别突出。风浪就是章罗同盟造起来的。别的党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恶劣。但人数较少，系统性不明显。就民盟、农工的成员来说，不是全体，也不是多数。呼风唤雨、推波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文汇报根本没有作自我批评。相反，它在十四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他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这时，在青岛召开的省市书记会议热气腾腾，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对反右派斗争作了全面部署，凡是大小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部门和单位都是运动的重点。经过猛追猛打，一直到1958年春天，反右派运动才基本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其中民盟系统就有500多人。

整风和反右派运动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的夏季才结束。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确实存在着极少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中共领导的右派分子。整风运动中，他们借机向党进攻，对右派进攻予以反击是完全有必要的。但是，右派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由于党对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运动中没有谨慎地把握好斗争的尺度，结果是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许多人只是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提了些意见，对一些干部的作风问题提出了

批评；有些人则是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对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正如中共中央在整风运动初期发出的党内指示中所肯定的那样，这类批评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有些意见虽然片面，甚至带有明显的错误性质，但大都属于认识问题，同那些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共领导的右派言论还是有区别的，应该予以帮助和教育，而不是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

在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许多是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或是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党外朋友，或是经历了历史的严峻考验，对党忠心耿耿的党员干部。也有许多是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他们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使他们不能在国家的建设中发挥作用，这既是他们本人的损失，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由于反右严重扩大化，使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受到挫折，也使群众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的程度的打击，则更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还严重地动摇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推翻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判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他在讲话中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正草案，决定公布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让全国人民加以讨论；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全国农村开展一场关于农业生产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为推动讨论发表社论，批评“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大跃进”的口号就此正式提出来了！

1957年冬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冬季。在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批判“右倾保守”思想，批判中充分发挥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围攻作用。同时，经过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地，养猪积肥。水利工地上红旗如海，夜晚则挑灯夜战，歌声如潮，煞是壮观。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和成都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大跃进”问题。话题又是从反冒进说起，毛泽东生气地说：“1956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多快好省，好省我看没有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这层意思我已在去年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了。谁要促退我们？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有的同志一个劲地反冒，我看离右派只有九十九了。”讲到这里，毛泽东看看周恩来，周恩来立刻感到了这眼光的威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四十二回 反右倾周恩来四检讨 促跃进毛泽东三放炮

话说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使周恩来、陈云等人异常紧张。毛泽东讲着讲着，拿出柯庆施写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问周恩来：“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毛泽东这么一问，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刘少奇等反过冒进的领导人都坐卧不安，其他人大都不知道反冒进的背景，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周恩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后，呆呆地坐了好长时间，才叹口气，写起检查来。1 月 19 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检查道：“1956 年夏的反冒进是一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与会者这才知道事情的底细，不禁为周恩来的坦诚和谦让所感动，会议气氛融洽起来。大家认真检查本部门本地区反冒进问题，开始讨论如何落实毛主席促进的思想。一些人已在会议期间给原单位通了电话，说了说会议反反冒进的情况，这些单位一听，也都闻风而动，开始促进。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 2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 月召开成都会议，4 月召开武汉会议，继续反反冒进，周恩来、陈云继续作检查。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被迫作了检查。他们检查完毕后，毛泽东又讲了话，他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促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对反冒进这个问题，还得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正在写检讨，心情不好，便走过来把屋门推开一道缝往里瞧瞧。只见办公室空无一人，只有周恩来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便叫上秘书准备去劝劝他。走到桌前，只见一张白纸上没有写几句话，还涂来改去。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心情矛盾，无法落笔。是啊，反冒进本来就是对的，现在要叫他说违心话，他怎么说得出来。邓颖超想想，建议周恩来还是由他口授，秘书记录。周恩来起初不愿意，后来想想，这个办法也对，便同意了。这样，便由周恩来口授检查内容，秘书记录。

当晚，秘书根据记录，整理了一份检查稿，送给周恩来修改。周恩来逐字逐句地修改，忽然一段话跃入了他的眼帘，“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周恩来按铃把秘书叫来，指着那段话问：“为什么要加这个成语？”秘书回答说：“我觉得加上这个成语可以更好地加重语气。”周恩来叹口气说：“这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说完，用笔抹去“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

检查稿修订后送去打印，打印件分送政治局常委。稿子很快又都退了回来。秘书一看，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批阅回来的稿件中，有一些把“检讨”的一些话删去，有些话改得分量轻了。周恩来阅稿后才喘了口气，这时邓颖超发现在起草检查稿的十多天中，周恩来两鬓增添了一些白发。

周恩来、陈云检讨以后，毛泽东觉得检讨深刻，便在会上宣布：“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全力以赴领导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顾全大局。”出席八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们认真讨论工作报告，会议决定把今年的钢产量指标提高到 800 万吨，以便争取用 15 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钢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是能否按期赶上英国的主要标志。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

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会议期间，各省市负责人都打了电话回去，要求立即行动起来，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冶金部给钢铁厂下达了新的生产指标，各钢厂都开始开足马力，加紧生产，社会上各行各业也都贴出大标语，“让钢铁元帅升帐”，“以钢为纲”，千方百计地支援钢铁生产，出现了许多动人的奇迹。

然而就在这时，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

1958年5月26日深夜，上钢三厂的司炉长丘财康在炼钢时，不幸发生事故，1300度高温的钢水烧伤了他的身体。上钢三厂立即要来了救护车，把他送到上海有名的广慈医院。医生们听说送来的病人是炼钢工人，纷纷赶来抢救，这时他们才发现丘财康烧伤面积达89.3%，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深二度的烧伤，抢救室里弥漫着一股焦味。根据国外文献记载，这样严重烧伤的病人在72小时内就得死去。他们虽然尽最大努力在抢救，但心头一直充满着阴影，广慈医院从来还没有接收过这样严重的烧伤病人。

为了抢救丘财康，当天下午广慈医院邀请院内外专家进行会诊，专家们一听病历介绍，都一个个摇头叹息，上钢三厂的党委组织部长一看专家们都不吭声，恳切地对大家说：“现在钢铁工人为了完成800万，在拼命，在苦战，在创造奇迹。希望你们切实想想办法，在医疗上创造出奇迹来。”医生们也恳切地回答说，经过一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大家的思想觉悟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也想为800万吨钢做贡献，我们要尽最大的可能抢救丘财康。上钢三厂党委宣传部长知道大家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但也知道他们信心不足。是啊，现在医院抢救烧伤病人用的是国际医学文献的权威定论，而设备又与文献所要求的差得太远，他感到必须破除国际权威文献对医生的思想束缚。

上钢三厂的党委听取了组织部长的汇报后，立即同广慈医院党委联系。双方商量后，感到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分析。他们把医生们召来，讨论国际医学权威的结论是否权威。广慈医院党委书记问医生们：“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受烧伤的都是什么人？”医生们心想，虽然烧伤的人里干什么的都有，但总是在一线劳动生产的劳动人民受烧伤的机会多些。党委书记问道：“那么，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专家，会不会为了抢救劳动人民的生命而用尽自己的学识和智慧？”医生们当然明白，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医院完全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一般的劳动人民没有那么多的钱享受高级的医疗。

这时，医生们才茅塞顿开，原来国际医学权威的定论是建立在这样的医学实践的基础上。党委书记看大家频频点头。知道大家的认识有了转变，便带着医生们去查房。丘财康看到医生们来了，用低微的声音对医生们说：“治好我吧。老婆、儿女我都放得下，但是炼钢炉需要我，生产上需要我，大家都在为800万拼命啊！”

看护的护士汇报说：“丘财康同志睡梦里都喊着钢、钢。”医生们听了汇报，个个热泪盈眶，外科主任亲切地对丘财康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救活你，我们一定能救活你！”

从此开始，医生们破除迷信，大胆革新，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活丘财康！”他们把丘财康移到消毒严密的手术间，进行隔离治疗，调来了最好的护士对他进行护理。为了启发丘财康的食欲，护士们根据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把各种名菜馆的菜单念给他听。上海各有关部门也一齐行动起来，缺医来医，缺药送药。听说丘财康要人工植皮，医生们和社会上的很多人勇

跃报名捐皮。为了让丘财康减轻翻身的痛苦，有关厂家专门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病床，可以让丘财康临空躺在上面，不害褥疮。丘财康虽然疼痛难忍，但主动配合治疗。到6月底，丘财康的全身创伤已渐渐好转，身体也慢慢复原，奇迹确实创造出来了。

丘财康被救活的消息一经报纸传开，人们纷纷到医院慰问钢铁工人丘财康，称赞医生们创造了奇迹，为钢铁元帅升帐做出了贡献。钢铁工人们从这一奇迹中得到了更大的鼓舞，深深感到党和人民对钢铁工人的关心和爱护，以更大的干劲投入生产。

农业战线上也是热火朝天，大修水利的热潮席卷全国。北京十三陵附近，也在开工修造大型水库，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解放军都到水库支援。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领导干部也来参加劳动，同其他普通劳动者一样，他们也住窝棚，打地铺，编成连、排军事组织，由周恩来手执红旗，每天领队去水库大堤劳动。

工程指挥员见周总理领着一大帮部长来参加劳动，赶忙跑来敬礼：“我们欢迎首长……”周恩来立即打断他的话：“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在这里我们都是普通劳动者。”王震笑着补充说：“现在你就是首长，我们是你的部下。”工程指挥员忙给大家分了工，周恩来带着部长们立即干了起来，挑筐的挑筐，推车的推车。罗瑞卿是公安部长，劳动时也不忘自己的本职工作，时时提醒老同志们注意安全，自己却推车猛跑。史良部长净拣大个儿石头抱。部长中有许多人在战争时期留下伤残，仍坚持劳动。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虽然年龄已大，但干劲不减。

周恩来在延安骑马外出时，被江青惊马，摔断左臂，虽经治疗，但终于留下残疾，不能伸直。同志们照顾他，想让他干点方便些的活，但周恩来却抢了一辆手推车推石料，接去又去装料、传筐。

中间休息时，大家又表演节目。荣高棠管体委，偏爱唱陕北民歌。史良部长当着几百人，学半夜鸡叫，人们捧腹大笑。胡愈之和史良很熟，史良因为爱国被蒋介石打成救国会七君子一案坐牢时，他就采访过她，没想到她除了通晓法律以外，还会口技。王震是南泥湾垦荒的老旅长，是劳动能手，还会讲笑话，他讲的讽刺孔夫子犯教条主义的笑话逗得大家直笑。

就这样，周恩来和部长们住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了整整一个星期才回来。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的劳动汇报后，连连称好。周恩来笑着说：“我的体会还不深，将军们的体会恐怕更深刻。”毛泽东急问：“怎么，他们也去十三陵了？”周恩来回答说：“他们没有去十三陵，而是下连当兵去了，穿着列兵的制服，住在班里，和大家一样操练。”毛泽东听了高兴极了，赞赏地说：“将军当兵，只有共产党的队伍才能做到。我们是有点资本哩。恩来，你们在北京守着，现在该我去受教育了。”

两人正说着，陈伯达送来《红旗》社论的清样，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指示写的。前不久，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中看到河北省嵯峨山附近的27个农业社在今年4月间合并成一个大社，叫嵯峨山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感到这是个新生事物，组成大社，政社合一，便于领导，而且人民公社这个名称也好，便立即通知陈伯达在《红旗》上发表社论予以提倡。陈伯达很快写好社论，印出清样。毛泽东看了一遍，同意发表。这时已是7月了，各地传来捷报，粮食亩产量大长，有的一亩打夏粮几千斤，还有上万斤的。

毛泽东看了这些消息，又喜又愁。粮食要么不够，要么一下子多的不得了。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者，粮食多了是好事，但粮食多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

另外生产力发展的这么快，原有的生产关系恐怕很难满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发展农业生产就要大修水利，平整土地，用大农业机器生产，现在那些几百户一社的农业社还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吗？他决定到农村去看看。

1958年8月，毛泽东乘坐专列外出视察，一路所见所闻，令人鼓舞。专列出北京后，先到了河北省，毛泽东视察徐水县，问一个农业社主任：“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社主任恭敬地回答说：“很好，比哪年都强，一亩打754斤呢。”陪同视察的县委书记赶紧补充说：“这里土质不好，产量算低的。今年我们县的粮食亩产是两千斤，全县共收12亿斤粮食。”毛泽东听了之后，又惊讶、又喜悦地问道：“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是31万人，那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县委书记回答说：“换机器，造酒。”毛泽东又问道：“也不光是你县粮食多。你去换，人家也换，没有那么多机器怎么办？”县委书记回答说：“让工人老大哥多炼钢铁，多造机器呗。”

县委书记的一句话猛地提醒了毛泽东。粮食打多了，工厂没有机器换，要影响工农联盟呀，看来八大二次会议定的今年生产八百万吨钢的指标已经低了，还得再提高些，争取今年生产一千多万吨钢。和1957年的钢产量比起来，这个数字翻了一番，明年再来个大幅度增长，用不了几年就超过英国了，看来现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已经不适用了，现在的口号应该是超英赶美。

毛泽东离开徐水以后，县委书记召开全县农村干部会议，要求秋粮大跃进。《人民日报》记者闻讯赶来时，只见全县农田里红旗飘扬，锣鼓齐鸣。这里的许多生产队都大放“卫星”，亩产几万斤都没有人提了，有的提出小麦亩产要达到十二万斤，一亩山药要生产一百二十万斤。记者听了，看了，也深受鼓舞，连夜写稿子寄给了报社。

离开河北以后，毛泽东又来到河南视察，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吴芝圃陪同毛泽东来到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毛泽东兴致勃勃地看了公社的托儿所，“幸福院”、食堂、面粉加工厂、滚珠轴承厂，和“幸福院”的老人们握手谈话。接着他又视察棉田，这里的棉花长得特别好，待走进棉田一看，只见棉枝上棉桃成串，毛泽东连连称赞：“这棉花长得真好。”吴芝圃介绍说：“七里营生产队种棉花一万五千亩，这样的棉田有五千多亩，每亩保证皮棉一千斤。”

毛泽东视察走后，七里营的这块棉田旁立即立起了一块牌子，上书“毛主席视察过的棉田”，从此，这块地只许种棉花，不许倒茬。

视察了河南省，毛泽东又来到山东省视察。省委书记谭启龙汇报了山东农村大跃进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历城县北国乡听说河北省有的地方提出口号，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他们也准备把全乡办成一个全民的大农场。毛泽东摇摇头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跟随采访的记者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报道出去，“人民公社好”的大标语立即贴满城乡墙头，全国农村热火朝天地大办人民公社。

形势逼人，一个钢铁、一个人民公社，这两个问题都需要马上解决。回到北京后，毛泽东立即找人谈话，重新确定钢铁生产指标。1957年5百多万吨，毛泽东说。“干脆，翻番，今年的钢产量指标定到1070万吨，何必那么

拖拖拉拉的。”

毛泽东一言九鼎，在 8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1958 年的钢产量指标是 1070 万吨，决定在全国大建人民公社。会议是在著名海滨胜地北戴河举行的，会议开完后都快到 8 月底了。算算时间，离年底只有四个月了，钢产量还只有四百多万吨。怎样完成剩下的 600 多万吨钢的任务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除了发动群众，来个全民炼钢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说干就干，中央一面让报纸发社论，一面让干部回去动员。于是，一时间，成千上万的人都离开农村、工厂、学校、机关去大炼钢铁，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力有几千万人。

正在这时，福建前线炮兵根据中央军委命令，从 8 月 23 日起，开始以压倒优势的火力炮击金门，以粉碎台湾国民党当局以金门、马祖为前哨阵地袭扰大陆，以表示抗议美军进驻台湾海峡，制造两个中国。

战报到京，毛泽东看了几遍，满意地笑了，对卫士说：“今年我也放了三大炮，总路线、公社、钢铁。”毛泽东心情极好，叫上卫士们到游泳池去游泳。大家换上泳衣，陪毛泽东在池中痛游一番。出池后，李银桥赶紧给毛泽东披上大毛巾，毛泽东摇摇头说：“不痛快，还是在长江里游起来惬意。记得 1954 年 9 月在北戴河海滨与海浪搏斗，那多痛快。一晃四年过去了，银桥的将军肚也起来了。”说完还拍拍银桥的肚子。

回到办公室以后，毛泽东翻阅材料，这是各地农业大跃进的情况汇总。

北戴河会议之后，全国农村城市掀起了更大的“跃进”高潮。这时实际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浮夸和混乱现象。高估产造成大增产的假象，致使北戴河会议作出 1958 年粮食产量 6000——7000 亿斤的决定，比 1957 年的 3700 亿斤增加了近一倍，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 4800 亿斤的指标也高出很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导致浮夸风进一步升级。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 1958 年的钢产量为 1070 万吨，比 1957 年的钢产量多了一倍，但实际上中国当时根本不具备生产这么多钢的条件。为了完成 1070 万吨钢的政治任务，各地都由第一书记挂帅，组织大批人马土法炼钢，被大炼钢铁运动吸走的全国劳动力有九千万人。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也都是“全民大办”。“全民”写诗，“全民”搞科学研究。广大人民群众确实表现出了可贵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度积极性。但是，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只能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致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人民公社化运动也是一哄而起。没有试验，没有总结，全国自北戴河会议后，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国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并入人民公社的合作社的一切财产均上交公社，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穷社无偿占有富社的部分财富。社员的自留地、果树、猪、鸡也都交到公社。政府和公社可以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乃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俱。农民们对此惊恐和不满，杀猪砍树。上级三令五申，严禁农民擅自处理自己的财产，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是给农村生产力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农民的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无偿平调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大量的丢失、破坏的现象。

人民公社把本社的社员按班排营组织起来，实行军事化管理，动不动就是大兵团作战，挑灯夜战，助长了蛮干的风气，造成人力的极大浪费。农村

中的集市贸易、家庭副业、摊贩小商都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人民公社还大力提倡供给制，企图把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包起来。但由于农村生产力水平的落后，这些只能当做口号喊喊，根本不可能实行起来。以当时各公社大办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这件事来说，由于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试行了几个月便无粮供应。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且说毛泽东翻着材料，忽然发现自己的家乡湖南省老被插“白旗”，他不禁皱起了眉头。这个周小舟是怎么搞的？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十三回 被挟持达赖离国 出义师总理平叛

话说毛泽东翻阅情况汇报材料，发现自己的家乡湖南省老是被插白旗，就是说他们的粮食单产跃进计划远远地落后于其他各省。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过去的秘书周小舟。这时全国各省的亩产计划一个比一个高，报纸上天天在放“卫星”，徐水县的小麦亩产计划已经上升到12万斤，湖南省的亩产计划为什么这么低？那些高产计划有没有吹牛的？毛泽东决心再次外出视察。

专列沿着京广线向南开去。虽然时值九月，序属三秋，但南方的天气还比较热。毛泽东从车窗里望出去，只见沿途秋粮长势喜人，广阔的平原上，到处冒着黑烟，这是群众建造的无数土高炉在炼铁。到处红旗招展，到处锣鼓喧天，一派大跃进的喜人景象。

车过荥阳时，毛泽东命令停车，把在路边田野里的用土高炉炼铁的十几个中办下放干部接到车上，在郑州宾馆听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谭震林和河南省委书记的汇报。河南省委书记详细地汇报了河南大跃进的情况。听完汇报，毛泽东问道：“有什么问题没有？”省委书记回答说：“问题不少，有的地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还有点保守，气魄不大。”毛泽东摆摆手说：“我是问有没有弄虚作假的地方？”省委书记肯定地说：“没有，高产田我们都是组织专人监收、监打、监过秤，不可能弄假。”毛泽东仍不肯相信，一个个地问：“你发现什么问题没有？”被问到的人都摇摇头，表示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毛泽东仍不放心，转身问坐在身边的丰泽园摄影员胡秀云：“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胡秀云在这一带已下放劳动了一段时间，了解情况，见毛泽东问自己，便老实回答说：“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四百斤，早晨就成一千斤了？有些干部一个跟一个吹。”

在场的人听了一下子脸色都变了。本地的干部见胡秀云揭了老底，又气又怕。中央办公厅的人怕的是胡秀云会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有些话，毛泽东可以说，别人不能说。

谁知毛泽东毫不生气，反而表扬胡秀云说：“敢说实话，很好嘛，看来你记住了临走之前我给你送的题词，实事求是。”说完望望省委书记和谭震林，问道：“你们到底是在放卫星还是放大炮？”谁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大家尴尬地你看看我，我望望你。正在这时，河南省委的同志端上来一盘面包放到桌上，省委书记对毛泽东说：“这是公社食堂烤制的面包，请主席尝尝。”毛泽东一尝，原来用白面和玉米粉合在一起烤的，味道不错，毛泽东也让大家尝尝。于是，大家品尝起来，齐声夸奖味道不错，原来有点紧张的气氛又和缓下来。

转眼间就到了10月，全国钢产量离1070万吨还差一大截子，中央向全国发出指示，一定要保证钢铁元帅升帐，使大炼钢铁的人数几乎达一亿人。无矿可炼，砸锅砸碗，送进土高炉。无煤可烧，砍树拆房。到了年底一统计，已炼钢1100万吨，超额完成任务。其实，很多土钢都是一堆废铁块，甚至连铁块都不是的“海绵钢”，根本不能用。

毛泽东这时也感到问题严重，11月初，他主持召开郑州会议，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作法。紧接着12月，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继续纠“左”，在讨论公布今年的粮食产量时，大家的意见不太一样，有主

张 9 千亿斤的，有主张 1 万亿斤的。彭德怀在东北、西北农村作过仔细的调查，知道所谓高产卫星大都是假的，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样。他听着大家说来说去，意见不一，便站起来说：“粮食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不要被一些虚假现象蒙住了。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可以追加，比较主动。公布数字多了，将来被动。”

刘少奇望望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公布 7500 亿斤吧。”大家讨论了一下，觉得这个估计差不多，就同意了。正要散会，毛泽东说：“慢”他点了一支烟，猛吸几口，才缓缓说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促进派。大跃进我放了三炮，总路线、钢铁、人民公社。我们的头脑前段热了一点，现在要冷一下。热、冷都是必要的，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首先你要热起来，中国一穷二白，是一张大白纸，正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画。没有冲天干劲，不热一点，行吗？有些人就是热不起来，老当观潮派，算帐派，秋后算帐。”

彭德怀一听愣住了，主席这是批谁呢？正在思索的时候，毛泽东又讲话了：“我决定辞掉国家主席职务，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线的工作就由少奇同志主持。”

回到北京以后，毛泽东还未来得及洗一把脸，一大堆文件又堆到了桌子上，其中有一些是一些省报来的严重缺粮材料。毛泽东逐一看去，山东、河南、甘肃，都是些大跃进中口号喊得最响的省，他感到自己被骗了，气恼地把文件扔到桌子上。

接下来，毛泽东又翻阅剩下的文件，这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西藏情况的材料。毛泽东看了几份，不禁“啊呀”一声，深深地皱起眉头，急忙召集李维汉、彭德怀、周恩来开丰泽园开会。毛泽东看大家来了，一面招呼请坐，一面急匆匆地翻阅着几份急件。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结束了批阅文件的工作，从办公桌后面走过来，坐在彭德怀旁边，指着文件，问彭德怀说：“老彭，札囊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彭德怀一拍扶手，愤怒地说：“这伙叛军凶残至极，从今年 4 月以来，原来在金沙江以东藏区活动的叛乱武装卫教军和四水六岗遭到我平叛部队的沉重打击，支持不住，渡过金沙江，窜扰西藏，总共有 6 万人之多，主要集中在昌都、山南和黑河。噶厦庇护纵容他们的叛乱活动，用各种方式供给他们武器给养。这些叛军野蛮杀害西藏僧俗群众，疯狂袭击我军车队和小部队驻地。7 月，他们在争莫寺附近伏击我军车辆。9 月，在尼木县麻江区伏击我军医护人员的汽车杀害我军医护人员 16 名。10 月，叛军向我军驻守山南泽当的守备分队和机关多次发起攻击，围困 74 天，被驻军和藏、汉族干部击退。前些天，也就是 12 月中旬，叛匪在札囊伏击我军一个分队，我军副团长以下 56 人阵亡，13 人受伤，汽车被毁 2 辆。我军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毛泽东严厉地问道：“为什么不还击？”彭德怀说：“没有命令啊。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不敢作主。”毛泽东果决地说：“我是军委主席，我命令，如果叛乱分子公然攻打政府机关、学校，破坏交通，驻藏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履行其保卫的职责。”彭德怀高兴地回答说：“是，我立即通知谭冠三。”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毛泽东拿起电话问道：“我是毛泽东，好，说吧！”毛泽东听完电话，转过身来说道：“谭冠三来电，西藏又出事了，噶厦通过西藏工委向中央提出要求，请中央直接出面处理叛乱事件，如果由噶厦直接负责西藏治安的话，中央就得发给他们武器。”彭德怀叫起来：“主

席，坚决不能发给他们武器。”毛泽东笑笑说：“老彭，你别急嘛，我还不至于让他们给耍了。”

彭德怀回到国防部后，立即同在京的张经武、张国华两将军商议自卫政策，两张完全拥护中央自卫的决定。彭德怀立即拟定电稿，发给西藏的谭冠三将军。驻藏部队接到命令后，加倍警惕，准备随时痛击来犯的叛军，西藏不时发生小规模的战斗。由于解放军只是自卫，以打退叛军的进攻为原则，因此叛军的实力没有受到打击。他们利用西藏驻军、机关分散的特点，偷袭、伏击自卫力量不强的小分队和军队，解放军和地方工作机关损失惨重，大量人员牺牲。叛匪把抓到的战士职工，剥皮挖眼，残酷杀害。大量藏军这时涌入拉萨，和叛军一起闹事寻衅，噶厦政府在布达拉宫连连召开会议，部署叛乱行动。

1959年早春的拉萨一派杀气腾腾的景象。

西藏军区司令部积极作应变的各种准备，谭冠三政委在军区主持军事会议，听取各军分区的关于匪情的报告。从山南、黑河赶来的干部报告了叛军在这些地方的活动，这些叛军，虽然打着卫教军的旗号，实际上是一群祸害百姓，破坏宗教的土匪，烧杀抢掠，奸淫僧尼，毒打僧众。山南的叛匪为了逼一位活佛献出金钱，竟用熔化的铁水把这位活佛灌死。黑河等地的群众眼见土匪横行，自己组织起来与抢掠的叛匪斗争。有一次一伙土匪前来烧杀，被群众武装包围，二十多名叛匪束手就擒，全被群众捆起来扔到河里。

正汇报间，山南军分区来了一封急电，谭冠三看完电报，气愤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对大家说：“同志们，噶厦公开支持叛匪。他们明明知道山南叛匪活动猖獗，却偏偏在山南建立了一座军火库，运去近一千支各种枪支、迫击炮和大量弹药，只派很少的藏军守着，故意放手让叛军抢去全部军械。这事我们一定要管。现在藏军主力已涌到拉萨，布达拉宫、药王山制高点都已被藏军占领，罗布林卡成立了叛乱指挥部，形势一触即发。从现在起，全军停止生产，进入戒备状态。”

这时藏军加紧军事部署，叛乱迹象已十分明显，不少藏族僧俗群众要求解放军平叛。解放军领导屡次派人规劝噶厦，请务必遵守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噶厦虚与委蛇，暗地里寻找口实，发动叛乱，不觉就到了3月初。

2月初是西藏的“驱鬼节”，按惯例布达拉宫举行盛大的跳神活动，谭冠三政委接到达赖喇嘛的请贴，请他去参加布达拉宫的跳神活动。

布达拉宫是一座庞大的建筑，建在山腰，砖石结构，异常坚固，内有房屋千间，曲廊暗室不计其数，现在已是藏军屯驻的所在。值大乱即将来临之际，去布达拉宫观看跳神，就像关云长单刀赴会。去不去呢？很多人劝谭冠三不要去，怕吉凶多。谭冠三想想，果决地说：“必须得去，不去，噶厦就会以此为口实捣乱。”说完，和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书记郭锡兰等几位负责人仅带少数警卫去赴会。

噶厦政府已在布达拉宫山脚下布下藏军岗哨，谭冠三和其他负责人谈笑风生，穿过层层刀丛到达赖住所互献哈达。谭冠三身处虎穴，谈笑风生，参观了跳神活动，胜利返回。

就在举行跳神这天达赖喇嘛向邓少东和郭锡兰主动提出：“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工委、军区负责人立即表示欢迎。3月1日，西藏工委统战部派人去罗布林卡请达赖确定来军区礼堂观看节目的时间，达赖说：“藏历元月是传

召大会，我不能离开。传召大会后，我一定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

达赖喇嘛答应去军区礼堂看戏的消息很快在拉萨传扬开来了，噶伦们指使一些人借此造谣惑众散布“汉人要劫走达赖喇嘛”。一时间流言大起，噶伦们又反过来哄骗达赖，说解放军请看节目是假，乘机扣留他是真。还胡说“汉人要消灭宗教，杀活佛”等等。达赖不相信这些话，他虽然年轻，政治上颇为成熟，知道解放军不会干这种事，他想出去辟谣，但已为噶厦挟持，不能行动自由。无奈之中，他只好写了一个便条，说明他已被反动分子挟持，无行动自由。信写好后达赖让一个心腹侍从送给谭冠三。谭冠三见信，急派要员再次去向噶厦交涉，务请达赖来军区礼堂看戏，噶厦拒不转达。谭冠三闻讯，又派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去布达拉宫，噶伦们立即唆使藏军痛打桑颇，等到部队赶去把他救回来时，桑颇已被打成重伤。

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这时已回到西藏，刚要去医院探望桑颇，忽听拉萨街上传来阵阵人喊马叫声。二人大惊，急欲派人探听，只见一个参谋急喘喘跑来报告：“自治区筹委会干部索郎降措被叛匪杀害，并在街上纵马狂奔拖尸示众。”张经武急令：“快去把他抢下来。”参谋领命带了一连人冲出去了，叛匪看到部队冲来，跳下马躲入民房，部队把索郎降措的遗体抢下来。

这时，拉萨街头秩序大乱，藏军武装游行，一些叛乱分子向解放军战士挑衅，不明真相的僧俗人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保护达赖。噶伦们见叛乱时机成熟，在罗布林卡开会，决定3月10日正式进攻西藏工委、军区驻地和自治区筹委会，索安旺堆狂呼道：“3月10日，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从10日开始我们公开正式站出来，同中央决裂，建立西藏国。”众匪军头目也跟着狂呼乱叫。

是夜，藏军和原已叛乱的卫教军七千多人一齐出动，占领了拉萨市周围各制高点，叛军不断地向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驻地开枪射击，拉萨市内火光冲天，叛匪抢劫商店，焚烧寺庙，拉萨一片腥风血雨。

张国华等人深知叛乱形势已成，为了说服藏军不要叛乱，连续派出多人向噶厦、藏军接触，劝告他们遵守十七条协议，但噶厦置若罔闻，一意孤行。这时达赖一连三次给谭冠三将军写信，说明自己被人劫持，无法制止叛乱发生。张国华等人眼见叛军步步进逼，只好调动部队加强防卫。

叛军们开始疯狂地向西藏军区、西藏工委等机关驻地冲击，驻藏部队被迫自卫还击。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一方面调动部队，一方面紧急报告中央：叛军劫持达赖，拉萨局势严重，叛军已大规模进攻西藏军区西藏工委，驻藏部队被迫奋起还击。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昌视察，3月11日毛泽东致电党中央对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给了精辟分析，并作了重要指示，毛泽东指出：“照此形势发展下去，西藏问题有被迫早日解决的可能。”还指出：“这种‘被迫’是好的。”他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应是军事上采守势，政治上采攻势。目的是：分化上层，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站在我们一边，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内，使他们两派分裂，教育下层，准备群众条件，并指示工委争取在拉萨大打一仗更为有利。12日中央转发毛泽东的电报到了西藏军区司令部。张国华高兴地一拍桌子说：“好！”他立即把电报给张经武、谭冠三、及西藏军区负责人阿沛·阿旺晋美少将、桑颇·才旺仁增少将及邓少东、詹化雨、王其梅诸将军看了，大家在地图前会商了一阵，决定了军事部署。张国华遂拿起电话，紧张地向各部队发出命令：“我命令，各部队立

即做好战斗准备，准备出击，坚决平息叛乱。”部队接到命令后，一面抵抗冲来的叛匪，一面作出击的准备。

达赖被挟持后，噶厦逼他出走，达赖说：“待我占卜一卦，看是宜留还是宜走。”噶厦们同意了，拥护着他到罗布林卡内的“贡布拉康”神殿里进行占卜。达赖首先在两张方形藏纸上分别写上“宜走”“宜留”，然后把两张纸包在两个糌粑团里，放进宝瓶。祈祷开始了，达赖焚香磕头，口里念念有词。祈祷结束后，达赖摇动宝瓶，众人都紧张地盯着。忽然宝瓶里跳出一个糌粑团，达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宜走”。达赖还想再占一次，众人哪里答应，把他拥回“永固不变宫”。此殿是1954年中央政府专门拨款为达赖修建的，金碧辉煌，极为豪华。达赖及其随同人员索康、柳霞、聂苏三个噶伦，达赖经师林仓、副经师赤江，代理基巧堪布噶章、副官长帕拉、达赖的母亲、姐姐，一代本彭措扎西、二代本扎西白惹、四代本多卡色和随行亲属及担任警卫的200名藏军共600余人，于17日夜10时左右，乘当晚夜色昏黑，拥着达赖出了罗布林卡后门，渡过拉萨河，去往山南，从那里又去了印度。

3月20日上午10时整，两颗刺眼耀目的信号弹从军区司令部升起，与叛军相持的解放军十几个连队，立即喊着杀声冲向叛军。叛军起先还负隅顽抗，但他们哪里是解放军的对手，很快被平叛部队分割包围。这时刚从农场赶来的炮兵连匆匆推出大炮向药王山叛军阵地猛轰，在炮火的掩护下，解放军步兵连队分两路冲上药王山，消灭了山上的叛军，控制了制高点。

现在只有罗布林卡的叛军据点还未攻克，这里驻着叛军指挥部和大量叛军部队。为了攻克这座据点，在攻占药王山后，解放军马上调集力量向罗布林卡外围发起攻击，战斗在下午7时半打响，经一小时激战，解放军部队即攻进罗布林卡。拉萨叛匪顿时群龙无首，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3月22日下午七时，盘踞在大昭寺内的最后一股叛军举起白旗投降。

经两天激战，拉萨叛乱已被平息，俘获叛军四千多人，缴获枪炮无数。3月23日，中央军委下令解除藏军武装，西藏军区接到命令后，一面组织部队奔袭逃窜在山南的叛匪，一面命令日喀则分工委同班禅协商，执行中央的命令，解除驻在后藏的第三、第五两个代本的藏军武装。

班禅大师当时驻锡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对拉萨叛乱之事毫无所闻，听了日喀则分工委的情况介绍后，不禁大惊，转而又点点头说：“这个脓疱总是要破的，早破比晚破好。毛主席说过，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只不知达赖佛现在怎样了？愿佛祖保佑达赖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愿佛祖保佑达赖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

在班禅大师的配合下，日喀则分工委和驻军顺利解除了两个代本藏军的武装，解散了噶厦政府派驻日喀则的基宗，所有编遣人员一律按照本人的志愿给予妥善安排，或参加工作，或领取路费自行回家。班禅对和平解决后藏的问题感到非常满意。

拉萨叛乱被平息后，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3月28日下达了国务院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行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在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达赖喇嘛被劫持期间，由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国务院命令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全藏僧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巩固国防，保护各民族人民利益，安定社会秩序，为建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

藏而奋斗。

班禅接到国务院命令后，立即致电毛主席周总理，完全拥护国务院命令。第二天，他又出席日喀则各界人士的集会，对大家说：“西藏地方政府的叛乱分子和上层反动集团真是罪恶累累，恶贯满盈。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武装已经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惩罚，这是他们自寻绝路得到的结果。他们是罪有应得的。现在达赖喇嘛被叛乱分子劫持，我已经多次祈祷佛祖保佑达赖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在他被劫持期间，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决定，我将竭诚努力，和大家一起，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出席集会的各界人士对班禅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几天以后，班禅即从日喀则动身来到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又过了几天，他从拉萨坐飞机去北京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正式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

由于拉萨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又被劫持到印度，西藏问题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忙于处理平叛、宣传等问题，一直到4月底才稍微有了空闲。这时各地发生饥荒的消息大量涌来，特别是甘肃省，本来就土瘠民穷，大跃进期间又大搞浮夸，现在粮荒特别严重，已有人饿死。想往那里运粮，又缺少车辆。俗话说，救荒如救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毛泽东苦苦思索着，一支又一支吸着烟。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四十四回 毛泽东谈笑神仙会 贺子珍会夫美庐宫

话说毛泽东在 1958 年秋冬之间，就已敏锐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乱子：很多人急急忙忙地往前闯，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许多公社迫不及待地准备宣布全民所有，许多地方已准备取消商业和商品生产。为了使大家冷静下来，清理混乱思想，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58 年 11 月党中央召开郑州会议，纠正“左”倾错误，接着又在武昌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两次会议的基础上，党中央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高度评价了人民公社的兴起；指出人民公社目前基本上仍然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商品交换不但不能取消，而且还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

1959 年 2、3 月间，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十四句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毛泽东在这里讲的基本意思是，在人民公社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核算中，要以生产大队（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反对一平二调。

第二次郑州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方针，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接着又在此年，即 1959 年 3、4 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两个文件都规定生产队（即生产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清理归还平调的社员财产。

1959 年 4 月初，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全会通过了 1959 年的计划，除了原来宣布过的建设投资作了调整外，计划仍然维持了宣布过的高指标，钢的生产指标定为 1800 万吨。

这时，国民经济由于“大跃进”，组建人民公社，大炼钢铁而造成的严重比例失调的恶果已经暴露出来。粮油大幅度减产，副食品更加短缺。钢铁生产上不去，突击生产也无济于事，第一季度只生产钢 336 万吨。日用品欠缺，供应紧张。许多地方出现极其严重的情况，出现了少见的饥荒。

在这紧急关头，陈云经过调查，向中央政治局建议，1959 年的钢产量应降为 1300 万吨，精简非农业人口，发展粮食生产，组织日用品生产。党中央和毛泽东很重视陈云的意见，立即作了安排。

尽管作了这些努力，但由于毛泽东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然完全肯定，因而“左”倾错误没有彻底得到纠正，形势没有根本好转。

就在这时，甘肃等地连连发来缺粮的告急电报。毛泽东责成总参谋长黄克诚抽调部队运输力量支援甘肃运粮。黄克诚一算，能抽出的车辆都抽出了，再到哪里去调车呢？正为难间，彭德怀结束对苏联东欧的访问回国了。黄克诚松了一口气，抓住彭德怀的手说：“彭总啊，你总算回来了，这一下我心里踏实多了。”彭德怀一惊，问道：“出什么事了吗？”黄克诚说：“你有所不知，近来山东、安徽、甘肃、河南几个省粮食告急，中央命令部队抽调运输力量去紧急支援运粮。部队已抽出了许多车船，甚至出动飞机。现在甘肃省粮荒更加严重，中央命令部队再抽出车辆支援，可是我现在到哪里去调车呢？”彭德怀跺脚叹气地说：“我早说了，要充分估计粮食产量的虚夸成

份，可大家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问题来了。现在只有把进藏的车辆抽一些下来。”黄克诚着急地说：“那会影响平叛的。”彭德怀叹口气：“救荒如救火，慢了，要死人的。你统一调配一下吧。”黄克诚答应了。

办完这件事，彭德怀想和毛泽东通一次电话，汇报一下他对农村形势的看法，但想了想，又把耳机放下了。正在这时，中央办公厅来通知说，中央决定7月2日至15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请彭德怀按时参加。彭德怀因忙于总结出访的心得体会，又要指挥西藏平叛的战斗，走不开，便给中央办公厅打了电话请假，不去参加会议。

时间不长，丰泽园那边来了电话，彭德怀抓起电话，只听对方说道：“喂，是彭部长吗？主席要跟你说话。”彭德怀一听，立即立正报告：“喂，是主席吗？我是彭德怀。”话筒里传来了毛泽东亲切的话音：“老彭，听说你请假不去庐山？不行，不行，你一定得去。”彭德怀为难地说：“主席，我刚出访回来，情况不熟。再说，还有平叛这档子事没完。”毛泽东说：“这些事都可以放一放，山南叛匪已经被歼灭，剩下些零星股匪，慢慢收拾吧，你一定要上山！”

彭德怀见毛泽东执意要他上山，只好向黄克诚交待了一下工作，向庐山赶去。

7月的武汉，酷热如炉。7月的庐山，凉爽似秋。这里早已戒严，政治局委员们和省市第一书记们、中央政府各部部长们奉命纷纷上山，山上顿时热闹起来。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毛泽东首先讲话：“我们这次开会，主要是讨论总结大跃进的工作。临上庐山之前，我去湖南看了看，湖南的工作搞得不错。我很赞赏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三句话，他说大跃进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成绩伟大就不说了，问题不少要谈透，前途光明要认清。我们常委把国内形势理了理，梳了梳辫子，那就是给大家传达下去的十九个问题，读书算一个，形势算一个，还有任务、体制、食堂、综合平衡等。去年做了件蠢事，好几年的指标要在一年内达到，但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跃进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

毛泽东喝了口水，又讲下去，谈笑风生，引古论今，讲得十分生动风趣，会场上不时发出轻快的笑声。

毛泽东讲完后，刘少奇接着讲话：“说老实话的人，去年的日子不好过，老被插白旗。去年一年成绩很大，成绩要讲够，不讲成绩就没有信心。教训也很深刻，要认真总结。我们今天在庐山开的会就算是个神仙会，大家可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中央领导人讲话后，开始分组讨论。彭德怀由于在西北工作时间比较长，被分在西北组里。由于是神仙会，大家发言比较放得开。彭德怀此前曾在西北考察过，半年之前又到湖南考察，还到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了解了一些真实情况。分组讨论后，他想找毛泽东谈谈，但会议日程安排很紧张。彭德怀有空闲时，毛泽东又在休息，几次去都被卫士挡驾。彭德怀找不到机会和毛泽东面谈，只好在小组会议上谈出来，希望毛泽东通过会议记录看到他的进言：

——我在去年年底考察过十个省的情况，也到了韶山公社。虚报产量的问题很严重，大炼钢铁吸空了农业劳动力，收禾只有童与姑。韶山公社国家给了许多贷款和帮助，也只增产了13%，根本没有报来的那么多，主席不知

是否了解这个情况。

——1957 年反右派取得了伟大胜利，脑子一发热就得意忘形，全民炼钢，想一下子吃成个胖子。人民公社也未经试验就铺开了，大刮共产风。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要是追究责任的话，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毛泽东也有一份。

——群众意见最大的是特殊化，官僚主义。我在外地考察，发现一些风景区都不让老百姓去了，里面盖的小楼，说是给首长住的。我看有些人成了贵族老爷，帝王将相了，小心老百姓骂娘。

——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别墅，搞什么名堂？这总不是主席让他们搞的吧，这些人想干什么？

虽然是神仙会，大家也还是很小心，只不过是议议大跃进的得失成败，讨论目前应该怎么办，还没有人敢指名道姓地这样批评毛泽东。现在骤闻彭德怀大喊大叫，个个屏息静气，睁大双眼看着彭德怀，没有人说一句赞同或反对的话。

华东组组长、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上山以来满脸堆笑，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张仲良、杨尚奎、周惠、李锐、田家英、吴冷西在会上发言连连批“左”，使柯庆施既恼火又高兴，但他老谋深算，喜怒不形于言表。散会后，悄悄地拿走彭德怀的发言记录，去美庐别墅找毛泽东。

毛泽东今天有空，独自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抽着闷烟。他接过彭德怀的发言记录看看，不高兴地对柯庆施说：“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会小会开了六七次，我是每会必检讨。我放了三炮，有错，可你彭德怀也总不该见理不饶人嘛。”柯庆施说：“家英怎么也跟着他们搅，我不好说，主席劝劝他吧。”毛泽东懒懒地说：“算了，吃饭放屁，肚里有气，气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谁叫我是始作俑者呢？始作俑者，其无后也。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无后也！”说着，毛泽东的眼圈红了，柯庆施一见不妙，赶快退了出去。

柯庆施走后，毛泽东望着庐山奇峰，不禁回想起了战争年代。最近他情绪不好，特别爱怀旧。他想起了韶山，想起了杨开慧，想起了贺子珍。突然，一个念头在心底升起。他用电话召来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对他耳语一番，方志纯频频点头，领命而去。

7 月 8 日傍晚，一辆小轿车从山下盘旋而上，车窗上挂着窗帘，从外面看不见车里的人的面貌。由于这个时期中央开会，小轿车上上下下，谁也没有对这辆小轿车予以注意。小轿车上了山，停在称为庐林别墅的 26 号楼，车门开了，从里面走出方志纯，接着是三个妇女，一老两少。在方志纯的带领下，两名年轻妇女挽着那位老妇人走进别墅。方志纯随后拿起电话，要通了美庐别墅的电话：“主席吗，我已把她接上山了，住在庐林别墅。”话筒里传来毛泽东激动的声音：“谢谢你，志纯同志。她身体不好，你就多费点心，安排得好一些。她喜欢抽烟，你先送她几盒。”方志纯答应说：“主席，你放心吧，我会安排好的。主席准备什么时候见她啊？”毛泽东在话筒里说：“这两天忙，得给组长汇报会讲话，过几天吧，到时我会通知你们的。”

毛泽东听方志纯报告说她上山来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1928 年在井冈山初次见面的情景像电影一样一下子在他眼前展开了，永新第一美人、纯情少女的动人风姿在眼前晃来晃去，但是突然间出现了 1937 年在延安窑洞离别的一幕，接着是她负气出走的瘦弱而苍老的身影。从此二十一年没

有再见过面。解放以后，她回上海居住，后来又回到南昌，彼此间通过几封信。他为她送去香烟，收音机，她为他捎来耳挖子，南方风味小菜。本来有几次毛泽东要接她来叙叙旧，但怕江青醋海生波，只好放弃了。这次来庐山开会，江青远在杭州，正好可以见见她，以了这桩心愿。

7月10日，庐山会议已近尾声，毛泽东命令田家英、胡乔木、周小舟、李锐等几个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秘书加紧修改《会议纪要》。这时，组长们已经来到小会议厅，准备参加组长会议。毛泽东首先听取汇报，然后开始讲话：“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纠‘左’，一定要让大家把话讲出来。不讲缺点，否认矛盾，就不能改正错误。决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算帐派、怀疑派，一个帽子也不戴。当然——”他弹弹烟灰，喝口茶说：“大跃进从全面来说，成绩和缺点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这一个指头的问题经过郑州会议等一系列中央会议，已经逐步解决了。现在要鼓干劲，把工作进一步做好。”

柯庆施等人在毛泽东讲完话后，立即表态，完全赞同毛主席的意见。彭德怀是西北组的组长，他看出来毛泽东的基本观点没有变，如果这样去纠偏，是不会取得很大的功效的。怎么办？他把自己的意见与隔壁住的张闻天、周小舟谈了，他们都觉得彭德怀的想法对，劝他去跟主席谈谈。彭德怀想去又不好去，不知怎么的，他觉得现在见毛泽东很难。思前想后，到了7月12日傍晚，他终于下定决心，和毛泽东谈一次。他住的地方和毛泽东住的美庐不过几百步之遥，很快就到了。不料警卫再一次挡了驾：“主席休息了。”彭德怀看看窗户亮着灯，便拨开警卫说：“主席根本没有休息嘛，怎么骗我？”说着就要往里闯。几个警卫急忙把他拦住，恳求说：“彭总，主席正在会见一个特殊客人，任何人都不得进去。你就照顾我们一下吧。”特殊客人？什么特殊客人这么神秘，彭德怀又没有见上毛泽东，心里快快地返回来。

其实，这时客人还没有来。待一会儿，天黑尽了。才从26号楼走出几个人，向美庐走来。警卫事先得到通知，没说一句话，立正敬礼放他们进去。客人们来到客厅，卫士让其他人都留下，只领着那位老妇人走上楼去，打开一间房子的门，让她进去。房里已有一个人背门坐着，听到门响，转过身来，喊了一声：“子珍！”就大步走过来，扶她坐下。来人正是贺子珍，自1938年离开毛泽东以后，她这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泪水不禁像涌泉一样流出来。毛泽东痛心地看着贺子珍，只见她头发枯白，面容憔悴，眼光呆滞，已经完全找不到当年的一点风姿了。

毛泽东深深地叹了口气，痛惜地说：“子珍，你吃苦了。我问你，你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走后，我托人几次请你回来，你为什么不过来呢？要知道，你走后我哭了好几次呢。”毛泽东说着眼睛湿润了。贺子珍已经哭成一团，后悔地说：“我那时年轻气盛，想不开。”毛泽东又问道：“你在苏联是怎么熬过来的？”提起这一段经历，贺子珍更难过了。当时贺子珍到苏联后，苏联方面照顾很差。贺子珍有次为一件小事和苏方有关部门一负责人发生争吵，竟被该负责人诬为有精神病，把她送进精神病院，饱受折磨，后来还是王稼祥得知此事，把她救了出来，贺子珍才得以和自己的女儿李敏（娇娇）重新见面。

毛泽东看贺子珍非常伤心，劝慰了一番，告诉她说：“娇娇已经有了男朋友，我看了，此人还不错。”贺子珍说：“我也见过了，我也同意。”毛泽东点点头说：“那好，开完会回去，我就给他们完婚。”

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因为还忙着会议的事，便让人把贺子珍送

回去，改日再谈。

毛泽东以为贺子珍上山的事情做得很保密，不会有人知道。其实，江青已在杭州接到报告，说贺子珍上山了，连夜打来电话。毛泽东拿起电话一听，原来是江青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吵着说：“明天我要来庐山。”毛泽东劝她：“这里开会正忙，你就别来了。”江青在那一头直吆喝：“我一定要来，明天就来。”

毛泽东放下电话，奇怪地说：“是谁眼这么尖，告诉江青了？”卫士走来，向他报告了一个消息。毛泽东问道：“陈伯达下山去了？对，山下有个通讯连，说不定就是他下山透露了消息。”

江青要上山，贺子珍是不能在山上呆了，毛泽东让方志纯马上把贺子珍送下山去。

由于贺子珍上庐山，彭德怀没有机会再和毛泽东面谈了。这时会议即将结束，大会秘书处已开始安排与会者返回的车船。彭德怀觉得这次庐山会议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烦躁不安，走来走去，忽然想出个主意，为什么不给主席写封信呢？正想之间，周小舟过来了，彭德怀把自己的想法跟他说了，周小舟非常赞成。彭德怀回到住所，就开始思考起来，最后考虑准备写三个问题：

甲、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这部分应该对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产值的增长作一些肯定，尽管报上来的数字有水分，但毕竟有这些数字在那里。除此之外，还要同时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过快过急，浪费资源等问题。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1.要着重指出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部门各地区，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见之于报刊。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来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党的威信下降。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 and 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

彭德怀对这个提纲审视了好一会，觉得差不多了，便按照提纲写起信来。

毛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信写好后，彭德怀叫来秘书，请他抄写一遍。秘书立即拿回去抄录起来，由于时间紧，任务急，他抄写得很快：……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 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二十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其实彭德怀的原文是“有得有失”，现在抄成“有失有得”，责备的成

分就加重了，可惜彭德怀在最后审阅这篇长信时，没有看出来。

信写好了，彭德怀并不想马上送去，他还想和毛泽东谈一下，面陈己见。从他住的虎吼岭到美庐只有几百步，彭德怀走了好长时间，走几步，又折回来。他怕当面陈述意见，谈崩了不好收场，可是想来想去，当面谈比送信的方式好，如果能谈上，这封信就不用送了。想到这里，彭德怀快步朝美庐走去。

毛泽东由于昨天晚上和贺子珍谈话，安排贺子珍下山，一夜没睡，快天亮时才睡下。彭德怀走到美庐门口，警卫立即跑过来报告说：“彭总，主席刚睡下，请你不要打扰啊！”彭德怀着急地说：“我有话要跟主席说啊！”警卫说：“主席睡个觉不容易，等他醒了你跟他说吧，不就几个小时吗？”彭德怀叹口气，只好走了回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十五回 彭德怀上书陈民情 毛泽东搬兵反右倾

话说毛泽东因贺子珍上山，江青打电话来庐山，连夜送贺子珍下山等事忙了一夜，天快亮时才吃了一片安眠药慢慢睡去，全然不知彭德怀来访的事情。直到下午，他才醒来，舒适地伸了个懒腰。今天是7月14日，庐山会议已基本结束。会议期间，人们议论纷纷，但总算没出什么乱子，明天就可以下山了。

毛泽东刚洗了把脸，秘书跑来报告：“彭德怀上午派人给你送了一封信。”毛泽东一愣，送信？大家都住在一块，有事可以来谈谈嘛，送信干什么？他立即意识到这封信可能有名堂，马上把信打开来看。看着看着，他的眉头不禁皱起来，胸脯剧烈地起伏着，最后把信放在桌子上，点了一支烟，苦苦地思索起来。

怎么办？自己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对这封信不理不睬，甚或把它退还给彭德怀。一是把这封信送给其他政治局委员看。如果选择前者，那彭德怀肯定不干，也会引起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不满。如果选择后者，那么这封信上将会有政治局委员的批语，会形成一种舆论。从目前的空气看，这种舆论肯定不会对自己有利。这就是说，彭德怀的这封信将起到引火线的作用，说不定会产生爆炸性的效应。

毛泽东充分掂量了这种形势，感到彭德怀的这封信是对他在全党领导地位的一种挑战，他决心接受这种挑战，通知会务组延长会期，让中办通知林彪、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人上山，参加会议；又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在山上的中央常委前来议事。他把彭德怀来信的事给大家讲了讲，轻松地笑着说：“既然彭德怀同志慎重其事地写了信来，不让大家议论也不好，我看干脆印发给大家，让大家议议吧。”三位常委觉得毛泽东的话有道理，应该让大家议议，让大家把话说完，便都同意印发。

中央办公厅接到指示后，以最快的速度把信赶印了出来，第二天发给与会人员。彭德怀一看大惊，这封信明明是自己写给毛泽东同志作参考的嘛，怎么在信的前面加上了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他要求收回这封信，但毛泽东微笑着摇摇头，把他打发走了。

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者以后，各组对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顿时成为会议的中心话题。人们对此持有两种意见。大部分人感到彭德怀的信写得好，揭出了问题的实质；一部分人觉得信的内容过于尖刻。张闻天是赞成彭德怀的意见的。他在华东小组会上发言，再次系统地谈了自己对大跃进的看法，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周小舟在中南组发言表示完全支持彭德怀的意见。刚上山的黄克诚本来就对大跃进中的浮夸看不惯，一上山就表示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书。

柯庆施、康生、陈伯达等人都是在大跃进中出谋划策，推波助浪的。庐山会议一开始，他们都有些紧张，怕批到自己头上。7月17日毛泽东突然发下彭德怀的意见书，他们立即意识到毛泽东要开始反击了，顿时活跃起来，在小组会上带头发言，批评彭德怀。康生为了表示自己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决心，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骂彭德怀多年来怀有异心，反对毛泽东，他在庐山写这封信，绝不是偶然的，信的矛头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不能姑息这种反党、反主席反社会主义的行为，要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云云。

在美庐别墅里，毛泽东翻阅着会议记录。会议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出乎他的意料，但他相信自己能扭转会议的方向。想起上庐山之前，自己一定坚决要彭德怀上山，真是太对了，要不然说不定山下还会出什么更大的乱子呢。

7月23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入历史的日子。此晚，毛泽东翻来复去地考虑着明天的会议，他已决定要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这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决定命运的拼搏。临战前的反复思虑使他难以安眠，吃了医生三次送来的安眠药，仍无法入睡。眼看着天色大亮，他吃了几片药，梳洗一番，来到了会场。

会场里静悄悄的，与会者都紧张地等待着。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登上主席台，喝了几口茶，点上一支熊猫牌香烟，开始讲起话来：“你们讲了这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以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觉。我看了同志们的记录、发言、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人有一个嘴巴，一曰吃饭；二曰有讲话之义务。他要讲，你有什么办法？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党内会外结合，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我劝党内这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在紧急关头不要动摇……”

毛泽东讲到这里，用眼瞟瞟彭德怀。有许多人像得到号令似的，一齐转过头去看看彭德怀。毛泽东语气加重了，激动地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嵯峨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每天三千人到那里参观，3个月30万人。这股热情怎么看？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对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共产风是不对的，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不能拿起就走。拿土豪劣绅的可以，不义之财，劫之无碍。但是这股风已经纠正了。为什么一个月能刹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当然饭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肉也只能一口一口地吃，要一口吃个胖子不行。林彪一天吃1斤肉还不胖，10年也不行。总司令和我的胖，非一朝一夕之功。全党都要学习，学点政治经济学。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以后作了一首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为霍去病’。北朝斛律光一字不识，还唱了一首《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公社干部不识字，可以给他们讲嘛。”

朱德在小组会上曾经发言，说食堂全垮了也没有关系，毛泽东在讲到食堂时狠狠刺了他一句：“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要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间派。有人对食堂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春秋时楚国宋玉作《登徒子好色赋》。登徒子在楚王前攻击宋玉漂亮好色。宋玉知道后，作赋一篇献给楚王，说东邻有一绝代佳人，连续偷看自己三年，自己都没有动心，而登徒子的老婆驼背鹄容，登徒子还和她生了五个孩子，到底谁好色呢？骂食堂的人就是用了《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彭德怀有书一封，讲大炼钢铁有失有得，他是把得字放在最后头的，急于发难，趁我党处在国内外夹攻的困难时候，向党进攻，企图篡党，成立他的机会主义的党。”

众人听到这里，一个个心惊肉跳。朱德尴尬地苦笑着。大家这时才清醒过来，原来一场暴风雨正向庐山袭来。彭德怀没有想到自己给主席写信成了向党进攻，顿时全身的血液涌上头部。还未等他发作，毛泽东大幅度地打着

手势，动感情地说：“同志们，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你们应该骂我。大办钢铁的发明权是柯庆施还是我？我说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庆施大声地回答说：“有！”毛泽东点点头说：“你那是意识形态。我是一个1070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得不偿失，闹了大乱子，自己负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也！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无后也！我无后也！断子绝孙……”

毛泽东讲到这里，声音哽咽，眼圈里涌出两汪泪水，手不停地颤抖着。会场一片寂静，有人不禁唏嘘起来，很多人心中开始怨起彭德怀来了，看他把主席气成这样。

从这天开始，庐山会议的风向一下子变了，从反“左”完全转到了反右。当天晚上，一些军队干部相继来看彭德怀，有的默默地和他握握手，有的劝他看开些。这些人走了以后，张闻天又来，两人似乎有很多话说，但现在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坐了一会，张闻天唉声叹气地走了。彭德怀在房子里闷坐半天，实在想不出毛泽东何以为自己的这封信发那么大的火。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即意见书）是7月16日由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到会同志。到7月22日，各小组对这封信进行了六天的讨论，除了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外，其余发言的同志都是同意这封信的嘛。彭德怀又想，自己写这封信，是感到有些话在小组会上不便谈，想找主席谈。可每次去，他都在睡觉，这才想到给主席写封信，供他参考，怎么主席把问题提得这么严重，而且还把过去的陈年老帐都翻出来。彭德怀担心，这样一来，问题非但不能得到解决，而且由于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原来的左倾急躁冒进问题还会进一步发展，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国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造成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这天晚上，彭德怀基本上一夜未眠。第二天，他用凉水冲了冲脸，走出屋外，恰好几位老师也向他走来。几个人在门口说起会议的事来。彭德怀委屈地说：“没想到主席讲话把陈年老帐都翻出来了，什么大帽子都扣上来了，什么会理会议、百团大战、野心家、反党。还说你解放军跟彭德怀走的话，我就上井冈山打游击。有这么严重吗？这是强加于人嘛。”老师们同情地点点头，提醒他说：“主席讲这些话可不是随便讲的，你总该有个态度才对！”彭德怀倔犟地说：“我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我没搞阴谋，你叫我说什么？”一位老师说：“你顾全大局嘛，委屈一下，写个书面发言吧。”彭德怀一摇头，硬邦邦地说道：“不写，不写。”大家不欢而散。

彭德怀回到住所后，想着主席话也讲了，骂也骂了，气也出了，会议可能就要结束了，吩咐随从人员收拾东西，准备下山。不料中央办公厅来电话，通知会议延期。彭德怀这才明白，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看来自己这次是过不了关了。他一屁股坐在床沿上，思前想后，就是想不明白。不就是私人之间的一封信嘛，毛泽东何以如此大动肝火，把什么“路线斗争”，什么“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上山打游击去”这些话都搬上来了。自己和毛泽东从井冈山时期就结下了战斗友谊，难道他就忘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吗？主席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听不得不同意见了呢？他想找人说说，可现在又能找谁去说说呢？

正想之间，毛泽东派人接彭德怀到美庐去谈谈。彭德怀心里一喜，终于可以当面和毛泽东谈谈了，可以有机会向主席当面解释一下了。只要把这件事向主席解释清楚，事情不就好办了吗？彭德怀立即起身，跟着秘书兴冲冲

地向美庐走去。

走进会客室，彭德怀不禁心里一沉，只见山上的常委都在这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还有新近上山的林彪。对着毛泽东的大沙发空着，看来是留给自己的。原来不是主席找自己谈话，而是常委们专门为自己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他顿时明白了，这是主席见自己不肯检讨，开常委会来批他。事已至此，彭德怀只好坐下来，听大家对他的批评。他掏出中华牌香烟，点了一支抽起来，立即被呛得直咳嗽。

毛泽东是知道彭德怀从不抽烟的，见此大惊，忙把自己的熊猫牌香烟推给他，关心地说：“老彭，你什么时候抽上烟了？抽我的，这个牌子的烟不呛。”接着毛泽东半似责备，半是关心地说道：“老彭，有事不要闷在心里，这样对身体不好。你看，你这个不抽烟主义者也抽烟了不是。你那个有失有得，得不偿失的意见为什么不在会议上提出来？也可以找我来谈谈嘛。怎么一声不吭，就来个突然袭击，给我下战书？”

毛泽东淡淡地笑着，抽了一口烟。林彪紧接着向彭德怀开了火：“彭德怀同志，你前不久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在苏联你和赫鲁晓夫那么亲热，是不是答应了他的什么条件啊？你这次在庐山发难，是不是和赫鲁晓夫有什么默契？”

彭德怀一听林彪要给他栽赃，气得一拍扶手，驳斥道：“胡说，你这是诬陷。我连一句外国话都不会讲，我说什么都得通过翻译，你们可以找翻译调查嘛。”林彪冷冷地阴笑着说道：“高岗也不会说一句外国话，照样里通外国，给苏联送情报。你和高岗那么热火，你就不会干这种事？你让中国士兵头上戴苏军的船形帽，你想把中国军队都交给赫鲁晓夫啊！”彭德怀气急了，猛地站起来，指着林彪的鼻子骂：“可耻！”

毛泽东立即挥手，命令彭德怀坐下，严厉地批评道：“老彭，我知道你心里有火。从井冈山以来，你对我就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你对延安华北会议一直不服气，这次在庐山发作了。好家伙，简直要把庐山炸平了！”彭德怀不服地辩解道：“我怎么想把庐山炸平？这次来庐山开会，我本来想着西藏平叛的事，不想来，是你下命令要我来的。我写信也只是供你参考，毫无恶意嘛！”毛泽东挥挥手说：“晓得，晓得，你是历来如此。你从郑州会议骂到北京会议，在庐山你又骂了二十天，你还要怎么样？”

彭德怀眼见毛泽东根本不听他的解释，又扯起了延安华北会议的事，不由得火冒三丈，一下子站起来，吼叫道：“你在延安操了我40天的娘，我操你20天的娘就不行？”常委们个个大惊失色。刘少奇愤愤地说：“真不像话！”周恩来严厉命令彭德怀坐下。毛泽东静静地用睡眠不足的眼睛看着他，把半戴香烟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

彭德怀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心灰意冷地听常委们对他的批判。他们说的什么，彭德怀一句也没听清楚，只是明白了，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要他检讨。

会议开完后，彭德怀懒懒地回到自己住所。几位老师跑来看他。一位老师说：“老彭，你怎么能操主席的娘？你呀，也太凶了一点。主席健在，你就这样。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你要好好检讨，认识错误！”彭德怀明白，自己不检讨，庐山会议就完不了，大家都拖在山上，天下大事怎么办？为了这个大局，他只好含泪写了个检讨。

毛泽东知道彭德怀不服气，为了打垮他的抵触情绪，8月1日，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他进行批判，一些政治局委员也奉命参加会议。

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与彭德怀有牵连的人也被通知到会旁听。

这次会议可没有上次会议那么轻松。毛泽东一宣布开会，林彪就抢着发言，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大骂：“彭德怀这次在庐山发难，完全是有组织、有纲领、有预谋地向党进攻。你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冯玉祥式的人物。三国时蜀国大将魏延脑后有反骨，诸葛亮知道他以后必反，便用计斩了他。你彭德怀脑后也有反骨。幸亏主席英明，及时识破了你的诡计。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看大家说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又讲起来，他从几十年前三军团打长沙讲到高、饶事件，从国际风云讲到庐山会议，巧妙地把党内的历史路线斗争都和彭德怀挂上号。这些事情常委们都是亲身经历者，但叫毛泽东一讲，似乎彭德怀一身都是不是。

中央这时决定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一些不在山上的中央委员应召飞速赶往庐山。8月2日，全会开幕，毛泽东首先讲话：“初上庐山，我是准备来挨骂的。从郑州会议骂起，一直骂到庐山会议，我是听得耳朵都磨起茧子来了。我从郑州会议检讨起一直检讨到庐山，不知检讨了多少遍。谁知有人还嫌不过瘾，要炸平庐山，全面否定总路线，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分裂我们党。我们一查，这些人原来已经结成了一起，成立了个军事俱乐部，为首者就是彭德怀，还有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彭德怀历来是和我合作，历次路线错误，他都有份。现在他公然发难，向党进攻，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了。现在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

“彭德怀的错误我是历来就有察觉。为了教育他，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让他在军委领导工作中能安心工作，我给林彪和其他老师们都发了转业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跟彭德怀走，我就上山打游击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毛泽东的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彭德怀在大会上检讨以后，会议立即分组讨论，柯庆施、陈伯达、康生都被分到彭德怀这个小组。彭德怀、周小舟、黄克诚、张闻天被各组轮流叫去回答问题，要他们回答在庐山前后的活动和目的。陈年旧帐都被翻出来，有人甚至还提到了毛岸英之死，说这是彭德怀反对党的领导的一个阴谋。

当然，最激烈的批判还是在彭德怀这个小组。这个小组的组长是朱德。会议开始后，柯庆施抢着打头炮：“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这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是要改换党的领导，要毛主席、刘主席下台，他上台。”

康生紧跟上：“彭德怀，你的真相就是魏廷式的人物，你后脑勺上长着反骨，你是不折不扣的野心家。”

陈伯达咕咕哝哝地说了半天，人们听不大懂他的福建方言，但大意还是明白的，无非是骂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反对唱《东方红》。

彭德怀有时想为自己辩解辩解，他每每刚一开口，林彪、康生、柯庆施、陈伯达就一拥而上，大喊大骂，斥责他“不老实，有反骨，是冯玉祥”。朱德见他们这样蛮不讲理，不觉大怒，一拍桌子，大吼道：“不许这样！什么作风！彭德怀同志的检讨我认为是中肯的。不过，老彭啊，你写信也该和我们商量一下嘛，怎么一声不吭，就单枪匹马地干起来了。”

毛泽东、刘少奇悄悄地来到会场，正好听到朱德的发言。毛泽东讽刺地说：“我看有些同志老了，头脑糊涂起来了，说话不着边际，颠三倒四地，隔靴搔痒。”朱德一阵苦笑，不由得想起了战争岁月。井冈山时期，抗日战

争时期，毛泽东能这样毫无顾忌地当众讽刺自己吗？变了，过去的战友关系，现在成了君臣关系了。

不等彭德怀申辩，毛泽东又数落起彭德怀的历史问题。彭德怀不服，大声申辩，林彪等人又和彭德怀大吵，会场成了一锅粥。朱德痛苦地摊开双手：“谁相信我们这些人在一个锅里吃了几十年的饭？”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等文件，撤销彭德怀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的职务，黄克诚中央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的职务，张闻天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周小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大局已定，大家纷纷收拾行李准备下山。毛泽东的卫士们也开始收拾毛泽东的东西。正在这时，彭德怀来找毛泽东，要和毛泽东谈谈。卫士们听说庐山的事了，把他挡在外面，先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彭德怀要来，沉思了一会说：“好吧，让他进来！”

彭德怀由卫士领着进来了。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只淡淡地说声：“坐吧！”彭德怀一看沙发上都堆着东西，只好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毛泽东点着一支熊猫烟，吸了一口，然后问道：“有什么话要说吗？那就快说吧！”彭德怀板着脸说：“我想提出一个要求，既然我现在已不能为党工作了，也不应该吃闲饭。我请求中央批准我去延安或湖南当个农民，种地打粮，也还可以为国家交一些公粮嘛！”毛泽东挥挥手说：“算啦。看得出来，你还不服气。如果你认为对，那就不要检讨嘛，检讨什么呢？”彭德怀无言以对，只好闷闷地告辞，毛泽东也没有站起来送。

彭德怀走了，卫士进来收拾茶具。毛泽东问卫士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吗？”卫士摇摇头。毛泽东对他说：“叫彭得华，要得中华！”卫士大吃一惊，暗想彭德怀果然有野心，连名字都有野心。

过了一会，田家英到毛泽东这里来了，毛泽东宽厚地说：“好啦，吸取教训吧。以后不要头脑一热，就跟着人家跑。以后你还是我的秘书，好好工作吧。”田家英从此不受重用。

闹了半天，毛泽东有点乏了，看着卫士们收拾行李，想着有件事该办了。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中央办公厅，在电话里命令道：“通知军委办公厅，后天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彭德怀一下飞机，就让他到会议上去继续接受批判！”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十六回 铸冤案立名俱乐部 去兵权归隐挂甲屯

话说庐山会议接近尾声时，毛泽东已决定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为了穷追猛打彭德怀等人，他有意把军委扩大会议召开的时间定在庐山会议结束的第3天，即8月18日，这样就可以使彭德怀一下飞机，就得到会场上去听批判，作检查，不让他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所以当庐山会议还在进行时，已经接任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就开始布置了，已经接任总参谋长职务的罗瑞卿大将领命在北京具体组织军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104人都是军界的大人物，会议秘书长由罗瑞卿担任，下分秘书、会务、警卫等组。当8月17日，彭德怀从庐山飞返北京时，军委扩大会议已是万事俱备，单欠彭总。彭德怀乘坐的飞机在南苑机场一降落，一队车辆严密戒备，立即把他拉到中南海怀仁堂作检讨，听批判。

谁知事与愿违，这些将军们戎马半生，养成了严格的讲求实际的作风。是啊，在战场上如果不严格地讲求实际，作战计划稍微脱离实际一点儿，教训马上就是一大片尸体。再说，这些将军们从军前许多人都是庄稼汉出身，他们还不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1958年，他们也参观过一些高产田，一眼就看出是假的。有了这个认识基础，他们看到彭德怀的信以后，不但不认为有错，反而暗暗叫好。所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许多人不发言。实在逼急了，大家也都千篇一律地表示拥护中央决定。

柯庆施、陈伯达、康生见将军们对批彭兴趣不大，都在那里哼哼叽叽地应付，连忙跑到毛泽东、刘少奇那里去告状。毛泽东听说军委扩大会议成了彭德怀煽动军队向党进攻的会议，大为恼火，看来自己不出马是不行了。他立即召集常委会议，要求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重新开会，林彪立即赞成，其他人也没有反对，于是毛泽东命令林彪立即重新组织会议。

林彪领命，得意非凡。自抗美援朝战争以来，他眼看彭德怀率军赴朝，屡立大功，威望隆著，很是妒忌，但又无法。不料想毛岸英死在朝鲜，彭德怀又几次闯宫，毛泽东甚为不快，林彪便经常在毛泽东跟前下谗言，日久天长，果然产生效果，八大上他晋升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彭德怀虽然还是政治局委员，但地位明显下降了。这次庐山会海生波，林彪在关键时刻助了毛泽东一臂之力，结果得以实现夙愿，重掌军权，他决心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好好立一大功，巩固住自己的地位。他下令罗瑞卿和空军副司令员吴法宪，出动18架飞机到全国各地接运将军。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所有负责人，各野战军军级领导干部，各省军区军级领导干部，各野战部队的师长、政委，军委处以上干部，再加上会务机构，共2000人。18架飞机起飞降落，前门饭店人进人出，一天之内，与会者全部到齐，进行编组。

8月22日，会幕重开。怀仁堂、紫光阁人山人海。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接着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查，然后又分组讨论。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被编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批彭黄的重点小组，组长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此人是东北金县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后在东北军任职，抗日战争初期率队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期任四野40军军长。

小组讨论开始后，这个小组好几天没有一个人发言。林彪找万毅这个老部下谈话，教以方略，又不断派人去小组会场观战，仍没有人发言。万毅见

此，便向大家提议：“既然大家都不发言，上面又要求深揭猛批彭德怀的问题。我看倒不如把彭德怀的意见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看他是咋整的，有没有右倾、反党的问题。有就批，没有就不批，大家看这样整行不行？”大家一致称好，“哗啦”一下子把意见书拿出来，谈起自己的感受。有的人谈起去参观卫星田时的笑话：“那次我们军委机关去参观天津市的卫星田。一看，稻子长得密密麻麻的，上面挂着许多大电灯泡，四周几部大风扇吹着，稻子穗头上还坐了个小孩，确实长势喜人。据当地负责人介绍，这亩田少说也要打1万斤，我们当场问他成本怎么核算，一下子把负责人问了个大张口。正热闹的时候，小孩闹着要回家。我们走到地里，把小孩接出来，才发现小孩屁股底下坐的是太阳灯，一看那些稻子都是从别的地里移栽来的，我在家乡就是种稻子的，还能骗过我。我们一追问，当地负责人说了实话，原来那些稻子是从18亩地里移栽过来的。”大家听了，一阵哈哈大笑。另外一个人接上话：“一次，我们到河北安国县去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编制训练。男民兵都大炼钢铁走了，‘黄忠队’和‘穆桂英队’来接受检阅。还没有开始检阅呢，几个‘黄忠’老头倒到地上，几位‘穆桂英’都尿了裤子。我们赶紧转身就走，人家穆桂英要换裤子，我们总不能站在旁边看着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洗澡避女人可不能忘噢。后来，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公共食堂，才知道穆桂英尿裤子的原因，原来食堂里只有一大锅稀稀的玉米面粥，看样还是为供参观煮的。没有吃的，只好猛喝水，穆桂英怎能不尿裤子。”他的话还未说完，另一个抢着说道：“热闹的事还在后面呢。我们参观完了，回到车上正要吃饭，一看，带来的干粮早就叫人给偷得干干净净。没办法，我们只好每人到食堂去喝了一大碗玉米稀粥，当然是交了粮票交了钱，然后大家坐车往回赶。这时候就热闹啦，你们猜怎么着？”大家睁大眼睛听他说：“一个个都在路上尿个不停。汽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到北京。有一个年轻的女中尉，因为在路边上找不到可以方便的地方，只好夹着，没想到一咳嗽，尿没有夹住，湿了一裤子。”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笑声。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议了半天，实在看不出意见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万毅看大家都说了话，便提议道：“我看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意见符合实际，没有什么反党的地方。现在有人只看着天上，全然不顾百姓疾苦，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的请举手！”

万毅话音一落，大家一下都举起了手，万毅说：“好，大家都赞成，我确定小组解散，大家回去分头学习。”

林彪得到报告，说军委、总参组不但没有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竟一致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万毅还解散了学习小组，这一气非同小可，立即把罗瑞卿叫来，商议一番。当天晚上万毅即被警卫组拘留，林彪另外指派组长，重新召集全组开会。

在此同时，邓华上将和洪学智上将也出了事。他们两位本是四野的干部，抗美援朝时，跟随彭德怀入朝，一直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由于军务匆忙，二人回北京时也未及主动去看望林彪，林彪一直怀恨在心，想找机会整他们。偏偏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华、洪学智二人为彭德怀说了一些公道话，林彪一下子把二人看管起来，最后把他们撵出军界，消了当年的一口怨气。

下一个是谁呢？

林彪眼见各小组讨论不甚热烈，便把会议改为集中批判，指定一些人发言。这些人指鹿为马，信口雌黄，生活小事、战斗部署，都成为彭总反党的

罪状。彭德怀毫不退让，讲井冈山的斗争，四渡赤水，讲草地上掩护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从张国焘的枪口下安全转移。林彪一看这样讲下去，彭德怀不但没有臭，反而更香了，于是指派心腹对彭德怀大轰大嗡，不让他有申辩的机会。只要彭德怀一开口，这些人便喊叫“老实坦白，抗拒从严。”彭德怀气极了，一拍桌子，大喊道：“开除我的党籍吧，把我枪毙了吧！你们谁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来报名吧！”

突然，会场上一位将军站起来跑到话筒前，大喊道：“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大家不禁愕然，仔细一瞧，原来是空军副政委吴法宪。此人最早是一军团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把他提升为39军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他对林彪感激涕零，现在林彪又当上了国防部长，他认为又一次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所以骂起彭德怀来格外卖力。

吴法宪见人们注意地要听他的讲话，便故作义愤填膺地喊道：“你们知道吗？在长征中，他亲自下令枪杀了一军团的干部，欠下了一军团的血债！”林彪乘机煽动道：“在长征中，彭德怀处处和一军团作对，想搞垮一军团，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从秋收起义亲自培育起来的队伍嘛。”

林彪说到这里，忽然台下一声大吼：“胡说！”如一个万钧雷霆在会场上爆炸。林彪顿时脸色变得煞白，浑身冒起汗来。人们循声望去，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众人心想，这钟伟莫非吃了老虎胆，怎么敢呵斥林彪元帅。

钟伟指着吴法宪和林彪，大义凛然地说道：“你们根本是胡说八道，造谣惑众。这事情我最清楚，我当时在场，我有发言权。那是二战遵义打娄山关的时候，一、三军团协同作战，仗打得很苦。激战中，一军团的一个连长临阵脱逃，拉了几个战士想去投敌，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正在审讯的时候，一军团追捕的战士也赶到了。经审讯，这个连长当场被处决。这样的临阵脱逃、拖枪投敌分子，人人都有权对他执行战场纪律。用这件事来加罪于人，挑拨军队之间的关系，岂不是太卑鄙了吗？我知道，我说了真话会招来杀身之祸，但连一句真话都不讲，还算是共产党员吗？”

许多人暗暗佩服钟伟的胆识，但也为他的安全担心。果然，钟伟刚坐下，几个武装士兵在几个军官的带领下，冲进会场。人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钟伟已被戴上手铐，架出会场。钟伟边挣扎边高呼：“你们不要上了人家的当，他们才是搞阴谋诡计，扯历史上的旧帐，挑拨军队关系！”

钟伟被押走了，将军们阴沉着脸坐在座位上。林彪感到有必要对钟伟事件表个态，不然下面的会就不好开了。主意已定，便声嘶力竭地喊道：“钟伟跳出来好，这颗定时炸弹埋藏在我们队伍里，是早晚要爆炸的，早暴露比晚暴露好！”他声嘶力竭地喊了几句，汗从头上冒出来，自觉体力不支，便宣布散会。

毛泽东听到林彪的报告，说万毅、邓华、洪学智、钟伟等人不但不揭批彭德怀，反而帮彭德怀说话，不觉大怒，让林彪继续清查军队中的彭德怀分子，结果又查出炮兵司令员吴信泉也说过同情彭德怀的话。此人原是四野39军军长，抗美援朝时，率军随彭德怀入朝，屡立战功，林彪一向对他怀恨在心，这时正好报复。此时，还查出一些彭德怀分子，这些人都被看管，随后转业的下放，下放的下放。

林彪接着逼令与会者表态。毛泽东为了加强会议的声势，亲自来大会讲话。刘少奇也在会上严厉批判了彭德怀。周恩来在会上着重检查了自己的错

误：“工作没有做好，致使彭德怀同志过问此事，酿成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林彪赶紧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奚落周恩来说：“他历来如此，专会和稀泥。”

常委中，只有陈云一直没有表态。林彪对毛泽东说：“陈云简直像尊瘟神，一言不发，神情可怕！”毛泽东不以为意地说：“不要理他，他总认为自己高明，实际上一贯右倾。”林彪连连点头：“主席说得不错，确实是这样。现在会议已基本结束，正在布置各单位清查右倾分子的工作，彭德怀怎么办？还让他住在中南海呀？”毛泽东说：“中南海是不能住了，在北京找个地方安置了他，警卫工作可得做好，不能出问题哟。”林彪答应说：“主席就放心吧，这些事我一定办好。”

9月13日，军委扩大会议结束。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正式任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兼国防部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部长职务。全国全军迅速掀起清查右倾分子的运动，报纸上充满了持续跃进的社论和报道。

在此同时，中央办公厅派出汽车和工作人员来给彭德怀搬家。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搬的，家具都是公家的，军服、肩章、绶带全部都上交了，剩下的不过是几件旧衣裳。搬家之前，彭德怀把秘书们叫来说：“我现在是高山上的倒马桶，臭名远扬了。你们跟着我是不会有什么出息了。虽然名义上我还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但恐怕是什么事也摊不上了。我是要解甲归田了，你们还跟着我干什么，都散了吧。一个农民还要什么汽车、司机、医生、护士，你们都统统走吧。到了挂甲屯，我的生活起居自然会有警卫班照顾，你们都走吧。我给杨尚昆打个电话，他会好好安排你们的。”红军时期，杨尚昆是三军团政委，彭德怀和他的关系处得不错。但这些秘书们一个都不愿走，死气百赖地要跟着彭德怀，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在庐山为民请命，说了真话。彭德怀动员了半天，见大家坚持不走，只好叹一口气，带着大家迁往新居。他没有告诉任何人搬家的消息，也没有任何人为他送行，悄悄地迁出了中南海。

新居在海淀区的挂甲屯，这里已是北京的西部郊区，靠近圆明园。据民间传说，北宋杨家将中的杨六郎在此休整，挂晒铁甲，故得名挂甲屯。杨家将中的老令公杨继业和杨延昭实有其人，但并非父子，杨延昭是否在此挂晾过战甲也无从考证。不过这个名字倒也适合彭德怀解甲归田的愿望。

拨给彭德怀的住房是挂甲屯的一所院子——吴家花园。据说此园原为吴三桂为爱妾陈圆圆准备的藏娇之园，故称为吴家花园。名为花园，由于历经沧桑，已无花园之景象。彭德怀走下汽车时，看到的是一所破败不堪的院子。一个警卫班在副连长的带领下已经进驻院子，他们铲除荒草，抹掉蛛网，草草收拾了一下，彭德怀等人便搬了进来。院子分为两进，彭德怀和浦安修住前院，警卫班住后院，秘书们分住前后院。

当天晚上，吴家花园有了点生气。由于环境卫生差，蚊蝇乱飞，壁虎、长蛇也乱窜乱钻，搅得人们一夜无法入睡。彭德怀一辈子打仗，感到这里比朝鲜的矿洞好多了，安然入睡，而浦安修却暗暗掉泪，什么是虎落平阳，这就是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彭德怀就拿上铁锹在院子里开起地来，这天正是1959年国庆节。秘书们和警卫班的战士们闻讯也都拿着工具要来帮他开荒，彭德怀劝他们说：“今天是国庆节，按例放假，你们都休息去吧。我是闲着没有事干，活动活动身体。”秘书们和警卫战士们不听和彭德怀一起开荒，很快

便把荒地开出来了。彭德怀在地里种些蔬菜，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能为国家减轻一点负担是一点。

因为今天过节，彭德怀拿出自己的钱来让管理员买一些肉菜苹果，给全体干部战士改善伙食。上午九点钟，他把全体人员召到自己的房间，一起看电视。这时中国的电视事业还刚刚起步，北京于1958年建立了一家北京电视台，上海等几个城市也相继建立起了几个实验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是中央电视台，设备较好些，经常在晚上播送新闻或转播一些活动实况。今天国庆节，天安门广场照例要进行阅兵和游行，北京电视台要进行现场转播。由于人民收入很低，电视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无缘的，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买得起黑白电视机。彭德怀的黑白电视机是办公厅给他配的，搬到吴家花园后，也没有收走，因为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嘛。

国庆阅兵开始了。彭德怀对这项活动多么熟悉。以往都是他从天安门上走下来，乘敞篷汽车出天安门城门洞，过金水桥，接受阅兵总指挥的报告，然后在阅兵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受阅部队。检阅车透体锃亮，在长安街上轻轻滑行着，耳边是起伏不断的雄壮的口令声，致礼声。今年程序依旧，只不过站在敞篷车上的已不是彭德怀，而是林彪了。林彪由于建国后久病未出，乃至年轻的新入伍的战士们都不知道他，纷纷向副连长打听这个满脸病容的瘦个子是谁。副连长瞟瞟彭德怀，没有好气地对战士们说：“管他是谁，好好看你的电视吧！”

彭德怀知道副连长怕自己心里难过，不肯对战士实说，感到自己在这里，战士们说话不方便，便借故离开俱乐部，在院子里走走。他点上一支中华烟，回想着电视上的热闹画面，不禁为国家 and 人民担忧。组织这样盛大的场面，作为一项礼仪活动无可厚非，关键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是否认识到了国内问题的严重性。他看到报纸、刊物近来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大批“得不偿失”论，“比例失调论”，要求“跃进再跃进”，不由得想到，如果把意识加以夸大，认为只要凭主观意识就可以造出奇迹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就不能不在具体事物中滑进唯心主义泥坑。报纸隐蔽真相，造成假象，继续扩大“左”的错误，看不到或不愿看“左”的东西正在破坏我们的胜利。

彭德怀正在苦苦思索的时候，警卫连副连长跟了过来。彭德怀问他：“你怎么不看电视去？”副连长说：“我有任务。”彭德怀明白了，苦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已经向毛主席作了三条保证，不当反革命，不自杀，自食其力。我是不会自杀的，也不会逃跑！”副连长脸红红地不吭声，过一会才说：“我们来前，都进行了学习，知道你在庐山犯了大错误。可是我实在弄不懂你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你能把意见书给我看看吗？”彭德怀说：“我一生光明磊落，意见书可以给你看。我的一些话可能不妥当，但我自信基本观点是对的。当然，你不必相信我说的话，也不要对别人谈你的真实看法。我已经连累了许多人，不想把你也搭上。”副连长答应一声“明白”，便带着意见书回后院去了。

中午开饭了，副连长没有来吃饭，彭德怀知道他在干什么，便拿了两个大馒头，里面夹上几大块鸡蛋和肉片给他送去。推开后院副连长的卧室，只见副连长坐在桌前发愣，桌上摆着彭德怀的意见书。他见彭德怀进来，急忙站起来整理军容，彭德怀摆摆手说：“免了免了，快吃饭吧。”副连长接过馒头，说：“谢谢你，彭总。我看完了你的意见书，有些想法。”彭德怀宽厚地说：“好嘛，我倒想听听。”副连长说：“你的意见提得太客气了，实

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实话告诉你吧，我家几个月前就已来信说断粮了，现在好长时间没有接到信了，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彭德怀听到这个“批评”，感慨万千，他现在能说什么呢？他只是关照副连长此事万不可在连队说起。

从此，这位副连长和警卫班战士们对彭德怀非常尊敬，彭德怀一再劝副连长要注意和自己划清界线，以免受到牵连，但副连长根本不在乎。彭德怀知道战士们家里困难，也经常帮他们接济一下家里。全院二十多口人和和气气，互敬互谅，日子倒也过得很快。眼看风扫落叶，水落石出，冬天来了。这时吴家花园经过彭德怀和战士们的清理修整，稍稍像个样了。

彭德怀隐居挂甲屯，形同软禁。但他逆境未敢忘忧国，想起国家和人民当前所处的困境，总是忧心忡忡，唉声叹气。

这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更为严重了。

庐山会议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这次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据1962年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这次斗争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发展，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遭到践踏，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导致了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在党内外大肆蔓延。那些怀有个人野心的阴谋家林彪之流则投其所好，掌握了大权，对国家、党、军队、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中断了党对“左”倾错误的有限度的纠正，使得“大跃进”的错误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靠着不顾一切的拼设备，拼资源的蛮干，倒是完成了1959年1200万吨钢和1960年的1840万吨的生产任务，但导致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进一步升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市场供应异常紧张。农业生产遭到的破坏尤大，由于高估产高征购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1959年、1960年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1960年生产粮食2870亿斤，相当于1951年的水平。许多地区因食物不足相当普遍地发生了水肿病，许多省份农村人口死亡率显著增加，河南信阳地区有9个县在1960年的死亡率是正常年份的好几倍。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若干年后，有的县志在记述这件事时，文章中甚至出现了“人相食”这样的字眼。

“大跃进”的发动者原来是希望让人民群众快一些过上较好的温饱的日子，但结果却是这样的惨痛。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最为严重的，无可挽回的后果，也是客观规律对盲目蛮干的惩罚。

一天，朔风劲吹，雪花飘舞，彭德怀正给大家讲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革命故事，门口哨兵进来报告，说门外来了母女二人，形同叫化子，冻饿倒地。彭德怀立即喊了一声：“快去救人！”大家一齐跟着彭德怀跑出去，果见大雪地里有母女二人躺着。大家把他们扶起来，副连长上前仔细看看，忽然大喊一声：“娘！”众人不禁吃了一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十七回 背信义苏联撤援助 度难关领袖断肉食

话说副连长在风雪中扶起因饿累倒在门口的老妇人，认得是自己的亲娘，彭德怀赶紧指挥战士们把老人家抬到自己屋里，炊事员煮了稀饭端了上来。老人家喝了几口稀饭，暖和过来，拉住儿子的手说：“孩子，总算又看到你了。村里逃荒的逃荒，要饭的要饭，已经有人饿死了，你可不能回去呀，在这儿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接着又有一些警卫战士的亲属从四川、河南逃荒来到吴家花园。这么多人都挤在小院里，有的秘书不太高兴了。彭德怀劝道：“我们是人民的儿子，父母遭了难，儿子哪有不管的。再说他们都是咱们的战士的亲属，让他们住下来，荒年过去了再说。咱们院子空地大，都开了种地，再搭一间饲养棚，养猪养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秘书想通了，把大家召来。战士和亲属一听说彭总要带大家把院子都开出来种地，高兴极了，一个个都抢着干起来。大家都是农民出身，几天就把院子全部开成了地，种上蔬菜、粮食，养上猪、羊、鸡，彭总又从自己的工资里取出些钱，买一些杂粮，这样掺和着吃，居然可以过得去了。战士们的亲属脸色红润起来了，个个叮嘱自己的儿子们：“荒年里，饥饿使人们连自己的孩子都敢吃，而彭总却收留下这么多逃难的人，把自己的口粮匀给大家吃，他的心真是比菩萨还好啦，你们要好好侍候他。”战士们个个含着热泪答应了。

彭德怀见吴家花园战士亲属的生活已安排好了，便去中央党校学习。党委书记、著名哲学家杨献珍亲自当他的老师，辅导他学习马列基本理论。说来这杨献珍也是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了，理论水平很高。他对大跃进中弄虚作假的事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感到问题严重，当时就对此提出了许多批评。庐山会议后，他仔细地阅读了彭德怀的信，认为信写得很对，怎么也看不出问题来。便在党校多次讲了自己的看法。彭德怀来党校学习后，因为观点相同，二人谈得非常投机。彭德怀拉住杨献珍的手说：“自从在庐山上栽下来以后，我一直感到困惑，你得拉我一把。”杨献珍笑笑说：“在历史和现实的疑惑面前，我们应该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不哭，也不笑，而是去理解’。你是不愿意在虚假和真实之间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这种不计较个人沉浮，而必欲掌握事物的真谛的精神，正是打开历史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彭德怀和杨献珍的对话，早有人报告了康生。康生复出以来，一直想独霸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这块阵地，但杨献珍却一直阻碍他实现这个愿望。非但如此，杨献珍还连连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唯心论，等于揭康生的疮疤。康生一直处心积虑地想除掉他，但又无处下手，现在骤然间得到了这份材料，喜出望外，立刻把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翻阅材料，皱着眉头说：“这些话比彭德怀的意见书还厉害。”康生趁机煽动说：“彭德怀、杨献珍是一文一武，山上山下互相配合向党向主席发动进攻，必须批倒，否则党校就是彭德怀的党校了。”毛泽东点点头说：“要批判，你去抓一下吧。”康生高兴得心花怒放，赶紧回党校布置去了。

康生走后，毛泽东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庐山会议这件事看来并没有完，彭德怀不服气，许多人也都不服气。邓小平开会时，总是坐得远远的不吭声，刘少奇正在修改他过去出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准备重新出版，在新版里，他加上了一大段话，看来是专门针对自己写的。《人民日报》已把刘少奇的照片和自己的照片并排登在一版上，很多事自己都插不上手了，一种

大权旁落的寂寞感浮上心头，他不经意地顺手在纸上写了一句诗：“恒娥不嫁谁留。”

正思虑间，西花厅打来了电话，报告周恩来出访印度、缅甸、尼泊尔等国归来。周恩来这次出访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从去年以来，中印边界形势日趋紧张。印度本来已经占领着大片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一直想通过谈判公平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但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对中国的建议不予理睬，印军已越过实际控制线，进一步在中国领土上筑碉堡，建哨卡，酿成流血事件。为此，周恩来总理专门出访了这几个国家，同缅甸、尼泊尔通过谈判，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划定边界条约，但同印度的谈判却很不顺利。毛泽东和中央常委非常关心此事，毛泽东一听说周恩来出访回来，立即请他到丰泽园来介绍一下谈判情况。

在菊香书屋，周恩来汇报了出国访问的经过。他和陈毅是1960年初出访的，是年1月，同缅甸达成边界协议，3月又同尼泊尔签约，但在访问印度时，尼赫鲁却拒绝同中国谈判。周恩来和陈毅苦口婆心地企图说服尼赫鲁，但尼赫鲁就是不听。经过一个星期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周恩来和外交部长陈毅只好率团而返。

听完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果断地说：“看来尼赫鲁是决心要同我们打仗了，我们在边防上也应该有点准备才是。”

尼赫鲁为什么一定要想同中国打一仗呢？原来事出有因。由于大跃进的失败，从1959年后期以来，中国大面积地出现了饥荒，逃荒的人们成群结队离家逃荒。蒋介石以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紧锣密鼓地策划进攻东南沿海，中国大批部队调往沿海各省布防。在这紧要当口，苏联背信弃义，于1959年6月撕毁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技术。此年9月，赫鲁晓夫率团访问中国，要求中国同意苏联在中国领土上建立长波电台，建立由苏军控制的中苏联合舰队，毛泽东讽刺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只好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去了。”赫鲁晓夫见此路不通，便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中国政府在中印边境争端中的正确立场。周恩来向他详细地解释中国政府的立场时，赫鲁晓夫一把推开地图，粗暴地说道：“你不能重新创造历史。”参加会谈的中共领导人见赫鲁晓夫这么粗暴无理，便纷纷向他讲理，双方吵作一团。中苏两党分歧由此遂公开化。赫鲁晓夫回国后，虽然还没有立即撤走专家，停止对中国几百个项目的援助，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已是早晚的事情了。

尼赫鲁认为，中国现在内外交困，正是打一场边界战争的好机会，所以敢于拒绝中国政府的一切善意的规劝，在中印边界厉兵秣马。美国、苏联也都支持印度向中国开战，运去了火炮等武器。

1960年的4月，虽然户外已是一片春色，但周恩来心目中却沉甸甸的，丝毫也没有轻松的感觉。国内问题成堆，怎样让人民赶快度过荒年，成为他日夜思考的问题。从丰泽园回来后，他咳了几声，走进西花厅。邓颖超一听咳嗽声，知道总理回来了，赶快出来迎接。说起来，周恩来每到西花厅就先咳几声的习惯还是在白区工作时养成的。那时每次回到机关，他都先咳几声，以探测反应，久而久之，就成了自然反应。邓颖超把他接到餐厅坐下，炊事员送来饭菜，周恩来把一碗红烧狮子头拿出来叫炊事员给秘书的孩子们吃去。他心事重重地对邓颖超说：“小超，现在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苏联很快就要撤援助，逼债款，国内困难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大，我们要与人民共甘苦，

“从今天开始，我就不吃肉了。”邓颖超劝道：“你是总理，要为毛主席分忧。工作繁重，万一身体垮了怎么办？我劝你还是吃点肉，由我来代你尽这份义务。”周恩来摇摇头说：“那怎么行，事情就这么定了，你给厨房关照一下吧。”

周恩来匆匆忙忙吃完饭，回到西花厅办公室，请彭真、伍修权、许建国、康生来一下。原来罗马尼亚工人党要在今年6月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参加。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共产党提议，利用这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各兄弟党共同商量一下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事宜。苏联共产党同意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中共中央乃决定派彭真率团参加这次会，代表团成员是伍修权、许建国、康生，重要工作人员有张香山、熊复。按照惯例，中央要员出国前，周恩来都要同他们谈话，何况这次是去出席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恩来估计到会上会出现激烈的斗争，提醒彭真等人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彭真辞别周恩来后，率团出访，第一站是先到莫斯科。苏共派出的科兹洛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共同交换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些分歧意见。会谈两天，没有任何成果。科兹洛夫最后说：“既然现在谈不出结果，我们两党可以在布加勒斯特继续会谈。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负责人都在那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集体交谈一下，等条件成熟时，再作讨论。”

中共代表团回到寓所，收拾了一下，彭真即把大家召集到花园里开会，旁边还开着一架大收音机。彭真说：“科兹洛夫的讲话大有文章，我总感到赫鲁晓夫会利用布加勒斯特会议搞名堂，有可能利用他们掌握的多数，通过一个什么决议，攻击和孤立我党。”大家觉得彭真说得有道理，当务之急是要摸一下苏共的底。彭真乃决定派伍修权和苏共中央联络处接触，让驻苏大使刘晓也通过大使馆的联络渠道探探苏联的态度。不几天，情况已经探明，赫鲁晓夫果然要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扩大争论，东欧各党都已经得到了苏共的通知。

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动作这么快，看来布加勒斯特的一场恶仗难以避免。彭真急忙把大家召来商议对策，经过讨论，决定采取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斗争方案。彭真嘱咐驻苏大使刘晓，立即用电报向中央报告。刘晓得令，准备回使馆执行，彭真又把他叫住说：“不行，用电报太慢，会误大事，有些问题电报上也说不大清楚。请你立即坐飞机回国，直接到上海向毛主席、刘主席汇报。另外还要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取得中央的指示，指示越具体越好。”刘晓答应了，立即坐飞机赶到上海，向在沪的中央常委作了汇报，中央常委完全同意代表团的应付方案。刘晓得到指示后，立即赶回莫斯科向彭真作了汇报。

6月24日，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了。彭真等人发现，出席会议的各兄弟党代表团手中，都有一份苏共中央在前几天给中共中央的通知，通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大会上赫鲁晓夫发言指责中国共产党，东欧党的领导人都都一哄而上，跟着赫鲁晓夫的腔调大骂中国共产党。彭真等人静静地听着，准备着反击。

轮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发言了，彭真大步登上主席台，针锋相对地批评了苏共领导违背两党协议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的做法，强调加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号召结成反帝统一战线。会议主席在彭真发言后，向

各党代表团散发了中共的声明。阿尔巴尼亚党代表团团长卡博看到中共代表团的声明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破坏协商一致原则、在国际共运中开了破坏这一原则的先例等话时，非常感动。阿尔巴尼亚是个小国，人口只有 170 多万人，苏共对阿党向来颐指气使，把自己当成老子党，把阿党当成小儿子党，阿党对此很不满意，卡博接受党主席霍查的指示，决心碰碰赫鲁晓夫这个庞然大物，便在发言中表示：“今年一月份苏共米高扬同志访问我国，同我党主席霍查谈了中苏两党分歧，并且指责了中国党。我们对此有看法，我们希望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应通过两党之间的讨论来解决，现在让各国党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是不适时的。我们党中央要在深入研究之后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对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提出看法。”

赫鲁晓夫见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小小的阿尔巴尼亚竟敢不听自己的指挥棒，大为恼怒，立即敲着桌子大叫大喊道：“我们对卡博同志不与我们站在一起感到痛心，阿党代表的发言是对苏联党的侮辱，我们不会接受，阿党要对自己代表的发言负责。”

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立即下令撕毁原来和中国签订的所有援建项目的合同，撤走全部专家。据统计，从“一五”计划以来，苏联援助中国的项目共为 304 个，到 1960 年 7 月已建成 103 个，还有 201 个正在建设中。现在专家们一走，带去了所有的图纸、计划和资料，这些工程全部停顿下来。再要恢复建设，就得重新设计、测量，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赫鲁晓夫见中国共产党不肯就范，便又向中国开始逼债。中国欠苏联的债主要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的苏联武器债款，当时斯大林说好这笔钱作为苏联对朝鲜战争的义务援助，现在赫鲁晓夫一翻脸，不承认斯大林的许诺，向中国政府逼要这笔钱。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快一百亿美元呢。政治局委员们都来到丰泽园会议室，问毛泽东怎么办，毛泽东果决地说：“还！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年 3 月中国登山队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峰，外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人办到了，难道就为这点债低下头吗？我看咱们应该学学登山队无高不可攀的精神，同这场天灾人祸展开斗争。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不吃肉了，也不吃苹果了，把猪肉、苹果统统拿去还债。”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表示，从今以后不吃肉，不吃苹果，勒紧裤腰带还债。

从此，一列列满载苹果、猪肉等中国农产品的货车一列列驶向满州里和绥芬河。在边界口岸，苏联检验人员拿着大铁圈在一个个套检苹果，只要有一个苹果从铁圈里漏出来，整列车的苹果便不要了。苏联市场上，到处都是从中国运去的苹果和猪肉，价钱便宜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饥荒在继续蔓延，许多省都发生饿死人的现象，毛泽东办公桌上，堆满了这类电报。毛泽东看着这些电报，叹息着说：“天灾人祸啊，天灾人祸啊！”卫士用提盒送来了晚饭，毛泽东一眼看见有一碗红烧肉，叫住卫士问：“说了，我以后不吃肉，怎么还做红烧肉？”卫士结结巴巴地解释说：“主席，这是你的定量供应的肉。”毛泽东冷笑两声：“定量供应？老百姓都有吗？你想哄谁，混嘛。你把这碗肉送给陈云同志，他身体一直不好，给他补补。”卫士不动，毛泽东催他：“快去呀。”卫士不但没有走，反而问道：“主席，你知道吗？你和总理不吃肉，老百姓并不相信，说那都是宣传，再困难，还能少了主席的肉吃。”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说的是实话，老百姓不会相信我们不吃肉。但是，同志哥哎，咱们是共产党，

咱们这支队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队伍，我们要自觉地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这是责任，是义务，懂吗？快送去吧！”卫士不情愿地走了。毛泽东端起马齿苋炒的菜来，就着米饭吃了个半饱，又在盘里倒些开水，喝下去，才觉得肚子舒服了些。

当毛泽东在丰泽园吃早饭时，周恩来正在西花厅吃早餐，玉米粉粥，一个金银卷。周恩来舍不得吃金银卷，先喝了玉米粥，然后才掰开金银卷，擦干净粥碗上的粥渣，香甜地送进嘴里去。

吃完饭，周恩来打电话请军委副主席贺龙和陈毅过来一下。林彪当了国防部长后，一门心思在想着投毛泽东之好，继续往上爬。他整倒了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洪学智等人后，把自己原来四野的一些将领吴法宪、李作鹏、黄永胜等人都安插到一些重要岗位上。前不久，他在部队提出四个第一的政治工作原则，遭到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对的反对，林彪便又展开反对谭政的斗争，把谭政整下去了。整个部队的指挥权便都转到林彪手里了，只是总参谋长罗瑞卿有点不那么听话，林彪想着到时再给他打个招呼吧。

林彪的心思都用在耍阴谋诡计上，一般的事情懒得管。毛泽东对林彪也很照顾，决定林彪生病时，贺龙具体管中央军委的日常事务工作。两位老总接到周恩来的电话，都赶到了西花厅。陈毅一进来就嚷嚷道：“总理，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没有，犒劳犒劳。”周恩来笑笑说：“还真让你们二位老总赶上了，我这里有几颗花生米，是吃饭时特意留下来待客的。”说着，把一小碟花生米端了出来，贺龙、陈毅也不客气，各人抓了一撮吃起来。周恩来对二位老总说：“自从西藏民主改革以来，触及到了一些西藏上层人士的利益，他们对此有些看法，班禅大师也有些意见。你们二位都和班禅熟，去看看他，开导他一下，班禅是很爱国的。”二位老总答应了。

贺龙和班禅为什么比较熟呢？原来二野进军大西南后，刘伯承不久调京筹建军事学院，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西藏驻军归西南军区指挥，自然和班禅打交道较多。陈毅曾在1956年3月，率中央代表团去西藏参加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并代表国务院授印，和班禅合作得很愉快。

班禅这时因事住在北京，中央对他及随从人员的生活待遇非常优厚。班禅以为这是应该的事，毛泽东、周恩来不吃肉的事他也有耳闻，但以为那不过是宣传。这次陈毅、贺龙一进门，班禅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比过去消瘦了。他把苹果拿出来，请二位老总吃，贺龙、陈毅看见这么大的红苹果，馋得直咽口水，但谁也不好意思去取。班禅直觉地感到，他们是真馋了，便给他们俩人一人一个大苹果：“吃吧，吃吧！”贺龙还在犹豫，陈毅早就吃起来了，一边吃一边催贺龙也吃：“快吃吧，别装假了，大师是老朋友了，不用装假。”贺龙一听也是，便“咔嚓咔嚓”地吃起来了。一会儿，两人的苹果便下了肚，陈毅舒服地吐了一口长气：“三月不知苹果味，今日在大师这里解了馋了。”班禅惊异地问：“你们真的没有苹果吃？”陈毅叹口气说：“苹果都给苏联还债去了，哪里有苹果吃。想吃口肉都没得。”班禅又问：“那外交部里不是有很多招待客人吃的苹果吗？”陈毅说：“我的活佛哎，你哪里知道，那些苹果都是给客人准备的，我们自己是不能吃的。客人来，我们只能看着人家吃，自己呢，一方面馋得要命，一方面还得装出我们不想吃的样子。那滋味，真难受。”班禅听了大惊，这才相信中共领袖们带头勒紧裤腰带和人民共度难关是真的事了。

两位老总随后和班禅谈了一些西藏的事，不觉到了中午，班禅让人准备

了几个小菜，无非是几个凉盘，又煮了几碗肉面。班禅吃了几口，便饱了，陈毅和贺龙风扫残云般地吃完了饭菜，陈毅吃完饭，向班禅表示谢意。班禅又给他们一人一个大苹果，让他们带回去。陈毅推辞了一下就装在口袋里，笑着说：“大师别笑话，咱们都是老朋友，我带一个给张茜，让她解解馋。”贺龙打趣地说：“你这哪里是看望大师来了，是到佛爷这里打游击来了。”陈毅笑着说：“都是自己人，哪里是来打游击。这是佛爷的布施噢！”

陈毅和贺龙向周恩来汇报了班禅的意见后，周恩来说：“班禅大师的一些意见很对，我们应该很好地重视。你们应该经常去看望一下班禅大师。”二人答应了。

周恩来送走陈毅和贺龙后，又拿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修改起来。全国城乡出现的极其严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使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被迫停止“大跃进”。从此年，也就是1960年10月开始，又回过头来纠正“左”倾错误，整顿人民公社，肃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

但是，经济形势的继续恶化要求中央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放宽政策，发动人民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受到严重困难的教训，毛泽东的心是十分痛苦的。他想起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个多么积极而又实事求是的好计划啊！只有在经历了“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以后，才看出了这个计划的稳妥。须知，这个计划的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党留下了三年的余地。如果当时执行这个计划的话，绝对不会出现今天的严重困难。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商议后，决定委托周恩来主持撰写中央《紧急指示信》，动员全党，为迅速纠正人民公社化中的错误、落实党对农村的政策、扭转农村形势而奋斗，周恩来知道这个任务的份量。迟一天、早一天，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都关系到许多群众的安危。他毅然拨开重重困难，置个人荣辱于不顾（谁知道1958年初的反冒进还会不会再搞？历史往往是会重演的），日夜工作，终于把《紧急指示信》写好了。现在，他又逐字逐句地修改起来。

《紧急指示信》开宗明义就申明全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中央和毛主席从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的“共产”风；规定了十二条政策：人民公社核算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坚决退赔；加强生产队的基础所有制，实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集市贸易等。

周恩来修改定稿后，把《紧急指示信》的打印稿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虽然已不担任国家主席了，但他在1959年4月初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是在此后4月中旬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事）又强调自己虽然决定不当国家主席了，但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书记处，他要在中央亲自挂帅，实际上仍然处在一线。毛泽东接过《紧急指示信》的打印稿，边看边修改。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这句后面，他加上了一句话：“从一九六一年算起，至少七年不变。”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后面，他又加上“至少二十年不变”。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

指示信》。全党动员，领导带队，无数支工作队深入农村，向基层干部和农民宣读、解释《紧急指示信》。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一个文件的批语中写道：“毛泽东同志……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毛泽东是希望由自己的自我批评推动广大干部认清形势，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

为了更有力地扭转农村形势，中央准备召开八届九中全会，周恩来少不了得忙碌一番。突然，秘书送来军委总参的一份报告。周恩来一看，气愤地说：“印军真是太猖狂了，我军的运输车队又遭到他们的袭击。”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四十八回 刘少奇调查花明楼 邓小平首倡责任制

话说中印边界自 1959 年以来，形势日趋紧张，印军已大规模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占了更多的中国领土。周恩来和中央常委商议后，决定中国边防军从实际控制线后撤 20 公里，以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诚意。

这件事定下来之后，军委副主席、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又来汇报“59·6”工程进展情况。所谓“59·6”工程乃是制造原子弹的工程。1958 年，苏联政府曾和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为中国提供制造原子弹的资料和技术，中国政府调集了大批科学家开始了理论研究，调十万部队在新疆罗布泊建立核试验场，在邻近的南疆和硕县乌什塔拉镇南疆公路的南侧的大漠里建起了核试验基地。部队进入这块不毛之地时，只见风沙漫天，遍地沙砾，但奇迹般地长着几蓬马兰草，勘测队员遂在图纸上写上“马兰”二字。马兰就成为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地名。

研究进入 1959 年时，正值美苏划分霸权范围的戴维营会议召开。苏联为了和美国垄断核武器，乃于此年 6 月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取消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援助合同。中国的核武器研制是上马还是下马，最后国防科委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毛、周二人商议后，决定上马，自力更生，研制出中国的核武器来。毛泽东最后给这项工程命名为“59·6”工程，就是要大家记住苏联于 1959 年 6 月撤销援助这件事，尽快造出争气弹。

“59·6”工程上马的决定作出来以后，核武器工程的各个链环都动起来了。在北京的花园村的高粱地里，建起了核武器理论研究大楼，朱光亚、邓稼先、钱三强、王淦昌等世界一流的核物理专家在这里日夜苦战，用落后的算盘，手摇计算机与美国、苏联的现代化电子计算机赛跑。在北京房山的深山里，一所现代化的原子能研究中心正在加紧建设。在青海“金银滩”草原上，一个生产原子弹的基地拔地而起。位于新疆天山南麓的核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场也正在加紧建设。

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报告，感到非常满意，叮嘱聂荣臻说：“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原子弹这个东西，他有，你没有，他就敢欺负你。造点原子弹，正是为了最后消灭原子弹。你回去要告诉大家，中央感谢他们，中国人民感谢他们，希望大家协力奋斗，造出争气弹来。”聂荣臻连连点头，但并不起身告辞。毛泽东问道：“你好像还有话要说，什么话，说出来。”聂荣臻吞吞吐吐地说：“现在在新疆和青海一线基地的同志们生活都很艰苦，两个基地的司令都向我汇报了这个问题，很多同志都得了浮肿病，是不是请中央给支持一点东西。”毛泽东笑笑说：“我说荣臻，你真是个老实人，就这点要求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我完全同意，咱们再勒勒裤腰带，不能太苦了前线的同志们。恩来，你说呢？”周恩来说：“我完全同意，再从中央机关和各省机关里扣出一些东西。我再向黑龙江要一些黄豆，给前线的同志们救救急。这事我马上去办，老总你就放心吧。”毛泽东又说：“中央最近下了决心，要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尽快克服困难，形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让大家要有信心。”聂荣臻说：“我明白了。”便告辞走了。

核武器前线基地的饥饿再一次震动了中央常委，为彻底扭转大跃进的错误，中央常委决定在明年 1 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讨论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建议。这个建议原来是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来的。这年 8 月，李富春在进行广泛的调查后，认为只有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巩固、提高，才能解决几年来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等问题；才能争取时间，较快地扭转当前的紧张形势。周恩来看了李富春的报告后，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又在“提高”前面加了“充实”，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1年1月14日，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批准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作出一系列决定，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共产风、虚夸风。决定全党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解决吃饭问题。接着，毛泽东在广州，刘少奇在北京分别主持南三区会议和北三区会议，毛泽东要求全党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开完了，毛泽东乘专列回北京。1961年的4月，江南应该是春雨如烟，百花吐艳，但可能是由于困难时期的缘故罢，江南失去了过去的妩媚。毛泽东凝神而坐，听着车轮的单调的声音。卫士来送茶，他一把抓住卫士说：“你听，车轮在说话呢。”卫士听了一会，听不出来，摇摇头。毛泽东固执地说：“再听听，你听车轮的响声，好像是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呜——”卫士被毛泽东逗笑了，问道：“那我们从北京往广州去的时候，车轮又在说什么呢？”毛泽东说：“噢，那时它们说的是‘充满光明，充满光明’，呜——”卫士乐得咯咯笑说：“主席真会说笑话。”毛泽东叹口气，说：“我的同志哥哎，我这可不是说笑话，这是人家在笑话我哦。”卫士气愤地问：“谁？谁敢笑话主席，我找他算帐去。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他算老几！”毛泽东纠正说：“中国早就有了。应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吧，给我找小姚来削铅笔，我要办公了。”小姚是专列上的女服务员，多才多艺，胆大心细，责任心很强，敢和毛泽东的卫士顶嘴，毛泽东很信任她。

小姚进来，把笔筒里一大把用秃了的铅笔削好，又给茶杯续好茶，便准备退出。毛泽东叫住她，问道：“小姚，我听卫士讲，你是党员？”小姚点点头。毛泽东又问：“你还懂点医学？”小姚回答说：“是的，为了做好工作，我尽量多学些知识。”毛泽东点点头说：“好！好！你比我那几个小鬼强。他们那，只知道一天到晚围着我转，送他们去学习，都死活不去，真没出息。”小姚听得出来，毛泽东这番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夸奖。她预感到，毛泽东有话要对自己说。果然，毛泽东点根烟，似有意，似无意地问道：“小姚，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我问你一句话，将来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敢造反不？”小姚一听，吓得差点昏过去了，中共中央怎么会出修正主义，造反？造谁的反？不过，她很机敏，脑子一转，就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任何情况下，我都听主席的，你指到哪里，我就冲到哪里。”毛泽东瞧着小姚，眼睛湿润了，显然这个答案使他感到满意。他提起笔来，在纸上写道：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这首诗是毛泽东最近写的一首诗，他抄录了一张，送给小姚。小姚不敢要，说：“我们有纪律呢，不准带任何文字下车。”毛泽东叹口气说：“你怎么这么老实呢。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小姚走了，毛泽东的心情平静不下来，听着车轮发出“没有希望，没有希望”的单调声音，他又想起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南方一些省，睁一眼闭一眼地让农民分田单干，还有“三自一包”，“大包干”，“责任制”，说不改变所有制，屁话！北方好一些。广州有个干部讲，坐火车去北京听车轮的声音是“没有希望，没有希望”，从北京坐火车南下，车轮的声音又变成“充满光明，充满光明”。这是什么话？简直是反党！还有刘少奇，毛泽

东还清楚地记得，在延安开七大时，刘少奇作政治报告，提到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不下 105 次，而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则只提到了几次。最近他总是说，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刘少奇啊！

毛泽东的专列“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地往北开，刘少奇的专列几乎是同时“充满光明，充满光明”地往南开。按照中央的决定，周恩来去河北调查，邓小平去京郊调查，朱德去四川调查，刘少奇则去湖南家乡调查。

根据今年 1 月八届九中全会的决定，中共中央重新设立大区。大区仍为六个，西北局、华北局、西南局、华东局、中南局、东北局。各大区第一书记为，西北局刘澜涛，华北局李雪峰，西南局李井泉，华东局柯庆施，中南局陶铸，东北局宋任穷。这几个大局分别协助中央领导本区各省，自治区的工作。

刘少奇到了广州，先会见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因为湖南省位于中南区，陶铸和赵紫阳可以说是家乡的父母官。刘少奇对父母官打招呼说：“这次我去湖南调查，你们不要派人跟着，就我、秘书、王光美三个人去。我也不住招待所，就跟战争时期一样，直接住到农民家里去。”陶铸、赵紫阳有点不放心，劝他带几个警卫。刘少奇发了脾气，谢绝一切照顾，第二天，就坐客运车到了湖南省。只见沿途红旗如林，但地里人很少，大概是都去大炼钢铁去了。偶尔看见一些妇女小孩在地里游荡着，刘少奇便叫车停下来，走到地里去看看。啊！只见这些妇女儿童个个鸠形鹄面，在地里挖野菜。路边上的树皮已被剥光，白森森的树身令人触目惊心。刘少奇问一位挖野菜的少女：“家里还有粮食吃么？”这位少女熟练地回答：“有，我们的粮食多得吃不完。”刘少奇又问：“既然有粮吃，为什么还来挖野菜？”少女熟练地回答说：“顿顿吃米，腻了。想换换口味呗。”换换口味？刘少奇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这位少女撒起谎来这么熟练，连个磕巴也不打，显然训练有素。他不由得想起周恩来说过的风马牛干部来。这几年提拔了一批刮风、拍马、吹牛的干部——风马牛干部，不但自己大说假话，还逼着群众大说假话。调查研究，取得真实情况，谈何容易。

果然，在湖南农村调查一开头就不顺利，奉命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干部，群众看来都是挑选的积极分子，他们脸上的气色也比一般群众好些，座谈会一开始，他们就大谈形势大好，收成是如何的好，口粮是如何的多，持续跃进计划是如何的大，指标、数字、百分比应有尽有。人人口若悬河，倒背如流，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刘少奇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朝大家鞠了个躬，恳求道：“我给大家敬礼了，请大家对我讲点真实情况，讲点真话好不好？我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妇女小孩都在地里挖野菜，树皮都给剥光了，你们在这里大吹牛皮，朝我冲壳子，对得起乡亲们吗？”参加座谈会的人面有愧色，个个低头不语。刘少奇见此，便叫散会。

回到借住的厢房里，刘少奇对王光美感叹地说：“我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想了解点真实情况还这么难，可见了解情况不只是开座谈会就能办到的，有时还得经过曲折的斗争，需要充足的勇气。”王光美点点头说：“你说得很好，那些风马牛干部有恃无恐，他们后面有大人物。”

一语未了，忽然村子里喧闹起来，秘书匆匆进来报告：“民兵捆人了！”刘少奇、王光美出去一看，果然民兵捆着几个妇女过来，刘少奇一眼认出，那位撒谎的少女也在被捆之列。刘少奇忙问那位领头的民兵：“她们犯了什

么法？为什么要捆他们？”民兵们说：“这是队长的命令，她们破坏生产，攻击大跃进，给党抹黑。”刘少奇命令道：“挖点野菜，就是给党抹黑吗？放了他们。”民兵说：“没有队长的命令，我们不能放。”一个不放，一个要放，正争执间，队长走了过来，大吼一声：“不能放，都关到队部去。”刘少奇生气了，大声命令道：“我命令你放了她们！”队长反唇相讥道：“你是谁？有什么权利命令我？你不就是中央下来调查的干部嘛！”刘少奇说：“我是国家主席刘少奇，我有这个权利。”队长哈哈大笑道：“国家主席？国家主席就带这么两个人来调查？我看你是存心跟我们捣乱。”刘少奇看队长这么蛮横，命令秘书：“给县里打电话，刚张平化来。”队长一看这架势，才有点害怕，便叫放人，那位少女哭哭啼啼地跟着大家回去。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县委书记来到大队后，立即把队长找来训了一顿，村里的人们才知道这个白发老头是国家主席刘少奇，顿时把他包围起来了。刘少奇向大家鞠个躬说：“乡亲们，这两年大家吃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对你们的生活产生影响。工作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有的老乡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看说得很对。也不要全怪基层干部，下面的错误是上面逼出来的。上面说粮食过关了，下面就到处放卫星。上面说一大二公好，下面就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所以上面要负一大部分责任。县、省、中央都有责任，中央要负很大责任。大办食堂、大办水利都是中央提出来的，问题的根子在中央。我是中央副主席、考虑问题不周，我向大家赔礼道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顶住瞎指挥的歪风。大家都来顶，不怕开除党籍，不怕丢官，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杀头。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于犯颜直谏。最重要的是要有民主气氛。不讲民主，不怕杀头，顶多历史上多几个烈士。有的人以权威自居，批评不得，这是要跌跟斗的。”

随后，省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少奇当即拍板，解散食堂，把粮食分给农民。由于农民的锅都在大炼钢铁中送进了土高炉，现在做饭都成了问题。刘少奇同省委书记研究了一下，让有关工厂快造出一些铁锅来供应农村。

刘少奇这样一路调查下去，最后来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自从投身革命后，刘少奇已是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离家时，尚是一少年，归来后，已是苍然一老人，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景物，刘少奇心里激动不已。本来，功成名就，荣归故里是中国人的一大快事，但今日归来，刘少奇却心情沉重，怎样赶快扭转农村的困难形势呢？不知怎么的，他想起了汉高祖刘邦荣归沛县时所作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壮士兮守四方。”刘少奇叹口气，对邻坐的王光美说：“何得良策兮安四方。”王光美点点头说：“我也正想着刘邦的大风歌呢，是啊，何得良策兮安四方。你是国家主席，良策要你出。”

花明楼炭子冲是丘陵环抱的一块小平原，老乡们并不知道刘少奇要来调查，所以未作任何准备。5月13日，大队干部看见一辆小汽车开来，还以为是为采访的记者呢。车门开了，刘少奇从车里走出来。大队干部以为是看花了眼，擦擦眼睛仔细看时，确是刘少奇主席。大队干部慌了手脚，忙着要去安排食宿，刘少奇止住了，提着行李向自己家里的旧居走去。

父亲、母亲都辞别人世了，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也都不在了，但旧居的房子仍保留下来。这是一所在湖南农村常见的那种居所，与一山之隔的韶山冲的毛泽东的旧居的格局极为相似。刘少奇走到旧居门口，看到门上方挂着

“刘少奇同志旧居”的木牌，命令队干部：“把牌子取下来。我们是共产党人，不要搞这种个人崇拜。”走进房内后，刘少奇看到房里都是照片等陈列物，生气地说：“这是搞么子名堂嘛，这些东西统统撤下来，房子分给困难的父老乡亲去住。”队干部不想撤，刘少奇、王光美自己动手撤，队干部无奈，只好帮着一起撤，准备等刘少奇走了以后再恢复起来。

刘少奇要了几块木板，在过去自己住的那间房子里搭了张床，和王光美住了下来，请来过去的几个老朋友来一起叙叙旧。二叔和老倌都是刘少奇幼年时的朋友，过去一起在刘少奇父亲私塾里读过“人之初，性本善”，这次相见，大家高兴不已。刘少奇为了招待老友，特别想办法搞了一点酒，全国正闹灾荒，也没有什么菜，炒了一盘鸡蛋，大家边喝边谈，分外亲热。

刘少奇问二叔：“陈二叔，家乡灾荒闹的这么厉害，怎么县汽车队一车车把粮食往外运，大家都不动啊？”陈二叔说：“共产党对咱们有恩啊。一解放，就给咱们分了土地，眼前虽然有困难，但咱们得帮着党去克服这个困难，怎么能干那种事呢。”黄老倌接着说：“我们相信共产党会很快想出办法来克服困难。不过，你们得赶快想出办法来，要是还这么下去，再有两年，人们可吃不住劲了。”刘少奇听了，不由得流出两行热泪，对两位老人说：“我感谢你们这两位老朋友对我说了真话。为这，咱们干了这一杯。”

老乡们从地里回来，听说刘少奇回来了，都跑来看他。刘少奇把大家让进房子，对大家说：“我一走四十年，今天回来不是衣锦还乡，而是给父老乡亲们赔礼来了。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让父老乡亲们吃苦了。我一定想出办法，尽快地扭转这个困难局面，请父老们给我两年时间。两年之后，大家仍像今天一样饿肚子，你们就去扒了我的祖坟！”父老乡亲们听了，个个热泪盈眶，争着和他说起这几年的事来。

刘少奇在花明楼公社调查了四十天，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结束了调查回北京了。

周恩来结束了在河北的调查，邓小平、彭真结束了在京郊的考察，都已回到北京来了。

毛泽东还没有回来，他正在广州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这个条例可以说是毛泽东调查的一个结果。原来他一路南来，发现去年、也就是1960年11月中央发出的《紧急指示信》还没有完全解决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内部生产小队（后一律改称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以及生产小队内部社员之间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农村形势就不能较快地扭转，于是于此年，也就是1961年3月在广州主持起草了《条例》，经过试行修改，取消了不得人心的部分供给制（实际上基本供给不了什么）和公共食堂，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后一律改称生产队），而且还规定至少三十年不变。

党在调整农村政策的同时，也调整党内政治关系，调整党同受过错误批判的群众的政治关系，对过去被批判的党员和群众实行甄别，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和职务。

对工业的调整也开始进行。

由于八届九中全会仍认为1960年那些虚报的粮食产量是可靠的，钢的生产能力是稳定的，所以全会通过的1961年的计划数字中的钢产量1900万吨和粮食4100亿斤的指标虽然与1960年基本持平，没有大的增长，但由于1960

年的产量数字水分太大，所以工业的调整成效不大。

周恩来发现这一情况后，督促和组织经济计划部门摸底调查，查清了这几年来的粮食实际产量：1958年4000亿斤（庐山会议“核实”为5000亿斤）；1960年2787亿斤（原估计3700亿斤）；1961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160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钢和其他许多工业品的产量也大幅度跌落下来。1961年的钢产量由1900万吨降至850万吨，粮由4100亿斤降至2700亿斤。当年完成的备主要项目的产量与此基本相符，粮食略有回升，达到2950亿斤。

在工业调整中，大力整顿企业秩序。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李富春、薄一波派出十一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也叫工业七十条）。在这个《条例》的指导下，工厂企业原来被“大跃进”破坏了的规章制度又建立起来，逐步消除企业管理混乱，责任制度松弛，经济核算制松散，生产率降低等问题，国营企业的秩序稳定下来。

在科学、教育、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也进行了调整，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对反右派斗争以后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批判加以清理，错了的都要甄别。继续贯彻落实科学和文艺工作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62年3月，周恩来在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于广州召开）上讲话，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这一论断其实只是从实质上恢复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的阶级状况的论断。尽管如此，在经历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和不讲科学规律蛮干的“大跃进”运动以后，周恩来在广州的讲话还是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明确反对。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毛泽东用沉默回答了他。这就说明，毛泽东并不同意周恩来的这个讲话，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兆示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还可能会出现大的反复。

这时中印边界上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印军的直升飞机经常飞到中国境内，给深入到中国境内的印军据点空运作战物资。中苏边界上也有一些新动向，苏军在边界上活动得很厉害，苏联驻新疆乌鲁木齐市总领事馆和伊犁的领事馆的官员频频和一些人接触。在广东深圳，一些人不断地偷渡到香港，又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港英当局对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已提出抗议。周恩来忙着处理这些事件，又要按“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忙得不亦乐乎。刘少奇从湖南回来后，看到周恩来时，简直快认不出他了，只见周恩来脖子变得细长，以前挺合身的衣服现在像个大褂子一样在身上直晃荡。刘少奇担忧地劝道：“恩来，你要注意身体，适当吃点肉。你累垮了，这一大摊子事谁来干。”周恩来不以为意地说：“主席不吃肉，你也不吃肉，你们两位主席倒是要吃点肉。我嘛，没有关系。小平最近看了很多材料，他有一个大胆的设想，我觉得很好，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刘少奇很感兴趣地问道：“什么主意？”周恩来说：“三自一包……”他正要详细解释时，西花厅来了电话。周恩来一听，对刘少奇说：“印军又在边界上捣乱了，我回去处理一下。”刘少奇说：“你赶快去吧。”

周恩来刚走。邓小平来看刘少奇，刘少奇问道：“听说你想出了个好办法，可以很快解决粮食问题，到底是什么办法呢？说出来我听。”邓小平笑道：“是总理给你说的吧？其实，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农民自己想出来的。你还记得吧，去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你汇报过，安徽宿县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农，因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便于1960年向大队提出到荒山

上去开垦荒地。大队干部一想山荒着也是荒着，种些粮食岂不更好，便同意了。这位老农上山一年，开了16亩地，打了几千斤粮食，喂了猪，养了羊，不仅自己的温饱解决了，还上交公社近两千斤粮食。消息传开，宿县农民要求把土地包给农民自己种，安徽省委试了一下，果然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不改变所有制，只是在劳动组织方法上作一些改变，实际上是一种生产责任制。”刘少奇说：“这件事我知道，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单干。”邓小平拿出烟，给刘少奇一根，然后给刘少奇和自己点上烟，抽了一口说：“说到单干，我想去问一下柯庆施同志，我们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是不是单干？难道一个方向盘三个人掌着就是社会主义，一个人掌着就是资本主义？我看三个人同时掌方向盘汽车非翻了不可。纺纱厂的女工也是一个人看一台或两台机器，这也是单干嘛。具体劳动组织方法要根据客观规律制定。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刘少奇点点头说：“我看这个办法对，中央农村部部长邓子恢也多次提出这个意见。应该让人家试一试嘛。”

接着，两人又商量了一下纠“左”的问题。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又是实际上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在一线主持工作。他感到不开一个大会，从根本上扭转全党的认识，要纠“左”是很难的，只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时间不能再等了，拖延一天，就要饿死一大批人。他试探地问邓小平：“明年1月召开一个全国四级干部会议，彻底扭转全党的认识，你看怎么样？”邓小平是书记处总书记，听了刘少奇的建议，立即发挥他的职业专长，粗略计算了一下，四级干部会，即中央、省市、县四级干部，加起来何止万人，便提出具体方案：“县一级干部，只限于第一书记。就这样开会人数也有七、八千人呢。”

两个人正商议得起劲，丰泽园来了电话。刘少奇接过电话讲了一阵，最后挂上电话，对邓小平说：“主席又来电话催了，人民公社的核算一定要以队为基础。主席现在可是急了，已经就这个问题向全国发了几次通知了。”邓小平说：“成千上万的人都饿死了，不急行吗？现在必须采取坚决措施，不能等到明年了。我建议，一要给农民一点自由，实行责任制。二立即解散全国农村食堂，口粮发给农民。三下放城镇人口2千万。”刘少奇说：“我完全同意，再和总理商量一下，说干就干。再有两年不解决问题，天下非大乱不可！”

刘少奇正想找周恩来商量一下，没想到周恩来神色紧张地进来了，刘少奇知道一定发生了特别紧急事情。果然，周恩来带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上海、北京、天津三大城市的存粮光了，商店里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已被抢购一空，市面上谣言不胫而走，人心惶惶，怎么办？

刘少奇、邓小平听了这个消息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三大城市、几千万人，中国人口文明的精华所在。城市和农村不一样，一旦断粮，毫无办法可想，大城市更是不堪一击，只要断粮一星期，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一拍桌子，果断地喊道：“一定得想办法调运粮食，从其他省调，下死命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调粮省份下命令，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住三大城市。”刘少奇立即拍板：“好，事情就这么定了，请小平协助总理筹划一下，我马上给各省写通知。”周恩来提醒道：“要不要给主席汇报一下？”刘少奇想想说：“也好。”

刘少奇拨通丰泽园的电话，问道：“主席起来了没有？起来了，请主席接电话。是主席吗？我是刘少奇啊。有一个重大问题向你报告。上海、北京、

天津的三大城市的存粮已经用完，市民们马上就要断顿。喂……”电话里静静地，没有任何反应。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四十九回 夺油田王进喜舍命 造核弹邓稼先失踪

话说毛泽东听到三大城市断粮的消息，着实吃了一大惊，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程度。他思考了半天，同意书记处和国务院从外省紧急调粮。但这样一来，外省就得付出牺牲。毛泽东放下电话，心情沉重地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然后吐出来，烟雾顿时在房间弥漫开来。一支烟还没有抽完，电话铃又响起来，原来是周恩来打来的电话，报告说地方汽油所剩无几，能不能从军队的油库里拨一些油支援运粮。毛泽东知道，部队的汽油也不多了，但为了保证三大城市运粮，他还是同意从部队的存油里拨出一些油来。

由于苏联背信弃义，中国这时真是雪上加霜。原来据外国专家测定，中国地质构造不具备生成石油的条件。确实，从世界打出第一口油井至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只发现了两块小小的油田，即陕北延长油田和甘肃玉门油田。中国的用油在解放前主要靠从美国进口，解放后靠从苏联进口。1959年苏联撕毁合同，同时也断绝给中国的石油供应。没有办法，北京的公共汽车都背上了一个大煤气包，靠烧煤气开动。空军、海军、陆军的军舰、飞机、坦克总不能靠烧煤气开动，只好减少训练科目。毛泽东和中央当时非常着急，急忙召来地质学家李四光，问他中国能不能找到油。这李四光是世界著名地质学家，建国前夕，周恩来特别去电请他回国担任地质部长。李四光看到电报后，即开始办手续从英国回国。蒋介石派出说客和特务，力图劝他去台湾，李四光为了摆脱他们的纠缠，颇费去一些时间，直到政协会议召开，李四光仍然没有回来。有人劝周恩来不要等了，再安排别人当地质部长，周恩来坚决地说：“一定要等到李四光回来。”果然，李四光赶在1950年到了北京。

李四光根据自己的研究心得，对石油生成的地质条件提出一整套理论，根据这一新的理论，李四光判定中国地下不但有油，而且藏量丰富。他组织了许多钻探队在东北的松辽平原、新疆的塔里木盆地、河北任丘县、山东半岛等地展开钻探。今日毛泽东召见，正好汇报钻探结果。李四光轻轻告诉毛泽东：“东北松嫩平原的葡萄花构造的第一批探井已经开始喷油，证明这里有大量的石油。”毛泽东大喜过望，问道：“有多大？”李四光回答说：“仅就探明的地区已经有2000多平方公里，实际上还不止。石油部余秋里部长已经在制订开发计划。”毛泽东问道：“那么说，我们可以把贫油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李四光肯定地回答说：“是的。完全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急忙拿起电话，嘱咐邓小平抓抓这个工作。随后邓小平组织石油部起草了《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立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大家同意了这个报告。仅仅过了7天，毛泽东和中央的批件回到了石油部，周恩来亲自具体指导石油部实施这个计划。

从1960年初到现在，一年多过去了，毛泽东不断得到报告，得知石油会战异常迅速，会战大军中英雄层出不穷，特别是有个工人王进喜，在油田上苦战苦干，号称铁人。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盼着他们早日生产出大量石油来，赶快把缺油的包袱从背上解下来。

为三大城市紧急调粮的事又使毛泽东想起了东北油田，正好中央办公厅送来了石油部党组余秋里、康世恩等人的报告，毛泽东看了一眼，高兴地笑起来。原来松嫩油田在1960年一年中，边会战，边产油，已经生产出97万吨原油。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再往下看，石油部党组在报告中建议把第一口喷油探井所在的肇川县大同区，改名为大庆区，把这块大油田命名

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这个名字起得好，是该大庆一番。毛泽东提起笔来，立即在宣纸上写了“大庆油田”四个大字，让秘书赶快给送去。

石油部党组接到中央的批示后，立即召开万人大会，表彰先进模范，再鼓干劲，但铁人王进喜却迟迟没有到会。余秋里正要派人去找，钻井指挥部的技术员匆匆跑来报告：“王进喜钻井队把射孔打错了！”余秋里一惊，打错射孔，直接影响打井质量，这还了得。这事要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余秋里想都不用想，便要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可现在错误却是发生在王进喜身上，怎么办？一年来王进喜在油田的表现一幕幕在他脑海里闪过……

王进喜原来是甘肃玉门人，从小拉着瞎眼的父亲到处乞讨。稍大，进了玉门油田当工人。那时的石油工人比叫化子强不了多少，王进喜穿的一双鞋破了补，补了破，破了再补，最后这双鞋竟有九斤重。王进喜就是一年四季穿着这双九斤重的鞋在打井。解放了，工人当了油田的主人，矿上为工人盖起了整齐的宿舍，皮鞋、棉衣、皮帽、手套等工作用品、劳保用品发个没完没了，每星期天矿上都演电影、唱秦腔，矿领导逢年过节都到工人家中嘘寒问暖。王进喜十分感动，暗暗想着要拼命工作，报答共产党的恩情。党组织很快发现了这棵好苗子，着意培养他，使他在报恩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树立了共产主义思想。从此，王进喜干得更欢了，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1959年，国庆节他被石油部推选进京观礼。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车顶上都架着一个黑不溜秋的大箱子，难看极了。他好奇地问排队等车的人：“公共车上架那么个家伙干啥？”人们告诉他：“苏联断绝对我国的石油供应，国家又没有大油田，只好在车上架起煤气箱子，用煤气来开动车子。”王进喜听了，像被人打了两个狠狠的耳光，脸顿时烧起来。他狠狠地责备自己：“王进喜呀王进喜，国家没有石油，遭了这么大的难，你这个石油工人有什么脸还在北京观礼。”

回到宿舍后，王进喜立即向石油部观礼团团团长提出回玉门去。团长吃了一惊，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王进喜一拳砸在桌子上，哽咽着说：“国家没有油，首都的公共汽车背起了煤气包。国家遭这么大的难，我要回玉门去，多打井，多产油，为国家分难。”团长松了一口气，劝他说：“玉门油矿就这么点油，你回去也无井可打。我告诉你吧，东北松嫩平原发现了大油田，中央要组织10万人会战，有你拼命的时候。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观礼，回到玉门后你还要给大家作报告，要鼓起全油田的人的干劲支援大会战，你说这个任务重要不重要？”王进喜笑了：“重要，我一定好好观礼。”

回到玉门油矿后，正值矿里召开支持东北松嫩大油田会战誓师大会，王进喜跳上主席台，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我到北京观礼，看到街上漂亮的公共汽车上架着黑不溜秋的大包，就像俊媳妇脸上长了个大瘤子。我一问，原来是国家没油，公共汽车只好烧煤气。我一听，恨不得找个老鼠窟窿钻下去。我们是石油工人，却让国家遭这么大的难，可耻啊！我报名，第一个去东北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王进喜的话博得了人们爆雷般的掌声，工人们高呼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争先恐后地报名去东北大油田。

钻井队一支接一支地走了，王进喜却迟迟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他急了，去找矿领导。矿领导赶快让他坐下，王进喜不坐，要矿领导马上告诉他出发的日期。矿领导只好告诉他：“矿里急需补充一名领导，经研究，决定你来补充进领导班子。”王进喜这下可急了，抓住矿领导的手说：“我的老领导，

我心急火爆地要去东北大油田打井，你却要把我弄到办公室坐板凳，我不干。我一定要去，要快去，国家没油，我急啊！”矿领导看他急成这个样子，怕他急出病来，一口答应他马上走，王进喜高兴地 and 矿领导摔起跤来。

王进喜带领的钻井队要出发了，矿领导都跑来送行，见他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一套毛选，诧异地问：“你的行李呢？”王进喜摆摆手：“要什么行李。我一去，井架就是我的家，还要什么行李！”矿长无奈，在他走后，同他的妻子一起收拾了些衣服铺盖，让后起身的人给王进喜捎去。

王进喜到了大庆油田，只见四面八方来参加会战的石油队伍一支接着一支，车站上人喊马嘶。王进喜兴奋极了，恨不得一口气就把机器搬到井位上去，可是由于起重机少，王进喜队的钻机得排队等着从车上卸下来。那怎么行，王进喜把全队职工召集到一起，鼓动说：“毛主席在北京看着咱们快快拿下大油田。没有起重机，咱们肩扛手抬，也要把钻机运到井位上。咱们石油工人顶天立地，吼一声也要叫地球抖三抖！”大家听了，齐声赞好，连夜肩扛手抬，把60多吨重的钻机运到井位上。1960年的4月，东北松嫩平原晚上还结冰茬，但王铁人却浑身热气腾腾，站在钻台上，一搬刹把，机器一阵轰鸣，开钻了。

开钻了，但没有水管线，水过不来。没有水怎么打井，王铁人牙一咬：“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他把刹把交给副队长，自己拿起水桶，跑步去提水。指导员紧接着拿起脸盆跟上，工人们提桶端盆，跟着王进喜去端水。全队整整端了200多吨水，才保证了钻井的需要。在开钻期间，王进喜白天黑夜呆在井位上，困了裹着皮大衣打个盹。这是第一口井，王进喜不放心。结果只用了6天，王进喜队就打好了一口井。王进喜回到自己住的破土房里，房东老大娘惊喜地说：“进喜，你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可真是个铁人哪！”

第一口井打好以后，王进喜紧接着打第二口井。突然，发生了严重的井喷。压井用的重晶粉没有运来，王进喜果断地命令：“用水泥压，出了问题我负责！”水泥一袋袋倒到浆池里，工人们用铁锹站在池边上和着，这怎么和得开。王进喜急了，跳进浆池里，在浆池里艰难地行走着，用身体和着水泥，水泥很快和好了，井喷被压住了。

这样一个好工人，如今出了点差错，把射孔搞错了，要不要批评呢？余秋里、康世恩商量了半天，觉得响鼓还要重捶敲，大庆的三老四严精神对谁都一样，于是决定在大会上批评王进喜钻井队。

王进喜处理完事故，跑来参加大会。队上的工人怕他不知道大会正在批评他，忙跑过去劝他躲躲。王进喜粗声大嗓地说：“你让我领奖的时候往前面站，挨批的时候往后躲，我不干！”说完，径直朝会场走去，在最前面坐下来，头抬得高高的听领导的批评。余秋里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铁人真是个人，不居功，不自傲，勇于听取批评，是工人阶级的典型。

大会开完后，余秋里和大家商量了一下，提拔铁人当了钻井大队长。这大队长管着许多井队，近千人的队伍。钻井指挥部为他准备了个办公室，可是谁也别想在办公室找到他，他一天到晚在各个井队转。这大草原上，井队之间相隔十几里，几十里，王铁人干脆用自己攒下的钱买辆摩托，骑着跑井队，帮着解决问题，指导打井。有时自己扶住刹把帮他们打，晚上裹着皮大衣在井队的帐篷里一倒。井队转完了，他又去开荒点帮着家属们开荒，到托儿所去看看娃娃们住的房子漏风不漏，一发现问题，就叫来几个机关干部

和自己一起和泥巴，堵墙缝。工人们喜欢这个大队长，有他在，觉得心里有了主心骨。

铁人再铁，也还有犯错误的时候。不久，他就又犯了一个错误，为此，铁人内疚了一辈子。

那是有一次去托儿所检查工作的时候，铁人发现托儿所里的阿姨不在，一个小孩在床上哇哇地直哭。铁人心疼地抱起娃娃哄着，亲着，心里很恼火，这个阿姨太不负责任了，一定要好好地批评她一下。一会儿，阿姨回来了，原来也是家属，是来队不久的一个小媳妇。铁人恼火地问她：“你刚才到哪里去了？你看孩子哭成了什么样？他的爸爸怎么还能在队上安心打井？”那个阿姨也不说话，赶紧把孩子接过来哄着。铁人气仍未消，找到托儿所负责人，要她好好对新来的阿姨加强教育。托儿所负责人笑着说：“铁人，这次你可弄错了，那个孩子是那位小阿姨的孩子，她为了照顾好其他的孩子去打预防针，就把自己的孩子锁在房里。”王铁人一听，用拳头一捶自己的头，懊悔地说：“我这个官僚主义，怎么也不问问。我赶紧给她道歉去。”说完，扭头朝小阿姨那里跑去，对小阿姨鞠个躬说：“同志，我弄错了，向你道歉，你批评我吧。”小阿姨脸红了，不知说什么好。正在这时，记者来了，一把抓住他说：“铁人同志，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请你谈谈你的英雄事迹吧！”王铁人说：“好，我谈谈。记者同志，你知道大庆油田上谁是英雄吗？为了照顾好工人的孩子，把自己的孩子锁在房里哇哇哭的阿姨是英雄；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坐在油罐列车上测量油温的技术员是英雄；在荒原上日夜打井的那些工人是英雄；用计算机把一个数据算十万次的老工程师是英雄。没有他们，哪有大庆。你要采访英雄，这位小阿姨就是英雄，请你好好采写她吧！”

王铁人尽管道了歉，但并没有轻易放过自己，他逢人便讲自己的这个错误。直到当了钻探指挥部副总指挥后还拿这个事例向大家说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个人是渺小的，不管作出多么大的成绩，都不要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一切荣誉都属于党和人民。

为了加速油田的开发，邓小平在征得中央常委同意后，下令3万名部队官兵集体转业开往大庆油田。于是大庆除了一支穿蓝制服的石油大军外，又来了一支穿黄制服的大军，大庆油田的开发更快了，北京街头上的公共汽车顶上的大煤气包到1961年底时都被取下来了。

邓小平这段时间忙得要命，他不仅要管大庆会战的事，还要管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事。3万名部队官兵集体转业开赴大庆油田后，他又打电话给余秋里，冬季将临，要立即解决油田职工过冬的问题，不能有一个冻伤；又指示黑龙江省委书记欧阳钦，尽快解决大庆油田的木材。余秋里、欧阳钦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研究过冬问题。欧阳钦建议油田盖东北农村那种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全用土坯砌成，又厚又结实，虽不高级，但暖和实用，盖起来也快。余秋里等人考察后，觉得这种办法确实不错，当即作出决定。全油田仅仅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盖起了干打垒土房几十万平方米。欧阳钦又下令大兴安岭的木材列车，一律开往大庆，为大庆解决盖房用材。

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当10月初第一场大雪下来时，大庆的十万职工已全部住进了暖和的房子。邓小平得知后，便放了心。

大庆过冬的问题刚处理完，聂荣臻元帅又来向邓小平汇报导弹、原子弹研制的情况和编制未来7年科学规划的设想。邓小平听完以后，请聂总把这

些意见写成书面材料，提交中央讨论。12月7日，邓小平表示同意聂总的意见，并把这封报告交给中央讨论。周恩来听了聂总的汇报后，对邓小平和聂荣臻说：“邓稼先他们的工作非常辛苦，是不是再给他们生活上多补助些，他们是国宝。”聂荣臻完全同意，邓小平又指令中央有关部门为邓稼先、钱三强、钱学森等研制核弹和导弹的专家们增加生活供应品。有关部门立即承办，调集了大批猪肉、糖、香烟给科学家们送去。

后勤部门的卡车开到花园村6号时，只见大楼里灯火辉煌。门岗查验了他们的证件后，便让他们进了院子。大楼门口还站着双岗，士兵嘱咐他们等着，便去通知楼里的传达室，请邓稼先等同志下来，点验中央发给他们的食品。传达室负责人到了楼上，楼上悄无人声。他推开研究室的门，只见邓稼先和其他科学家们七倒八歪，个个人事不省，不觉大惊，忙通知保卫处长。保卫处长带着医生警卫飞快上了楼，看看这个，推推那个，然后带人出来，对传达室的人说：“没有事，都太疲劳了，睡着了。让伙房给他们做些夜宵，待会让他们吃。”

传达室负责人通知伙房去了，保卫处长带着医生、警卫为邓稼先他们在门口站岗。他是个有经验的老保卫人员，军委抽他到这里时，对他讲得一清二楚，绝对不许发生任何问题。他深知责任重大，夙夜不得安眠，经常是晚上睡得正香，忽然惊醒，披衣出来检查安全保卫工作。因此，他十分熟悉这些科学家们，尤其是对邓稼先更加钦佩。花园村6号三年的生活一下子又浮现在眼前……

邓稼先是清华大学高材生，和同班好友杨振宁一起考取美国官费留学资格，1950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他便要求回国，美国人见他是个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便同意他回国了。1950年8月，邓稼先坐轮船越过万顷碧涛的太平洋，回到了祖国。而另一个学者——钱学森的运气就差多了，由于他当时已很有名气，美国扣着他不放。经过中美华沙大使级的会谈，钱学森好不容易才于1956年回到国内。

1959年中国决心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中央任命邓稼先为理论研究的带头人。从此，邓稼先从一切报纸上消失了，各种集会上也都看不到他的人影。美国盛传邓稼先失踪，只有他的好友杨振宁博士暗暗地猜测，邓稼先肯定是担任原子弹研究的主攻手了。

研究原子弹，谈何容易，又正值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邓稼先和一群大学生吃住在花园村的科研大楼里，白天黑夜地在那里干，理论问题一个个被攻破，最后进入了最关键的一个数据的测算，没有电子计算机，他们用手工计算器反复测算……

保卫处长正想着，邓稼先醒了。这时食堂里把夜宵也做好了，保卫处长向他汇报了中央送来慰问品的事。邓稼先高兴极了，叫起大家，拉着保卫处长一起向食堂走去。他请工人师傅们用送来的猪肉炒了几个菜，打开送来的酒、烟，举杯祝贺说：“为我们圆满地完成最后一个数据的测算，干杯！”保卫处长听说最后一个数据被测算出来了，连忙举杯向邓稼先表示祝贺，大家痛饮一杯，邓稼先便让大家回去睡觉，明天向二机部领导汇报。

二机部听了汇报后，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听说邓稼先的理论研究已经完成，下面即将由青海基地开始实际制造，非常高兴，和彭真市长商量了一下，再腾出几个院子来，供监控设备研制工作者使用。于是，几个宽大的院子，一夜之间墙上架起铁丝网，门口站上了岗哨，上百名科学家食

宿在这里，研究原子弹试验和起爆的监控设备。

与此同时，钱学森领导的导弹研究进展也很快，第一批几枚地地导弹已制造出来，准备试射。聂荣臻在办公室守着电话，听取汇报，不断发出指示。试射时间到了，试射总指挥发出口令，靶场即开始发射。忽然，扬声器里传来前线的紧急报告，导弹飞行不正常。话音未落，扬声器里传来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靶场报告：“导弹爆炸。”聂荣臻不觉吃了一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回 王恩茂礼送叛国将 赵紫阳妥息逃港风

话说聂荣臻从扬声器里听到前线指挥员报告导弹发射失败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责备研究人员，而是怎样鼓起大家的劲来。正在考虑的时候，秘书又进来报告，钱学森来了。聂荣臻赶紧迎出去，钱学森正好从汽车里钻出来，聂荣臻一把拉住他，看来看去，心疼地说：“学森同志，你瘦多了，头发也掉得厉害，要注意身体啊。”钱学森叹口气说：“聂总，地地导弹发射失败，我要负主要责任，我要向你检讨，请求处分。”聂荣臻说：“是的，这次导弹发射是该有人承担责任，但这人不是你。”钱学森问：“那该是谁？我是导弹研究院技术院长嘛，我该负责嘛。”聂荣臻笑着摇摇头：“不对，你不能负这个责任，该负责的是科学研究的规律。学森同志，你想想，哪一项科学研究不是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才成功的，我看这次导弹发射成绩很大。我们白手起家，自力更生，造出了导弹，把它打出去了，这难道不是胜利。来来来，今天晋察冀老乡给我送来点野味，咱们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导弹发射干一杯！”

钱学森听了聂荣臻的这席话，心里不禁慨叹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聂总也。他回去以后，领导科研人员日夜攻关，很快找出了导弹的毛病，地地导弹发射成功。接着，地空导弹、军舰空导弹接连发射成功，装备部队。地空导弹营接连击落窜扰大陆的台湾美制 U—2 高空侦察机。聂总报请中央批准，授予钱学森中将军衔，以表彰他的突出贡献。

说话间就到了 1962 年 1 月，这时国内困难更加严重，内地逃荒的人群东流西走，边界上骚动不安。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迫于形势，他不得不同意立即召开全国四级干部会，检讨错误，总结教训。中央常委会开会决定，四干会的主报告先是由邓小平继由刘少奇主持起草，中央并责成邓小平负责准备这次会议。

此年，也就是 1962 年 1 月 11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重要工矿企业负责人，部队高级指挥员共七千多人，是有党以来空前规模的一次会议，以后通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

会议开始后，首先讨论邓刘主持起草的大会的主报告的草稿。这篇报告写出来后，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就直接交给大会讨论修改。经过七千人反复的讨论和修改，最后定稿，名为《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作为会议的正式文件下发给七千余与会者。

报告系统地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报告虽然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但着重点却分析研究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教训。报告指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为：一、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二、在人民公社工作中，大刮“共产”风，大搞平均主义，瞎指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四、大量增加城市人口，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

报告强调指出，对于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领导机关。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对书面报告进行了解释，回答了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经过五年、十年再来总结经验；现在不能套用缺点错误和成绩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的那种说法，从全国看，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讲着讲着，刘少奇扯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说的话许多是符合事实的，反右倾斗争搞过头了，扩大化了。为什么右派都让说话，而不让彭德怀同志讲话呢——”

刘少奇又说：“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在于他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有一个军事俱乐部，他们的反党活动和外国的颠覆活动有联系，是里通外国。”

林彪在座位上不动声色，悄悄地观察着毛泽东对刘少奇讲话的反应，一个主意悄悄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

1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要经过一些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接下来，毛泽东又讲了一大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大道理，代表们对主席的自我批评非常感动，要学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要付出学费的，现在学费付出了，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可妥善地进行革命和建设了。

接下来，邓小平在会议上讲话，指出必须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把党的领导权集中于一个人，反对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家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困难，总结了计划上高估产，高指标，缺口大，基建战线过长，不切实际、过多过急地大办大搞等教训，提出了克服目前困难的八条办法。周恩来、邓小平在讲话中都作了自我批评。

以后，陈云、朱德都在会议上讲了话。

对于他们讲话的内容，毛泽东既在预料之中，又在预料之外。毫无疑问，这些讲话使毛泽东的权力和威望受到损害。针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发言，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提醒人们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警惕党内的修正主义推翻我们。

林彪明显地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刘、邓等人讲话的不满，同时他也从毛泽东的讲话里领会了毛泽东的真正想法，1958年的根本设想是对的，只是缺乏一套具体合适的政策和办法。这固然是由于缺乏经验，还没有付出学费，同时也是由于下面的干部胡吹胡说，欺骗了中央。想到这时，林彪明白了，又一次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投资的机会到了。他看看其他人说得差不多了，便在

大会上说起来：“毛泽东思想总是正确的。经济困难的发生，不是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实际，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听毛主席的话去做，那么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困难，就不会走这么大的弯路。”

毛泽东望了林彪一眼，一种欣慰之感油然而生，林彪要讲的正是自己想讲而不好讲的话。

林彪知道自己的讲话引起了预期的效果，又接着讲下去：“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与会代表大部分都是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许多人联想起历史，不由得对林彪的话产生了共鸣。可不是吗？是谁第一个走上井冈山，开展红军运动的？是谁，率领我们反围剿，打败白匪百万兵？是谁，在延安运筹帷幄，把握时机，把人民军队发展到近二百万？是谁，指挥解放军以少胜多，仅用三年时间，消灭蒋军八百万，夺取全国政权？又是谁，在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将一个混乱落后的旧中国治理得秩序井然，百业兴旺？不都是毛主席吗？所以林彪的讲话赢得了会场上猛烈的掌声。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上，心里对林彪充满了感激，当自己处在困境时，不是刘少奇，也不是周恩来，也不是邓小平、朱德、陈云，不是他们，而正是林彪，坚定不移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坚决地维护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八大前，自己提名林彪当党中央副主席，真是太对了。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全党的思想统一起来了，各种经济政策都一一落实。在党的领导下，全中国人民都在为迅速扭转困难局面而行动起来了。

此年，也就是1962年5月，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起草的关于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下大决心，大刀阔斧地调整国民经济：一、从1961年到1963年6月，精简职工两千万，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精简的职工和减下来的城镇人口下放农村，既减轻了城市供应的压力，又为农村输送了近一千万劳动力；二、停建缓建基本建设项目，1962年施工项目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基建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三、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尽快解决吃饭问题；四、缩短工业战线，对一些效益不好或目前非必要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降低工业生产指标。1962年比1959年减少企业数38%，钢由1866万吨降为667万吨。对石油、原煤、支农产品则予以加强。

七千人大会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加快了对在“反右倾”等运动中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和党员的甄别平反工作，到1962年8月，全国有六百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得到了平反。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大部分都在1962年被摘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摘了帽子的人的政治处境和工作待遇稍有改善。

这些调整措施的每一项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以减少城镇人口二千六百万人为例，二千六百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这么多的人口一下子要从城市下到农村，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其困难和复杂可想而知！由于党的崇高威信，这么一件大规模的下放城镇人口的工作在两年内迅速地完成了，基本上没出什么乱子。

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农业生产开始回升，经济困难迈过沟底，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开始逐渐得到克

服。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特点的建设社会主义途径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快一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出发，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为此拼命奋斗，这种精神是可贵的；大跃进期间完成的一些好的农田水利工程以后发挥了好的作用，兴办工业企业也为一些落后地区发展工业播下了种子，如此等等，都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全党缺乏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加快迅速完成，又使一些干部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1956年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反急躁冒进的意见还能给予尊重、或是容忍妥协，经过反右派斗争和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家长制、一言堂作风在党内盛行，终于导致“大跃进”的灾难。这个问题不解决，还将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尽管实行了这些重大的调整，但粮食不会在一天之内长出来，刚刚迈过经济困难的沟底的1962年的春天，是最难熬的一个春天，许多省份，逃荒的人群络绎不绝，住在边境上的人，则开始往境外逃去。

首先是中苏边境上出了问题。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1年10月，周恩来应邀出席苏共22大，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会议上带头攻击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为中苏分歧说了公道话的阿尔巴尼亚党，周恩来当即站起来驳斥赫鲁晓夫的话。不待会议开完，周恩来果断地离开会场，提前回国，以表示对苏共错误作法的抗议。毛泽东破天荒地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刘少奇、朱德也都陪同毛泽东迎接周恩来归国。自此以后，苏联进一步恶化中苏两党、两国关系。1962年春，他们乘中国春荒严重之机，指示苏联驻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市领事馆和伊宁市领事馆，秘密利用各种关系，煽动居民外逃。

1962年4月初，乌鲁木齐街道上的积雪开始融化，但天气依旧寒冷，白天融化的雪水在夜间又冻成了冰。就在这样的一天，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祖龙泰耶夫少将和伊犁军区司令马尔国夫少将坐着吉普车到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他们在草原上钻蒙古包，进帐篷，鼓动人们到苏侨协会领苏侨证。这两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少将都是俄罗斯族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新疆的伊犁、阿勒泰、塔城三个地区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武装起义，建立了民族军，祖龙泰耶夫、马尔国夫也参加了民族军。新疆解放以后，民族军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祖龙泰耶夫、马尔国夫被授予少将军衔，委以军事领导重任。

1962年时，春荒严重，新疆也不例外，苏联克格勃乘机煽动边民外逃，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在克格勃的引诱下，决心叛国。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欺骗边民，许多苏联克格勃分子也利用各种关系在边民中进行渗透，一个巨大的阴谋逐渐酝酿成熟。

4月22日凌晨，新疆伊宁市附近的霍尔果斯口岸静悄悄。自从中苏关系恶化以来，经过霍尔果斯口岸大桥往来的中苏公共汽车已明显减少。

哨兵端着枪，警惕地守卫在口岸上，最近苏方境内车辆调动频繁，似有非常行动，得加倍警惕。

忽然，从晨雾中涌来数十名拖儿带小的边民，要求去苏联。战士查验证件时，他们拿出了崭新的苏侨证。战士奇怪，怎么一下子冒出来了这么多的苏侨。正犹豫间，成百上千的人举着崭新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国！”“我们要去苏联！”乱纷纷地向口岸涌来。

与此同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政治文化中心伊宁市也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级别高于一般的专、州，该州下辖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所以伊宁市的重要党政军机关有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州政府，伊犁专区党委、专署，伊犁军分区。这几个单位都位于伊宁市的主要大街斯大林大街上，彼此相距很近。

4月22日上午，在大批边民涌向霍尔果斯口岸的时候，斯大林大街上出现了一伙一伙的人群，这些人手持棍棒，一边在街上行进一边大呼：打死汉人，打死汉人；不仅许多在街上行走的汉族人突遭毒打，就连许多维吾尔族干部也挨了打。这些人在街上行凶后，便都向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委冲去，站岗的警卫未及阻拦，就被他们用棍棒打倒了。发狂的人群如洪水般冲进了州委大院，几千人把州委大楼包围得严严实实，他们举着双筒猎枪朝大楼的窗户开火，州委大楼上一片玻璃破碎的声音。

忽然，一辆办事外出归来的吉普车被闹事的人群发现了，他们包围了吉普车，把车于掀翻在地。有人用汉话喊着：“烧车，快烧他娘的！”有人立即砸烂车上的油箱，点着了汽油，吉普车熊熊地燃烧起来。车里的干部无法爬出来，眼看就要葬身火海，警卫部队冲上去，从车里把他们拉出来，撤进了大楼。闹事的人没有想到解放军战士这么勇敢，再加上群龙无首，一时被解放军战士的勇气震慑住了，眼睁睁地看着警卫部队撤进大楼。

忽然，有人喊着：“快去攻大楼啊！”人们被提醒了，“嗷”地大叫一声，冲向州委这座土黄色的四层大楼。州委干部从一楼撤出，用杂物堵塞了楼梯，坚守在二楼上，闹事者冲了几次没有冲上去。州党委会在三楼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闹事者早已越过了闹事的界限，践踏法律，赤裸裸地用武力攻击州委机关，破坏公物，打死打伤干部群众，抢走档案，决不能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土匪行径让步，坚决实行武装自卫。于是，州委集中了楼上仅有的几支枪，开枪还击。闹事者一看楼上开枪了。吓得往后退去，不一会儿，人群退出了州委大院。

闹事者一看攻占州委大院的企图没有得逞，转而攻击相邻的伊犁地区专署。正在伊犁检查工作的新疆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少将闻讯赶来。曹达诺夫也曾是三区革命民族军的将领，他赶到专署，只见院子外挤满了人，便走到院子里的高土堆上，劝道：“冲击国家工作机关是违法的，大家不要上了坏人的当，赶快回去。有意见可以向上反映，千万不要闹事。”这些闹事者指着曹达诺夫大骂，推倒木栅栏，向院子冲进来。曹达诺夫只好和专署干部退到了大楼里，曹达诺夫拨通伊犁军分区的电话，命令警卫连立即赶到专署。

警卫连赶来后，在大楼前持枪站成一排，警卫连长用粉笔在院子里划了一道线，向闹事者大声宣布：“从现在起，谁越过这道白线，我就开枪！”有人畏惧了，悄悄地往后退去。这时有人煽动道：“解放军不会向群众开枪，他不敢开枪，冲啊！”一些闹事者心想，是啊，只见过解放军一年不断地为群众做好事，哪见过解放军向群众开枪。一些聪明点的人知道，解放军对人民群众那是真好，嘘寒问暖，挑水扫地，见了姑娘躲着走。可解放军打起坏蛋来也是厉害得很呐。乌斯满叛乱，解放军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给收拾了。这些人眼看闹事过了头，成了武装暴乱，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们还是向院外溜去。为首者一看事情不妙，便领头冲了过来。连长举起手枪，朝天鸣枪警告，闹事者愣了一下，又不顾死活地冲过来。连长大声下令：“打！”战士们一齐举枪朝地上射击，闹事者吓得哭爹喊娘地朝院外跑去。

曹达诺夫见围攻者逃散，走出楼来向警卫战士们致谢慰问，他立即要通新疆军区的电话，向军区报告了伊宁市的暴乱始末。这时原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上将已调中央工作，他的老战友、南疆军区司令王恩茂中将中央军委任命为新疆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中共中央任命王恩茂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接到曹达诺夫的报告后，大吃一惊，刚放下电话，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这些中苏边境线上的专州都打来紧急电话和电报，报告本地党政军机关都遭到闹事人群的冲击和包围。王恩茂心情沉重地放下电话，立即召来自治区党委常委和军区其他负责人会商对策。中印边境形势紧张，新疆主力部队已调往喀什待命，这些部队不能调动。兵团和地方部队都有重要的维护本地治安的重要任务。考虑再三，决定抽调上述闹事地区的兵团值班部队协助本专州驻军恢复治安，劝阻边民不要外逃。决策定下来以后，王恩茂立即把有关暴乱情况和决策报告国务院，同时下令各专州立即提高警惕，防止事态扩大。

就在新疆自治区党委研究对策时，霍尔果斯口岸已乱成一团，越境者又跑回来向人们鼓吹：苏联边境上都搭好了帐篷，盖起了房，想住多大就住多大；面包香肠，牛奶苹果摆满了房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边民们听了，兴高采烈地赶着牛羊，从桥上挤过去。阿尔勒、塔城、博尔塔拉几个重要的口岸上，越境的人群也挤成一团。苏联境内，摆着许多兵车，广播车为入境者打气。夜晚，苏联边境上的探照灯一齐打开，为越境者照亮。整整三天三夜，外逃的边民们撕碎口岸上中国国旗，打倒哨兵，夺走枪支，推开劝阻者络绎不绝地越过边境，进入苏联。

周恩来接到新疆自治区党委的电报后，连忙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刚睡下，周恩来果断地要求卫士立即叫醒主席，有十万火急的事情报告。毛泽东被叫醒后，知道发生了非常之事，立即让卫士打电话请总理过来。周恩来走进菊香书屋，把王恩茂的电报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吃惊地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我们的公安机关怎么事先一点都没有察觉？”周恩来建议说：“新疆军区的两位少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已写了报告，要求去苏联，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劝说一下？”赛福鼎也曾是三区革命民族军领导人，被授以中将军衔，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毛泽东摇摇头：“算啦，人去不中留，我就不信苏联是天堂。他们要走，礼送出境。金龟子可能还想对我们落井下石，可以从青海、甘肃、内蒙调一些骑兵部队到新疆去，让王恩茂在乌鲁木齐市组织盛大入城式，要像欢迎志愿军回国一样欢迎这些部队进疆。”周恩来赞同地说：“主席这个指示很重要，我马上去落实。”

王恩茂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军区召开欢送祖龙泰耶夫、马尔国夫及四十多名校、尉级军官会议，会议结束后，军区即把他们和家属送上汽车，礼送出境。出走者在离开乌鲁木齐城时，不少人都睁大眼睛向这座美丽的边城行注目礼，一种前途未卜的感觉沉重地压上心头。

于此同时，新疆军区加强了边界口岸的管理警备工作。要走的，一律礼送出境，但必须办理离国手续。从4月22日以后，陆续前往苏联的人共有6万7千人之多。

从青海、甘肃、内蒙等地调来的大批骑兵部队飞快地乘火车抵达乌鲁木齐市。5月中旬，乌鲁木齐市主要大街上搭起了彩门，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欢迎骑兵部队进驻新疆。骑兵部队的指战员们背着冲锋枪，举着雪亮的马刀，接受新疆人民的检阅。大批骑兵部队的到来，震慑了一些企图

继续制造事件的反动分子，使他们不敢妄动。

王震率部进驻新疆以来，新疆各族人民群众眼见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对共产党、解放军充满了感激之情。王震走后，王恩茂执掌新疆军政大权，继续按照老首长王震的苦干精神建设新疆，特别注重提拔少数民族干部，短短几年间，全疆就吸收、提拔了近十万少数民族干部。有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进入了县、地区、自治区的领导机关，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一些少数民族领导干部经常教育自己的亲友，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虽然暂时经济出现困难，但他们深信共产党会很快领导人民克服困难。伊塔事件发生后，全疆局势仍然稳定如常。再加上新疆的浮夸风、共产风原来就不甚厉害，损失也小，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执行七千人大会精神，全疆经济形势很快好了起来。

周恩来则协助毛泽东处理完了伊塔事件，紧接着又接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电报，报告称：5月以来，广东大批群众听信了逃到香港、香港可以收留、有活干有饭吃的传言，为饥饿驱赶，大批逃往香港。每天从广州至深圳的道路上，携妇将雏，挑担推车逃往香港的人络绎不绝。每天冲过边防线的人数竟达数千人。最多时，一天有6千人冲过边防线，逃到香港，企图找一个有饭吃的地方。但是港英当局坚决拒绝接收这些非法入境者，逃过去的人大部分又被遣送回来。广东农民和市民人心惶惶，港英当局连连提出抗议，国际舆论也对此大哗。

周恩来立即把广东大规模的逃港事件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中央常委决定由周恩来负责解决这个事件。周恩来当即指示陶铸，把平息逃港风要作为广东的头等大事来抓。陶铸接到中央指示后，责成主管农业的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来处理这个事件。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出身于滑县一般贫农家中，13岁时加入了共青团，参加了聂真等人领导的滑县暴动，时为1932年。抗战军兴，赵紫阳转入共产党，在党校学习一年后，返回滑县任中共县委书记，在陈再道将军指挥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的支持下开展工作。从这时起，他一直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不久又任中共冀晋豫区第三地委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军南下，担任地方工作团团长，率千余地方干部随刘邓大军展开战略反攻，进军大别山区。刘邓任命赵紫阳为新建的桐柏区党委书记刘志坚的副手、担任区副书记，并任桐柏军区（即中野第10纵队）副政委，协助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委刘志坚领导军区工作，成为省军级干部。广东解放后，赵紫阳又奉调广东工作，升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1955年，他改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南局恢复后，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实际主管广东工作。

从5月以来，赵紫阳也一直为强劲的逃港风所苦恼。平息逃港风可以采用的最便捷的办法是动用武力强行阻拦。但他知道这些农民市民逃港并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只是想找个地方吃饱肚子，动用武力于理不通，于情不忍。接到中央和陶铸的指示后，赵紫阳感到要平息逃港风，与其抽刀断水不如釜底抽薪，下令广东各级负责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清仓查库，安排好群众的吃饭问题，粮食差额确实较大的地区立即上报省里，由省里统一安排。

赵紫阳的命令下达后，广东各级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清查粮仓，赈济群众。但不久赵紫阳发现，有的地方行动迟缓，舍不得把粮食拿出来。赵紫阳不禁大怒，立即命令省委办公厅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分赴各专、县进行检查，

对拖延不办者严肃查处。此令一下，许多支工作组立即出发，认真检查，查处了一批干部。于是，赵紫阳的命令被彻底执行，人们有了度荒之粮，也就渐渐安静下来了。

赵紫阳看到逃港风有所减弱，不禁松了一口气。但紧接着一些地区报告，还有许多农民不听劝阻，要逃往香港，是否把他们抓起来？赵紫阳指示他们：不要抓，一个都不许抓，谁抓谁犯错误。现在要对群众讲清楚，逃到香港不是办法，香港容不下那么多人。现在是去一个，香港警察就抓一个，家产弄光，小孩死掉，最后还是叫香港送回来。如果跑到香港日子好过，政府也赞成，现在不是这样嘛。各级干部都要把这些情况讲清楚。铁路沿线要设立接待站，让那些被遣送回来的人现身说法，让群众明白，不是政府不让他们去，实在是去香港还得送回来，不是办法。群众知道了香港的真相，他们也就不去了。

广东各级干部接到赵紫阳的指示后，立即向群众进行解释工作，正好逃港过去的数万人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想逃到香港去的人在铁路沿线见到这些垂头丧气的被遣送回来的逃港者，始知政府说得不差，也就悄悄地回去了。这时，夏季作物已经成熟，由于全党认真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今年粮食收成不错，农民有了粮食，也就不再跑了，逃港风基本平息下来了。

赵紫阳看到各地农民情绪已经基本稳定，大为高兴。忽然，他看到一份报告上说某地党委决定对逃港遣送回来的人要进行审查，凡是党团员的都要开除党籍、团籍。赵紫阳不禁眉头皱起来，立即让秘书通知各地，对于被遣送回来的人，一律不得歧视，要热情欢迎，表示同情他们的遭遇。对其中的基层干部和党团员只进行正面教育，只要认错，不予处罚。

各地接到赵紫阳的指示后，对遣送回来的人妥加安置。有些人本来担心会挨整，想着再设法逃港，一看政府和省委并不追究，反而热情欢迎，也就安心了。一场大规模的逃港事件妥善地得到了处理。

周恩来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报告，得知逃港风妥为平息，其间没有动一支枪，深感欣慰。这时全国夏粮已经入库，收成甚好，市场上各种肉类食品有了明显地增加。邓颖超嘱咐炊事员说：“全国城镇居民都已供应肉了，今天给恩来炒一盘肉吧！”炊事员答应了，烧了几个周恩来爱吃的狮子头。周恩来吃饭时发现肉，忙问炊事员：“这是怎么回事？”邓颖超过来代答道：“恩来，这是我的主意。现在城镇居民都开始供应肉了，给我们也发了肉票，我就让炊事员给你弄个菜吃。”周恩来高兴地点头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了，咱们一起来喝一杯吧！”

周恩来正要坐下吃饭，忽然军委来了电话，报告印度军队最近得寸进尺地蚕食我国领土，袭击我运输车辆，中印边界枪声再起。周恩来放下电话，立即坐车去丰泽园。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五十一回 立专案禁出《刘志丹》 换警卫审查彭德怀

话说周恩来听到中印边界上印军连连在中国扯冬等地区建立据点的消息后，连饭也顾不上吃，急忙驱车驰往丰泽园，对毛泽东说：“主席，我看中印边界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毛泽东听完周恩来的汇报后气愤地说：“欺人太甚，是可忍，孰不可忍。通知陆军第4师，让他们立即上山。”周恩来答应道：“是，我立即通知他们。”毛泽东又说：“还得写一篇社论驳驳尼赫鲁，我来写，题目就叫《是可忍，孰不可忍》，你看怎么样？”周恩来极力赞成说：“很好，哀兵必胜。”毛泽东点点头：“那就这么定了。”

周恩来回后，立即向屯驻在新疆喀什的陆军4师发出命令，要他们立即上山。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接到命令后，立即命令屯驻在喀什的陆军第4师10团、11团上山，增援中印边界西段的边防部队，骑兵3团也奉令开到了西段的康西瓦备战。与此同时，周恩来领导中国政府与印度政府多次交涉，希望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并严令中国部队不得开第一枪。印度政府因为还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在照会中同意谈判，但却屡屡要求中国部队撤出中国领土，为谈判设置重重障碍，以掩护印军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为创造谈判的气氛，又命令上山的中国部队撤回喀什和叶城待命。

周恩来这段时间特别忙，又是内政，又是外交，二十几个秘书川流不息地抱着材料来找他批。这天中午，邓颖超正陪着周恩来在餐厅吃饭，一个秘书探头探脑地往里看，周恩来连忙放下饭碗，向办公室走去。邓颖超无奈地向秘书说：“你们呀，连恩来吃饭也不放过。”秘书抱歉地说：“大姐，对不起，有紧急情况。”

秘书呈递上材料，周恩来一看原来是邓小平关于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三个人安排工作的建议。七千人大会结束后，邓小平总书记受命主持全国的甄别平反工作。当时全国在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被打成右倾分子或划为有右倾错误的党员、干部有一千多万人。4月底，邓小平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下发全党，要求“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即使有些轻微错误的，也不要留尾巴。”5月份，在中央常委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甄别平反的办法，凡是过去整错了的，统统摘帽子，不要留尾巴。在邓小平主持和督促下，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对365万名党员、干部进行了甄别，至8月底，这些人中的70%都被摘掉了帽子，对370多万群众都予以平反。基层的问题解决后，邓小平又来解“军事俱乐部”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比解决基层的问题难度大，主要是彭德怀的问题没有解决。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先恢复他们的工作，邓小平建议任命周小舟为湖南省委副书记，黄克诚为陕西省副省长，张闻天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邓小平这样雷厉风行地督促甄别平反工作，周恩来深感欣慰，甚至怀有一点感激之情。但是彭总呢？想到彭总在吴家花园的处境，周恩来又有些黯然神伤。

秘书把这份急件带走了。周恩来又开始翻看桌上堆着的几十份待批文件。为了让周恩来批文件时分出轻重缓急，秘书对每份文件的内容都用纸条写了简单说明，把纸条夹在文件里。周恩来逐一看去，只见有一份文件要求盖国务院大楼，他把字条抽出来，说了声“滑稽”，便把文件放到一旁准备

打回去。

忽然，电话铃响了。周恩来拿起电话，只听邓小平在电话里说道：“总理吗？我有急事要马上报告。”周恩来说：“好吧，我等着你。”周恩来放下电话，继续抽看纸条。不一会儿，门外响起汽车刹车声，邓小平来了。他急忙迎出去，邓小平下车后环视周围，惊讶地说：“总理啊，你的大生产运动硬是要得，花坛都让你种上了西红柿。这哪是总理办公的地方嘛，简直就是四季青公社的菜地嘛。”周恩来笑着摇摇头说：“我的菜地还没有主席的菜地大呢。主席把丰泽园都种上了菜，我看丰泽园该改个名字了，就叫丰收园吧。”邓小平打趣道：“那西花厅也该改成西菜厅，这才名副其实嘛。”

两个人进了办公室，周恩来把桌子上“不要吸烟”的牌子拿掉，邓小平抽出烟点上，才正色说道：“彭德怀写了一篇长文章，共八万多字，由杨尚昆同志转给了我，内容主要是针对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说明自己没有里通外国问题。文章我已经呈递给了主席，也向少奇同志作了报告，你和少奇同志去主席那里次数多些，是否找个机会和主席说一下，把彭总的问题解决了。”周恩来一口答应下来：“没问题，我和少奇同志商量一下，找主席去说说。”

接下来，两人又商量了一些事情，不觉就到中午，邓小平告辞要走。周恩来一把拉住说：“不要走，今天咱们一起聚聚吧。”邓小平也不客气，二人向餐厅走去。饭菜上来后，周恩来为邓小平倒了一小杯酒，高兴地说：“小平这一段时期，为党办了一件大事，使几千万人丢掉了思想包袱。今日我请客，敬你一杯！”邓颖超笑着问周恩来：“每次客人来，你都说是你请客。也不算算，你那点工资能请几次客，还不都是我掏腰包。”邓小平哈哈大笑说：“总理啊，这次可叫大姐给问住了。”周恩来笑着改口：“今天是大姐请客。来，为你的甄别平反工作的胜利干一杯！”

邓小平走后，周恩来赶紧去找刘少奇。刘少奇正好因为中央马上要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有许多事要和毛泽东商量，便和周恩来一起去丰泽园。毛泽东正在菜地里锄草，见到周恩来，放下小锄，和他们打了打招呼，三个人在菊香书屋前的院子里坐了下来。原来菊香书屋前的小院里长着一棵大树，每到夏天，浓密的树荫挡住了酷热的阳光，院里凉风习习。毛泽东便让卫士在树底下放了一张圆桌，经常和客人坐在圆桌周围谈话。刘少奇坐下后，谈了会儿北戴河会议的准备工作，然后又提起了彭德怀的事：“我听小平同志说，彭德怀写了一篇长文章，文章已送到主席这里来了。”毛泽东一听脸色立即沉下来，不置可否地说：“洋洋八万言书，我看了，已让中央办公厅打印，在京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刘少奇和周恩来交换了一下眼色，知道毛泽东不愿意让彭德怀出来工作，便不好再说什么了。

刘少奇、周恩来走后，卫士长进来报告：“专列已经准备好了，请主席起程吧。”毛泽东看了屋子一眼，把手往办公桌、沙发、茶几上面一划拉：“都带走。”卫士长即指挥卫士把这些文件书籍分别装箱，带到专列上去。

8月初的北戴河，海水蔚蓝，凉爽宜人。毛泽东到北戴河后，卫士们立即把书箱打开，把原来摆在桌子上的文件照原来位置摆放在桌子上，原来放在沙发扶手上的《李贺诗集》还放在扶手上，原来斜放在茶几上的《楚辞》照样斜放在茶几上。毛泽东洗了把脸，坐在沙发上看起《李贺诗集》来。没有看几句，卫上进来报告：“柯庆施同志来了。”毛泽东抬抬手说：“请他进来。”柯庆施进来后，朝毛泽东问候一句：“主席，近来睡觉怎么样啊？”

毛泽东回答说：“睡得很好，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啊！你手上拿的什么？可以给我看看么？”柯庆施说：“当然可以啦，我就是为这件事来向主席汇报我的想法的。”他把那卷东西呈上去，毛泽东打开一看，原来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剧本。字排得很大，是柯庆施专门让人排印的，这样，毛泽东看起来就不太费眼力了。毛泽东很欣赏海瑞，也很爱看海瑞戏，吴晗写海瑞戏，毛泽东是知道的，胡乔木已经告诉过他，他还让胡乔木好好鼓励吴晗一番，让吴晗写出海瑞那种同民共甘苦的精神。但今天毛泽东看完《海瑞罢官》后，却有些不快。“罢官”这个字眼太刺目了，另外怎么把“退田”这些事也写到剧本里去了，这很有点“三自一包”的味道嘛。

在毛泽东看剧本时，柯庆施谦恭地规规矩矩地坐着，把手放在腿上，一副好学生的样子，但眼睛却紧紧地盯着毛泽东。他看到毛泽东眼角的肌肉跳了几下，知道毛泽东对剧本产生了反感情绪，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席，我看这个剧本有问题，这是影射毛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我看了彭德怀写的八万言书，明明白白是对主席罢他的官不服气，要翻案。”毛泽东点燃香烟吸了一口，冷冷地说：“我对彭德怀这个人了解，不能给他平反。”

彭德怀的案子因为有了《海瑞罢官》这出戏，性质更严重了。北戴河会议期间，康生因为主持撰写中苏两党论战的文章好几次来找毛泽东，言谈间也提到《海瑞罢官》，康生建议组织文章批判这出戏，毛泽东莫测高深地摇摇头。康生担忧地说：“我看有一股势头，有一些人对庐山会议反右倾不满意，要翻庐山的案。现在翻案风、单干风刮得很紧。邓子恢来北戴河前，到中央党校讲了一大通，简直是把党骂得一无是处。这股风和彭德怀都有关系。”毛泽东点点头说：“彭德怀的案是不能翻的，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2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召开了，毛泽东首先在大会上讲话：“我准备讲三个问题，一、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二、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三、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矛盾，我看国内阶级的存在是长期的，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存在着阶级，就存在着阶级矛盾。在党内，这种斗争就表现为我们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现在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刮得很紧啊……”

毛泽东讲起阶级斗争来很是吸引人，谈今论古，头头是道。参加会议的许多人可是心里一紧，刚能吃一顿饱饭，又搞起运动来啦，不知这一次又是谁倒霉。

毛泽东正讲到兴头上，不料想刘少奇插起话来，一下子把他的话头打断了。过去开会，只有毛泽东在别人讲话时插话，谁还敢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这次刘少奇不但插了，而且还讲得时间很长，简直是喧宾夺主。其中最让毛泽东恼怒的是，刘少奇在插话中强调了一句：“要防止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是刘少奇以插话为名，在批自己刚才的讲话呢。

这天的会散了后，毛泽东很生气，一个劲地抽烟，喝茶。江青走进来火上浇油地说：“主席，你看看刘少奇在这里写了些什么？”毛泽东接过江青递过来的杂志，原来是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这期杂志上全文刊登

了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是刘少奇在延安时的一次讲话，后来中央印成单行本在党内发行。这次出版算是再版了。毛泽东翻开江青折页的地方，一段话映入眼帘：“这种人根本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只是胡诌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术语，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装作马克思、列宁的姿态在党内出现。并且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 and 热情。”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的这段话当时是批评王明的，但王明早已垮台了，已移居苏联。那么现在再发表这段话是针对谁的呢？谁是共产党领袖呢？听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前刘少奇作了大量修改，如果他还是像延安时期那样对自己忠诚的话，再版前他还能把这段话原封不动地搬上来吗？看来这不是一时的疏忽，毛泽东一想到这里，气恼地把杂志扔在地上。江青把它拾起来，冷笑两声说：“事情已经明摆着，他们对你是敬而远之，把你当菩萨来拜，磕完头，就算完成任务。我出去转了几个地方，现在那些诸侯们你的话不听，我讲个什么更是理都不理，但对刘少奇的话却像是对圣旨一样。”毛泽东突然暴怒起来，大吼道：“你滚，你滚！”江青哭喊着“我还不是为你好？”跑出去了。

江青走后，毛泽东陷入沉思之中，看来现在得准备反击了。他打了个电话给林彪，叫他立刻来一趟。林彪自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央办公厅按他的要求，专门给他在北戴河盖了一栋楼，编号为91号楼。此楼不同他楼，上下两层窗户均用桐油漆的木板封上，以便怕光、怕水、怕风的林彪居住。林彪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立即来到毛泽东住处，直到很晚才离开。

接着，毛泽东又在常委会上提议，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递补为政治局委员，并任书记处书记，在下月于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予以追认。康生心里好不高兴，但表面上不露声色。回到自己的寓所后，暗自开了一瓶好酒，为自己庆贺庆贺。突然，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打来电话，报告说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了一部小说《刘志丹》，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很多原则性问题与历史不符。康生接完电话后，让人去查了查，很快查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情况是这样的，1956年，工人日报出版社社长高丽生为纪念先烈刘志丹，约请李建彤写一部描写刘志丹革命生平的小说。李建彤感到有必要把刘志丹的革命生涯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向读者作个介绍，便慨然允诺。她虽是刘志丹的弟媳，但对刘志丹革命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尚不十分清楚，于是便不辞辛苦，回到陕北进行采访、调查，采访了陕北老干部三百多人，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前后共写了五稿，1962年时第五稿开始在《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上连载。

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刘志丹被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关在监狱里。毛泽东到陕北后，立即下令释放刘志丹，恢复原职务，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党中央曾作过决议，但尚未彻底解决。《刘志丹》一书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这些问题，在原陕北革命根据地工作过的陕北老干部对这本书的发表也有不同的看法。刘志丹的老战友马锡五支持李建彤写这部书。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则有些顾虑。他心里明白，陕北问题本来就比较微妙，高岗自杀后，这个问题更敏感了，因此他写信劝李建彤不要写这部小说，可写一点关于刘志丹的革命回忆录。阎红彦是陕北子长县人，参加过清涧起义，担任过红军陕北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他感到陕北的许多问题只有中央能定，因此给李建彤写信，劝

她不要出版。不料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突然看到《刘志丹》已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深怪李建彤不听话，便把此事告诉了康生。

康生没有看过《刘志丹》，也没兴趣去看。他只知道《刘志丹》的写成触动了党内高层的一根敏感的神经，于是他立即写信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指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个带有政治倾向性的问题。”责令工人出版社速印六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

工人日报出版社社长高丽生接到康生的命令后，顿时汗如雨下，六神无主。本来想宏扬先烈精神，没想到却酿成大祸，但政治局委员的命令谁敢违抗，没有办法，高丽生只好让出版社速印六百本，送交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即分送来京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中央委员。

有这本书作靶子，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似瀑布直落九天，雷霆万钧。9月24日，全会一开幕，毛泽东便首先讲话，大力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康生在会上听着毛泽东的讲话，拔出笔来写了一个纸条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一看纸条上只写着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他立即把纸条在会上公布了，就着纸条上的这句话进一步发挥起来：“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写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毛泽东讲完话后，八届十中全会便分组讨论。康生带头围攻习仲勋：“你习仲勋是反党小说《刘志丹》的挂帅人物，是为高岗翻案，也是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对毛主席，反党。你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在康生的煽动下，一些人对习仲勋群起围攻。习仲勋想辩解，根本无法开口，只好向周恩来请假说：“我最好不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周恩来批准了。

八届十中全会经毛泽东亲自提议，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和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由康生主持两个专案的审查工作。会议正式公布了撤销黄克诚和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增选康生为政治局委员，增选康生、陆定一、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会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讲话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的理论观点和形势分析。八届十中全会根据刘少奇的提议，决定继续强调经济工作，不要因为抓阶级斗争而忽视了经济工作。虽然如此，但全会的风向已变了，抓阶级斗争成了全党头号大事。全会结束后，康生走马上任，把专案组成员召来说：“《刘志丹》的要害是想同毛主席一手创建的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他们不写毛主席如何创建江西革命根据地的英雄业绩，却来写陕北革命根据地，这能说是疏忽吗？小说中的罗炎就是高岗，高岗给中央送过信，罗炎也给中央写过信。中央批高岗，陕北有些人不服气，小说就是为高岗翻案的，也是为彭德怀翻案的。彭德怀当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是副书记嘛。”在康生的督促下，专案组雷厉风行地进行审查工作，凡是与小说沾过边的干部一律撤职，集中北京“学习”，等待着他们的将不是一般的处分，而是人人都无法料到的残酷迫害。许多人因此案被关进监狱，更有一些人被逼供致死。

周恩来和刘少奇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反右倾是不同意的，但他们无法同毛泽东的权威抗衡，只能私下对彭德怀表示同情，特托朱总司令代表他

们和邓小平到吴家花园看望过彭德怀一次。这次八届十中全会，又出来个《刘志丹》事件，周恩来生怕习仲勋想不开，便叫上陈毅一起来看他。见了面后，周恩来拉着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你信任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现在出了《刘志丹》这件事，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你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流着泪说：“总理，你放心，这点我还会，我准备还回陕北农村做个农民。”周恩来点点头，但仍不放心，让秘书坐车把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接回家来，叮嘱她说：“从今天开始，你不要上班了，在家陪着老习。单位那里，我派人去说。”齐心答应了，从此留在家里陪着习仲勋。

事情办完后，周恩来坐车回去，耳边回响着习仲勋的话“回陕北农村去当农民”，他摇摇头，回农村当农民？哪有这么舒服的事，彭德怀也好几次提出要去当农民，结果又怎么样，最近还成立了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他哩。想到这里，周恩来不禁为彭德怀担起心来，他能承受得了这次新的打击吗？

与周恩来的担心相反，彭德怀得知八届十中全会不仅没有给他平反，反而进一步成立了他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消息后，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明白自己的案子是翻不过来了，既然翻不过来了，他也就不再想这事了，心情反而平静起来。不久，专案组开始了对他的审查，吴家花园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是警卫班奉令撤走，接替他们而来的新的警卫班个个面若秋霜，对彭德怀监管得很严格，彭德怀不仅不能外出，连想出门散散步都被禁止了，事实上，他已被拘禁了。老警卫班撤回去后，士兵复员，带班的副连长背上党纪和军纪两大处分，转业还乡。吴家花园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其次是彭德怀身边的人员均被编上号数，列入专案，受到审查。过了些时间，专案组人员又来清查《保卫延安》一书。这本书是建国初由作家杜鹏程创作的一部小说，描写了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西北解放军连歼胡宗南部队主力，扭转西北战局，光复延安的英勇战斗。小说写了部队中层和基层的指挥员，士兵和群众，也写了中央领导人和西北解放军领导人的活动。彭德怀当时任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西北解放军司令员，自然在小说中被浓墨重彩地加以描写。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这时文化部奉中央指示，收缴销毁《保卫延安》。由于彭总不喜欢别人描写自己，故没有保存这本书，身边的人受彭总的约束，也没有保存这本书。专案组人员一一抄检后，果真连一本《保卫延安》都没有发现，便回去复命去了。

抄检销毁《保卫延安》一事，沉重地打击了彭德怀，他的夫人浦安修经常被她所工作的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的领导找去谈话，要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具体地说，就是和彭德怀离婚。浦安修不愿离婚，但这是组织对她的要求，她不能违抗组织的要求。无奈之中，她只好写了离婚报告交给北师大党委，北师大党委交给北京市委书记刘仁，刘仁又转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尚昆又交给了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是不同意浦安修离婚的，那不是对老彭打击太大了吗？但这话还不好明说，想了一会，有了主意，便在浦安修的报告上批道：“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邓小平想，浦安修看到报告，立即会明白我的意思的。但是这份报告根本没有转给浦安修，北师大党委只派人通知浦安修：“你的离婚报告组织上已经批了。”

浦安修离婚后，到吴家花园来向彭总告别，彭德怀平静地说：“我理解你，这几年连累你了，幸亏咱们没有子女，你走吧，以后多保重。”浦安修哽咽着说：“老彭，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的。”彭德怀点点头，送浦安修出

吴家花园。突然，一个警卫战士跑过来，挡在彭德怀面前。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二回 买买提挺身护战友 罗光燮滚雷扬国威

话说八届十中全会后，浦安修来吴家花园和彭德怀话别。彭德怀对离婚一事倒也释然，送浦安修出吴家花园。不料警卫战士插过来把他挡住。他只好目送浦安修走出去，两人洒泪而别。

邓小平很快知道了彭德怀、浦安修离婚的事，不禁大为惊讶，很遗憾地把这事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放下电话，叹了口气，又审阅起中国外交部给印度政府的照会来。原来在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印度军队又向中国扯冬地区逼近，并开枪打死中国边防军官，中印边界形势骤然重新紧张起来。周恩来根据中央常委会的决定，负责指挥这场军事外交斗争。外交部这时已起草了向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周恩来逐字看去，作了一些修改后交还给外交部。外交部10月3日把照会送给印度驻华大使馆，新华通讯社全文播发了这个照会。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接到外交信使送来的照会原文后，细细看去，只见照会写道：

印度方面利用中国边防部队停止边境巡逻的情况，从今年6月起又一次越过所谓麦克马洪线，侵入线北中国西藏地方的扯冬地区，建立了扯冬、绒不丢、批果布、卡龙四个侵略据点。双方各自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显然有碍于印度方面不仅在西段和中段，而且在东段进行这种侵略活动。印度政府一方面在9月18日向中国发出照会，拒绝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另一方面从9月20日起向扯冬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连续的攻击，截至9月30日止，共打死中国边防人员三人，打伤九人。这种猖狂的挑衅和攻击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事实很清楚，印度政府决心要用枪炮来回答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中国政府对此不能不表示愤慨。

尼赫鲁看到这里，冷笑了两声，暗自想到：国家之间的外交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中国在边界上兵力少，防务虚弱，士兵军官适应不了高原缺氧寒冷的自然条件，又和苏联闹翻了脸，有什么实力与适应高原气候，又得到苏联、美国支持的印度山地部队抗衡？尼赫鲁心里明白，中国政府是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辛亥革命后英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西藏，迫使当时北洋政府同意召开中、英、藏三方会议——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线会议期间，参加会议的英国政府代表亨利·麦克马洪同西藏地方当局的代表夏札·边觉多吉背着中国中央首席代表陈贻范于1914年3月24日在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制造的所谓“中印边界线”。该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延伸至西藏察隅，在中印边界地区把历来属于中国的面积达九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归当时英国统治的印度。（历届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过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编者注。）但是尼赫鲁现在需要这条线，作为蚕食中国领土的文件根据，至于麦克马洪线是怎么划出来的根本不管他了。非但如此，尼赫鲁还想出一条蚕食中国领土、霸占中国扯冬地区的妙计，那就是在照会中把麦克马洪线的西端部分再向中国境内推进了3.4分纬度，也就是推进了七十公里。这样，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不就都成印度的了？

尼赫鲁决心已定，指示印度外交部照会中国政府，只有中国军队从麦克马洪线以南撤走，印度才愿意进行谈判。周恩来看到这封照会后，生气地说：“这也太不讲理了，这是要中国政府承认印度军队侵占中国领土是合法的。尼赫鲁明知道中国政府是不会答应这个条件的，故意这么写，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关死了谈判大门。”这时秘书送来一些剪报，扼要地为周恩来介绍这

些剪报的内容：“这是英国《泰晤士报》10月8日发自德里的通讯，《泰晤士报》一向偏袒印度政府，现在也不得不指出，如果中印边界上发生战争的话，正是德里拒绝进入会谈；这是德意志新闻社的报道，印度政府已任命考尔中将担任东方军区司令，考尔已整编了专门用于边界战争的新军团，他从尼赫鲁那里得到授权，对我国采取有限的进攻行动；这是美联社的电讯，报道说印度政府决心在几天内把中国人赶出麦克马洪线……”周恩来听到这里，摆摆手说：“好啦，你放在这里，我来看吧。”

1962年10月6日印度政府向中国驻印使馆发出拒绝和谈的照会后，紧锣密鼓地发动战争。10月16日，尼赫鲁从锡兰返回新德里，一下飞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军事行动，调动十几个旅的部队入侵中国，下令印度的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军火，侵入中国领土的印度部队，接到了考尔中将立即向中国军队进攻的命令。10月17日上午，侵入扯冬地区的印度军队由哈东山口北犯。是日夜晚，印军侵入到克节朗河择饶桥，向桥东的中国守军猛烈攻击。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新疆奇普恰普河地区的印度军队在飞机的配合下，攻击中国边防部队。印度终于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印边界上的雪山冰峰之间，顿时枪炮轰鸣，杀声连天……

这时从山上撤下的中国部队骑兵3团，10月20日刚刚回到驻地叶城，半夜里突然接到前线司令部的命令：“立即上山参战！”团长哈斯木命令号兵吹号紧急集合，部队从被窝里爬起来，迅速集合起来了。哈斯木传达了司令部的命令后，立即命令战士们上车奔赴战场。重机枪班的战士司马义·买买提帮助副班长阿不都依提把重机枪架在驾驶室顶上，自己和卡得尔坐在车尾处。其他战士也都迅速在车上坐好了。哈斯木团长和蔚富恭政委商量了一下，便下令开车。长长的军车行列在黑沉沉的夜里向昆仑山开去。10月下旬的夜风吹来阵阵寒意，战士们都是热血沸腾。恨不得插翅飞上昆仑山，用脚端平侵略者的据点。

正当骑兵三团星夜赶往昆仑山的时候，印军入侵部队已经大举向中国边防部队进攻，中国边防部队猝不及防，伤亡甚多，被迫自卫反击。10月20日，中国西藏边防部队经一天激战，击退了由克节朗河进犯的印度军队，收复了兼则马尼、扯龙、卡龙，激战继续进行。在中印边界西段，新疆边防部队击退了从奇普恰普河地区和加勒万河谷来犯的印度军队，拔除了侵略军在天文点、加勒万河谷、阿里的班公湖北岸的中国领土上设立的许多哨卡。在这里作战的是中国陆军第4师，这个师是王震将军统率的359旅的老底子，作战顽强，部队中多四川兵，年轻个小，很被人高马大、满脸胡茬的印度雇佣军看不起。但印度军人不了解，中国的湖南和四川民风强悍，向以当兵为荣。被印度军人称为娃娃兵的这些四川兵一上阵，就把印度兵打了个落花流水，印度军队这才尝到了娃娃兵的厉害。在这几次战斗中，师部派出工兵营协助步兵连队清除印军埋设的地雷，爆破印军的碉堡，屡立战功。消息传来，急坏了因冻伤在山下住院的工兵营战士罗光燮。他乘医生不注意，偷偷从医院里跑出来，拦了辆上山的军车赶回部队。指导员许文一看他双手缠满绷带，知道是溜号出来的，便打发他到炊事班拣菜去，不让他参加战斗。

4师11团和10团协同作战，接连奏凯。边防2团也在班公湖北岸的西里扎甫4000高地作战中一举歼敌，夺回了被印军侵占的神圣领土。

按照西线指挥所何家产司令员的部署，位于天文点、巴里加斯、拉到扎西南一线的约山口哨卡，由陆军4师11团3营收复。临战前夕，何家产少将

突然变更部署，改由阿里支队且坎分队攻打。原来约山口哨卡本是且坎分队的哨兵，印军蚕食中国领土时，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和谈的诚意，且坎分队奉命不得向侵入的印军开枪，约山口哨卡遂被印军侵占。现在且坎分队主动向司令部请战，要求由他们自己夺回哨卡。何家产考虑到哀兵必胜，且坎分队又熟悉地形敌情，乃决定由且坎分队攻打约山口哨卡。且坎分队接令后，英勇冲击、前仆后继，打垮了入侵印军，收复了哨卡。

现在该打羌山口了。哈斯木率领的骑兵三团这时已开到山上，奉命从且坎出发攻打羌山口。骑兵3团不熟悉这一带的地形，他们只知道红山头那边是羌山口，至于敌人的哨卡在什么地方概不清楚。原定计划是由且坎分队带路，但且坎分队在收复约山口哨卡的战斗中伤亡过大，无法带路，时间紧又不容许侦察。哈斯木心一横，命令部队熄灭车灯，戒备乘车模黑前进。车队翻过红山口，像一条黑色的巨蟒，在雪原上爬行着。哈斯木和蔚富恭政委坐在第二辆车上，睁大眼睛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突然，侧面喷起一团火光，敌人碉堡里的机枪火力，象一条火蛇窜来，驾驶员立即中弹牺牲。坐在车尾的司马义·买买提端起冲锋枪，向印军火力点猛扫，印军机枪被他吸引过来，副班长阿不都瓦依提乘这个机会把重机枪调过头来，压住印军火力点。哈斯木指挥部队攻击，歼敌一部，收复了羌山口，接着收复狮泉河畔的杜布契列。印军慑于中国边防部队的神威，早已逃窜，但买买提却壮烈殉国。

4师侦察连奉令配合10团3营、阿里骑兵支队消灭典角地区的入侵印军。他们骑马迅速插到拉干赫尔、切断了逃跑之敌和北援之敌的联系，迫敌退却，收复巴里加斯地区、缴获了印军留下的大批大米、罐头、奶粉、酒，我无一伤亡。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的战斗胜利结束。

周恩来在这段时间，和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中将及西线、东线两个前线指挥所经常保持着联系。第一阶段战斗胜利结束后，他写信给亚非国家首脑，说明自1959年空喀山事件以来，中国政府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持克制态度，希望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无奈印度政府视中国的态度为软弱，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忍无可忍，只有自卫反击。他在信中呼吁亚非国家主持公道，推动中印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亚非许多国家首脑收到周恩来的信后，纷纷发表谈话，赞赏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的立场，批评印度政府的军事冒险。但是，尼赫鲁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扩军备战，迫害华侨，再一次在中印边界挑起战火。

11月14日，盘踞在中国西藏瓦弄地区的印度侵略军出动三千兵力，沿着察隅河谷向中国边防部队进犯。中国军队被迫还击，连续击退印军进攻，并开始转入反攻，入侵印军狼狈逃窜，中国部队收复瓦弄地区。随后，中国边防部队又粉碎了侵入中国达旺河以南印军的猛烈攻击，经两日激战，入侵印军不支向南逃去，中国部队进驻西山口。中印边界东段的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

西线的战斗异常惨烈。

11月18日，入侵中国的印度军队向驻守在斯潘古尔湖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中国边防部队自卫还击，击退了印军的进攻，并转入了反攻，开始收复印军在斯潘古尔湖两岸侵占的中国土地。

入侵印军在斯潘古尔湖两岸的两个山头上构筑了大量碉堡，并布设了雷

区。这两个山头一个是热琼山，一个是莫尔多山。

收复热琼山的战斗由哈斯木指挥的骑兵 2 团和 4 师 11 团 3 营负责。他们乘汽车星夜赶到热琼山下。喜马拉雅山上天气奇寒，漫天飞雪，战士们衣服上，脸上都结了冰。进入攻击位置后，部队沿着河谷向海拔 5200 米高的热琼山头爬去。骑兵 3 团主要由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战士组成，11 团则基本是汉族战士，军官士兵同仇敌忾，互相扶持，忍受着寒冷与缺氧的困难，爬上了山顶，立即按预定方案，向敌碉堡群发起攻击。骑兵 3 团无座后力炮排排长买买提·托乎提命令架好炮，向敌碉堡轰击。可是由于天气酷寒，炮弹装不进炮膛。买买提·托乎提排长急了，飞起一脚，硬是把炮弹填进了炮膛，“轰隆”一声，炮弹在敌碉堡上炸开了。第一炮打响后，炮弹可以顺顺当当地填进炮膛了，买买提·托乎提命令炮手抵近碉堡，直接瞄准射击，只听“轰隆”“轰隆”声响个不停，一发炮弹一个碉堡。炮排打了 25 发炮弹，轰平了 18 个印军碉堡，11 团的战士们连连向炮排欢呼，在炮排的支援下，他们前仆后继，勇猛向敌军发起攻击。这时，设在楚舒勒的印军炮兵，开炮支援入侵印军。3 营七连副指导员张代荣看到前方炮弹打来，急令冲锋的战士卧倒，并趴在一个战士的身上。炮弹在他们身旁炸开了，冰雪土石和着弹片，四处飞溅。硝烟过后，战士们发现张代荣全身挂彩。担架队要把他抬下山去，张代荣指指负伤的战士们：“不要管我，先抬战士们。”不一会儿，张代荣这位荣获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命令、授予“爱兵模范”光荣称号的军官终因流血过多，牺牲在阵地上。战士们继承烈士遗志，4 连全歼热琼山 8 号哨所的印军库玛 13 营的 130 多名敌兵，七连仅用一个多小时全歼印军 9 号哨所的敌军。

热琼山 8 号哨所、9 号哨所间还有一个结合部，印军筑有碉堡多座。攻击任务由四师 11 团 3 营八连担任。攻击开始后，喷火兵手持喷火枪近敌喷火。喷火手何汝亮机动灵活靠近敌碉堡，一扣板机，一道火龙窜进敌军枪眼，碉堡里顿时火光熊熊，印军士兵被烧得焦头烂额，鬼哭狼嚎，顿成焦炭。何汝亮接连喷掉五个印军碉堡，其他喷火兵也喷掉一批敌军碉堡，数十名印军葬身火海之中。印军吓得屁滚尿流，失去斗志，连连被歼，最后只剩下一个核心碉堡未被攻克。印度境内的炮兵连连向中国攻击部队开炮，战士伤亡较大。赶来增援的 9 连战士王忠殿抱起一根爆破筒向印军碉堡扑去，把爆破筒从枪眼里塞进去。印军士兵从里面往外推，王忠殿一把扯掉引线爬在枪眼上，用胸膛死死顶住爆破筒。印军士兵被中国士兵的神勇吓破胆，个个呆若木鸡、不知所措。瞬间，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水泥块和印军肢体，破枪飞上空中，碉堡中的敌军被全部炸烂。王忠殿英勇牺牲。

至此，收复热琼山的战斗全部胜利结束。

收复莫尔多山的战斗，是整个西线自卫反击战中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印军在莫尔多山山顶筑有碉堡多座，阵地前埋设了许多地雷，形成三道雷区，每道雷区长达 50 米。由于中国军队指挥员受地形限制，侦察计算失误，没有估准中国部队攻击出发地与印军阵地之间的距离，所以当 11 月 18 日拂晓攻击开始时，炮兵发射的炮弹全都落在雷区前面，炮火准备既没有扫除雷区，又没有炸掉印军根据地。在莫尔多山担任攻击任务的是 4 师 10 团和阿里骑兵支队。炮火发射完成后，部队开始冲锋时，担任主攻任务的阿里骑兵支队 4 连连长曹福荣才发现这个大错误，但为时已晚。部队已全部暴露在印军火力面前，印军发射的炮弹已打乱了中国部队的队形。

情形万分紧急，怎么办？四连连长曹福荣趴在阵地上，两眼向前望去，只见自己所在的山峰和印军所在的山峰在白云缭绕中时隐时现，一道一千多米长的山脊梁把两座山峰连接起来，这就是自己部队的冲锋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印军埋设有三道雷区。雷区后面是十多座印军碉堡，还有十多辆坦克和美国供应的大口径无后座力炮。碉堡后面是印军指挥中心和军用机场。拔除这个据点，对印军将是个沉重的打击。想到这里，曹福荣命令部队：“现在所有部队都要听我的指挥。是刀山，也要上；是火海，也要跳；与其被敌人打死在这里，不如死中求生。我命令，踩着石头 雷区，大家看着我的样子做！”说完，带头向雷区 去。战士们踩着曹福荣的脚印， 过了第一道雷区。

但在 第二道雷区时，有人踩响地雷倒下。接着，又有人踩响地雷倒下。危急中，四师工兵连的一个排冲上来了，4 连的战士们卧倒，等待工兵排除地雷。

罗光燮跟着工兵排冲进雷区。他在军训中练就了一手排雷的技术，可是眼前的雷区被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根本找不出埋雷的蛛丝马迹。雪继续下着，左旋右转的狂风把白茫茫的雪花搅成了雪雾，能见度大大降低。

工兵排副排长高承珣带着一个小组上前去排雷，不幸踩响地雷，身负重伤，壮烈殉国。第二小组紧接着上去，又都倒在前进路上。排长王奇芳急了，命令 2 班上。罗光燮用冻伤未愈的手抓住爆破筒，随全班出动了。该死的大雪把雷场覆盖得严严实实，罗光燮刚刚冲进雷区，就被一颗防步兵人马压发雷炸掉左小腿，昏死在雷场上。

过一会儿，罗光燮醒来了。他一看，中国边防部队还被印军的炮火和雷区阻挡在冲锋道路上。雷区没有打开。他寻找爆破筒，但爆破筒在他倒地时，滚到斜坡下面。他想起了工兵战士的神圣责任，猛地向雷区滚去。“轰”的一声，他的右臂又被炸掉了。罗光燮没有停下来，继续往前滚去，接连又是几声轰响，第二道雷区被打开了。罗光燮英勇牺牲，他的四肢已被炸飞，脖子也被炸断，头和躯干只连着一道皮。

目睹罗光燮神勇的工兵排和骑兵 4 连的指战员们刹那间发出惊天动地的冲杀声。雪峰为战士的神勇所撼动，发生了阵阵雪崩。巨大的雪崩轰鸣声似在传颂英雄史诗般的光辉业绩。战士们忘记了耳旁呼啸的炮弹，忘记了脚下爆响的地雷，在雷区里疯狂般地扑向 16 号阵地。这时，他们已不再是一般的战士了，而是正义之神，国威之神。印军被中国战士的神勇吓破了胆，脚轻手软，被中国边防部队全歼。盘踞在斯潘古尔湖以西中国境内的入侵印军张皇失措，争先逃入印度境内。

至此，在西线的入侵印军的 43 个据点全被拔除，西线的自卫反击战大获全胜。

从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0 日，中国边防部队仅用几天时间，就全歼入侵印军八千多名，印军被俘人员达四千名之多。德里一片慌乱，边境城市阿萨姆的印度官员生怕中国部队乘胜冲下山来，连忙疏散人口、抓捕华侨。尼赫鲁也慌了神，嘴上喊着要同中国作长期的军事斗争和精神斗争，实际上心里正在发愁：全国的军队不过三十万。这次派上山的都是一些最精锐的部队，连最精锐的部队尚且无法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其他的部队又能有多大的战斗力呢？他实在不敢往下想。这天直到很晚，尼赫鲁才睡去。

11 月 21 日深夜两点钟，尼赫鲁正在熟睡，秘书进来把他推醒，把北京

电台广播的中国政府的声明递给他，喜悦地说：“中国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边防部队从11月22日开始全线主动停火。从12月1日起，撤到1959年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在实际控制线本侧设民政检查站，中国政府的声明说，他们主动采取这些措施，表示了愿意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极大诚意，希望我国政府作出积极响应。如果我国军队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留在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他们保留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必须由我国政府承担全部责任。”尼赫鲁听了秘书的报告，把广播记录稿扔到一边，抱着膀子在地上走来走去，大声地嚷叫着：“我不信，我不信。一支胜利进军的军队，怎么会主动停火，后撤？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事？”正当尼赫鲁怀疑的时候，外交部官员送来了世界各国政府和舆论机构对中国声明的反应。尼赫鲁一一看去，竟都是称赞中国政府的立场的。并劝印度政府勿失此空前良机。尼赫鲁看完外电报道，颇有所动，吩咐秘书：“这都是通讯社电讯稿，我要看中国政府的正式文件。”

中国政府的声明很快由驻华使馆派信使送到国内。尼赫鲁要面子，表面上向中国政府提出把边界控制线恢复到1962年9月8日状态，但实际上按兵不动，中印边界问题就这样被冷藏起来了。

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后，又要指导外交斗争，又要部署军队后撤，经常开会开到半夜。这时国内经济形势好转，每到半夜时，炊事员就端上来一盆肉片白菜炖粉条和一盆馒头，大家自舀自吃，边吃边议。为了表示中国政府要求和平的诚意，根据中央决定，周恩来提议把4000名印军战俘连同缴获的武器一律送还印度。有的人气呼呼地反对，说打日本，打美帝也没有把缴获的武器送回去的。周恩来好一番解释，大家思想才通了。同意叫印度方面派人打着白旗来接收。周恩来笑笑说：“打白旗像个投降的样子，他们脸上下不来。打绿旗吧，绿色是象征和平的嘛！”大家听了，齐声赞好。周恩来便下令给已后撤20公里的中国边防部队把俘虏和战利品送还给印军。从12月26日起，短短几个月内，四千名印军战俘和缴获的战利品全部送给印度。世界舆论大为惊叹，这且按下不说。

再说参加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将士们下山后，受到西藏、新疆人民的热烈慰问。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中将指示部队医院和地方民政部门，妥为治疗安置山上下来的伤员，并积极想办法为伤残复员战士介绍对象。一个从莫多尔山雷区下来的伤残战士被安置到自治区机关工作，同志们为他找了个对象。举行婚礼这天，新房中分外热闹。这时一个中年人提着礼品不声不响地来到新房，新郎新娘和参加仪式的人们看到来客，个个惊讶得张大了嘴。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三回 唐师傅巧焊万吨机 陈大夫妙接断肢手

话说从莫多尔山雷阵下来的一位伤残战士的婚礼正在热闹当口，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中年人，大家一看，原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新疆军区司令员王恩茂中将，不禁齐声欢呼起来。王恩茂把礼品送给新郎、新娘，祝贺他们白头到老。新婚夫妇要留他喝一杯，王恩茂因为还要组织干部去买买提、罗光燮等战斗英雄、烈士的家乡去慰问烈士遗属，坐了一会儿便告辞了。

这时新年已快要到来，王恩茂想起上海数万知识青年为了支援新疆建设，不远万里，先后来到新疆，应该派人给上海人民送些新疆特产，以感谢他们对新疆建设的支持。主意已定，便立即通知区党委办公厅去办。办公厅的干部接到指示后，便组织购买了一批吐鲁番葡萄干、哈密瓜等特产用汽车运到尾亚，再换上火车向上海运去。上海市委接到来自新疆的这批礼物后，立即分发到工厂、学校、医院、生产队去。江南造船厂是上海的大企业，前几年又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现在又正造万吨水压机，自然是重点照顾的对象。市委给他们送去了一些葡萄干、哈密瓜，数量虽然不多，但却表达了新疆人民的一片心意，全厂技术人员、工人和干部们决心尽早造出万吨水压机，支持全国人民的建设，支持新疆的建设。

万吨水压机是世界机电产品的尖端产品，其工程难度之大，作用之重要，与原子弹不相上下。这种水压机工作时，可以产生一万吨的压力，相当于一艘万吨轮满载时的重量。在这样沉重如山的压力下，几百吨的钢件如同面团，被任意揉搓。一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就不能没有万吨水压机。可是，由于工艺复杂，建造难度很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建造。江南造船厂开始建造时，世界上总共有四座万吨水压机，分布在美国等几个工业特别发达国家。别的国家要锻压特大钢件，如万吨轮上的机轴时，要出很大的价钱到这几个国家的万吨水压机上去压，就这样，人家还常常把你的工期排到最后。

中国甚至于连这样的条件也没有。由于西方国家和苏联联合起来对中国进行封锁，任中国出多少钱，拥有水压机的这几个国家也不给你加工。没有万吨水压机，造不出万吨轮，造不出航空母舰，造不出大机床，就要被动挨打。周恩来按照中央的决定，组织全国学者专家汇集江南造船厂攻关。大家决心造出争气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

中国人果然聪明，没用几个月，就设计出了万吨水压机的图纸，而且比外国的那几座还先进，不仅压力增加到12000吨，而且水压机的自身重量比外国的少1000吨，只有2000吨。图纸设计好后，全厂技术员工人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开始建造，其中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就不一一细说了，只说说水压机上的那四根粗大的钢柱吧。水压机一工作，逐级传递压力，最后压力达到12000吨，这山一样大的压力都集中到那四根钢柱上，四根钢柱推顶着压头锻压钢件。可见钢柱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了。钢柱制造质量不过关，锻压中钢柱破裂，那这水压机就成废品了。那么四根钢柱如何制造呢？由于工艺方面的限制，只能分段造出钢柱，然后再一根根焊接起来。焊接工艺的要求是，焊接出来的四根钢柱每一根都要像完整锻压出来的那样光滑、坚固，稍差一丁点儿，钢柱就会在压锻中断裂。谁有这样的本事，把分成几段的钢柱变成宛如整体锻造出来的一根钢柱，只有鬼斧神工才能办到。

指挥部把全上海最好的焊工排了队，排来排去，认为只有焊接之王唐师傅才能胜此大任。这唐师傅貌不出众，语不惊人，平日里只是埋头苦干。由于他为人好，技术高，江南造船厂上上下下几千人，都尊敬地叫他唐师傅，他的真实姓名倒没有几个人知道。唐师傅被指挥部用轿车接去，总指挥请他担任焊接钢柱的任务。唐师傅既没有说出一番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写什么决心书，只是轻轻点了点头，便一头回到车间干起来。

其实，唐师傅何尝不知道自己一点头，万吨压力便担到肩上了。只是他觉得多说不如实干，回到车间，他先让天车吊了两根类似的钢柱试焊起来，结果很不理想。他知道用平常的焊接方法是不行，必须要找出一种新焊接法。于是他找专家，查资料，访朋友，做试验，半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但新的焊接法终于给他找到了。他在试验用的钢柱上一焊接，果然效果很好。总指挥部为了检查这种新焊接法的可靠程度，调集几十台巨型拖拉机，分别把两段焊件往两头拉，拉力合起来也差不多有万吨了。结果拉拽半天，焊件纹丝不动，后来检查，焊接处毫无丝毫断裂的痕迹，人们禁不住把这位唐师傅抬起来，向他欢呼祝贺。

有了这种新焊接法，四根钢柱很快焊接好了，根根平滑如镜。试机那天，只听总指挥一声号令：“开机！”水压机顿时一阵轰鸣声，四根钢柱推顶着压头缓缓地压下来，几百吨烧红的钢件如面团一样任由水压机的压头揉搓，成为锻件，摄影灯亮成一片。经检测，水压机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世界第五座万吨水压机试制成功。

消息传来，上海各界人民纷纷去江南造船厂向工人阶级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也组织医生、护士前往江南造船厂慰问工人。年轻的外科医生陈中伟放下显微镜也准备报名前去，院长说：“你不要去了，抓紧时间攻下显微外科。”陈中伟一听，只好不去，又趴在显微镜上练习接人体肢体上的血管、神经、肌肉。陈中伟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没有几年，还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他就非常注重解剖学，尤喜研究人的细微血管、神经的分布情形及联接的办法。这种手术，必须借助显微镜的帮助，所以也叫显微外科。陈中伟的志向是，终有一天，要攻克断肢再植这个技术难题。为了这个奋斗目标，陈中伟已练习了多年，并且和医院一起，设计制造了一整套这样的手术器具。1963年的一月，正是一年中最为冷的时间，按照国家的规定，黄河以南城市居民和办公室都不得装暖气，上海自然也不能例外。这里是江南，冬天天气比北方暖得多，但屋子却很阴冷。陈中伟在这样的冷房子里反复做着试验，手冻得有点不听使唤了，便放下器具，搓搓手，到锅炉间去烤烤手，烤暖和了又准备接着做。

突然，走廊里响起了铃声，这是有重大外伤病人急需抢救的信号，陈中伟急忙往急救室跑去。只见急救室的床上躺着一个青年工人，脸色煞白，已疼得昏死过去。他是个冲床工人，今天在操作时不慎被冲床齐齐切掉左手，一位老工人在随其他人护送他来医院时，把他被切掉的左手也带来了。陈中伟接过手来，感到手还有些温气。

外科主任和院长、医生们讨论怎样抢救这个病人，当然最简单的办法是对伤口清洗包扎，让其愈合。还有一种办法是把手接上去，但是这谈何容易，国内外都没有这样的先例。院长看看陈中伟说：“陈医生，你的意见呢？”陈中伟觉得自己经过数年的苦练，已基本掌握了显微外科这种技术，病人的手切得很齐，又保护得很好，正是施行断肢再植的理想病例，便点点头说：

“接！”院长立即下令：“陈中伟主刀，全科医生参加，立即施行手术。”命令一下，手术室红灯骤亮。无影灯下，护士们各就各位，医生们站立一旁，进行配合。这种情形，和打仗是一模一样的。无论官位大小，年龄高低，在手术室里大家都得听从主刀医生的命令。陈中伟在显微镜下把病人的断肢对到一起，开始接起血管来。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比登天还难。人手上的大小血管不知有多少根，有的血管细如发丝，要把这样小的血管接到一起，让血液像原来一样畅通无阻，这该有多难！还有神经、骨头、肌肉、皮肤，陈中伟在无影灯下做了整整一天手术，才把手接上。好在手术室内有暖气，不然手早就冻麻木了。

手术结束以后，由于疲劳和紧张，陈中伟倒在床上，一下子睡着了。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就跑到病房去，观察病情。只见病人的手开始肿胀，陈中伟暗叫一声“不好”。断肢再植最怕的就是断肢发生肿胀，如果不能消除肿胀，断肢最后就会变黑坏死，那样的话，就得又动手术切除坏死的断肢。不仅会给患者带来精神上沉重的打击，而且还会使这门年轻的医学学科夭折。但是祖国迫切需要这门学科，人民迫切需要这门学科，军队也迫切需要这门学科。想到这里，陈中伟暗自说道，无论如何，也要使这次手术成功。

陈中伟仔细地检查了患者的再植手，回忆了手术的全过程，认定手术没有问题，病人的手肿胀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好在以前他对术后病人再植肢体发生肿胀时的医疗作过深入的研究，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办法，现在这些办法都可以派上用场了。在他的建议下，科里成立了特别护理小组，陈中伟亲自指导检查护理工作。食堂专门为病人做了医疗饭菜，配合特护工作。不几天，病人的断肢手的红肿开始消退，伤口也逐渐愈口，在陈中伟的指导下，病人逐步开始活动手指关节。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中国首例断肢再植手术成功了！病人的伤口已完全愈合，手指关节活动功能也恢复得很好。但是，陈中伟仍不放心，他还要检验一下病人再植断手的承重能力。试验的办法很简单，也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办法，那就是在桌子上摆上四块各为一公斤、二公斤、三公斤、四公斤重的铁块，铁块上焊有提手，让患者依次去抓。

中国首例断肢手术成功的新闻已经被报纸电台广播报道，这时记者们听说再植断手要进行承重测验，纷纷赶到医院要进行采访。科主任劝记者们不要采访，陈中伟知道科主任怕测试失败，断手被拉下来，当众出丑。但他自己心中有数，对科主任说：“让他们来好了，我有把握，测试保证成功。”记者们听了欢呼一声，架好电影摄录机、照相机，开始准备采访。

没想到，在此关键时刻，患者却怎么也不肯接受测试，患者的几个家属在病床前站成一排，大叫大嚷，怎么也不肯让科主任和陈中伟接近。记者们听到病房里的叫嚷声，不知出了什么事，纷纷跑进来。只见患者的亲属嚷叫道：“我们求求你们，别让他去抓铁块，好不容易手长上了，要是叫铁块拉下来了怎么办？不行不行，你们走吧。”一个亲属竟然要跪下来给陈中伟叩头。科主任和陈中伟万没想到测试工作会在这个地方出毛病，如果顺应患者的要求，停止测试，记者们可都等在这里，消息传出去，会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也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怎么办呢？陈中伟急得在地上走来走去。蓦地，他的眼光停留在病床上的一张《人民日报》上，那上面赫然登载着一条通讯《舍身滚雷，开辟通路——记战斗英雄罗光燮同志》，他心头顿时一亮，有办法了。他拿起报纸对患者和亲属说：“不测试也行，但你们得回答我一个

问题。你们想必都看了这张报纸了，罗光燮为了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舍身滚雷，英勇牺牲。还有一些解放军战士受伤致残，如果我们能为他们实施断肢手术，让他们能重新拿起武器打敌人，你们肯定会赞成吧。”患者及亲属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啦。”陈中伟脸色严肃起来：“那你们就得好好地配合治疗，发展祖国的显微外科，为人民更好地服务，医生有责任，患者也有责任啊！难道你们就不愿意为此作出贡献？我想这肯定不是你们的意思。”患者及家属都同意地点点头，患者的母亲犹豫地说：“可是——”陈中伟笑着打断她的话，把X光片子举起来解释说：“你们应该相信我，请看片子，患者的骨头已完全接起来了，负重度超过四公斤的重量，完全不会发生你们担心的情况。我能把断手接好，当然了解断手生长的情况，你们就放心吧。”患者和家属望着面前的这位神医，信赖地点头同意测试。

断手再植手的负重测试开始了，测试室里一片紧张气氛。患者在陈中伟的指导下，先抓起了一公斤铁块，顿时，人们一阵欢呼，摄影灯、镁光灯闪得人们睁不开眼睛。接着，患者又抓起了二公斤、三公斤重的铁块。在要抓四公斤铁块时，陈中伟突然命令：“停！”众人吃了一惊，不知发生何事。陈中伟命令X光摄影师透视患者的腕部，他看着屏幕上的图像，把记者和患者亲属叫过来说：“你们看看，患者的腕部完全正常，没有丝毫损伤的痕迹。”记者和亲属们看去，果然如此。随后，陈中伟指导患者抓起了四公斤重的铁块，记者们赶忙拍摄，患者抓着铁块停留了一分钟，随后轻轻放下。陈中伟再用X光机透视检查，患者腕部依然正常。这时，测试室里发出阵阵欢呼声，记者们赶回去发稿去了。患者及家属涕泪横流，向陈中伟等医生护士们连连感谢。

中国首例断肢再造手术完全成功，上海市卫生局专门拨款成立了进修班，调集上海的优秀内科和外科医生向陈中伟学习断肢再植手术。陈中伟又要当医生，又要当教师，忙得团团转，不过心里却很愉快，总算能用自己的技术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了。

一天，陈中伟正准备到进修班讲课，突然一辆吉普车开到楼门口，车上下来几位军人，一位军人口气生硬地拦住他，问道：“你是陈中伟大夫吗？”陈中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答道：“是的。”那位军人命令他：“我们是警备区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说完，他招招手，那几位军人走过来，把他向吉普车拥去。

究竟陈中伟这一去是福是祸，且看续回。

第五十四回 学雷锋中华多楷模 爆核弹楼兰尽英雄

话说陈中伟被几位军人拥向吉普车，陈中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愿意上车，和那几位军人争执起来。忽然，又一辆军用吉普车驶过来，车上下来一位中校。他见此情景，立即喝住几位军人：“你们这是在干什么，怎么对陈大夫这么没有礼貌，赶快向陈大夫道歉。”那位领头的军官立正答应了一声“是”，随即向陈中伟道歉：“陈大夫，我们一直想着赶快完成任务，生怕你被别的单位抢走，所以想赶快把你抢上车，到车上再给你慢慢说，所以——对不起，请你原谅。”大家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中校一面笑一边批评他们：“以后不许这样，对专家要有礼貌。”科主任从车上下来摆摆手说：“好啦，不要批评战士们啦。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许多医疗单位都在抢着要中伟去指导。要慢一点，可真要叫别人给抢走了。唉呀，不好，又一辆小卧车开过来了，准是抢中伟来的。中伟，快上车，到车上我给你说。”中校一听，也紧张了，赶快一挥手：“上车。”

汽车开出了医院，科主任才慢慢对陈中伟说：“警备区接受了中央军委的一项紧急任务，为全军开办断肢再植手术进修班，特请你去讲课。现在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包围着我们，中央立足于大打、早打，部队急需培养出大批能掌握断肢再植手术的军医，这是一项重大战备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好噢。”陈中伟点点头，严肃地答应道：“请组织上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在陈中伟的指导下，断肢再植手术在全国迅速地推广起来。上海警备区和第一军医大学也不断接待全军来上海进修的军医。这时世界很不太平，北面苏联重兵陈兵边界，南面美国侵略越南的战火已烧到河内，西面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东面美国机动部队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大海游弋，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多次派股匪窜扰大陆。上海市正是中国东部门户，战备任务十分紧急，上海市警备区举办的军医学习班也是战备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按照中央军委的部署，上海市警备区不断地把战备落实情况上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

罗瑞卿继任总参谋长后，公安部部长一职由谢富治上将担任。罗瑞卿到总参后立即到各部队进行视察。全军在林彪元帅的倡导下，正在学习毛泽东著作，抓活的思想工作。全军指战员通过学习毛泽东著作，确实很大程度地提高了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但罗瑞卿也发现，由于林彪提倡的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违反认识论规律的学习方法，部队中学毛选的活动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战士不是去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而是背诵其中的个别句子以解决什么“活的思想问题”。这样下去，势必会造成一些人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情况。特别是一些部队只顾抓学习，放松了军事训练。部队不掌握军事技能怎么能打仗呢。于是他一面要求全军加强军事训练，一面思考着怎样推动全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这天，他批阅了各部队送来的一些战备工作报告，站起来伸伸腰。秘书兴冲冲地进来了，把一份报纸递给他。罗瑞卿接过报纸，原来是沈阳军区的《前进报》，上面登着一篇通讯，介绍军区某部班人雷锋的事迹。他工作忙，没有时间细看报纸，秘书也知道这一点，没等罗瑞卿询问，便报告起雷锋的其人其事来。

说起来也许人们不信，这位鼎鼎大名的雷锋实在是貌不出众，只有1米54厘米的个头儿，不要说在东北，就是在他的家乡湖南省也绝对属于小个

儿。1959 年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荆营长去接兵时，实在不愿意要这个小工人。可是雷锋执意要参军，而且对荆营长哭讲了自己的血泪家史，荆营长才知道这位小工人当兵的目的。

雷锋本是湖南省望城县人，生于 1940 年，正是日本侵略军横行中国的苦难岁月。1944 年冬，日本侵略军下乡扫荡，雷锋的父亲雷明亮被日本军队抓去作民伕，雷明亮寻机逃跑，不幸被发现抓回。日本鬼子把他痛打一顿，扔在山上不管了。鬼子撤走后，雷明亮被乡亲救回，终日咳血拉血，没有几个月便含恨而亡。雷锋的母亲为生活所迫，到长沙城里地主谭四滚子家作缝工。这年，雷锋的母亲不过二十多岁，正是青春年华，又生得秀气，竟被地主儿子强奸。雷母含羞忍辱回到村里，1947 年中秋节悬梁自尽。

雷锋失去双亲，成日在外流浪。望城县解放后，区农会从外面把他救了回来，这时的雷锋满身疥疮，骨瘦如柴，区长拨出公款，为他治病，供他上学，初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乡政府当了通讯员。后来响应国家号召，他又去团山湖农场当拖拉机手，1958 年自愿支援鞍山建设，来到鞍钢，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讲到这里，雷锋哭着说：“党比我母亲还亲。旧社会，面对黑暗势力的压迫，母亲只有泪淋淋。到了新社会，党教会了我闹革命，使我入了团，我一定要参加解放军，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荆营长听了雷锋的家世，非常感动，一拍大腿：“你当兵的事定了，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雷锋参军后，汽车团让他开苏联进口的嘎斯车，他不仅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运输任务，而且还利用不出车的间隙时间为人民群众多做好事。他是个战士，每月津贴只有 6 元，他用这点津贴费买了毛泽东选集、鲁迅著作、革命英雄传记等书，剩下的钱都攒起来，两年多攒了 200 多元，全部寄给了灾区……

罗瑞卿听着秘书的汇报，眼里噙含着热泪，心里想着，多好的战士啊，他的精神代表着时代的精神，是解放军优良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光大。想到这里，罗瑞卿命令道：“快向沈阳军区传达我的命令，请雷锋同志进京向驻京部队作报告，我们现在正需要这样的一个好典型来推动部队的军事建设和政治建设。”秘书沉痛地说：“罗总长，我无法执行你的命令，雷锋同志已于去年、也就是 1962 年 8 月 15 日，在指挥助手倒车时，助手不慎撞倒电线杆，杆子正好砸在雷锋头上，抢救无效，光荣牺牲。”罗瑞卿一下子站起来，追问秘书：“什么？已经牺牲了？”秘书点点头，罗瑞卿一言不发，笔直地站着，为烈士默哀。

忽然，电话铃声大响，秘书接过电话，听了几句，捂住话筒，向罗瑞卿报告道：“罗总长，解放军报总编辑赵易亚来了电话，他们准备转载前进报的文章。”罗瑞卿说：“我来跟他说。赵易亚吗？我是罗瑞卿。前进报的文章你们就不要转载了，把作者陈广生请到北京来，让他带上材料，重新写一篇大文章在军报发表，好好向全军介绍一下雷锋。”

过了几天，《解放军报》又给罗瑞卿打来电话，报告陈广生——雷锋生前所在团俱乐部主任已经到了北京，带来了雷锋日记。日记写得很感人，只是扉页上有姑娘的题赠，有点“那个”，请示罗总长怎么办。”罗瑞卿听说雷锋日记的扉页上有点“那个”，不禁对“那个”产生了兴趣，命令不许撕掉“那个”，让陈广生带着日记立即来总参，他要亲自看看这个“那个”。

解放军报派人陪陈广生到罗瑞卿办公室，罗瑞卿翻开日记的扉页，只见

扉页上写着：

亲如同胞的小雷弟弟：

你勇敢聪明，有智慧，有远见，思想明朗，看问题全面，天真活泼，令人可爱。你有外在的美和内在的美，对任何同志都抱着极其敬仰的心情……这一切结合起来，才算得上我心爱的弟弟。

弟弟，你值得人羡慕的还多着哩，是青年中少有的，在建设社会主义中是会做出很大的贡献的。你的干劲和钻劲使你勇往直前。希望你在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中，把自己全部的光和热献给全中国、全世界，让人们都知道你的名字，使人们都热爱你、敬佩你。弟弟，希望你实现做姐姐的理想。

在临别之前，要把我内心的千言万语说完是办不到的。

我是不愿意弟弟离开的。但祖国的钢都需要你和等着你呢。

弟弟，前进吧！前进是伟大的，光明的。姐因文化程度太低，不能把我内心想说的都写出来，只好就此搁笔。你姐黄丽

1958.11.9

罗瑞卿看完题赠，问陈广生：“这位黄丽是个什么样的姑娘？”陈广生回答道：“我问过雷锋，黄丽是湖南望城县城里的一个供销社营业员，个头和雷锋差不多，长得很俏，人都喊她俏妹子，后来和雷锋一起到团山湖农场，又都编在一个团小组。为人性情开朗热情，工作负责，服务态度好。”罗瑞卿叹息一声：“可惜啊——”

陈广生听罗瑞卿叹息一声，心里不禁往下一沉。解放军报的同志小心翼翼地问道：“罗总长，是不是这篇文章就不写了？”罗瑞卿一下子站起来，批评道：“什么？不写了？糊涂！我说可惜，是可惜雷锋同志已经牺牲，不然的话，我要极力促成这件好事，而且要亲自主持他们的婚礼。你们看看，扉页上的题赠写得多么好啊，你们搞宣传的要注意，不要把先进人物当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那样的神在地球上是不存在的，也是人们无法学习的。你们看《人民日报》以前对王崇伦的报道写得多么好，他们写出的王崇伦是一个活生生的先进人物，原来也有缺点，在党和组织、群众的帮助和教育下不断进步，开始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神圣使命，千方百计提高生产效率。人们看了这样的报道，马上就可以去学，结果在整个社会上都激起了劳动竞赛热潮，你们应该好好向《人民日报》学习。”陈广生等人齐声答应一声“是”，便都告辞，罗瑞卿作个手势说：“等等。”说完，他立即铺开一张宣纸，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在宣纸上写了五个大字“伟大的战士”。罗瑞卿把题词交给陈广生等人说：“我等着看你们的大文章。”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得知《解放军报》要发表长篇通讯《伟大的战士》，也忙组织记者进行采访。这时毛泽东已得到罗瑞卿的关于雷锋事迹的报告。经他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发布命令，命名雷锋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吴冷西向毛泽东建议，请他为学雷锋活动题词，毛泽东欣然答应。几天后，即1963年3月2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吴冷西，毛主席的题词已写好，请他去取。吴冷西急忙赶到中央办公厅取来了题词，急命制版。3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最显著位置刊出了毛泽东题词手迹“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又刊出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手迹，一个学雷锋的热潮顿时在中华大地热气腾腾地掀起。

中华民族本来就有优良的道德传统，学雷锋活动又使优良的道德传统进一步升华，急公好义，舍生救人，艰苦奋斗，崇尚节俭的优秀人物层出不穷。

勇救战友壮烈牺牲的工兵班长王杰，舍身救旅客列车的钱塘江桥哨兵欧阳海，勇拦惊马英勇捐躯的炮兵战士刘英俊，在小学课堂里辛勤耕耘的女教师斯霞……群星灿烂，不胜枚举。真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华大地，人们互相关心蔚成风气。神州万里，干群守责尽职更多美德。

学雷锋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中央领导人也没有例外。说来也许人们不信。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丰泽园，房里没有一件多余的摆设，他睡的床是几块木板搭起来的，被褥也都是普通的白布布面。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里竟然没有一张沙发，后来毛泽东知道后，让中办给做了一个。此前，我国外交部送礼没有经验，常送客人一些贵重的生活品，毛泽东知道后发了脾气，批评外交部：“送礼不要大手大脚。送生活用品，既花钱，又没有纪念意义。有的外国人来看我，送我一根孔雀毛，我看就很好。宴会也是，动不动燕窝鱼翅。上次一个客人来看我，我请他吃饭，就是我那几个菜，再加上几个菜，客人吃得还很满意。外交礼品和宴会必须改革，少花钱，办好事。”

俗话说上有好焉，下必效之，中央常委这么艰苦奋斗，部长将帅们也个个勇挑重担。就拿聂荣臻来说吧，前些年身体不好，邓小平准备安排他担任北京市长，聂荣臻偏偏挑中了造核弹和导弹的重要工作。谁不知道这项工作辛苦风险大，还经常要往戈壁滩上跑，但聂帅毅然主动请缨，勇挑重担。在他的领导下，两弹的研制工作进展很快。聂荣臻向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满意极了，连连向这位留欧时的老同学表示祝贺。随后，邓小平向中央常委作了汇报。因为邓小平要主持和苏共的论战，不久即将出访苏联，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制造两弹的专业委员会，陈毅、聂荣臻、李富春、张爱萍、罗瑞卿都是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员。

专业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直接主管两弹的研制工作。邓小平抽身出来准备出访苏联。先是赫鲁晓夫压中国同意苏联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努力失败，中国拒绝当苏联的附庸，赫鲁晓夫恼羞成怒，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从1962年到1963年，赫鲁晓夫又接连在东欧五个兄弟党的代表会议上策动攻击中国，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公开论战，迫使中国不能不对此作公开的答辩。接着又发生了苏联策动中国边民大量外逃的伊塔事件。在不久前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战争中，苏联又公开袒护印度，把中苏分歧公布在全世界面前，中苏关系跌到了谷底。

为了在和美国的核武器谈判中多一张牌，1962年9月，赫鲁晓夫决定由即将返任的驻华大使契尔年科给毛泽东带去一个口信，建议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1963年春节后，毛泽东接见了契尔年科，同意在莫斯科会谈，并决定邓小平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彭真为副团长，团员有杨尚昆、伍修权、刘宁一、康生、潘自力。

1963年7月4日，邓小平率团去莫斯科会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去机场送行，足见中共中央对邓小平此行的重视。经过半天多的飞行，飞机于下午3时在莫斯科机场徐徐降落。此日，莫斯科天气阴沉，雨雾迷漫，机场上冷冷清清，只有200多个中国使馆人员和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手持鲜花，表情严肃地迎接代表团的到来。

飞机停稳后，邓小平走下舷梯，和迎上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意识形态专家苏斯洛夫握手，双方谈谈“今天天气……”，然后驱车去莫斯科的列宁山宾馆。

赫鲁晓夫刚从东德回来，正在列宁山上的别墅里检点从东德带回的礼物，柯西金进来报告说：“赫鲁晓夫同志，邓小平已经来了，你见不见他？”赫鲁晓夫一听“邓小平”三个字，身子一抖，立即想起了1957年毛泽东二赴莫斯科时讲过的一段话。那次邓小平也参团来到莫斯科，在欢迎宴会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赫鲁晓夫顺着毛泽东指着的方向望去，看见邓小平应对自如地和大家碰杯。毛泽东说：“他的名字叫邓小平，非常聪明，前程远大。”赫鲁晓夫知道毛泽东的这话不是随便讲的，从此记下了邓小平这个名字。现在他一听毛泽东派邓小平来会谈，不由得有点畏惧，连连摆手说：“不见，不见。”柯西金问道：“尼基塔，你是不是怕那个邓小平？”赫鲁晓夫恼怒地训斥道：“柯西金同志，我不许你用这种口吻对我说话。”

在列宁山宾馆，中苏两党开始会谈。苏斯洛夫一开始就指责中国共产党攻击伟大的列宁缔造的党，苏共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紧跟着攻击中国政府不尊重苏联。他们发言的时候，邓小平抽着烟，不动声色地听着。他们讲完了，邓小平掐灭烟头，质问他们：“好，咱们就从这个问题谈起吧。当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你们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立场上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自卫斗争，甚至连最起码的公正也不要了，公然运送武器给那个资本主义国家。我看列宁这把刀子你们丢得差不多了。你们说中国政府不尊重苏联，请问，是谁要在中国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是谁在中国边境煽动边民外逃，不就是你们苏联吗？难道这也算是尊重中国的表示吗？现在你们正和美国、英国谈判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完全是针对中国的，想捆住中国的手脚，难道这也是尊重中国的表示吗？要想解决问题，你们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立场上来。”苏斯洛夫和安德罗波夫被驳得哑口无言。从宾馆出来，安德罗波夫和苏斯洛夫向汽车走去。苏斯洛夫问道：“安德罗波夫同志，你对这位小个子印象如何？”安德罗波夫摊开双手，耸耸肩膀，无可奈何地说：“邓小平这个人，太厉害，最好不要惹他。”

中苏两党会谈，由于苏共中央坚持错误立场，对会谈毫无诚意，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不过，他们也尝到了邓小平的厉害。7月19日晚，苏共中央举行宴会，为中共代表团送行。赫鲁晓夫想了好一会，去不去呢？去吧，怕应付不了邓小平，不去吧，明摆着是怯阵。想到最后，还是决定硬着头皮去赴会。在宴会开始前几分钟，赫鲁晓夫匆匆走了进来。宴会开始，赫鲁晓夫过来和邓小平碰杯，邓小平举起酒杯说：“我们打了九年的交道，看来以后来往的机会不多了。如果我有幸再来莫斯科的话，怕是见不到你了。我们好好喝了这杯酒吧。”赫鲁晓夫放下酒杯，敌意地说：“为这，我是不喝的。我是苏共中央总书记，现在是，以后也是！”邓小平淡淡地笑笑说：“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率团回国时，苏联开动了一切宣传机器，指名攻击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仅苏联一级报纸就发表攻击文章一千多篇，地方加盟共和国级报纸发表攻击文章七百多篇。

中苏公开论战不可避免。

邓小平回到国内后，立即主持中苏论战工作。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准备

发表九篇长篇评论，和苏共论战。这个时期，邓小平也不时过问两弹的制造工作，聂荣臻也不时把进展情况报告给他。这样转眼就到了1963年9月。一天，邓小平正在思考九评的撰写工作，忽然电话铃声响起来，邓小平拿起电话，聂荣臻激动的声音传过来：“小平同志，报告你一个好消息，邓稼先同志已经在原子弹总装方案上签了字，我们的原子弹马上就要在西北马兰总装了。”邓小平问道：“报告总理了没有？”聂荣臻在电话里回答说：“报告了，总理指示让我再向你报告。”邓小平感佩地说：“老同学，总理总是那么对人体贴入微，真让人感动。”话未完，总理的电话来了，问他有没有时间来参加专业委员会会议，邓小平连忙回答道：“总理，现在我正忙着九评的事，实在无法为你分劳。”

周恩来得知邓小平不能前来参加专业委员会，便让秘书通知陈毅、贺龙、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钱三强、彭恒武、王淦昌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专业委员会会议。还有两天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四周年，天安门广场上华灯齐亮，国庆游行队伍正在天安门前的大道上进行彩排。将帅们和科学泰斗们从前门那里绕道过来，进了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总理已在北京厅等着，迎候前来开会的人们。

人都到齐了。秘书提示开会的时间到了，周恩来看看自己戴的国产上海表说：“再等等，主角还没有到呢？”

正当周恩来在北京厅说“主角”还没有到时，北京西郊机场跑道灯已全都打开，一架喷气式客机轰鸣着降落在跑道上。飞机刚刚停稳，几辆高级“红旗”轿车驶到飞机跟前。从飞机上下来两个人，一头钻进轿车，轿车随即飞快地向城里驶去，最后停在人民大会堂前。从飞机上下来的几个人紧步向北京厅走去。他们一推开北京厅的门，房间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掌声。周恩来走过来握住他俩的手，使劲地摇着：“李觉同志，邓稼先同志，你们辛苦了。”李觉抱歉地说：“我们来晚了，耽搁了总理的时间。我们在马兰抢做一个试验，试验做完了才上的飞机。”周恩来笑着摇摇他们的手：“你们这种分秒必争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好，主角到了，我们的会该开始了。请李觉同志和邓稼先同志先讲。”

李觉和邓稼先向大家汇报了原子弹的研制情况。周恩来问道：“主席很关心这件事，他要我问大家一下，明年能不能试爆。先请学森、稼先说，你们是行家，最有发言权。”钱学森想了想说：“可以，我可以保证明年进行试爆。”邓稼先接着说：“实弹组装明年年度一定完成。”周恩来一听点点头说：“好，我马上把大家的决心向主席汇报，我们一定要尽快造出原子弹，打破美国、苏联的核垄断。另外从现在起，要对马兰基地和核爆点现场进行清理。核爆场黄羊沟是古楼兰属地，地形复杂，气候异常，自古以来常有土匪出入，要防止潜藏的土匪破坏。”聂荣臻立即吩咐秘书给马兰基地司令张蕴玉将军打电话，立即组织部队清理核爆区，所需外围部队请新疆司令员王恩茂调配。周恩来看看表，立即下令：“从现在开始，立即进入一级动员状态，确保明年试爆成功。散会！”

会议一散，大家立即分头行动起来。李觉和邓稼先一头钻进汽车，赶往机场，乘飞机往马兰飞去。从北京到马兰的5000公里专用电话线讯号不断，马兰基地总机值班室里，几十个女话兵忙着接线，双手似翩翩而飞的彩蝶。

1964年5月，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总装成功。古楼兰国的戈壁滩上的核爆场立起了挂原子弹的120米高的铁塔。兰新铁路上一列又一列装载着核试

验用品的军列驰向吐鲁番，人员物资在那里下火车后，又装进大军用卡车星夜开往楼兰。每到夜晚，公路沿线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车队络绎不绝地源源向南开去。随着车队的不断到来，楼兰核爆场铁塔周围几十公里的地域内，放射状地布满了坦克、汽车、大炮、楼房、地下工事，楼房里和工事里放着装着各种动物的铁笼，一支骑兵防化部队在进行紧张的训练……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周恩来的指示，王恩茂调来一团骑兵部队配属给核爆场，担负清理核爆场的任务。骑兵部队以连为单位，反复清查，在沙漠深处发现了大股人群活动的痕迹。眼见试验日期越来越近，核爆场居然发现不明身份的人群，这还了得！张蕴玉紧急报告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毛泽东急命周恩来，加紧调派部队赶往楼兰，一定要弄清这些人的真相，清除隐患。周恩来得命，驰电王恩茂再调两个团的骑兵和一个飞行中队到楼兰执行紧急搜剿任务。部队急行军开到楼兰后，张蕴玉即成立行动指挥部，自任总指挥，指挥清剿工作。刚刚部署已定，忽接试验场通讯部队司令部电话，一个女兵班在出外接线时失踪。张蕴玉大惊，即命部队开始行动，并调来一批刑警配合行动。三个团的骑兵得令立即分兵清剿，沙漠里顿时人喊马嘶，沙尘飞扬。飞行中队也出动飞机在空中侦察。

周恩来得知核爆场女兵班失踪，估计楼兰潜藏有土匪，说不定还是青海、宁夏的马家军溃散的部队。他当即把这个估计告诉了张蕴玉要他限期破案，如果因此影响了核爆任务，唯他是问。张蕴玉满头大汗，日夜指挥清剿。这时离核试验的日期更近了。虽然具体日期还没有定，但月份已定下来，即今年，也就是1964年10月。

到底哪一天进行核爆炸，还有些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周恩来特别担心核爆烟云对环境 and 人民健康的影响，为此他连续召集专业委员会进行讨论，根据气象资料和其他准备资料，周恩来反复进行了论证，最后秘密决定把核试验时间定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2时。这前后三天，楼兰一带都是晴天。时间定下来以后，周恩来马上报告了中央常委。他回到西花厅以后，又写了封短简，装入信封，外面写上邓小平、聂荣臻、罗瑞卿的名字，请他们签阅。专门经办核试验文件的秘书知道，这是党内最高机密。在西花厅，除周恩来和一个经办秘书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事，连邓颖超也丝毫不知，所以他不敢让其他人知道，通过电话联系，直接找到首长本人，请他当面签名阅读。最后秘书向周恩来汇报了邓、聂、罗都已签阅了短简，并把短简呈上，周恩来很满意，夸奖了他几句。

说话间，就到了10月，核试验日期已经迫近。国防部副部长张爱萍上将要起身往楼兰主持核爆炸，行前和周恩来约定联络暗号，规定原子弹的代号为“老邱”。张爱萍走后，立即打来电话报告，核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周恩来严肃地通知他：“经中央决定，核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6日下午二时，中央要求核试验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张爱萍响亮地答道：“是！一定完成任务。”周恩来追问道：“核试验场那群可疑的人找到了吗？”张爱萍答道：“已经发现女兵班的女战士被害，估计是伙政治土匪，部队正在追剿中，估计很快可以抓获。”周恩来恼怒地说：“怎么动作这么迟缓？10月14日以前一定要解决问题。”张爱萍答应道：“是！”他听周恩来放下电话，赶忙督催剿匪部队清剿。

剿匪部队这时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连续发现被害的女战士尸体，搜索网立即向这一带收拢。三天后，剿匪部队终于在一个沙漠洼地里包围了这群

可疑的人，只见他们有一百多人，佩有机枪、步枪，个个面目狰狞。起初，他们还企图抵抗，当被骑兵部队的强大火力扫倒一大片，残存者只好投降。经审讯，这些土匪果然是过去西北的国民党马家军，兰州一役，马家军被一野歼灭，这股残余匪军遂潜入古丝道楼兰地区。女兵班的女兵被他们俘获后，横遭凌辱，有几个被他们活埋，剩下的几个也都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剿匪部队救出了女兵，找到烈士的遗体，押着土匪凯旋而归。张爱萍接到报告，一看日历，正是10月13日，是周恩来规定的最后期限，连忙拿起电话，要通北京。

周恩来得到张爱萍的报告，传令嘉奖剿匪部队。随后，他整理了一些资料。这时已到午夜，炊事员送来夜餐，大米稀饭，小笼包子，外加一盘花生米。这天，周恩来工作到第二日凌晨才睡。

10月14日，中南海举行核爆前的中央常委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核试验的准备工作，邓小平、李富春也参加了。周恩来汇报完毕后，中央常委经过讨论，通过了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制造核武器是为了打破美苏对核武器的垄断，是最终为了消灭核武器。核试验一成功，我们马上发表公报，建议世界各国首脑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即命令楼兰核试验场，把“老邱”挂到铁塔顶上，预备起爆。部队早做好了准备，一声令下，立即把三吨多重、3万吨梯恩梯炸药当量的“老邱”吊装在铁塔顶部的平台上。

1964年10月16日，这是一个注定要写进历史的日子。此日上午9时，周恩来、聂荣臻走进了核试验北京指挥中心。他们刚到，张爱萍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报告，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老邱’已经通电，请指示。”周恩来通知他：“中央已经决定零时定在10月16日北京时间15时，请你们立即行动，预祝你们成功。”

张爱萍得令，当即命令李觉将军和核试验专家坐着吉普车，指挥试验人员安装起爆装置。李觉等二人来到铁塔下，亲自指挥试验人员安装好起爆装置，随即指挥大家撤退，他最后锁死了登塔的小铁门，也坐车离开了。这时六十公里方圆的核试验场上，已经寂无人声，只有九十多项效应工程静静地摆在那里。

下午2时，张爱萍再次请示：“点火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请指示。”周恩来下了命令：“试验开始！”

按照预定方案，张爱萍和指挥人员进入了爆心八十公里外的前沿指挥所，他不断地发布命令，“取样飞机立即起飞。”“防化部队准备出动。”“准备点火！”“半小时准备！”14时50分40秒，张爱萍下令：“起爆！”起爆指挥员随即下令“开始起爆！”操作员立即开通主导传送开关，大声地报道：“10、9、8、7、6、5、4、3、2、1，起爆！”

操作员话刚落，大地突然猛晃了一下，位于地下的前沿指挥所骤然一亮。张爱萍看看表，正好是15时整。他走出指挥所，只见远处的铁塔不见了，一个巨大的恶魔从地下钻出来，在半空里摇晃着乌黑蓬乱的脑袋，狰狞可怕，沉闷的爆炸声似惊雷阵阵传来。

突然，一个军官跑出来喊：“张副部长，北京紧急电话！”张爱萍一惊，不知何事，急忙来接电话。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五回 焦裕禄尽瘁兰考县 陈永贵苦战狼窝掌

话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张爱萍迫不及待地跑出地下工事，用望远镜观察蘑菇云，忽然参谋跑来让他接北京电话。张爱萍赶忙跑进地下工事，拿起电话：“总理吗？我是张爱萍。”周恩来在电话中问道：“‘老邱’怎么样了？”张爱萍一字一顿地答道：“‘老邱’已经爆炸了！”周恩来不放心地追问一句：“你的确看清楚了？是‘老邱’爆炸了吗？”张爱萍严肃地答道：“是的，我刚才在山坡上亲自观察，确实是‘老邱’爆炸了，引起了巨大的蘑菇状的烟云。”周恩来说：“好，我马上向主席汇报！”

毛泽东这时已经起床，开始办公，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风趣地说：“我们要感谢赫鲁晓夫，要不是他撤销援助，激起了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我们很可能不会这么快就造出原子弹来。为此，我们要奖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说：“主席讲得太精彩了，我现在马上组织人起草公报。”

周恩来放下电话，马上把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他的夫人龚澎找来，要他俩起草公报。说起来，乔冠华和龚澎也算是周恩来的老部下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长期驻在重庆和国民党当局谈判，龚澎一直是他的英文秘书，乔冠华也一直负责国际形势研究，是周恩来领导的重庆公开出版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编委之一，两人都是不可多得的大才子。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他们遵照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写好了新闻公报。公报简略地报道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接着建议世界各国，立即召开国际会议，全面彻底地禁止核武器。在此之前，核武器国家都应首先作出保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不对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公报写好后，周恩来审阅了几遍，又送毛泽东审阅。正式定稿后立即召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和副社长穆青。吴冷西由于还兼着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所以新华社的具体新闻业务由副社长穆青分管。周恩来指示他们要立即把公报发表出去，并对具体发表工作提了一些要求。

吴冷西、穆青接到指示后，立即布置新华社国内部发通稿，《人民日报》出号外。10月17日清晨，解放军驻京部队出动了大量卡车运载专刊新闻公报的《人民日报》号外到市内各处。五点一刻，所有卡车上的军人和报社工作人员一齐发放号外。北京市民对中国制造原子弹的事毫无所闻，骤然看到号外上用头号大铅字套红印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又惊又喜，拥到卡车跟前索要号外，先睹为快。

这天晚上，周恩来又是一夜没睡，直到听取了吴冷西关于发放号外的报告后才回到卧室去休息。邓颖超这时已睡醒，准备到院里的菜地里锄锄草，周恩来拦住她：“你先别走，我告诉你一个天大——不，比天还大的好消息。”邓颖超感兴趣地问：“比天还大？那是什么好消息啊？是不是越南南方人民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不对。解放军大比武又出了新成绩？也不对。庄则栋已经拿了两次世界冠军，莫不是他又拿了世界冠军？也不对。比天还大？这是什么好消息呢？你快告诉我吧。”周恩来笑嘻嘻地说：“我告诉你，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了！”邓颖超不信地摇摇头：“你别逗我了。”周恩来着急地说：“我不骗你，是真的呀，你看新闻公报。”邓颖超接过公报，一目三行地溜了一遍，又喜又嗔地说：“恩来，你真会保密呀。这么大的事，就没有听你说起过一句。”周恩来摊开双手：“这你可怪不到我头上，工作

上的事互不干涉，这可是在广州结婚前说好了的。”邓颖超打了一下他的手说：“跟你闹着玩呢，你就给个棒槌当针（真）啦，快睡觉去吧，这几天事肯定少不了。”

还真让邓颖超说准了，周恩来躺下不到两个小时，秘书把他叫醒了，周恩来知道发生了非常事件，急匆匆来到办公室。只见办公室里坐着好几个人，其中有吴冷西和穆青。周恩来进来，他们一齐站了起来，不等周恩来发问，吴冷西急忙报告：“总理，据外电报道，赫鲁晓夫下台了。”这回轮到周恩来又惊又喜了，连忙招呼大家坐下，让新华社和外交部详细汇报这件大事的来龙去脉。

原来新华社和外交部早就注意到了苏联政局的异常变化。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又让他们预感到苏联最高领导层将要出现戏剧性的变化。那是10月11日，苏联“日出号”宇宙飞船将在这一天升空，贝克尔尔宇航中心气氛紧张而宁静。宇航员科马罗夫上校进入飞行舱后，在克里母林宫通过电视观察发射的赫鲁晓夫立即给他打来电话：“科马罗夫上校，祝你们顺利，你们将受到人民的欢迎和尊敬。”科马罗夫上校望着面前屏幕上赫鲁晓夫的圆圆的光脑袋说：“谢谢你，赫鲁晓夫同志。”

科马罗夫上校正想放下电话，忽然坐在赫鲁晓夫身边的苏共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讲话了：“科马罗夫上校，当你们回到地面上来的时候，我将亲自迎接你。”赫鲁晓夫不满地看了勃列日涅夫一眼，快地走开了。这一切自然没有逃过科马罗夫上校的眼睛，勃列日涅夫的话总使他感到其中大有文章，“我亲自……”，这口气给人的印象，似乎苏共中央总书记不是赫鲁晓夫，而是他勃列日涅夫。科马罗夫想到这里，不敢再往下想。发射的时间到了，他按照控制中心的指令，开始打开发射装置，“轰隆”一声，火箭慢慢地升起来……

科马罗夫不敢往下想，可世界各国驻苏记者和外交官都在拼命往下想，他们都得到本国和本新闻机构的指示，日夜监视着苏联政局的变化，新华社和中国大使馆自然也未能例外。

“日出号”飞船进入太空后，第二天赫鲁晓夫便去皮宗达海滨别墅休养。要在往日，他走到那里，请示工作的电话便会跟到那里。但这次却见鬼了，他来皮宗达一天一夜，竟然没有接到一个电话，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袭上心来，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决心天一亮就飞回莫斯科去。

但是，已经晚了。第二天，也就是10月13日，还没等赫鲁晓夫起身，几个武装军人走进来，板着脸命令他：“立即穿好衣服，跟我们回莫斯科！”赫鲁晓夫大叫大嚷地抗议说：“为什么？你们根据谁的命令敢这样对我说话？”那几个军人也不答话，架起他就走。飞机在莫斯科机场降落以后，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哈斯特内把赫鲁晓夫迎进车内，汽车往克里母林宫急驰而去。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厅里戒备森严，委员们都已在桌子周围坐好。赫鲁晓夫一进来，苏斯洛夫二话不说，立即提议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苏斯洛夫话音刚落，全体委员都举起了手，赫鲁晓夫这才明白，勃列日涅夫把什么都布置好了，但后悔也没有用了。不知不觉地，赫鲁晓夫自己也举起了手，为中央主席团解除自己的职务投了一票，留下了历史的一个大笑话。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感到这是改善中苏关系的一个机会，便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说了，毛泽东立即赞成，指示吴冷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

表达了中共希望中苏两党在伟大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愿望，并派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率团出席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的典礼。苏联方面一看周恩来率团而来，也非常重视，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苏维埃主席米高扬三人亲自出面接待。但会谈中周恩来发现，苏联新的领导集团没有丝毫纠正错误的意愿。非但如此，在 11 月 7 日庆祝俄国十月革命的苏联国宴上，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竟对贺龙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了，你们也可以把毛泽东搞下去嘛。”贺龙当即提出抗议，并当场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马上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最严重抗议，并立即决定率团返国。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后，毛泽东走上前去，把一束鲜花送给周恩来，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眼光里充满了信赖和感谢。随后，周恩来又和前来迎接的刘少奇、朱德握手，新华社记者的相机“咔嚓”“咔嚓”地响着，拍下许多照片，送回新华社总社。

当天，穆青在新华社工字楼二层的办公室里，审阅记者采写的新闻和照片，他最后挑定一幅周恩来怀抱鲜花，和毛泽东亲切握手，刘少奇、朱德站在他们身边面带笑容的照片，对文字解说和新闻通稿作了仔细的修改，然后交值班室发出，供全国报纸刊登，电台播送。

穆青是河南杞县人，抗战时期来到延安，进了解放日报社当了一名记者，以后曾任新华社特派记者、华东分社社长、总社国内部主任，前几年提升为新华社副社长。这一段时期事情特别多，而且都是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大事，原子弹爆炸，新华社巴西分社和中国驻巴西的机构的九名同志被巴西政变当局逮捕，中苏会谈再次破裂，还有越南、柬埔寨的局势的重大变化，江青搞的革命现代戏汇演，批杨献珍、孙冶方，批坏戏坏电影，哪样能离开新华社的报道，所以穆青这段时间特别忙，头发也掉得厉害。

正忙之间，河南老乡、新华社名记者冯健走了进来，对穆青说：“乡党，俺有件事要给你说说。”穆青忙放下稿子，把他让进里间。过了好长时间，里间的门才打开。秘书一瞧，两位河南老乡都哭红了眼圈，穆青还在用手绢按着鼻子。

秘书不知何事，也不好问。过了一段时间，穆青、冯健、周原三人去了河南采访，这时已经是 1965 年了。中共河南省委，《河南日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负责人听说穆青等三位大记者到来，立即派出小车，送他们去采访。穆青坐车来到一个烈士陵园，只见许多农民在一座烈士墓前哭拜，许多人泣不成声。穆青等一行肃立墓前，向烈士墓三鞠躬。

烈士墓的主人究竟是谁，何以引得上至省委领导，下至黎民百姓对他这么尊敬？说起来也平常得很，墓主人的名字叫焦裕禄，生前是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兰考县位于黄河故道上，涝、风、沙、碱四样东西是这里的特产，其环境恶劣，土质贫瘠，生活艰难可想而知。谁知焦裕禄就偏在这个穷得连老鼠也没有的小穷县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

焦裕禄是 1962 年冬天来到豫东兰考县的。这一年，兰考县连遭内涝、风沙、盐碱三害，灾情严重。县境内横贯着两条黄河故道，平沙茫茫黄入天，风起沙走天皆暗。火车站上，灾民挤成一团，准备乘车外出逃荒。时值寒冬，大雪纷飞，朔风怒号，人们耐不住饥寒，哭声响成一片。

焦裕禄眼见兰考县这幅幅惨景，心如刀绞，刚放下行李，就步行到农村看望群众去了。他推开一户农家东歪西倒的柴门，走进冰冷的茅舍。冷炕上坐着一个老太太，冷不丁见一个雪人推门进来，招呼道：“你是谁啊？找谁

啊？”焦裕禄答道：“我是你的儿子，看你来了。”老太太也不推辞，应了一声：“那敢情好。”焦裕禄正要说话，老大爷推门进来了，老太太忙介绍：“这是咱的儿子，看咱们来了。”老大爷一端详，原来是个干部，挺面生的，看样子是从上面下来的大官，忙往炕上让。焦裕禄坐在炕沿上问道：“大伯，你说咱县怎么这么穷呢？”老人叹口气说：“你是上面下来的吧，你不知道啊。咱兰考县内有两条黄河故道，风沙漫天。黄河水退走了，可留下了盐碱，地里长不出东西啊。”焦裕禄说：“咱治住它，怎样？”老人说：“难啊。这故道经省跨县的，从哪里开始治？谁又肯豁上命带大家去治？”焦裕禄拍拍胸脯：“我带大家治，我是新来的县委书记，叫焦裕禄。”老人仔细打量了他一阵，点点头说：“我信你，这么大雪天你不在县委大院的砖房子里烤火，却一步一个雪窝往冷草房钻，就冲这，我信你。你要查风口，追水头，我给你当参谋。兰考，我熟。”焦裕禄逗道：“大伯，那可很苦噢，不能反悔呀。”大伯笑着边点头边说：“不悔，不悔。一定，一定。”

从这天开始，焦裕禄带着测量队，查风口，追水源，从本县查到外县，从本省查到外省，泥里滚，水里去，焦裕禄每天都滚成个泥人。眼看到了1963年的夏天，大雨倾盆，洪水满天。焦裕禄刚从外面考察回来，疲劳不堪，一见洪水，陡来精神，挥挥棍子说：“好啊，洪水送上门了，咱们正好查查水道。”说罢，拄着棍子，在没腰深的大水中摸索前进。

突然，焦裕禄感到一阵扎心的肝痛，不由得弯下了腰来按住肝部。原来焦裕禄患有慢性肝病，县委不让他带队调查，怕劳累加剧病情。焦裕禄坚决反对：“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毅然带队调查，现在果然肝区疼痛起来。就这样，焦裕禄不时用手扶扶肝部，在大水中踉踉跄跄地走着。就这样，焦裕禄带领调查队查清全县八十四个风口的风向和地形，给风口编了号，绘了图；查清全县有一千六百个沙丘，丈量了每个沙丘的大小，也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所有河流的桥涵也都查清了，绘了图。在此基础上，焦裕禄集思广益，领导制定了治三害的规划，一是广植树木，建立防护林带；二是疏通水道，让大水顺水道流进水库，干旱时可以引水灌溉；三是给沙地和沙丘“贴膏药”、“扎针”，就是种上草木，封死沙丘。由于任务明确，办法得当，县委一声令下，全县三十万人一齐行动起来，仅仅两年，居然大见成效。

可是，焦裕禄的肝病却越来越重了。兰考县的干部群众发现，焦裕禄无论走到哪里，总是把左手揣在怀里。开会、作报告时，他又总是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日子一长，他办公时坐的藤椅右边竟被顶出了一个窟窿。大家都知道，焦裕禄肝疼剧烈，已难以忍耐了。可县委送他去医院时，他坚决不干。无奈，县委给买来了几副好药，焦裕禄又嫌贵，花了公家的钱，舍不得吃。直至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躺下时才被送进医院。河南省委、开封地委闻听焦裕禄病重，连忙派出负责同志送焦裕禄去北京的大医院治疗。医护人员知道了焦裕禄在兰考县鞠躬尽瘁的动人事迹后非常感动，请来首都的众名医为他会诊，用最好的仪器为他检查，用最好的药为他治病，但终因病耽搁的时间太长，已成肝癌晚期。医生们回天无力，焦裕禄终于在1964年4月辞别人世。临终前他拉着县委负责人的手说：“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说了。回去后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又对守候在床前

的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负责人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说完，头一偏，昏了过去。医生们赶紧抢救，但焦裕禄再也没有醒过来……

穆青听了兰考县委的介绍后，决心像焦裕禄那样去采写焦裕禄。他和冯健、周原步行踏看了焦裕禄留在兰考的战斗痕迹。此年兰考又是大风不停，雨下个不停，但他们发现，从沙地上长起来千百条林带把风沙挡住了，水也顺着河道畅快地流走了。大风之年，兰考却没有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大水之年，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此年，兰考县粮食初步实现自给了。目睹兰考巨变，穆青连连赞叹：“奇迹，真是奇迹。”他不由得想到，全国所有的县委书记要都像焦裕禄这样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的话，国家的面貌不知将发生多大的变化，又哪里会出现前几年的浮夸呢？想到这里，一个思想的火花在脑海里一闪，他兴奋地对冯健、周原说：“咱们这篇通讯的标题就叫《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如何？”冯健、周原一齐赞好，三人赶紧回到房间，开始起草通讯的采访和写作计划。

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及总编吴冷西和穆青通过几次电话，全力支持他们写好这篇通讯。1965年的春天早已来到北京，吴冷西由于忙着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业务，竟没有余暇观赏一下北京的春天景色。等他想到这一点时，只见院子里的桃树上已是满枝翠绿，其间点缀着几朵发白的残剩的桃花。啊！已是暮春时节了。

忽然，案头的电话铃声接二连三地响起来，外交部、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接连打来电话，要求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一定要搞好阿尔巴尼亚贵宾来访的宣传报道。原来自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东欧执政的兄弟党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党和中国共产党继续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阿尔巴尼亚被中国誉为是亚得里亚海滨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现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来中国访问，自然受到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客人到各地参观。吴冷西自然不敢马虎，接到电话后，稳妥地部署了报道工作，派出优秀记者随同采访。

1965年5月，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贵宾参观访问了一些地方后，即和李先念副总理陪同贵宾去大寨访问。这大寨本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山村，僻处晋北高原的昔阳县，穷山恶水，何以成为国宾参观访问的必去之地呢？说来话长。山西的许多地方是革命老根据地，出过数不尽的英雄模范。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周西村突遭国民党阎锡山部队掩袭，一批村干部被捕，其中有年仅15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阎军摆开大铡刀，一个个铡死了村干部，刑场上血流成河，人头乱滚。这时阎军连长拉出刘胡兰，对她说：“只要今后不给共产党办事，就不铡你。”刘胡兰大义凛然地说：“那是办不到的事，要杀就由你吧，死有什么可怕，我再活十七岁（实际周岁是15岁——笔者）也是这个样子。”说完自己躺在铡刀口下，从容就义。毛泽东听到这件事后，含泪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自然这仅是无数英雄业绩中的一个，还有许多劳动模范，为了支援前线，建设农村，带头组织合作社，最早的有西沟村的李顺达，也是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

大寨的互助组比李顺达的西沟互助组成立得晚些。当时，人们都找兵强马壮的对象组成互助组，剩下一些老弱幼无人要。时当壮年的共产党员陈永贵找到他们，和他们结成了一个互助组，人们都讥笑这个互助组办不长，对陈永贵甘愿吃亏不理解，组里的人也有些泄气。陈永贵把组员召来打气说：

“莫听那些闲言碎语，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我看咱这互助组好哩。老的经验，小的过几年长起来就是好后生。互助、互助，就是要互相帮助，总想着沾便宜，还叫什么互助组。”

还真叫陈永贵说对了，由于陈永贵不怕吃亏，热诚地帮助大家，这个互助组的组员们都向陈永贵看齐，互相帮助，越来越兴旺。其他的互助组，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干脆散伙。没几年全国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办农业合作社，大寨村就以陈永贵的互助组为基础，成立了农业社，陈永贵自然就被选为社主任，又被党员选为支部书记。1958年后，大寨农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但还是很贫苦，根本原因是这里的自然条件太差。站在虎头山上，只见七沟八梁一面坡，光山黄土乱石滩。当时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叫狼窝掌的山坡上，这里坡陡得连驴都站不住，下点雨，就成洪水，种籽都冲走了，哪能长庄稼。陈永贵在虎头山上盘桓了多日，想来想去，要想日子过得好，就得把坡地改成梯田，用石头垒成田堤，闸住水，只有这样，才能让地里多打粮食。但是，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打堤要石头，改田要动土，这得多大的工程量啊，又得多长时间才能完成啊！治田先治军，治军先治头。陈永贵把支委贾承让、郭风莲召集起来学毛主席著作《愚公移山》，陈永贵开导大家说：“人家愚公一家人能移走太行山、王屋山两座大山，咱大寨几百口子人就不能把狼窝掌治住吗？我看只要咱们几个支委带头干，群众一定能跟上来，狼窝掌一定能治住。”支委们也想尽快改变大寨面貌，陈永贵的话正合大家心意，支委会决定重新安排大寨河山，大战狼窝掌。

支委会既然作了决定，大寨群众马上行动起来。此年秋收一结束，人们就上了山。贾承让上山开石。郭风莲组织铁姑娘队，自任队长，带着姑娘们挑土改地。陈永贵挥动大镢头，挖山不止。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人们啃着冰冷的窝头，大战狼窝掌。历经几个冬春，终于修成道道梯田，田边上都用石头砌上堤堰。雨水下来，都被挡在堤内，肥料，种籽再不会被水冲走了，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大寨人都服了陈永贵。

不料到了1963年夏天，一场灾祸从天而降。那时暴雨下个不停，在县里开会的陈永贵担心暴雨形成洪水，冲垮新修的梯田，不等会议开完，便心急火燎地冒着大雨赶回村子去。一进村口，陈永贵不禁呆住了，只见全村的房子窑洞被暴雨渗塌许多，狼窝掌的梯田石堤都被冲垮，一片狼藉。

怎么办？陈永贵把支委召集起来研究对策。狼窝掌还要不要治理，支委们也没有了主意。陈永贵把桌子一拍，果决地说：“要治，狼窝掌一定要治理。连个狼窝掌也治不了，还要咱共产党干什么？”一句话激起了支委们的责任感。贾承让说：“永贵，你带着大家干吧，我们支持你！”陈永贵满意地说：“好，不过，咱们跌个跟斗，得学会防滑。雨一停，咱们到山上看看去。”

天晴了，陈永贵带着支委到了山上，只见石堰全部垮了，石头被冲得满沟都是。陈永贵心情沉重地说：“垒得这么结实的石堰怎么会垮了呢？”突然，一道小石堰引起了他的注意。陈永贵急忙过去察看，只见这道石堰弓背向里，完好无损。陈永贵大叫一声：“好啊！”支委们一惊，都跑过来，只见陈永贵打头拍腿地骂着自己：“我怎么这么笨呢？真该死！”郭风莲问道：“书记，你这是怎么啦？”陈永贵指着小石堰说：“你们看，这道小石堰弓背向里，洪水来后，水沿着石堰向两边流去，堰就冲不垮。而其他的石堰呢，都是弓背向外，洪水到后都从石堰的两边聚到石堰的中间，可不就把堰冲垮

了吗？现在我们只要把石堰的弓背都修为向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大家一叫，恍然大悟。

问题找到了，大寨群众又重新开山劈石干起来，经过两年的奋斗，弓背向里的石堰重新砌了起来，又在山上做了些水利工事，狼窝掌算是给治住了。

大寨的奋发图强的英雄事迹惊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此大寨成了中国的一处名胜，来参观学习的络绎不绝。

周恩来对农业学大寨运动非常重视，同时他也感到，要根本改变晋北的自然条件，要大种树，他感到大寨似乎对此有所忽略，便乘这次陪阿尔巴尼亚贵宾去大寨时，向他们好好指出来。

直升飞机在大寨大队降落下来了，周恩来李先念陪客人参观后，便乘客人休息的机会，看望了郭风莲的姥娘和其他社员，又来到虎头山上，极目远眺。只见对面山头上有一片树林，郁郁葱葱，分外喜人。周恩来指着树林问陈永贵：“那些树是哪个大队的？”陈永贵回答说：“是武家坪大队的。”周恩来赞赏地说：“要是所有的山头都长上树，就不会再出现1963年的洪水。对自然灾害，不只要防，更要积极地向它进攻。种树就是最好的进攻手段，树多了，吸住了水，下雨不成洪，无雨墒情好。你们应该多种树，绿化荒山。”陈永贵忙答应下来。周恩来还要说什么，秘书走来站在一边。周恩来知道秘书有急事找他，便走过来问道：“什么事？”秘书小声说：“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遇险！”周恩来忙摇摇手，让他别讲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五十六回 宣统帝蒙赦省人生 代总统归国膺重任

话说周恩来于 1965 年 5 月陪阿尔巴尼亚贵宾去大寨参观，对大寨的绿化工作作了部署。这时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正准备从美国返回祖国。他的代表程思远先生曾从香港秘密回国，向中央请示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晤见程思远先生，请他向李宗仁先生转达中央的“四可”原则，这“四可”是：一、李宗仁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程思远先生把“四可”原则原原本本地向李宗仁先生作了传达，李宗仁先生决心返回祖国定居。

周恩来在大寨时，程思远先生又受李宗仁先生之托，启程回国，最后一次安排李宗仁先生返国事宜。周恩来回京后，即安排会晤程思远先生，对李宗仁先生回国事宜作了仔细的安排。程思远非常感激，对周恩来说：“李宗仁先生在美国经常翻阅溥仪先生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很受启发。纵观上下几千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把一位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改造成新人，在新制度下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充分证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是多么伟大。这也是李先生下定决心万里回归的重要原因。李先生很想尽早见到溥仪先生。”周恩来肯定地说：“你回去告诉李宗仁先生，他的这个愿望完全可以满足，我将动员溥仪先生到机场迎接你们。”

程思远见诸事已妥当，准备告辞，周恩来说：“为了保密，我不能送你。你们回返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台湾方面将对你们有所动作。我已指示有关部门配合你们，你们一定要按计划行动喽，绝对不能让李宗仁先生受到伤害。”程思远点点头：“总理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程思远走后，周恩来拿起电话，向有关部门下达了准备迎接李宗仁先生归国的命令。这些事办完了，周恩来又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李宗仁先生马上就要回国了，他急于见到溥仪先生。但溥仪先生最近身体不好，你代我去看看他吧，听说他住院动了手术，请医院尽力想办法，恢复溥仪先生的健康。”秘书答应一声走了。

秘书来到医院，看见溥仪先生的夫人李淑贤女士在病床旁守护着，遂向他们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在此之前，溥仪夫妇已收到章行严老先生受毛泽东之托送来的一笔款子（毛泽东的稿费）。溥仪对中央领导的关心十分感动，请秘书代为向总理问候。

突然，门外吵闹声又起。溥仪心烦地说：“又来了，赶快让她走，我是溥仪，不是宣统皇帝。”护士们闻声出来，把“她”劝走，溥仪还愤愤不平地嚷道：“我是溥仪，不是宣统皇帝。”周恩来的秘书惊诧地问李淑贤：“溥夫人，这是怎么回事？”李淑贤叹口气说：“还不是为溥仪是宣统皇帝——”

原来溥仪是清宫的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仍享受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条件，仍在紫禁城里当着小皇帝。1924 年，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其麾下鹿钟麟将军奉令驱逐溥仪出宫，溥仪乃逃往天津租界。他虽然不再是宣统皇帝了，但清朝的遗老遗少仍把他当成皇帝。溥仪呢，也想着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再登大宝，正好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想把溥仪抬出来做伪满洲国的皇帝，两下里一拍即合，溥仪即潜逃到长春，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持下登上了康德皇帝的宝座，成了关东军的傀儡。与溥仪的想法相反，

他当了傀儡皇帝后，不但没能依靠关东军的帮助恢复“祖业”，反而受尽日本人的气，并险遭杀害。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溥仪被苏联红军俘虏，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拘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方面于1950年7月把溥仪等伪满洲国战犯移交给中国战犯管理所。1959年9月，刘少奇主席颁布特赦令，对溥仪和国民党集团的战犯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荃、曾扩情、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实行特赦。溥仪获得特赦后，毛泽东、周恩来数次接见，勉励他好好学习。溥仪觉得自己对故宫情况熟悉，要求到故宫当一名解说员，反省自己过去的腐朽生活和罪行，中央领导人没有同意，安排他到全国政协文史馆当专员，每月工资200元人民币。

溥仪过去当皇帝时，不知有多少人在侍候他，自己完全不能料理生活。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九年的改造，他学会了做很多事。特赦后虽基本能自己料理生活，但总是笨手笨脚，丢三落四。他以前的几位皇后贵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许多人劝他续弦，并热心地为他介绍对象。这时有位清朝年间的皇亲国戚的千金看上了溥仪。这位千金小姐本也漂亮，只因自己要求的条件高，偏又遇上社会大变故，蹉跎至今，年近不惑，尚待字闺中。恰好溥仪要续弦，他现在虽然是蒙赦的战犯，但在这位老姑娘和一些清朝遗老眼中，溥仪还是大清朝的皇帝。许多人来看他，还口叫皇上，行九叩大礼。溥仪生气极了，连连批评他们留恋封建社会，对老姑娘的求婚自然也拒绝了。他只想找一个比自己略为年轻一点，能和自己一起过日子的贤淑女子为伴。恰好周振强——这位早年时当过孙中山先生卫士的国民党军长托人把北京市朝阳区一家医院的护士李淑贤介绍给溥仪。李淑贤长得端庄，时年三十七岁，出身很苦，为人贤淑，很合溥仪的心意。二人经过一段恋爱后，便在1962年结婚了，周恩来亲自参加婚礼，贺客如云。

溥仪结婚后，在李淑贤的帮助下，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一书。在这本书中，溥仪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总结，对自己在伪满洲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叙述了自己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学习生活和体会。全书生动地介绍了一个时刻梦想复辟的末代皇帝被共产党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的过程，披露了末代皇帝和清宫、伪满、战犯生活的许多鲜为人知事情，1964年正式出版后，轰动一时，洛阳纸贵。

溥仪结了婚，老姑娘仍不甘心，大哭大闹，溥仪住院后，不时来医院纠缠。李淑贤开玩笑地问溥仪：“老溥，人家对你一片痴情，又是皇亲国戚的大格格，家里硬货很多，你为什么看不上她呢？”溥仪生气地说：“你不知道呢，她看中的不是溥仪，而是宣统皇帝，她想当皇后呢。只可惜她看错人了，我溥仪不是宣统皇帝了。旧的溥仪已经死了，我现在是新的溥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堂正正的国家干部和公民，岂能和大格格那种满脑子旧思想的女子结婚。你不知道呢，还有气人的事。有位小姐，年轻漂亮，硬要我答应娶她，说是要感谢皇恩浩荡。细一打听，才知道她爷爷本是个农民的孩子，有次我爷爷下乡，看他聪明伶俐，带回家来，从此逐步提升，当了官，发了财，小姐现在要以身图报。你说说，这多荒唐。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要把我当皇上呢？我特赦后，周总理接见我，提醒我说，溥仪呀，你出去了，还会有人向你叩头呢。当时我还不信，现在一看，果不其然。”李淑贤笑着说：“现在好多了，他们碰了几次钉子，也不再叫你皇上了。”

秘书回去，把溥仪的情形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你再去一趟

医院，让医院绝对保证溥仪的休息。另外，你通知一下政协，给溥仪补助点钱。他们来往人多，又都有病，又都不怎么会过日子，单靠溥仪那点工资怎么够呢。”秘书答应着办去了。

秘书走后，周恩来又由溥仪联想起李宗仁来，忽然，电话铃大响，周恩来听了几句，神色大变，吩咐说：“要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国民党特务加害李宗仁先生。”他放下电话，不安地在办公室走来走去。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归国是件震动中外的大事，必将在政治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可不能出半点差错噢。

那么，李宗仁先生到底碰上了什么危险呢？原来，他还没有从美国动身，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已派出一批特务来美国，准备把李宗仁先生劫持去台湾。李宗仁先生回国乃是件极端秘密的事，李宗仁从政治军数十年，岂能不知其中的厉害，所以他把归国的安排工作只交给他的老友和部下称思远先生一人，外人概莫与闻。但是，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况且李宗仁先生在归国之前，经常发表声明，早已引起了美国和世界舆论的注意。李宗仁先生是否要回归祖国成为美国和香港报纸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香港报纸还数次报道过李宗仁已回归祖国的消息。这些消息虽然纯为子虚乌有，但已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

李宗仁先生是1949年12月从香港赴美治病的，原来还准备等白崇禧在军事上守住海南岛后回来视事。不料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个大包抄，把白崇禧的主力部队歼灭于大陆，海南岛不久也被解放军解放。白崇禧被蒋介石许以国防部长之职骗入台湾，从此再不能出来。李宗仁只好在美国纽约当了寓公。旅美初期，蒋介石数次派出使团劝说李宗仁赴台，李宗仁知道去台湾后就会变成张学良第二，坚不赴台。

朝鲜停战以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日增，程思远又受邀自港返京观光，所见所闻，令人鼓舞。李宗仁得知这些情况后，思想发生变化，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百废俱兴，建设规模之大与成就之速，实为史无前例。中国百余年来战乱频仍，民穷财尽，今日幸得有此和平建设的机会，这是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转折点。1958年8月，李宗仁在美国发表声明，建议国共再度和谈，为国家统一作出适当安排；要求美国正式发表声明，承认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

以后，李宗仁又多次发表声明，呼吁促进祖国统一。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出版后，他仔细阅读，更受启发，甚至为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台湾当局看到李宗仁思想的变化，便加紧监视，数年下来，看李宗仁足不出户，门庭冷落，毫无回大陆的迹象，便放心了，他们也不相信代总统敢回大陆。

李宗仁从1964年以来，一直悄悄地准备着返回祖国。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离美乘飞机去了瑞士。李宗仁走后，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委托律师出售新泽西州的一所房子。有人惊问她为什么卖掉房子，郭德洁回答说：“我身染重病，无力再照顾这所房子。卖掉它以后，我要去瑞士治病。”听者深以为然。原来郭德洁女士已患绝症多时，瑞士风光秀美，是治病疗养的好地方，郭德洁女士去那里治病是很自然的事。

两天以后，郭德洁女士离开纽约飞到瑞士，与李宗仁聚齐。等了几天，程思远由香港飞到苏黎世，与李宗仁会了面，告诉他一切都已安排就绪，请他立即起飞。李宗仁因为还要等着约好的吴尚鹰一同走，迟迟不肯动身。程思远担心继续等下去会出问题。果然，到了7月11日，程思远接到一个秘密

通知，要他们立即离开苏黎世，否则将遭杀身之祸。程思远赶紧报告了李宗仁，请他立即动身。李宗仁知道这个消息的份量，赶紧和程思远一起由亲戚陪着去了机场。李宗仁的亲戚刚回到住所，就见几个彪形大汉在门口守着，一见他回来就拿出一份电报说：“这是白健生先生给李德邻先生的电报，我们要亲自交给德邻先生。”那位亲戚抹了一下头上的冷汗，不由得心里叫了一声“好险”，对这几名老特说：“李德邻先生去罗马旅游去了，你们走吧。”这几名老特不相信，便说：“好吧，我们在这里等他回来。”从此，这几名老特严密地监视着李宗仁的这位亲戚，与他形影不离。

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香港《快报》立即刊出消息“李宗仁将返大陆”。鉴于香港报纸以前放过几次空炮，世界各大通讯社都纷纷向台湾当局提出咨询。台湾当局一口否认这个消息的真实性。鉴于台湾当局的特务系统向以消息灵通著称于世，世界传媒也都认为香港《快报》这次又放了空炮。李宗仁离开苏黎世后的去向成为舆论界猜测的有趣题目之一。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李宗仁的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一个。

1965年7月20日上午，北京机场戒备森严，周恩来总理率彭真、郭沫若、贺龙、陈毅、罗瑞卿、徐冰、高崇民、许德珩、叶剑英、傅作义、蔡廷锴、溥仪、王昆仑、朱蕴山、卢汉、刘仲容、邵力子、黄绍竑、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及他们的夫人们一早就来到机场。今日将有一位历史人物莅临北京，来迎接的人们兴奋地互相交谈着……且慢，范汉杰、廖耀湘不是在辽沈战役中被俘了吗？怎么他们也跑到北京机场来了，原来自1959年第一次特赦战犯后，1960年11月国家第二次特赦战犯，范汉杰、廖耀湘、沈醉等人就是在这次被特赦的。

将近11点时，从南边传来隆隆的飞机声，大家不由得在7月的骄阳下，手搭凉篷向南方的天际望去，只见蓝蓝的天际上出现了一个银色的亮点，不一会便变成了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飞机轰鸣着，向着跑道降了下来，一会儿就滑行到停机坪停下来。周恩来率欢迎人群向飞机走去。机舱门打开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出现在舱门口，只见他中等身材粗壮有力，一行一动都还带着军人的姿态。他是谁呢？正是前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桂系领袖，前国民党政府副总统、代总统李宗仁先生。

李宗仁站在机舱口，一眼就认出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还有贺龙、叶剑英……总而言之都是熟人。北伐途次，八年抗战，重庆谈判，大家一起共商国事，那该是让人多么振奋，多么留恋的岁月。可惜国民党不识时务，发动内战，以致生灵涂炭，最后被人民打败。李宗仁边想边向人群看过去，杜聿明、宋希濂……啊！他们也都来了。想起他们的战败被俘，自己也有责任，现在是认输的时候了。他向人们笑着挥手致意，快步从舷梯上走下来。周恩来紧走一步，握住李宗仁的手说：“德邻先生，我代表祖国欢迎你回国定居。”李宗仁激动地说：“周部长——啊，不，周总理，感谢政府对我的关怀。这位是我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周恩来和郭德洁女士握手，告诉她说：“你身体有病，要注意节劳，我已经在北京医院为您安排了病房，明天，你和德邻先生去检查一下身体。”郭德洁致谢说：“还在抗战时期，我就知道你体贴人。二十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心细。颖超大姐呢？”周恩来抱歉地说：“她早就准备要来机场接你们，结果临时有事要处理，不能来了。”

周恩来陪着李宗仁夫妇依次和元戎们见面，周恩来笑着说：“德邻先生，是不是还要我给你介绍一下？”李宗仁摇摇头说：“不要，都是老朋友了。啊，贺龙先生，还记得北伐途次的武昌战役吗？剑英先生，当年陈炯明炮击总统府，幸亏你机智果断，率卫队营救出了中山先生。这不是沫若吗？我记得台儿庄战役后，你带队来慰问我，我还送你一张照片呢。”郭沫若说：“怎么不记得。台儿庄战役后，你在台儿庄车站的站牌下面，身着戎装，照相留念。我去慰问你时，你送我一张，我还在《洪波曲》中专门写了这件事呢。”大家回忆往事，不禁哈哈大笑，真是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恩来这时对李宗仁说：“德邻先生，这里有一位朋友，你恐怕不太熟悉，我给你介绍一下。”说着拉着李宗仁的手说：“这位就是溥仪先生。”啊！是末代皇帝！李宗仁紧紧地拉住溥仪的手，连说：“不错，不错。和《我的前半生》中的照片一模一样。溥仪先生，我们都当过你的子民呢。”溥仪笑着说：“我今年五十九岁了，对于过去的一切，我是认罪了。现在我真正成了一个自由公民，越活越年轻了。”李宗仁说：“你认罪，我认输。天下大势已定，我们国民党人和海外爱国人士应该本着认输的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建国。我在美国读了你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对我很有启发。”溥仪说：“你认输，我认罪，都很好。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胜利，祖国的胜利，也是我和德邻先生后半生的胜利。”

接着李宗仁和杜聿明等人握手见面，大家自然又是一番感慨。周恩来怕李宗仁过于疲劳，便提议道：“同志们，先生们，我们要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欢迎德邻先生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回国定居，全国政协也要开茶话会，大家有的是时间畅叙离情。今天是不是先送德公去寓所休息？”大家听了一致同意。周恩来一招手，一辆三排座豪华大红旗轿车开过来，周恩来送李宗仁夫妇上了车后，招呼大家都上了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向市区开去。为欢迎李宗仁先生到来，北京街道上挂满了彩旗，一派节日气氛。

蒋介石在台湾得知李宗仁果真回了北京，十分恼怒，把保密局长毛人凤叫去训了一顿，临了吩咐道：“想个办法，不留痕迹地把那个人干掉。李宗仁既已投共，留着那个人也没什么用了。”毛人凤心领神会，周密部署，派行动组开始行动。

李宗仁回到北京定居，人民大会堂开大会欢迎，虽然还没有给予正式职务，但明摆着是要荣膺重任的，起码，现在就已是中央政府的高级顾问了。台湾很多军政要人得知这一消息后，都为之受到震动，其中白崇禧的心情更是复杂，充满了苦涩感。遥想1949年，自己因一念之差进了台湾，从此便被监视起来，没有一点自由，更不要说出岛访问了。每当李宗仁在美国发表批评台湾当局的声明或谈话时，蒋介石便授意白崇禧发表声明予以驳斥，白崇禧虽不愿意，但身不由己。现在李宗仁回了北京，他的按钮作用也完结了，说不定蒋介石就会来要他的命。想到这里，白崇禧决定以后深居简出，处处小心。

但人总有七情六欲，自我禁闭的时间长了，总是有点烦闷，白崇禧便带着卫士去山里散步。他们在山里转了一回，便坐着木轨车往深山驶去。这木轨是专门设置的一种旅游轨道，旅游者可坐着木轨车顺山而下，驶往山里，从来没有出过事。白崇禧一行坐了两辆木轨车，木轨车顺山而下，风驰电掣，令人心胸畅快。不料前面的一辆车驶过一座桥时，桥忽然断裂，车子坠入河涧，摔得粉身碎骨。白崇禧坐在后面一辆，卫士急忙刹车，哪里能刹得住。

卫士急了，一把把白崇禧推出车去，就在这一刹那间，车子驶上桥，坠入河涧。白崇禧爬起来望着山涧里摔得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由着浑身冒冷汗。他知道这是谁干的，如果他摔死了，明天台湾报纸上肯定会登上条消息，说他白崇禧由于桥身朽烂，死于意外事故。

从此，白崇禧更小心了，很少出门，只和服侍他的护士张小姐在房里作爱。可是毕竟年大力衰，不得不吃补药。行动组见有机可乘，乃密令医生在补药上作文章。这补药果然有劲，白崇禧不禁高兴起来。可是有天，卫士们发现白崇禧的卧室久闭不开，撞开门一看，白崇禧已经是撒手西去。医生们闻讯检验尸体，都只认为是用力过度之故，而都不知道是补药作怪。

周恩来为白崇禧误入台湾，导致严重后果深为可惜。有一次和李宗仁谈起往事，说起了白崇禧，周恩来说：“健公号称小诸葛，但他就没有把蒋看透。1949年他的老本都已在战场上打光了，蒋一再请他去台湾，还能有什么好事吗？”李宗仁叹息一声说：“是啊，当年我和思远都劝过他，他就是不听。自食其果。”

李宗仁回国定居快半年了，心情愉快，成天忙于接待各方人士。但他却没有注意到，郭德洁女士的病由于兴奋和参观访问劳累而转重了，终于在医院里一倒不起，于此年年底辞世。李宗仁十分悲痛，周恩来亲自料理丧事，安慰李宗仁。忙忙乱乱，不觉到了11月12日，周恩来来到西花厅，一眼就看到桌子上放着刚到的《文汇报》。他拿起报纸打开，只见有一版的通栏大标题是《评新编历史剧 海瑞罢官》，署名“姚文元”。周恩来不禁吃了一惊，怎么事先一点风声也没有，好生奇怪。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七回 收心腹江青批海瑞罢官 结死党林彪骂全军比武

话说周恩来看到《文汇报》上刊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后，暗吃一惊，怎么这件事连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他仔细地读完这篇文章，心情异常沉重。很明显，这次批判不同以往，是大有来头的。从1962年以来，报纸上每天都登大块批判文章，批《李慧娘》、批《北国江南》、批《早春二月》，批《舞台姐妹》，批“合二而一”，批“让步政策”，批“经济价值”，骂孟超，骂翦伯赞，骂孙冶方，骂杨献珍。这些人都是文化人，而撰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吴晗却是北京副市长。姚文元敢批北京市副市长，直接在北京市市长、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彭真头上动土，没有最高领导的同意行吗？说不定，这篇文章就是最高领导授意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就更严重了。搞这么大的动作，自然不会仅仅为了搞倒一个副市长，大概也不会单为打倒彭真，那么，还有谁呢？周恩来蓦地想到了北方局，他不禁打一个寒噤。

过了两天，消息传出来了，姚文元的文章果然是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由江青秘密去上海组织的。本来江青先是要在北京找几个人写这篇文章，但北京没有人愿意写，于是江青就想到了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对，找柯庆施去。江青于是立即南下，找到了柯庆施，对他说：“柯老，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急迫的事要办，别的地方找不到人，主席让我来找你。”柯庆施谦恭地说：“是什么任务，江青同志你就交给我吧。”江青说：“好，我就知道柯老肯定会支持我，主席常夸你呢。你还记得去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主席和刘少奇的一场争论吗？”

提起这个问题，柯庆施是太知道了，他是政治局委员，就亲自参加了这个会嘛。那是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否定了刘少奇制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十条办法，讨论通过毛泽东制定的“二十三条”。后一个文件和前十条比较，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确定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1963年上半年开展起来的。当时，湖南省和河北保定地区在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肯定了湖南和河北的做法，决定在全国农村推而广之。接着他又主持制定了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又称《前十条》），指出运动的目的是重新教育人，尤其着重教育干部；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清经济，具体地说，就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故简称这个运动为四清运动。接着刘少奇又派自己的夫人王光美去河北省桃园大队摸底调查，这个地方正是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的地方。王光美带着工作组进村来，一不凭吊名胜古迹，二不找干部了解情况，一头扎到贫下中农里，摸底调查，秘密串连，其景象与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里的土改队长到村屯里发动土改的情形一模一样。桃园大队干部眼看自己一下子成了革命对象，不禁人心惶惶。

王光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在桃园扎根串联，发动社教的经验，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我讲了两年谁也不听。少奇同志一抓，就抓出了个桃园经验，把社教运动推开了。”

1964年5、6月，毛泽东，刘少奇进一步做出这样的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

在桃园经验的基础上，刘少奇又主持制定颁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也叫做“后十条”），决定社教运动完全撇开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由工作队领导运动。这样一来，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有的地方混淆了两类矛盾。

此年，也就是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也在北京举行。这次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首先讨论了刘少奇在12月15日提出的关于在农村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和在城市举行的“五反”（后来也改称为“四清”）运动的几个问题，然后起草被称为“十七条”的文件。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在12月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和毛泽东争论起来。刘少奇问毛泽东：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腐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回答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刘少奇争辩说：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强调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杜甫的诗写得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说明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慢慢清，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刘少奇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听了反问刘少奇：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这场争论过后，就到了12月26日。毛泽东邀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胡耀邦、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中央领导人、大区书记、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吃饭，过生日。这顿饭气氛异常紧张，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讲话：“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了，我已经老了，也许不久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

人人都听得出来，毛泽东的语气中有几丝浓浓的悲愤之感。这时毛泽东提高嗓门说道：“今天李敏没有来，她没下乡，没有资格来。李讷没有回来，下乡了。”他讥讽和恼怒地说：“拒绝到农村去，城市里生活舒适哟，不出修正主义才怪。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

讲到这里，毛泽东不客气地大声问李富春：“富春啊，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

李富春知道，由于自己和毛泽东关系很深，毛泽东要批评什么时，经常拿他做个话头，说的是自己，批评的可是别人。毛泽东说起自己来毫无顾忌，只是更显得二人之间的情谊非同一般。所以李富春听了毛泽东的话，只是笑笑什么话都没有说。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却是心情沉重，他们听得出来，既然毛泽东说“你们”，那就不是李富春一个人，还会有谁呢？

12月28日，毛泽东手里拿着《党章》和《宪法》出席继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晃晃这两本文件，不无恼怒地说道：“请你们回去也找《党章》和《宪法》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又是一个“你们”。

陈伯达看到毛泽东对刘少奇不满，便在中间拨火添柴，加剧了两人的分歧。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一直开到过了年的1965年1月。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十七条”停止下发，会议重新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部分地纠正了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工作影响下各地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是却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路线抬起头来。

两位中央主席在会议上公开干起来了，与会者吓得心惊胆战。柯庆施、康生纷纷抢着表态：主席的说法符合马列主义，社教的重点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也觉得这样闹下去不好，便提议道：“说中央有后台，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吧。但可能在中央的一些部门里有他们的后台，是否改成‘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其他人一听，也都觉得这样改较好。

会议散后，毛泽东又叫来秘书在文件的前面写一段话，把刘少奇说的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观点狠批一通，指出这些观点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通过了，但毛泽东很不痛快，多吃了一片安眠药才慢慢入睡。

柯庆施想起那次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争吵，关心地问道：“那次会议，刘少奇把主席气坏了，主席最近身体好吗？”江青看看周围，小声地对柯庆施佯装不懂地说：“主席很后悔，说自己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一线工作，是看错了人，现在必须回到一线主持工作。”柯庆施高兴得直点头：“早该如此了。那么主席有些什么战略部署呢？”江青再次看看周围，神秘地说：“我就是为此来找你的。先批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柯庆施佯装不懂地问：“为什么呢？写海瑞可是主席在上海会议上讲的。”江青瞪了他一眼：“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主席当年讲，海瑞敢讲真话，骂嘉靖皇帝是家家皆净也，可是嘉靖皇帝死了，他又哭得死去活来，是真忠臣。可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是什么？是为彭德怀翻案！”柯庆施又装糊涂：“这我就不明白了，一个吴晗，非党人士，区区副市长，何以这样大动干戈？”江青不满地说：“柯老，你怎么不听话了？你想想，三十年代的北方局书记是谁？”柯庆施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连擦冷汗，赶紧解释道：“我明白了，江青同志。我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一个是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这两个人有理论，文笔好，足以担当重任。”江青满意地说：“好，我见见他们吧。”

柯庆施心里明白，这事慢不得，当即把张春桥和姚文元找来与江青见面。江青过去多次来过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见过面，也读过他们的文章，所以见面以后，江青没讲几句客套话就布置任务：“找你们来是想让你们写一篇批《海瑞罢官》的大文章。此事关系重大，全中国只有主席、我、柯老，

再加上你们俩知道，你们一定要保密，不能对任何人说。文章要写的快，写得好。现在是3月，10月份要定稿。”张春桥、姚文元眼见江青，也就是毛泽东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又高兴，又紧张。

从此，张春桥经常来往于京沪，见了熟人，只说是来听现代戏的，乘人不注意，一头钻进接头点，和江青讨论稿子。到1965年10月底，稿子如期定稿。11月10日，这篇稿子在上海《文汇报》上登了出来。考虑到种种原因，只署了姚文元一个人的名字。

谁知姚文刊出后，除了华东局所管辖的几个省的省委机关报作了转载外，北京的全国性报纸都没有理这个茬。非但如此，书记处副秘书长彭真还向上海市委打来电话责问：“你们发表姚文元文章怎么不向书记处打招呼？你们的党性哪里去了？”江青眼看全国报纸都按兵不动，北京还准备追查，不禁大怒，马上到杭州向毛主席告状：“主席，他们都是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头的，按说应该闻风而动，可是现在他们都一个个按兵不动，还打电话批评上海市委没有党性。你看看，北京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应该想办法打破这死一般的沉寂。”毛泽东想想，果断地说：“让上海印小册子，全国发行。给我要北京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对全国报纸转载姚文作出安排。”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请书记处副秘书长、北京市市长彭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参加，在人民大会堂讨论转载姚文问题。大家按照开会的时间，一早就来到人民大会堂等着。过了一会儿，彭真来了，他心事重重地坐下来，问邓拓：“老邓，吴晗现在怎么样？”邓拓回答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大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彭真这时的处境很为难。明摆着，批判吴晗是不对的。吴晗写海瑞戏是当年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经过胡乔木再三动员才写的。他写海瑞戏是开始于上海会议，几个月后才出现了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事件，两者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况且，今日批了海瑞罢官，明日又会怎么样？彭真不由得看了邓拓几眼，为他担起心来。这位邓拓在反右派运动中因为“引蛇”不力，被调离《人民日报》，来到北京市委书记处当了一名书记，分管文教工作。前几年他为《北京晚报》开了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在上面发表了一百多篇杂文，后来还结集出版。与此同时，他还与吴晗、廖沫沙等市领导合作为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开了一个专栏，名字叫《三家村札记》。彭真读过邓拓的《燕山夜话》，很欣赏他的文章，但也对其中的《专治健忘症》、《一个鸡蛋的家当》感到吃惊，他知道这两篇文章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写的，果然不久，他就听到了从上面传下来的风声。

彭真明白，他反对转载姚文，可能会遇到打击，乃至不幸。但他是书记处副秘书长，历史已经把他推到了政治大决斗的风口浪尖上，为了保护党的干部，为了中华民族不致沦入一场大灾难，他决计牺牲自己，尽力遏制这个来势凶险的“左”祸。

经过讨论，大家感到周恩来过问此事，不转载是不行了。彭真说：“转载可以；但一定要把对吴晗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以内，不要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最后决定先由《北京日报》在11月29日转载，《人民日报》11月30日转载，其他报纸依次转载。

彭真作了这些部署后，怕吴晗精神上受不了这种打击，便把他找到国际

饭店，对他交了底鼓励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吴晗感激地点点头。这几天，吴晗坐卧不安，茶饭不思，他本来就瘦，这一来就更瘦了。

国际饭店正在开市委工作会议，吴晗走后，彭真找邓拓商量说：“老邓，你来写一篇文章，从学术的角度上批批吴晗，也可以为学术讨论引路嘛！”邓拓想了想说：“那就写一篇从海瑞罢官谈谈道德继承的文章吧。”彭真赞许地点头：“我看这个题目就好，你先写，写出后我再看看，由我修改定稿，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在作了这些部署后，彭真又准备起草汇报提纲。原来为了领导文化批判运动，中央已于7月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彭真任组长，康生任副组长，陆定一、许立群、姚溱是组员。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学术界争论较多，也有人想把《海瑞罢官》往政治上扯。彭真感到自己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有责任制定一个向中央提交的文化批判汇报提纲，经中央批准后，下发全国，正确地引导运动。彭真把自己的想法向在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汇报了，他们也觉得很有必要，让他快点写出来，送毛泽东审阅，然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让在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

多事之秋，日月如梭，眼看着就到了1965年的年底了，在京的中央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赴上海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专程从杭州赶往上海参加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到通知后个个都心事重重。自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全国的政治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毛泽东在杭州又是指示周恩来督促彭真转载姚文，又指示上海新华书店印小册子在全国发行。江青、张春桥活动得很厉害，江青经常南下，张春桥经常北来，而且每次来行动诡秘，看来下面还有大文章。凡此种种，已使中国政坛大有山雨欲来之势。现在毛泽东忽然又要在上海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不知又要整谁了。

1965年12月初，中共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汇集上海，毛泽东和南下的中央常委们打了招呼，这次会议是专门解决总参谋长的问题的。据吴法宪写信揭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病逝前，罗瑞卿曾托他转告叶群，要林彪下台，不要管军队的事了，军队的事由他罗瑞卿管就可以了。毛泽东生气地说：“这明明是夺军权嘛！”刘少奇、朱德等人听了，确实大吃一惊，罗瑞卿平常工作不错嘛，怎么会夺军权。

明天就要开会了，会议驻地岗哨林立，气氛紧张。在林彪的住所里，有两个人正在紧张地进行谈话。一个是林彪的夫人叶群，一个是继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按着林彪的要求，已经给中央常委写了一封信，揭发罗瑞卿通过刘亚楼传话夺军权。但他不是政治局委员，还没有见识过中央政治局斗争的大场面，一听说要他在明天的中央常委会上发言，不禁心惊肉跳，汗水顺着胖胖的脸流下来。叶群给他打气说：“你怕什么，罗瑞卿和刘亚楼谈话是在病房里，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现在刘亚楼已经死了，你揭发他们谈了些什么，已经是死无对证了，你怕什么？”吴法宪流着口水说：“不怕，不怕。”叶群鼓励道：“这就对了，另外告诉你，林总已经通知总参，把你的级别由六级升为五级。”吴法宪赶紧表示忠心；“你转告林总，我跟罗瑞卿誓不两立，林总指到哪里，我就打到那里。”

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一召开，吴法宪又拿出当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整彭德怀的劲头，大喊一声“我揭发”，在得到允许后，便慷慨激昂地揭发起

来：“罗长子在我们空军活动得很厉害，他对刘亚楼司令员说，有四条意见请他转告叶群，一、林彪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出也得出，现在不出，将来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二、要好好保护林总身体；三、今后林彪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罗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罗瑞卿还反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毛主席的思想不是马列主义顶峰。刘亚楼司令员后来识破了罗长子的阴谋，把这件事对我讲了，要我向中央揭发。”

吴法宪的话使常委们吃了一惊，刘少奇问叶群：“刘亚楼是否向你转告过罗瑞卿的那些话？”叶群镇定地说：“讲了，我来揭发。”她拿过麦克风，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对罗瑞卿大泼污水。刘少奇虽然不大相信这些话，但唯一的证人刘亚楼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啊！

为了确证吴法宪和叶群的揭发是否属实，中央常委决定调查一下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这么大的事，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死荣辱，刘亚楼不会不向自己的夫人说的。

吴法宪听说中央要调查翟云英，慌了手脚，连忙跑到叶群这里来讨教。叶群狠狠地说：“吴胖子，你已经出了头了，现在只有一条道走到底才有生路。你要是半路退出，林总不会饶你，人家也不会放过你。栽赃陷害总参谋长，最轻也要判你个死缓。”吴法宪听了汗如雨下，哀求道：“你不要吓我了，赶快教我个法吧。”叶群眼一转就有了主意：“去找翟云英，让她写个证明不就得了。”吴法宪担心地说：“她要是不写呢？”叶群突然发怒，骂道：“你怎么这么废物，你手中的权是干什么的？”

叶群的布置正赶到点子上了，以后调查人员去问翟云英时，翟云英说，她曾看到刘亚楼在临终前向她伸出四个手指头，似有话要说，但没有说出来就去世了。中央常委一商量，认为罗瑞卿确实讲过四点要求，必须把他的总参谋长拿掉，让杨成武代总参谋长。中央决定总长易人后，派了一架飞机去接罗瑞卿。

罗瑞卿这时正在昆明视察部队的大比武，他眼里看着比武场上龙腾虎跃的战士展示着高超的军事技能，心里却不时掠过一种不祥的感觉。今年2月，他去上海向林彪汇报自己的工作，林彪对他异常客气，笑眯眯地说：“十个大将，陈赓已在前几年病逝了，现在的几位，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长子你还能用谁呢？”罗瑞卿不知林彪为什么这样客气，想着正好可以乘林彪心情好时汇报工作，便兴致勃勃地汇报起全军大比武的情况来。林彪耐心地听着，等到罗瑞卿讲完了才慢慢地说：“罗总长，抓军事训练是必要的，可不能冲击了政治。一定要突出政治，引导全军学好毛主席著作。你是搞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身，希望在这方面多出些力，一定要保证我们的军队忠于毛主席。”罗瑞卿一听林彪的话里有一种强调突出政治忽视军事训练的意思，便老实不客气地说：“林总，我有一点想法。你的一些话总带有一些绝对化的味道，什么顶峰呀，最高呀，都到顶了，思想还怎么发展？”林彪没有想到罗长子这么不识抬举，气了个半死。

从林彪那里出来后，罗瑞卿又去看了刘亚楼。刘亚楼患肝癌在上海住院，罗瑞卿问了一些病情，安慰他说：“老兄放宽心吧，就凭你这身体，再加上治疗，我保你还能再干四十年！”刘亚楼伸出四个指头，苦笑着问道：“四十年？”他摇摇头没有再说话。

罗瑞卿绝对没有想到，他离开医院后几天，林彪、叶群先后来了医院，把人都支走，和刘亚楼单独谈了话。罗瑞卿回京前，又去看了刘亚楼一次，

刘亚楼断断续续地说：“感谢你来看我，我可能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罗瑞卿给他掖掖被子说：“好好养病吧，别胡思乱想了。”

起初，罗瑞卿对刘亚楼的话不太在意，一个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总会有一些特别的想法，正像中国的一句古话说的那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后来越想越不对劲，一种直感告诉他，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不说别的，就拿林彪来说吧。林彪过去对自己的部下很少说客气语，但对自己很亲热，前几天离开上海前去见林彪，林彪还很亲热地拉他吃糖。难道他就不忌恨自己顶了他，罗瑞卿想到这里，感到似乎有一张无形的大网向自己撒来。

罗瑞卿在昆明的视察还没有完，突然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了一架专机来接他去开会。罗瑞卿搞过多年保卫、公安工作，凭经验判断，这次去开会凶多吉少。果然，他在上海一下飞机，就被一群保卫人员送上汽车直接开到会场，一位他素来敬爱的中央领导人在外面等着他，一看他从车里钻出来，便上前打招呼说：“你来了，林彪同志揭发了你，向主席写了信，揭发你让刘亚楼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你要有个正确的态度。”罗瑞卿听了眼前一黑，自己的担心果然被证实了。只是这场横祸来的这么突然，这么离奇，是他怎么也想不到的。不过他有信心洗刷掉林彪泼向自己的污水，他以为，只要中央领导明白了事情的真相，那么林彪的阴谋就会败露。

然而罗瑞卿，这位声名赫赫的老公安部长，像当年被捕的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一样，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来到会场准备辩解，但没容他说上几句，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一拥而上，把他的话堵回去，而唯一可以为他作证的刘亚楼已经作古。

死无对证，罗瑞卿骤然想起了办案的这一最大的忌讳，顿时全身冒出冷汗来。他明白了，现在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林彪在上海会议上把罗瑞卿打下去之后，心中十分得意。这半年多来，他一直与毛泽东住在南方，共商文化革命大计。林彪几经试探，见罗瑞卿不肯为己所用，便经常在毛泽东面前中伤罗瑞卿，提醒毛泽东，在这个非常时刻，防止军队出问题。毛泽东也怀疑罗瑞卿在军队中调兵遣将，搞大比武，是不是要有什么动作，便同意解决罗瑞卿问题，以稳住军队。罗瑞卿被收审后，毛泽东又调兵遣将，把军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正当林彪高兴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这几年来，他收到了好几封匿名信，都是揭发叶群的，其一是说，叶群在与林彪结婚前已经不是处女；其二是说，叶群是个假党员。这人是谁呢？看此人对自己行踪这么熟悉，肯定出自党的高层领导圈内。此人不除必遗祸患。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八回 挽狂澜彭真去职 参军机陶铸进京

话说林彪接到匿名信后，几经思考，决定把信交出去，让公安部查办此人。毛泽东得到林彪的报告后，认为不前不后，偏偏在上海会议揭发出罗瑞卿以后，有人寄匿名信给林彪，而且还是北京寄来的，肯定在北京确实有一个政变集团。他立即把信转给北京的中央书记处，要他们督促公安部限期破案。

彭真接到指示后，立即把匿名信呈送刘少奇。刘少奇反复观看，发现许多信署名王光美，发信地址是自己的夫人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但邮戳却是另一地区的。刘少奇很生气，这不是明摆着挑拨自己和中央常委的关系吗？偏偏又是在这个时候。他立即要彭真通知公安部，务必尽快破案，并要彭真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是12月21日回到杭州的。在去上海之前，毛泽东把陈伯达、艾思奇、田家英、胡绳、关锋五个秀才找到杭州，对他们说：“要提倡读马列，我党真正懂马列的人不多。但是马列的书很多，因此要选择出版几种，每部书上都要有中国人写的序，找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事。”

然后，毛泽东谈如何选择和如何写序的问题。毛泽东还有许多话要说，但因为突然出了罗瑞卿问题，毛泽东要去上海，就未及再谈下去。

罗瑞卿问题解决后，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和秀才们谈起出书问题。也许毛泽东因为解决了罗瑞卿问题，自认为军队已经完全控制起来了的缘故吧，这次他谈得很开，海阔天空，从古到今，中美关系，文化批判，足足讲了有3个小时，临了说起姚文元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即12月8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的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戚本禹是《红旗》杂志社的一名十七级研究人员）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快一个月了，田家英他们这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谈《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谈话结束后，田家英和胡绳商量了一下，觉得毛泽东谈学习马列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搞一个纪要。艾思奇身体不好，陈伯达又住在另外一个地方，来往不便，田家英便根据回忆写了个谈话纪要。纪要写好后，田家英把胡绳和关锋找来，让他们看看，有无遗漏错误的地方。胡绳看完，表示同意。关锋问道：“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的那几句话没有写上，是否妥当？”田家英不耐烦地说：“主席主要谈的是学马列问题，那几句话是附带谈到的，与谈话主旨关系不大，就不必写上了。”关锋听了，没有再说什么。

田家英哪里知道，没有写上纪要的这几句话正是毛泽东谈话的画龙点睛之笔。第二天彭真、康生、杨成武到杭州后，毛泽东直截了当地谈起了《海瑞罢官》：“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解释说：“我们经过调查，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什么组织联系。”毛泽东拖长声音问道：“是这样吗？康老，你说呢？”康生扶扶眼镜：“组织上没有联系不见得思想上没有共鸣，搞阴谋还要订个君子协定吗？”毛泽东很欣赏康生的这几句

话，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烟。

第二天，彭真给毛泽东的卫士打电话，要求单独和毛泽东谈谈。卫士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想想说：“好吧，让他来吧。”彭真来了，和毛泽东在房里谈了好久好久。卫士们自然不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是看到彭真出来时，似乎很高兴。在北京的刘少奇和邓小平都接到彭真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彭真在电话里大声地说：“我和主席谈了，主席赞成我的继续‘放’的方针，吴晗问题两个月以后再做政治结论，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我马上要赶回北京，向中央汇报。”

1965年的岁末就在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中过去了。春节刚过，彭真就把五人小组成员找来开会，这是五人小组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彭真首先介绍了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学术讨论的情况，批评了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他有点生气地说：“一年前，小平同志就批评有些所谓的左派乱打棍子，无限上纲，搞得别人不敢写文章，不敢演戏，新华社一天只收到两篇稿子。小平同志说这些人就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现在这样的人还有没有，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人还有没有，我看有。这些人应该好好学习，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根据调查，吴晗写《海瑞罢官》是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当时主席提出要学习海瑞。胡乔木同志根据主席讲话精神，请他写学习海瑞的文章，那时还没有开庐山会议嘛，还没有发生彭德怀事件嘛，没有彭德怀罢官的问题嘛。《海瑞罢官》确实是庐山会议之前动笔写的嘛。吴晗怎么能事先知道四个月以后彭德怀要罢官呢？《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根本没有关系嘛，怎么能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呢？”

讲到这里，秘书进来对彭真小声说：“关锋、戚本禹把他们写的攻《海瑞罢官》的要害的文章送来了，说要请你审查发表。”彭真大声吩咐秘书：“告诉他们，我最近很忙，没有时间看文章。”

秘书走了，彭真建议说：“学术批判要慎重，不要过头。现在是继续放，不要乱扯《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郭沫若同志都很紧张了，邓拓也很紧张，北京市委刘仁同志和郑天翔同志都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我看有必要搞一个汇报提纲。康老，你看呢？”

康生似笑不笑地说：“大家讨论吧。”陆定一、姚溱、吴冷西都没有意见。彭真果断地说：“既然大家都同意，那就请姚溱同志起草吧。今天是2月3日，后天中央常委要开会，最好能在会前把提纲写好。”

散会后，姚溱一头钻进钓鱼台宾馆，为了找个帮手，他又把许立群拉来了，连夜突击，很快把稿子写了出来。彭真立即把稿子打印，五人小组人手一份。由于稿子的内容完全是根据二月三日的会议内容写的，同时中央常委会已经开始了，彭真未来得及再组织会议讨论，便交给了中央常委会，好在还有中央把关嘛。

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工作。他接到彭真的报告后，召集北京的常委们进行讨论。邓小平看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感到这个提纲很好，完全符合自己的想法，立即表示同意：“我一年前就讲过，对文化战线的批判过了头，要立即刹车，可我的意见没有被中央采纳。现在必须刹车，我建议中央把这个汇报提纲发下去，让全党按提纲的精神开展学术讨论。”朱德、周恩来完全赞成邓小平的意见。刘少奇问列席会议的康生：“你是五人小组副组长，有什么补充的吗？”康生摇摇头，叹口气说：“唉，这两天我的痔疮又犯了，不能久坐，我先到外面走走吧。”

刘少奇望望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康生，眼里闪过一丝疑虑，继而点点头说：“我看就这样吧。不过还得请示一下主席。彭真同志，你就去武汉一趟，直接向主席汇报吧。”彭真答应了，正要动身，刘少奇又叫住他说：“还有一件事要你办一下。”彭真停下来。刘少奇用目光征求一下常委们的意见，他们都点点头。刘少奇才说：“写给林彪同志的匿名信，公安部现已初步查明，是陆定一的老婆严慰冰写的。在此之前，严慰冰给林彪写了不少匿名信，许多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是公开的传单。这件事关系到陆定一同志，因此要特别慎重，还必须进一步查证。估计陆定一同志不一定知道此事，你可以同陆定一谈谈，请他配合查证。如果真是严慰冰写的，就请陆定一回避一下。”彭真听了着实吃了一惊，问道：“到底写了些什么呢？”刘少奇回答说：“还不是说叶群婚前生活不检点，已不是处女了……”彭真急迫地问：“那叶群同林彪结婚前到底是不是处女呢？”刘少奇笑笑说：“那我们怎么可能知道呢？只有林彪同志有发言权啊！”其他常委听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彭真一点也笑不出来。多事之秋，偏偏陆定一家出了这么件事，无论这件事如何处理，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五人小组的工作，而陆定一又是小组里自己的最得力的助手。他回到家里以后，便打电话约陆定一到自己家里来一趟。陆定一以为是汇报提纲的事，第二天上午就赶到彭真家里。彭真跟他说了几句工作上的话，便打开保险柜，把一选材料递给他。陆定一刚想说话，被彭真用手势止住：“你先看看吧。”陆定一打开卷宗口袋，原来是一沓照片，照片上是一些书信。他看着书信，觉得字体比较熟悉，便问彭真：“这都是些什么书信啊？”彭真告诉他：“这都是自1961年以来有人写给林彪的匿名信的影印件，许多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是传单。中央认为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特命公安部侦破。”陆定一急问道：“那么查清了没有，到底是谁写的啊？”彭真用手指指照片：“你见没见过这种字体？”陆定一想了一下，头脑里“嗡”地一声：“难道是她？”彭真点点头说：“正是的。经公安部多方查证，写信人就是严慰冰。”陆定一急忙解释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可是一点也不知道呀，就连林彪有几个孩子我也是看了这些信才知道的呀！我请求中央对我审查。”彭真安慰他说：“定一，你别着急呀。难道你没有看出来中央对你还是信任的嘛。这些信是否为严慰冰所写，还要进一步查证，你能不能想些办法？”陆定一想想说：“严慰冰正在练钢笔字帖，我把她的字帖拿来，请公安部进一步核对。”彭真说：“很好，就这么办吧。”

当天陆定一回到家里，见严慰冰正在练字，不禁气不打一处来。他勉强按下火气，若无其事地和她聊会儿天。第二天，他带了几幅严慰冰写的字送给彭真。过了五天，陆定一去怀仁堂开会，会散后，彭真把他单独留了下来，严肃地说：“公安部核对了笔迹，认定匿名信是严慰冰写的。中央常委讨论了这件事，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中央常委认为你与此事无关，决定保护你。从现在起，你就住到医院去。过几天，我们一起到武汉向主席汇报，这期间，你千万不要离开医院噢！”

陆定一在医院里心神不定地住了几天，便得到通知，和彭真一起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不知怎么的，严慰冰得到了消息，赶来机场为他送行。陆定一不好与她说什么，扬扬手便上了飞机。严慰冰不知丈夫为什么对她忽然如此冷淡，很是不满。

彭真、陆定一、康生来到武汉后，立即乘车去武昌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东湖宾馆位于珞珈山下的东湖的湖心岛上，周围是万顷碧涛，岛上花草

茂盛，树大荫深，是武汉的著名风景区和避暑胜地。彭真一进入岛内就感到凉气袭人。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彭真的汇报，一直不置可否。彭真汇报完了，毛泽东神色冷峻地问道：“吴晗写《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有关系没有？”说完，逼视着彭真。彭真坦然地说：“根据调查，《海瑞罢官》和彭德怀没有联系。”毛泽东拉长声音反问道：“是吗？我听康生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康老，你说是吗？”康生吱吱唔唔了几句，别人也没听清他说的什么。毛泽东也没有再说什么，把茶碗的盖子扣在茶碗上，表示送客。

彭真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常委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中央常委见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汇报提纲，以为毛泽东基本同意了，便让彭真代中央写了批语，把“二月汇报提纲”发了下去。

彭真以为“二月汇报提纲”经毛泽东审阅，从此可以把涌动的那股给全国人民可能带来巨大灾害的祸水的澜头按下去，但是他想错了。就在提纲发下去不久，江青就和康生跑到武汉向毛泽东告了状。江青这时刚在上海受林彪委托，搞了一个全军文艺座谈会纪要，把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打成是黑线专政。过去由于罗瑞卿的反对，她一直不能穿军装，现在堂而皇之地穿起了新式军装。其实，江青在过去不能穿军装怪不上罗瑞卿，因为穿军装就得佩戴军衔，江青没有军衔，自然不能穿军装。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军衔制度已于去年5月取消，新式军装没有任何标志，只在领口两侧缀有两块红领章，表示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软檐战斗帽上缀有红五角星帽徽，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所以江青现在可以很方便地穿起了军装。

人逢喜事精神爽，江青自延安和毛泽东结婚后，忍耐了二十多年，现在终于可以大露峥嵘了。

3月28日，江青约上康生、张春桥去武汉东湖宾馆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最近一直睡不好觉。江青、康生最近经常来反映情况，据他们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勾结在一起，要在二月发动兵变，杨尚昆私设窃听器私录他和常委的讲话。虽然他不太相信这些人的话，但还是采取了许多措施，收审了罗瑞卿。不料，罗瑞卿竟于3月18日跳楼自杀，虽然没有摔死，只是跌断了左腿，但已使毛泽东异常恼火。再加上严慰冰写匿名信，彭真又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决心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从哪里着手呢？就在这时，江青、康生又上门告状来了。

江青、康生事先已研究了汇报策略，决定挑选毛泽东最忌讳的事汇报，挑起毛泽东的怒火，尽速把彭真等人拉下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尽快爬上去，汇报一开始，康生就挑拨道：“彭真他们是反对主席的，他们包庇吴晗，公然反驳主席，他们眼里还有主席吗？”江青火上浇油，紧跟着说：“北京已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再不采取果断措施，就要出大问题。”

毛泽东沉着脸，一直在静静地听，但他拿烟的手指却有些抖动。康生观颜察色，知道这些话打动了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听完汇报，一下掐灭烟头说：“我看是时候了……”

康生从武汉回来，变得不可一世，他把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找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中又添油加醋地加进去了许多自己的话。周、邓并不知

道康生等人去汇报的事，现在又不好打电话去向毛泽东核对康生传达的真假。不过从康生狂骄、蛮横的态度上，他们也猜到了康生这次是奉旨回朝，地动山摇。在康生的胁迫下，中央书记处只好召开会议，解决彭真的问题。会议从4月9日开始，连开四天，周恩来、邓小平在会上一言不发，只听康生在会上发言。这位专门靠整人过日子的斗争专家，一来是觉得已经撕破了脸皮，只有斗争到底才有出路，二是取得了上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所以放胆批去，整整讲了四天，用一句后来发出的中央文件里的话来说，就是“康生同志系统地批评了彭真同志在这次学术批判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康生批彭真这般卖力，陈伯达唯恐落后，论功行赏起来没有自己的份，也不时地用他的福建方言大讲一通，就是所谓的“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了彭真同志的一系列严重错误”。

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与其说是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参加，不如说是康生主持，陈伯达参加。周恩来、邓小平一心想保护彭真过关，康生、陈伯达则用毛泽东的指示来压他们，逼着中央书记处通过决议，撤销“二月汇报提纲”。

其实，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只不过是一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刚开完，毛泽东便通知中央常委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南下，他在武汉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更是声嘶力竭地大骂彭真，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央决定撤销“二月汇报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以康生为顾问，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因带头发难有功，都进了文化革命小组。从此，江青就以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从幕后站到了台前，假毛泽东的威信而对其他上自刘少奇，下至黎民百姓的共和国公民任意笑骂了。

整倒了彭真，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又接着整陆定一和杨尚昆了。

4月28日，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到陆定一的住所中南海增福堂。陆定一这时已经去了南方，家中只有严慰冰在家。这位副部长也是严慰冰的熟人，他进了增福堂，对迎上来的严慰冰说：“老严啊，中央组织部通知我们，想动动你的工作，你这职务也是该动动了。”严慰冰有点意外地说：“怎么我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啊？”副部长不以为然地说：“你想想，这样的事怎么能事先告诉你呢？快走吧，车子在前面等着呢。”严慰冰一看中组部催得这么急，便跟着副部长出来。怀仁堂前的大平场上，果然停着一辆高级“吉姆”小轿车，车里已有两人。副部长把她请上车后，吉姆车立即开动，车子顺着沙滩的五四大街往前开去，奇怪的是并没有向西往西四南大街的中组部开，而是东拐西拐到了一所高墙上围着铁丝网的大院门口。这不是监狱吗？严慰冰刚想喊叫，车里的两个人按住她的肩膀，给她戴上了手铐，立即把她带到了审讯室。审讯室里已坐着几个警官，一个警官扬扬手中的照片，低声威严地说：“我看也不用多讲了，你就老实招供吧。”严慰冰见事已至此，抵赖也没有用，索性借这个机会把林彪家的丑事抖搂一番吧，便讲起她为什么要写叶群的匿名信的事由来。

原来叶群本名叶宜敬，在北京上过中学，抗日战争时期来到延安。叶群生活作风不好，婚前曾多次有桑中之约，来到延安后，又和林彪挂上了勾，挤走了林彪的夫人陕北米脂人刘某，她和林彪正式结了婚。初夜就选在叶群

月事之期，林彪也被她瞒哄过去。叶群自从成为林彪夫人，颐指气使，后来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更是狐假虎威，令人反感，对于林彪前妻的女儿也是备加歧视。严慰冰看不惯，便来抱打不平，没想到铸成大案。

叶群结婚时是否还是个处女，本是个人生活小事，没想到却成了中央政治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5月初，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所有的会议决议都已由毛泽东审定下来，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做的事就是按照毛泽东的决定，对这些决议表决通过。会议的主要议程是成立专案组，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也就成为打倒陆定一的主要理由之一。会上为了“揭露”严慰冰和陆定一攻击林彪的“罪行”，林彪还当众写了一个证明，证明叶群和他结婚时是个处女。这个证明在会上被宣读了，参加会议的许多人直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堂堂国防部长当着这么多各路诸侯的面来证明自己的老婆的贞洁，岂不是大煞风景么。俗话说，屎不臭，挑起臭。林彪这么一证明，大家反都知道了叶群原来是这等货色。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中央立即发出由毛泽东指定康生等人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文件因为是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也叫做5·16通知。通知在痛骂了彭真一顿后通知全党：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立即被软禁起来，北京市委被改组，吴晗被囚禁，邓拓自杀，全国政治气氛陡然紧张起来。这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也被迫自杀。

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原本在会议结束后即赶回广州，不料他被留了下来，中央领导要找他谈话，直至5月29日，他才心事重重地回到广州。他的夫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志好生奇怪，再三追问，陶铸才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呀，中央决定调我当中宣部长。”曾志立即反对：“你不合适，中宣部长要理论文化，文字水平很高的同志担任，你胜任不了。”陶铸点点头说：“紫阳同志也认为我不太适合这个工作。”曾志果断地说：“你向中央提出辞职。”陶铸摇摇头说：“没那么简单，中央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辞是辞不掉的。”曾志担忧地说：“你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现在又是这样的形势，我担心搞不好会栽大跟斗。”陶铸无可奈何地说：“可我是个党员啊。”曾志到此也无话可说，给他简单收拾了点行李，陶铸便乘火车北上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五十九回 乱北大聂元梓领贴大字报 稳首都刘少奇主派工作组

话说 1966 年 5 月北京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陶铸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文办主任，在行政上他已是国务院副总理，这样，现在他一身荣兼数任。在有些人看来，陶铸是中国政坛上正在冉冉上升的一颗明星，唯有他的夫人曾志对此番升迁反应冷淡，提醒陶铸小心摔得粉身碎骨。

曾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就在中央下令调陶铸进京的当口，在钓鱼台里，当今政治核心圈中的两位实力人物正在议论即将到任的陶铸。钓鱼台地处北京城西，北宋时，曾有人在此地的小湖中筑台钓鱼，因而得名。建国后，这里被建为国宾馆，园内流水淙淙，亭台翼然，一栋栋风格各异的豪华别墅式小楼散布其间。只有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级的国宾来访时，才有资格被招待住进国宾馆。“五·一六”通知一发，文化革命狂飙骤起，这里即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驻地。此刻，住 8 号楼的康生和住 15 号楼的陈伯达在园内一边散步，一边议论。康生瘦而高，陈伯达矮而胖，一个山东口音，一个福建方言，但这并不妨碍二人进行密谋。

康生交底说：“陶铸是黄埔五期出身。他的上升是在东北，林彪很重用他。”陈伯达似有疑虑地说：“可是——陶铸在 1954 年的党代表会上，曾说过他当毛主席的学生不够格，愿意拜邓小平为师。他到中央，能带头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吗？”康生拍拍陈伯达的肩说：“老兄，你不知道，陶铸以前对刘少奇开过炮，二人积怨较深。这是一个大炮筒子，主席很重视他。这几年他的职务上升很快，去年他任中南局书记兼国务院副总理，现在又兼任中宣部长、中央常务书记、文办主任，一身而五任焉。我们要多拉拉他。”陈伯达点点头，还想说什么，康生看看表说：“我得回去一趟，今晚有要事安排。”陈伯达问道：“急什么，这么晚了——”康生打断他的话，诡秘地说：“这事慢不得，你瞧着吧，有好戏看。”说完招招手，一辆大红旗轿车悄然而至，康生坐上轿车，出园而去。

康生刚刚回到自己在鼓楼大街的住宅，门卫进来通报：“她来了。”康生连声吩咐：“请，快请。”不一会儿，一个四十多岁、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妇女由门卫陪着走了进来。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立即迎上前去，拉住来客的手，亲热地开玩笑道：“元梓，一进城你就扎进了北大的高楼深院，也不来看看老同学。”来客客气地回答说：“哪能呢，我是怕首长忙，不好随便打扰。”曹轶欧说：“看你说的，首长今天专门等着你呢，咱们快走吧。”

两人走进餐厅，康生正在餐厅里等着，来客恭敬地致意道：“首长好，首长身体好吧？”康生笑笑说：“马马虎虎吧。聂元梓同志，你现在还在北大哲学系吗？”聂元梓勉强地挤上了一丝笑容说：“首长记得这样清楚啊。是的，我还在北大哲学系工作，任党总支书记。”康生皱皱眉头说：“你是很有能力的嘛，怎么到现在还是个哲学系总支书记，真不像话。”聂元梓酸溜溜地说：“首长过奖了，我就这么大点能力，哪还能指望提拔呢。”曹轶欧拉拉聂元梓说：“别尽顾说话了，快入席吧。我今天特意请了一位高级厨师，咱们一起叙叙旧吧。”

三人入席后，服务员开始上菜，冷盘热炒，样样精致。聂元梓过去来过康家，从来没有受到如此盛情款待，不觉有些受宠若惊，暗暗思忖，康生夫妇肯定有求于自己，但又不好多问。康生夫妇呢，只是不停地劝酒布菜，饭局以外的事只字不提。

酒足饭饱，三人回到客厅，品评着香茗，康生夫妇才把话引到正题上来。康生缓缓地说：“你的事轶欧已经跟我说了多次。你和轶欧是延安时的老同学，你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屈居一个大学的系总支书记确实不是回事，所以我一直想着你的事。现在有一个机会……”讲到这里，康生打住话头，眯起眼，仔细地打量着聂元梓，观察她的反应。聂元梓一听说有个机会，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首长的意思是……”康生接过话头，诡秘地说：“中央今天通过了一个五一六通知，撤销了二月汇报提纲，解散了五人小组，彭真算是完蛋了。可他还有大后台，要冲垮他的后台，单靠中央开会是不行喽，必须要发动群众，这就要有人敢出来点一把火，让全国都烧起来。你敢不敢干啊？”

聂元梓听了大吃一惊，暗自思考着，彭真的官就够大的了，他还有后台，那肯定是官职比他更大的人，这会是谁呢？那就只能是刘少奇了。向这样大的人物开火，搞不好会粉身碎骨的。康生看出了她的心思，进一步劝道：“你好好想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冲上去了就是大功臣。错过这个时机，你要后悔一辈子。”聂元梓权衡利弊，下了决心：“干！”康生笑了：“这就好。其实呢，要你干的事也很简单。这是一个材料，上面列着北大与北京市委的罪状提纲，你按照这个材料，在北大贴一张大字报出来。”聂元梓接过材料说：“好，我一定照首长的指示去做。”康生叮嘱说：“要快，越快越好！”聂元梓决断地答应道：“首长你放心吧。”

聂元梓回到北京大学后，连夜找了几个一起商量写大字报的事。经过一番密商，他们准备把大字报的矛头集中指向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和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珏云。大字报写好后，聂元梓又掏出钢笔在文章最后加了一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鬼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大字报定稿后，聂元梓指挥其他人把大字报用毛笔抄好，然后用毛笔在后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其他人也依次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时已是5月25日上午，聂元梓带着大家来到学生大饭厅前，在东墙上把大字报贴了出来。

北京大学，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是中国政治气候的晴雨表。近日来报纸上声讨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连篇累牍，篇篇都是杀气腾腾，邓拓已经自杀。前几天，又传达了中央下发的“五·一六通知”，“通知”直接点名批判彭真，校园内到处是三三两两探测消息的人群。如果把这时的北大比成为一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是一点也不过分的，现在所缺少的就是一根导火线了。聂元梓领着贴出来的大字报犹如一根点燃了导火线的导火线，一下子把这桶炸药引爆了。顿时，校园里贴出了上千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到处有人找聂元梓辩论。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的师生也都纷纷跑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北京大学犹如闹市那样热闹。

周恩来已经派人抄来了大字报底稿，他看着看着，不禁感到十分恼火，只见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干了些什么？”大字报攻击宋硕等人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到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方式。”周恩来看完大字报，

立即把秘书找来，吩咐他说：“你去北大一趟，找到聂元梓，就说我说的，她这样做是十分错误的，违背了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的规定，必须深刻检查。”

秘书走后，周恩来又看看大字报，深感这张大字报大有来头。如果不是有人授意和支持，她聂元梓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干这事。到底是谁支持她这么干的呢？他想了一下，恍然明白，肯定是康生干的。

康生这时心情十分紧张，生怕聂元梓顶不住，说出实情。特别是当他听到周恩来派人批评聂元梓的消息后，更有点坐不住了，赶紧派人把大字报底稿送给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激动地说：“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写得是何等地好啊！”他立即给康生打电话，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康生接到电话，一看时间已经是6月1日下午了，赶紧找来几个人，布置晚上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广播这张大字报。有人提出，聂元梓政治上、生活上有不少问题，太臭，北大没有几个人支持她。康生恶狠狠地一拍桌子说：“别讲了，她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和首都许多大学一下子乱了起来，大字报满墙满院都是，学生教师也分成两派，互相辩论。康生原来担心事情有变，现在大字报一广播，顿时轻松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感慨万千地对曹轶欧说：“啊呀，聂元梓的大字报一贴出，周恩来派人去追查，我真担心主席下不了决心。现在好了，大字报广播了，我们都解放了。”

这时，陈伯达接受了毛泽东的命令，进入人民日报社，接管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6月1日，他们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6月2日，又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宣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首都的许多大学，开始出现揪斗领导干部和教授的违法事件。

陶铸就是在这个时间进北京的。他离开广州的当天晚上，就在列车里听到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当时就觉得不对劲儿。给党委贴大字报，这不就是当年右派干的事儿吗？既然广播了，也就是提倡的意思嘛，这样一来，岂不是天下大乱了。6月4日，车抵北京，这时北京市委已经改组，北大党委也被改组，北京的政治气氛异常紧张。陶铸下车后，立即住进钓鱼台国宾馆。康生和陈伯达听说陶铸到了，立即去了9号楼看他，一则是拉他，二则是摸摸他的底牌。陶铸并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底牌，见了康生和陈伯达就着急地说：“现在北京的这些大学乱得很，得想个法子才行，我看派工作组是个办法。”康生摇摇头说：“现在是群众运动，谁个劣，谁个不劣。群众看得最清楚。”陶铸立即顶起来：“照你这样说，那还要共产党干什么，怪事，共产党的天下不让共产党当家。”康生劝道：“老陶，你刚来中央，有些事多想想。运动刚开始，先不要急，看看再说。”

康生和陈伯达辞别出来。陈伯达问：“你对老陶印象如何？”康生笑笑说：“一头牛！他还不摸底，得让江青同志给他透透底，让这个蛮牛去顶中国的赫鲁晓夫。”

康生、陈伯达走了后，陶铸想了好久。形势的发展果如曾志所预料的那样越来越复杂了，现在自己该怎么办呢？毛泽东远在杭州，在北京主持工作的是刘少奇。过去为工作上的事，陶铸顶过刘少奇一次，刘少奇后来找他谈了一次，把事情说开了。虽然如此，二人之间总还存在着一些芥蒂。不过为

了尽快结束北京高校中的混乱局面，陶铸顾不上这些了，他决定立即去找刘少奇，把自己的想法谈出来。

出乎陶铸的意外，刘少奇极为赞赏他的想法，他焦急地对陶铸说：“我一直在打电话，向毛主席请示。毛主席总说不要急着派工作组。我和总理、小平等同志商量了一下，他们也都感到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必须把首都的严重情况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你也去吧，你刚从地方来，没有框框，看问题更客观一些。”陶铸同意了：“我一定去。”

6月9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坐飞机赶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情况。

刘少奇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在北京主持工作，自然是由他首先汇报：“主席，北京的情况很严重，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人都被学生揪斗，党委已经瘫痪。”刘少奇向来以冷静、沉着著称，但在说这几句话时，明显地流露出急躁和不安，他接着汇报说：“北京新市委为了稳定学校秩序，建议仿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向各高校派工作组。”

与刘少奇急躁不安的心情恰好相反，毛泽东显得轻松愉快。他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满不在乎地说：“乱一点怕什么，先让他乱一阵子。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是自古治国的好办法。”

陈伯达立即附和道：“主席说得对，我是不同意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要把群众当阿斗。”陶铸立即顶他：“派工作组是我们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相信群众，群众还得由党来领导嘛。”

于是，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派，一种主张不派，大家在毛泽东面前争论起来，各自把理由摆足了，然后静下来望着毛泽东，听他最后裁决。毛泽东望望大家说：“这件事不要急，工作组可以派，也可以不派。”这话虽然有点让人感到模棱两可，但主要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并没有积极支持派工作组。刘少奇感到心中无数，请求说：“下一步怎么搞，我确实不太清楚，还是请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吧。”毛泽东摆摆手，坚决地说：“我这里有些事走不开，北京的事你们商量着办吧。”谈完端起了茶杯。

刘少奇、邓小平这次来汇报，本想得到明确指示，但结果还是不得要领，两人多少有点失望地回到北京。这时不仅北京大乱，全国也开始乱了起来，北大发生的事在全国那些重点大学里都发生了，各地告急文书都涌到了中南海，一些大学的师生跑到中南海门口请愿，要求尽快恢复高校秩序。怎么办？刘少奇有点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催促说：“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派工作组。”刘少奇为难地说：“可是，主席没有明确表态说派工作组啊。”邓小平接着话头说：“可也没有表态说不派工作组啊。”刘少奇还下不了决心：“小平，我有难处。我是主持中央工作的，万一主席翻脸，不好交待啊。”邓小平说：“那好办，我们做出决定，请主席指示不就得了。现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全党都看着你呢。”刘少奇没有说话，点了支烟坐在藤椅上抽了起来。邓小平也点上烟，两人谁也不说话，像比赛似的狠劲地吞云吐雾。忽然，刘少奇站起来，神色断然地说：“开！派工作组，我要向党、向国家、向人民负责。”邓小平一把掐灭烟说：“我马上去通知。”

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了，中心议题是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首先反对：“主席没有同意派工作组，工作组不能派。”邓小平反驳说：“主席也没有说不同意派工作组啊。”陈伯达诘难道：“那怎么理解毛主席的话？”邓小平嘲弄地说：“主席的意思很明白，可以派，也可以

不派。这是主席告诉我们，需要就派，不需要就不派。现在需要不需要啊？”许多政治局委员拍手称妙，陈伯达狼狈不堪地低下了头。

刘少奇按按手，示意大家静下来，宣布说：“我已向主席打电话请示了，主席同意派工作组，这是电话记录。”他把电话记录交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又传给陶铸，陶铸吼道：“快派工作组，工作组就代表党的领导，要快派，就像消防队救火那样。”邓小平拍了一下桌子，强调说：“老陶说得好，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现在我来念一下工作组名单，北京大学是张承先，已经去了。北师大是孙友渔，人民大学是赵一萍……”

工作组带着神圣的使命，立即进驻各大专院校，许多师生看到工作组进校松了一口气，终于可以恢复校园的安静了。

康生、陈伯达见自己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立即向江青告状，要她向毛泽东反映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他们又另外找来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这几个带头闹事的人，向他们密授妙计，三人得示而去。第二天，这几个大学里立即出现骚乱，酿成一个个事件。

首先是北京大学出现了大规模的骚乱。6月18日上午，一些学生在聂元梓的指挥下，随意到校园内的各办公室和教授住宅，把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和教授抓出来，两个按一个，在他们的脸上涂上墨汁，戴上用字纸糊的高帽子游街示众；到处设置斗鬼台，把教授们推上台去，反剪两臂，使劲按下脑袋，形如苏制米格喷气式战斗机。一些流氓乘机摸女学生的胸部和大腿，校园里一派混乱恐怖的景象。

驻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事先已经得到一些报告。据查，昨天晚上，有的人和校外电话联络密切，今日一早，又发现几个身份不明的人骑着自行车满校园跑，他们跑到哪里，哪里就出现骚乱。张承先立即把工作组成员召来开会，要大家立即出动制止事态的发展，张承先自己也跑到两个斗争点讲了话，要他们立即释放被抓的教授。慑于工作组的威力，这些学生被迫释放了那些领导干部和教授。

江青得知北大发生的事件后，立即向毛泽东写信，诬告北大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毛泽东这时已不在杭州了，他于六月中旬离开杭州后，到韶山的滴水洞住了一段时间。这个居处离韶山毛泽东故居不远，位于半山坡上，地形隐蔽，风景优美，毛泽东在这里住了十几天后，又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武汉。为什么说是白云黄鹤的地方呢？原来武汉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古时有仙人乘黄鹤来到武汉，栖止数日后又乘鹤而去。后来武汉人根据这个传说，在黄鹤栖止的长江岸边修建了一座黄鹤楼。唐诗诗人崔颢登黄鹤楼，面对奔流不息的大江，深感人生易逝，乃慨然命笔，写下了千古绝唱《登黄鹤楼》，其中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所以后来人们也把武汉叫做白云黄鹤的地方。

毛泽东回到武汉后，天天看材料，很有兴味。自5月以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每天都在报眼位置刊登毛泽东语录，报纸上的文章，凡是毛泽东的话都用黑体字标出，所以现在看报纸的版面，如同一个个大麻眼，毛泽东看着很不舒服，心里想道，我这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历来不相信。现在可好，叫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毛泽东很想下一道命令，停止这样的宣传，可是转而一想，不行，这样做，无异于给左派泼冷水，帮助了右派。想到这里，毛泽东放下毛笔，叹口气，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逼上梁山啊！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

人，自己这还是第一次呢。

毛泽东放下报纸和文件，在房间里扭动身子活动活动。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三国名医华佗。毛泽东对华佗很敬仰，曾在一首诗里写到过他，这时又怎么想起了华佗呢？原来华佗创编健身操“五禽戏”，这里的禽泛指动物，非特指禽鸟而言。“五禽戏”是模仿老虎、猴子、鸟等动物的行动特点而编成的健身操。建国后，有人把它又发掘出来，在民间推广，毛泽东来往于湖南、杭州、武汉、上海之间，经常看到有人做“五禽戏”，现在他在房间里活动身子，联想到五禽戏来，不由得模仿起来，先学老虎潜行，后学猴子抓耳，毛泽东不禁笑了，学得还挺像，暗自想道，看来自己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什么顶峰？瞎吹什么呀，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吹得越高，跌得越重。他们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活动了一会儿身体，毛泽东又拿起文件读起来，这是林彪5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专讲政变，历数国际国内政变事例。毛泽东读了，心里一惊，还没有人这样讲过政变问题，同时心中也有些不安。这个文件中央催着要发，毛泽东本不想批，但想想不能给左派泼冷水，就批示同意下发。

批完了文件后，毛泽东感到有许多话要对江青说，便提起毛笔写起信来：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十回 批刘邓江青交底 讲党性陶铸换头

话说江青接到毛泽东的长篇复信后，发现毛泽东对林彪的做法不满，认为自己被迫当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钟馗。看到最后，只见毛泽东在信上叮咛自己，这封信现在不能公开；又告诉自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江青看完了毛泽东的信，心中有了底，知道决战即将开始了。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乘专列回到北京，刘少奇得到报告，立即拿起电话同丰泽园联系，准备立即赶来向毛泽东汇报。卫士在电话里告诉他：“主席很累，正在休息，明天再汇报吧。”刘少奇失望地放下了电话。但是不久他就得到报告，毛泽东连连召见康生、陈伯达等人，听了整整一夜的汇报。刘少奇心中有些不高兴，按组织原则，应该先听取副主席的报告嘛。

第二天午后，刘少奇去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态度冷淡地说：“请吧。”顺手点了根烟抽起来。刘少奇汇报了北大聂元梓乱揪乱斗的事件，汇报了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闹绝食、向工作组长王光美施加压力的事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一句话。刘少奇汇报完了，满以为毛泽东一定会对自己派工作组的决策表示满意，谁知毛泽东严肃地批评道：“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一席话似暴风骤雨，一下子把刘少奇打懵了头。他有点不明白了，派工作组是主席同意了呀，怎么一下子变卦了。还未等他明白过来，毛泽东又下令：“把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就是那期登载张承先汇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材料的简报予以撤销，把工作组从大学里都撤出来。”

刘少奇尽管很有意见，但毛泽东一言九鼎。他还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通知全党：“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毛泽东回到北京，重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使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如打足了气的皮球一样蹦得更欢了。他们在北京的高校里窜来窜去，给聂元梓、蒯大富打气，听任他们缠住工作组，扩大事态。看着差不多了，陈伯达和江青就去北京大学煽风点火。

北京大学师生听说江青晚上要来讲，早早地聚集在校内的五四广场上。北京的夏天多雨，这天晚上又是小雨霏霏。广场上的灯都打开了。灯光里，学生仍打着伞，顶着塑料布，焦灼地望着广场入口处。

来了，一队队警卫战士进入广场，在主席台周围列队警戒，然后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依地位的高低，陆续进入会场，在主席台上就坐。

忽然，一队警卫战士开进广场，在入口处布下警戒，主席台上的官员们也都站立起来，工作人员在主席台前跑来跑去，神态格外紧张。广场上的学生们一看这架势，知道江青要来了，一齐朝入口处瞧去。只见几辆大红旗车在入口处停下来，一个身材修长，身穿军装的女人从第一辆车上下来，后面紧跟着陈伯达。顿时，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江青一边走一边含笑招手，神态分外潇洒。她走在主席台前的跑道上，思绪万千。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她，江青，一个上海滩上的三流女演员，终于挣脱了抗战初期和毛泽东结婚时政治局为她立下的不许参政的三条规定，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号施令了。一想至此，江青心中好不得意，大步流星地向

主席台走去。

江青登上主席台，随后陈伯达、康生也登上了主席台。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一看时辰已到，便站起来宣布：“同志们，中央文革小组今天来看望大家，现在请江青同志讲话。”北大学生们已从各种渠道得知毛主席回到北京，刘少奇、邓小平挨了批评，这时候，江青来北大讲话，肯定会带来不少的消息，所以不顾夜雨霏霏，个个聚精会神地听着。江青完全知道学生们的心情，一开始讲话就卖弄起她的权威人士的特殊身份来。她尖着嗓子，拉长声音喊道：“同志们，你们好，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学生们听了，顿时热血沸腾，整齐地呼叫着：“江阿姨，我们爱你。”聂元梓拉开破嗓门，在旁边的麦克风前喊起来：“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尖着嗓子喊道：“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

喊得正热闹的当口，广场上一角突然响起几百年轻人一齐朗诵毛泽东语录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夏夜的广场上，几百年轻人一齐朗诵着这句富有战斗性的哲言，格外令人振奋。人们循声望去，只见广场一侧，整齐地列队站立着几百名青年男女，个个身穿发白的黄军装，显然，这些军装是他们的父辈征战沙场的历史见证，因此，也是这些青年们高贵门第的象征。最惹眼的是这几百名青年男女的右臂上都戴着红袖章，袖章上是三个醒目的黄色毛体字“红卫兵”，大概是集字而成的。再看看，他们都戴着北大附中的校徽，原来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

红卫兵这个名字及其这个组织的狂热的好斗本性立即引起了全场人们的注意，自然也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立即借题发挥道：“小将们，我们支持你们，毛主席也支持你们。可是有人就不支持你们，他们背着毛主席，镇压革命小将。当然，派工作组我们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毛主席主张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可是毛主席的话他们不听，我的话更不听，可是有的人的讲话好像是圣旨一样，他们可听啦。毛主席回到北京，一看大学都关着门，心里很难过，立即开了中央常委会。中央认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决定撤销工作组。”聂元梓听到这里，激动地高呼起口号来：“感谢中央文革小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趁着聂元梓领着全场学生喊口号，江青喘了口气。等口号声停歇了，她突然尖声喊道：“我控诉！”师生们听了，一下子屏住呼吸，以为江青要透露重要新闻。江青尖声喊叫道：“她从来就不是我们家真正的儿媳妇，韶华是趁毛岸青神志不清骗他和自己结了婚。”江青的这句话纯属造谣诬陷。

果然是一条重要新闻，没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家里竟也和一般老百姓家一样在闹家务，这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许多人极感兴趣地听她往下讲。陈伯达却拍拍江青的肩膀，示意她不要往下讲了，江青也感到讲漏了嘴，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也有损自己“文化革命旗手”的形象，便连忙转口：“我不怕，我要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文革小组坚决站在革命小将一边，无条件地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江青讲到这里，忽然质问站在旁边的张承先：“你为什么要镇压革命群众？啊？我要你说！”张承先辩解道：“我们没有镇压革命群众呀！我们工作组只不过是制止了一些人随便打人侮辱人的不法行为。”江青冷笑道：“什么不法行为？天是无产阶级的天，法是无产阶级的法，我们就是要把那些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谁敢镇压群众，谁就没有好下场。”江青讲到这里，喘了口气。聂元梓乘机狂呼口号：“六·一八革命精神万岁！”

几个事先预伏在主席台两侧的学生冲上来，按住张承先，让他坐喷气式。江青从一个学生手里接过皮带抽打着张承先，嘴里还狠狠地嚷叫着：“我叫你镇压革命群众，我叫你镇压革命群众。”

看着张承先挨打，聂元梓高兴极了，带着她的那伙人上台台下地乱呼口号，但台下响应者寥寥无几。陈伯达知道江青带头打人失了身份，引起了众怒，赶忙跑过来救驾，对着麦克风喊道：“革命小将们，我是个小小老百姓，我要向革命小将学习，向革命小将致敬。江青同志的讲话是代表毛主席的，很重要，大家要认真学习领会。”

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成员当夜悲愤地离开了北大校园。清华大学工作组撤得却不那么顺利。由于首都的这几所高校中有许多高级干部子弟，刘少奇挨批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高校。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康生的支持下，清华学生蒯大富搞了个绝食事件，煽起部分学生对王光美的不满。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后，蒯大富立即反扑过来，揪住王光美不让走，周恩来得知后，派人以开中央会议为名把她接了出来。

王光美神情疲惫地回到中南海自己的家里，刘少奇歉疚地说：“都是我不好，让你受牵连。”王光美摇摇头，断然地说：“不，你没有错，你是对的。”她望望聚集在一起的沉默忧愁的几个孩子平平、源源、亭亭、小小说：“孩子们，你们要坚信，爸爸是对的。派工作组是中央集体做的决定，毛主席也是同意了。”王光美正在做孩子们的工作，刘少奇的二女儿刘涛从清华大学回来了。由于革命战争时期长期的动乱环境，刘少奇一生共结过五次婚，前四个妻子牺牲的牺牲，分离的分离，留下了允斌、爱琴、允若、刘涛、允真五个孩子。刘涛和允真的生母是王前，现在还健在。前面几个孩子都工作了，刘涛还在清华大学念书，王光美待她如同己出，照顾甚周，这时她见刘涛回来，张罗着要厨师做几个好菜、孩子住校，生活上清苦些，前段时期刘涛又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起忙着学校里文化革命的事，累坏了。

但是，刘涛今天满脸愁容和困惑，不理睬王光美的嘘寒问暖，直截了当地问刘少奇：“爸爸，你到底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背着毛主席派工作组？”刘少奇面对女儿的责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好保持沉默。王光美向女儿解释说：“涛儿，派工作组是你父亲请示了毛主席的，是毛主席同意后中央集体做的决定，你父亲的错就在于他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他不承担责任谁承担？”刘涛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继续追问道：“爸爸，你推行错误路线并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啊？”刘少奇猛抽烟，脸色阴沉，继续保持沉默。王光美忍不住向女儿又解释说：“涛涛，你不要逼父亲了。你父亲是中央副主席，有许多事情是不能跟你讲的。”刘涛这时翻脸了，站起来指着王光美吼道：“你不要解释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吧。”王光美没想到刘涛这么绝情，不禁悲愤交集：“涛涛，你太没良心了，你看着我们落了难，就这样欺负我们啊！”刘少奇掐灭烟，转过身来对刘涛严肃地说：“好，我来回答你。你知道吗？有人在清华大学设了个陷阱让我和你妈跳。蒯大富绝食，完全是康生在后面支持的，我当面问他了，他没否认。你现在明白了吧，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单纯。如果你想保自己，和我们划清界限，那也可以。”

刘涛听完父亲的话，没有再说什么，跨出了这个她以前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家。离开家门前，她不禁恋恋不舍地回头望了一眼，只见父亲、继母满脸的悲愤，但哭红的眼睛中又明显流露出疼爱 and 期待的目光。刘涛心里一酸，

二十几年的养育之恩，就这么一刀切断，她心里也有些不忍。但想到这个永远不会再翻身的家庭将会给自己带来的损害，毅然回头走了。

刘涛的出走沉重地挑断了刘少奇、王光美感情上的一根弦。王光美提醒刘少奇说：“涛涛被人做工作拉出去了。看来形势的发展凶多吉少，你要有所准备。”刘少奇还抱有信心地说：“主席历来是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再说，我有多大的错呢？唉，现在真有点无所适从，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我也不晓得。明明是对的，人家却说你错了……”

刘少奇确实不知道这个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但有几个人知道，江青就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个。现在，她正在找已搬到中南海的陶铸，向他交底。

说起来，陶铸和江青也是老熟人了。江青经常去广州休养，陶铸和曾志总是热情款待。别人在这位第一夫人面前都是恭敬之至，大气都不敢出，唯有陶铸可以无所顾忌地和她大叫大嚷。但是现在当江青一身戎装地闯入陶铸在中南海的新居时，陶铸却居然拘谨，客气起来。因为他明白，现在他面对的不再是那位牢骚满腹的无所事事的女人，而是正在受到毛泽东宠信的，专以挑弄是非为其职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她由于是主席夫人，还有着了解和传达中枢要旨的特殊身份。在动乱的今天，这些都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更何况，她今天来是向陶铸下达一项重要作战任务，这个任务又使陶铸十分头疼。

江青进来后，在沙发上坐下，头一句话就噎得陶铸说不出话来：“噢，你搬家了，为什么不在钓鱼台住呢，在那里我们可以互相商量呢，别忘了你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呢。你是不是嫌文革小组名声太小，不如国务院响啊？”陶铸摇摇头，半天才说：“哪能呢，在广州我是西瓜，在中央只能是个芝麻哩！”江青认真地说：“你是芝麻？你才不是芝麻哩。你是西瓜，主席很器重你，林彪同志也很看重你。过去我每次到广州，你们每次都热情款待，我也很感谢你哩。”

陶铸心头滚过一阵热潮，连说：“应该的，应该的。”江青脱下草帽说：“虽说应该，也实难得。现在你到了北京，我也要多尽尽心。我问你，政治局生活会上的发言，你准备好了吗？”江青指的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政治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的生活会。陶铸在8月1日就得到了通知，让他准备发言。但是陶铸却一点没有准备，因为他一直到现在也看不出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有什么错误，更何况他对刘、邓在前几年的一些纠正浮夸错误的一些措施是非常赞成的。他不想乘人之危，落井下石，还要讲讲党性嘛。

江青看看陶铸吞吞吐吐的样子，知道他没有准备，便拉拢说：“你是左派，你早就向刘少奇开过炮嘛。”陶铸一听，血液都似乎凝固了，同刘少奇争论过就是左派？难道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党内高层领导间存在着这么大的裂痕，这太可怕了。江青看陶铸脸色沉重，诚挚地说：“你知道了吧，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底。多少人想摸这个底，我们都没有告诉。你是左派，是西瓜，你最有资格开头炮，所以我只向你交这个底。”

陶铸听了江青的话非常反感，这不是拉帮派、搞阴谋么。他暗下决心，宁死也不参与这种活动。然而当面拒绝江青的要求也不好办。陶铸喘着气，艰难地说：“不行，我不能开头炮。”江青以为他害怕，鼓励地说：“怕什么，主席给你撑腰，我们都和你站在一起，你还顾虑什么，你以前不是朝刘少奇开过炮么。”陶铸摇摇头，苦笑着说：“我——不能落井下石。”江青

这才明白陶铸的心思，原来他对刘少奇、邓小平还蛮有感情的。她后悔自己看错了人，冷冷地说：“你很有人情味嘛。”

江青失望而又气恼地从陶铸住所出来后，又去找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一听江青要他打头炮，一口答应。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许多中央委员被冲击未能到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校的聂元梓等人列席了会议。全会开始后，毛泽东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生活会。他宣布开会的话音刚落，谢富治就抢先发言，气势汹汹地大批刘少奇、邓小平的路线错误。谢富治是二野出身，备受刘伯承、邓小平信任，曾担任陈赓兵团的政委，协助陈赓抢渡黄河，展开战略反攻，这个兵团当时号称陈谢大军，是二野最强大的主力兵团。现在，他为了邀宠，当左派，不顾做人的起码品德，拼命往刘少奇和自己的老政委头上泼脏水。在谢富治凶猛攻击的带动下，有些人也跟着发言。毛泽东的目光在陶铸身上扫来扫去，陶铸有些慌神，他用求援的目光看着周恩来，只见周恩来埋头喝着香茶，一声不吭。陶铸有了主意，也学着周恩来的样子品评香茶，生活会开了几次，两人一起品尝，始终一言不发。

当然，这期间陶铸也不是没有动摇过，特别是当林彪激烈地批判刘、邓时，陶铸暗想，难道是我错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他尊重林彪，林彪信任他，把他提拔为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林彪南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又推荐他主持中南第一大省的工作。陶铸对林彪向来非常佩服，每次进京，必先去看望林彪。现在林彪在会上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狠狠地批评刘、邓，从感情上讲，陶铸觉得应听毛主席、林彪，但实际工作的经历又告诉他，刘、邓是对的。陶铸见周恩来始终不发言，心里也就有了底。

中国的京戏里，每有统帅出场时，总是先有小兵出来摇旗呐喊，接着将军们依次上场摆队，等到戏台上站满了小兵将军时，统帅才在幕后大叫一声，这时观众都知道主角要出场了，个个屏息静气地观看。只见那主帅倒退着出场，故意不让人看见他的扮相，到了台前，主角才做一个漂亮的动作，猛然转过身来，这就叫亮相。

政治局生活会开了几次，林彪、谢富治这些开头炮的，打先锋的摇旗呐喊过后，主帅该上场了。主帅就是毛泽东。8月5日，毛泽东出场正式亮相，在全会的会议厅门口贴出了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但是，有很多政治局委员并没有“深醒”。周恩来没有讲话，但他内心深处是同情刘、邓的。过了两个月以后，他终于冒着被打倒的危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保护刘、邓。陶铸也没有“深醒”，两个月以后为了保刘、邓，他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八届十一中全会自毛主席贴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会议集中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会议最后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取消了中央副主席的职务。刘少奇的政治地位从以前常委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过了九天，中央又宣布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样，新的中央领导班子中毛泽东是中央主席，林彪是副主席，其他人一概都是常委。文化革命的领导体制正式形成，刘少奇被取消了接班人的地位，林彪成为新的接班人。

这个名单的出现，其中缘由人们都已经明白。奇怪的是陶铸拒绝打头炮，居然升为党内第四号人物，陶铸百思不得其解，只认为是毛泽东赏识他的忠贞的品格。全会结束后，他继续照着自己的想法干下去了。

转眼就是 1966 年的国庆节了，毛泽东要在国庆节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组织原来发源于清华附中。这年 5 月 29 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高三班的几十名高干子弟在附近的圆明园旧址集会，仿效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决定成立一个战斗组织“红卫兵”，参加该组织的，最初都是高干子弟，人人身穿父辈穿过的发白的旧黄军装，右臂上佩戴“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回京后给他们去了一封信，对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 月 18 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他身着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上，一些红卫兵代表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师大女附中的一名女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广场上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欢呼雀跃，红卫兵运动一下子在全国铺展开来。他们到处烧、砸、抢、偷，美其名曰“破四旧”，许多人被他们活活打死，千年古迹顿成废墟。此后，毛泽东又两次接见红卫兵，每次接见，广场上都是红旗如海，红卫兵们流着幸福的热泪，欢呼雀跃，如醉如痴。

国庆节后，新华社要发照片。按过去的规定，国庆节时报纸在头版要发毛主席和刘主席的照片，但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变了，怎么办？负责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宣部副部长熊复带着照片和一些工作人员请示陶铸，陶铸毫不犹豫地说：“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政治局常委，以前怎么发，现在还怎么发。”可是，新华社带来的照片中，没有邓小平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这可是个大照片，报纸上领导人排列数序的变化，照片上领导人的位置都成为红卫兵十分关注的事情，他们从这里分析中国领导层的变化，以确定哪些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可以去打倒。

陶铸想了一会儿，问新华社的同志：“有没有补救的办法？”新华社的同志回答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看照片上陈毅站在毛泽东跟前，他的身个和邓小平差不多，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大家又都穿绿军装，便说：“能不能把陈毅隐去，把邓小平移过来？”熊复说：“可以。”陶铸断然地说：“那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10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上，出现了毛主席和刘少奇、邓小平在一起的照片。还发了陈毅和毛泽东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了这张照片后，把报纸一扔，怒冲冲地嚷道：“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长到陈毅身上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十一回 救贺龙周恩来智布藏雄阵 保陈毅傅崇碧巧施脱壳计

话说江青看到10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领导人照片上，邓小平站在毛主席跟前，不禁大怒，朝着前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陶铸吼叫着：“这是见鬼了，邓小平的头怎么摸到陈毅身上去了？陶铸，你真会捣鬼，从哪里学来的换头术？”陶铸看着周恩来，周恩来翻着材料，似乎没有听见江青的话，可又马上合上材料，似乎是代陶铸回答：“现在开会吧，陶铸同志，你先说说吧。”陶铸是第四号人物哩，理当先讲。陶铸望望江青，好意地建议道：“江青同志在党政机关一直没有一个正式职务，这对于开展工作不利，我建议在党政机关中，给江青一个正式的职务。”

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后，当时中央政治局五大书记给江青立了个规矩，不许她干预政治，所以江青一直没有正式的党政职务。现在她虽然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还是希望在政治局和国务院有个正式的职务。周恩来是当年在延安给江青立规矩的五大书记之一，对江青进入政界，干预政治深感忧虑。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对江青职务的递升则各怀鬼胎。由于这些原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一听说陶铸建议给江青一个正式的职务，都注意地听着陶铸建议的下文。只听陶铸缓缓地说：“我想请江青同志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也比较方便些。”

陶铸讲这话没有一点贬低江青的意思。多少上将、中将，戎马征战一生，战功赫赫，也还没摊上个副部长呢。江青要功无功，要学无学，当个副部长也算是破格提拔了。谁知江青听了大为生气，她原以为陶铸建议她当政治局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没想到只是去当个副部长，她禁不住脸红耳赤地叫了起来：“亏你想得出，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周恩来知道江青野心很大，再说她的职务也不是他和陶铸能定的，便把此事用话岔开。谁知江青却不依不饶，挑起陶铸的毛病来：“陶铸，你总是说这个左派有毛病，那个左派是国民党党员，你不也是国民党党员吗？”陶铸见江青公然胡搅蛮缠，歪曲历史，气愤地斥责她说：“胡说，那些人是什么国民党党员，我是什么国民党党员，我是大革命时期奉党的命令跨党的国民党党员，当时毛主席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总理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事。你要是不懂，先去读读这段历史吧。”

自文革乱兴，江青这是第一次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训斥，顿时大喊大叫起来：“陶铸，你想镇压我！你敢给我气受，你等着吧！”陶铸也吼叫起来：“这是共产党组织，你乱干涉，还要不要组织原则？”江青听了，顿时哭起来，陈伯达、康生忙跑过来解劝，又帮着江青和陶铸吵嚷，中央文革碰头会闹翻了天。最后还是在周恩来的说劝下，会场才平静下来，但江青从此和陶铸结下了仇。

中央文革碰头会散会以后，周恩来急匆匆地赶回西花厅。他没有进办公室，径直来到西花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这是他和邓颖超的起居之所。他推开一间房子的门，朝正在吃饭的两个客人问道：“贺胡子，住的怎么样啊？”那两位客人闻声转过头来，原来是贺龙和他的夫人薛明。

贺龙为什么住到西花厅来了呢？原来这都是叫林彪、康生害的。林彪在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集中讲防止政变问题。据林彪讲，毛泽东在1965年底至1966年5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毛泽东说过这个问题，彭真的二月汇报提纲提出

后，毛泽东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在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泽东找人谈防止政变问题找的谁，林彪没有说。但要调兵遣将，那就少不了找林彪，林彪也乐得利用这个机会在军队等要害部门安插自己的亲信。

为了造成政变在即的恐怖感，以便进一步乱中夺权，林彪在这次讲话中，把中国历史上的政变历数一番，什么“玄武门之变”、“八王之乱”、“御河桥之变”、“商成逼宫”、“雍正谋位”等等，俨然是一位泛政变主义者。林彪的意思，无非是用政变吓唬毛泽东，让他把军权更多地让给自己，把军委中的陈毅、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贺龙、叶剑英六大元帅都打下去。

林彪的诡计还真没有白设。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彭真由于是分掌总参、中办、中宣、首都四大要害部门大权，被打了下去。林彪诡计初步得逞，接着就把手伸向仍在军委的六大元帅。但这六人都是开国元勋，功高位重，林彪难以下手。正巧这时，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贺龙、彭真勾结要在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驻兵，发动二月兵变。

林彪得到这个消息后心中暗喜，这张大字报是一颗炮弹，扔到哪里哪里就炸。但要把大字报变成炮弹还得加加工。自己身为副统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好亲自出面，想来想去，他想到了康生。此人是制造“莫须有”罪名的专家，只要他一张嘴，关羽也能被说成是奸臣。于是，林彪立即让叶群给康生打电话。康生正要午睡，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嘴里骂了一句“谁这么讨厌，偏偏在这个时候来电话”，拿起耳机，不耐烦地问：“谁呀？啊，是叶群同志。”康生的脸上立即堆起笑容，嗯啊哈地听起电话来，最后保证道：“请转告林副主席放心，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

放下电话，康生满脸浮现着得意的神色，又一个在林彪身上下本的机会来了。他立即把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召到钓鱼台，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是革命元老吴玉章，他年高体衰，不常到校，实际校务由郭影秋主持。此年5月，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解散，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郭影秋被调到北京新市委任书记，又代表华北局参加文革小组。

郭影秋被召到中央文革驻地后，康生当着许多人的面，劈头质问道：“郭影秋，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郭影秋点点头。“知道。”康生冷笑一声说：“既然知道，为什么不汇报？”郭影秋镇静地说：“这张大字报纯属子虚乌有。这事我知道的最清楚。当时北京卫戍区奉中央军委命令，为了加强战备工作新组建了一个团。但这个团的营房还没有盖起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就是在朝鲜战场率军血战铁原，掩护西线志愿军大部队转移的那位英雄军长）和我商量，能不能暂时借用一下人民大学的学生宿舍让这个团的官兵住一下。当时人民大学的许多学生下乡参加四清去了，很多房子空着。但我考虑到，校园里驻兵影响学校正常秩序，所以就拒绝了。后来这个团借用其他部队的宿舍安置下来。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根本不存在二月兵变的事情，所以也无须汇报。”

郭影秋可不是一般的文人，他是历史学家，著有《李定国》等晚明历史专著多本。同时他又是一员儒将，曾任军政委、剿匪司令等高级军职，所以在康生的突然袭击面前，镇静自若，把话讲得透彻明白，竟使康生无话可讲，大丢面子。康生十分恼火，指使一些学生揪斗郭影秋，把郭影秋从中央文革

小组赶了出来。不料郭影秋个人修养极好，待人和气，勤政廉洁。有晚他的夫人突患疾病（郭夫人也是高级领导干部），郭影秋一不叫车，二不喊人，自己背着夫人跑了五、六里路到海淀医院。医院领导大为吃惊，赶紧打电话叫人民大学派车来接。这郭影秋廉洁如此，对教授又非常关心，每月必看望所有教授一次。他对工人也亲如家人，每星期必和工人一起劳动一天。所以人民大学教授工人都非常喜欢这位温文尔雅的校长，一些学生受康生挑拨起来揪斗郭影秋，大部分学生都反对这样做，全校大部分工人和学生立即成立战斗组织保护郭影秋，为此两派学生在人民大学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彻夜辩论。会上，保护郭影秋的多数派据理反对揪斗郭影秋，全校工人和从乡下赶来的京郊农民（郭影秋在这里搞过四清）嚷着要把揪斗郭影秋的学生带到乡下去监督劳动，会场气氛非常紧张。

郭影秋是邓小平的老部下，邓小平听说人民大学学生辩论郭影秋问题，连忙赶来参加，从晚八时一直听到第二日黎明。最后邓小平讲话，他一口否认了二月兵变的事情，“二月兵变没有这个事，当时是新成立的一个团没房子住，跟人民大学借房，郭影秋同志没有答应，就是这么一件小事，不存在二月兵变的事。我们的军队是毛主席指挥的军队，谁都调不动，彭真也调不动，没有这回事。至于郭影秋同志，我是了解的，大家也都了解，是个好同志嘛。群众的眼睛是最亮的嘛！”邓小平的话博得了会场上数万人的掌声。

“不存在二月兵变的事”，这个消息一下子澄清了谣传。康生听了急了，也跑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会场上去讲话：“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事，是彭真策划的，他和一些人勾结，调动部队，在学校驻兵，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本来已经平息了的谣传叫康生这么一讲，又沸沸扬扬地流传开来了，各种简报、汇报如雪片般送了上去。康生又指使一些人把所谓的“二月兵变”和贺龙扯到了一起，他向一些亲信授意说：“二月兵变的后台是贺龙，他主持国家体委的工作，把体委变成兵变的大本营，给体委发了枪，发了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还在北郊修了碉堡。”体委确实有枪，但都是体育比赛用枪。凡是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用体育比赛用的枪支发动兵变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康生为了陷害贺龙，根本不管这些了，只要能安上的罪名，就捕风捉影地往贺龙身上栽。

周恩来知道林彪、康生居心不良，为防不测，干脆把贺龙接到了西花厅住下。

贺龙夫妇正在吃饭，周恩来进来后，他们站起来，周恩来忙让他们坐下，关心地问道：“住得怎么样用？”贺龙不安地说：“好是好，只是连累你了。”周恩来摇摇头说：“胡子，你怎么也和我客气起来了。”两人正聊着天，秘书推开门匆匆进来报告说：“总理，事情不好了，贺老总住在这儿的事不知怎么让他们知道了，林办打来电话追问呢。”贺龙一听“霍”地站起来说：“总理，你这儿我不能住了，我贺龙牺牲了没有关系，总理你可不能倒下去。只要你还当着总理，中国就有希望。”周恩来厉声命令贺龙坐下：“慌什么，你先在这儿住着。我给你安排一下，安排好了你再走。”贺龙听了只好乖乖地坐下来。

周恩来回到办公室，用电话召来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吩咐道：“小傅，贺老总现在遭了难，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先把他藏起来，别让红卫兵把他揪走。”傅崇碧想想说：“有，在西郊有一个小院子，就让老总先住那里吧。”周恩来挥挥手说：“走，咱们去看看去。”

周恩来的大红旗轿车沿着西长安街、复兴门内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往西开去，街上是一群群狂呼乱喊的红卫兵队伍，许多队伍还打着红旗行进着。周恩来看看他们身上背的背包，知道是外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现在，北京每天都有近一百万的外地红卫兵，大中小学都住满了，北京市的街道办事处都被动员起来接待红卫兵，这些都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一切都由国家免费供给，国库里本来不多的钱又花去了一大把。周恩来心里直叹气，灾难啊，民族的灾难！但是他对此毫无办法。身为国家总理，他能做的也只是巧妙地和文革小组周旋，尽最大的可能减小这场灾难。

汽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最后在西郊群山里的一个小院落前停了下来，这里茂林修竹，从外面看不见院落。院子里整洁得很，房子不算很好，但作为避难之所也完全可以了。周恩来很满意，叮嘱傅崇碧：“这里驻上一个加强连，一定要保证贺龙的安全。”傅崇碧说：“总理你放心吧。红卫兵是绝对不会从这里抢走贺龙的。但是中央派人来要呢？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周恩来叹口气说：“我明白，只要挡住了红卫兵，你就完成了任务。”

布置好了避难之所，周恩来连忙回到西花厅。贺龙问道：“总理，我可以走了吗？”周恩来点点头，难过地说：“胡子，你要保重噢。”贺龙点点头，和夫人薛明钻进汽车里，随傅崇碧而去。

贺龙搬家的事，立刻让林彪知道了，他立即下令逮捕贺龙，立专案审查。周恩来见事情捅开了，索性向毛泽东建议，由北京卫戍区成立特别监狱，把已被打倒分散看押的高级领导干部集中起来，由部队进行看护。周恩来最担心的是这些老干部分散各处，警卫混乱，以致被无法无天的红卫兵抓去。如果发生这样的事，这些老干部说被打死就打死了。如果把他们集中起来看护，就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虽然照样不自由，但人身安全总可以得到保证了，然后再等待时机，把他们逐步解放出来。这本来是周恩来想出来的保护老干部的计策，没想到却也正合了毛泽东的心意，一口赞成，并责成周恩来组织实施。周恩来立即把傅崇碧找来，要他组织特别监狱，告诉他特监的政策是名为特监，实为看护。傅崇碧完全领会了周恩来的用意，在北京城西的什坊院找了一所小山环抱的小院作为特监。特监里有一座二层小楼，小楼前后有两个院子，前院驻有一个连，后院沿墙的平房就是监所。平房都编上号数，每间住一人，他们是：

- 1 号陆定一
- 2 号黄克诚
- 3 号谭政
- 4 号彭德怀
- 5 号孔原
- 6 号彭真
- 7 号马明芳
- 8 号王尚荣
- 9 号班禅·额尔德尼
- 10 号荣高棠
- 11 号孟用潜
- 12 号万里
- 13 号陈克寒
- 14 号冯基平

15 号罗瑞卿
16 号邓洁
17 号李井泉
18 号赵建民
19 号贺龙
20 号刘仁
21 号陈再道（暂空）
22 号郑天翔
23 号赵凡
24 号林枫

每间囚室为 12 平方米，里面有一床一桌一椅，囚室朝院子的墙上有一门一小窗。小窗都已钉死，而且糊上了白纸，窗子下方有一小洞，挂着巴掌大的窗帘，供警卫战士们观察。

按照周恩来和傅崇碧的命令，没有卫戍区的命令，任何人也无权把特犯们拉去批斗，即便被拉去批斗，警卫连队也必派干部带数名战士相随监护，一是防止他们被打，二是批斗结束立即带回特监。

特犯们被集中到这里后，环境安全稳定，和战士们一起吃食堂，病了有警卫部队的军医治疗，总算松了一口气。除个别人外，后来他们绝大部分人都活了下来，走出特监，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许多人和警卫战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后话，暂且按下。

且说周恩来得到傅崇碧的报告，知道特监里的一切都已安排好了，但他还不放心，要坐车到什坊院去看看，亲自检查一遍。秘书跑来报告：“红卫兵已经冲到人民大会堂门口了，要揪斗陈毅。”周恩来生气地说：“打倒了贺龙，还要打倒陈毅。只要我还当着总理，就不能让他们揪走陈毅。”陈毅、李先念这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周恩来从自己在大会堂的办公室走出来，找到傅崇碧，让他布置部队加强戒备，自己带着陈毅来到大会堂门口。

红卫兵一看陈毅出来了，高呼起口号来：“打倒陈毅，陈毅是个黑帮。”陈毅说：“红卫兵小将们，毛主席的话你们听不听？”红卫兵们大声斥责说：“陈毅，你不要狡辩，你执行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你必须跟我们回去，交待你的罪行。”陈毅说：“咱们先学段毛主席语录吧，我领着念。”红卫兵们安静下来，听陈毅念毛主席语录。陈毅一字一板地朗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们大哗，大喊口号：“陈毅伪造毛主席指示，罪该万死。”

周恩来张起两手往下压压，高声说道：“红卫兵小将们，陈毅同志刚才朗诵的确实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大家对陈毅同志有意见，可以提，可以反映。现在毛主席交给陈毅同志一个重要的工作任务，请大家不要干扰他的工作，不要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家请回吧。”

红卫兵们听了周恩来的劝解，虽觉有理，但意犹未尽。忽然一个头头振臂一呼：“陈毅必须跟我们回去交待罪行，不揪出陈毅誓不罢休，冲呀！”这个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跟着往大会堂门口冲去。

周恩来见他们蛮不讲理，大为恼火，大喊一声：“站住！”他往前走了几步，大义凛然地宣布：“你们要揪陈毅，就从我的肩上踩过去。”红卫兵们过去见到的周恩来，都是满脸笑容，和大家一起唱歌，吃饭时还掰一块馒头把粥碗擦净，哪见过他雷霆大怒的情景。这时只见周恩来脸色铁青，眼睛

喷射着愤怒的火焰，端着左臂站在他们面前，完全是一副舍生取义的伟人形象。红卫兵们被他的气势震慑住了，悄悄地溜下台阶。周恩来一转身，带着陈毅进了人民大会堂。

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周恩来突然感到一阵头晕，不由得身子往下倒去。秘书们忙扶住他，叫来医生。医生一检查，连说：“不得了，是心脏病犯了。”立即就地抢救，周恩来很快脱离了危险。医生不满地问秘书：“总理今天连续工作多长时间了？”秘书叹口气说：“什么今天呀，他从昨天到今天，连续十八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医生气恼地责备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让总理休息会儿，这病完全是累出来的。”秘书们叫医生骂了一通，个个无言可对，只有相对苦笑。周恩来解释说：“你别怪他们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说完就要爬起来去办公，医生忙按住，严肃地说：“我今天要造你一点反了。你重病在身，得听我的。躺着，别动。”周恩来只好躺下，让秘书把傅崇碧找来。傅崇碧进来后，周恩来气喘吁吁地说：“小傅呀，陈老总的事我交给你了，过几天他要去北京饭店开会，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啊！”傅崇碧使劲地点头说：“总理，都在我身上，你就放心吧。”

江青听说红卫兵没有揪出陈毅，大为不满，把他们批了一顿，又给他们透露了陈毅要去北京饭店主持记者招待会的机密，最后叮嘱说：“这次可不能落空啊！只要揪出了陈毅，你们就立了大功，以后论功行赏起来，你们至少都是部长。”头头们听了，很是鼓舞，决心这次抓住陈毅。他们回来以后商量了一番，在北京饭店布置了一些人做眼线，大队人马藏在附近的一个机关里，单等陈毅到时开始行动。

来了。先是北京卫戍区的几辆中吉普驶来，从车上下下来一群高高矮矮的、胖胖瘦瘦的军人，一色的红领章，红帽徽，分不出谁是军官，谁是士兵。这些军人下车后，匆匆地走进了北京饭店。红卫兵们知道，这是预先布置警卫工作的卫戍区军队，陈毅马上就要到了。果然，不一会，一辆大红旗在一辆中吉普的陪伴下到北京饭店门口。红卫兵们正想行动，不料想来了两卡车的士兵，把北京饭店门口围起来，红卫兵头头稍一犹豫，就看见陈毅戴着大口罩和墨镜从红旗钻出来进了北京饭店。

完了，现在只有等陈毅出来时在路上截他了。

北京饭店的会好容易散了，陈毅在一些军人的陪同下走出饭店钻进红旗，车子随即开动，在一辆中吉普的护卫下离开北京饭店。原来先到的那批军人却迟迟没有出来，可能是认为已经完成了警卫任务，这时正在休息吧。红卫兵头头见陈毅座车警卫力量单薄，正好可以下手，忙命令按计划行动。

陈毅的座车行驶在大街上，突然一队红卫兵横穿马路，座车被迫停了下来。那队红卫兵这时却不过马路了，哗啦一下子围过来把座车团团围住，打开车门，把陈毅拉了出来。一个红卫兵头头一把揪掉陈毅脸上的墨镜和口罩，原来此人不是陈毅，只是个和陈毅个头、体态相似的军人。这位军人厉声斥责他们：“这是中央军委的车子，我身上带有林副主席的批件，你们怎么敢拦我，还要不要脑袋？”红卫兵们捉鸡不成蚀把米，怕耽误了中央军机大事要当反革命，赶紧赔礼道歉，那位军人让书记下了他们的名字，然后悻悻地上车走了。

陈毅哪里去了呢？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二回 保刘邓还演小城春秋 挽国殇再尝囚徒滋味

话说北京饭店会议散了以后好一会儿，那些先前来的军官们才涌出饭店。这时饭店门口一片军人，军官们上中吉普，士兵们上卡车，只见许多红帽徽、红领章晃来晃去，再也分不清谁是谁了。

几辆中吉普沿着来时的路线疾驰而去，最后拐进一条胡同，在一所院子前停了下来。军官们下了车，护送一位老军人进了院子，便又钻进吉普车朝大街驶去。老军人进了房子，拿起电话：“喂，傅崇碧吗？我是陈毅。我已经回家了，谢谢你的护卫。你这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妙计硬是要得。哈哈……”

得知陈毅没有出事，周恩来总算放了心。这时已到年底了，毛泽东要主持国务院、政治局和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周恩来准备了一下，就去参加碰头会。

各路人马陆续来到了会场，江青一进来就朝陶铸吼道：“陶铸，你为什么鼓动学生去调查我，搞我的特务活动？”陶铸反唇相讥：“你不是到处讲怀疑一切嘛，你能讲怀疑一切，我就不能讲？”陶铸又吼道：“我是政治局常委，讲一句话也得向你请示啊，你算老几？”江青恼羞成怒地大嚷起来：“陶铸，你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你是哪个司令部的人？”陶铸坦然地说：“当然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主席前不久还保了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呢。”一句话噎得江青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工作人员进来报告：“主席到了。”大家一齐站起来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进了会场，在桌子的中心位置坐下来，按按手，示意大家坐下。周恩来首先汇报起来：“现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但是缺乏组织和引导，必须想个办法，让毛主席的指示能彻底得到贯彻。”

周恩来讲完话后，会场上一片静默。刘少奇、邓小平因为派工作组被说成是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现在处于被批判的窘境中。现在谁还不知趣，再提出派工作组之类的人下去。

毛泽东知道大家的心思，但彼一时，此一时也，情况不同了，现在派工作组有利于落实自己的战略部署。他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指示大家：“我同意恩来的意见，派军队下去，把群众组织起来，对学生进行军训。文化革命再搞上几个月，也就差不多了，娃娃们该复课了。大家想想，军队下去，叫个什么名字呢？”

毛泽东的话使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议论起来。毛泽东听了几个提名，都觉得不好。周恩来见大家议得差不多了，便提议说：“可否就叫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嘛。”人们一听，齐声称赞这个名字起得好，毛泽东也笑着点点头，拍板说：“好，就叫这个名字吧。”

派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的事就这么定了。没想到江青却叫了起来：“我有意见！”与会者不知她又要放什么炮，不安地瞅着她，毛泽东也有些发怔。江青见自己已成会议中心，不禁得意起来，放肆地向毛泽东说：“毛主席，你不让群众起来，我要造你的反！”

毛泽东没有想到江青当着中央这么多要员的面宣布造自己的反，有点手足无措。这要是换一个人，毛泽东立即会做出最激烈，最恰当的反应，但是江青是自己的夫人哪，又是文革小组副组长，不好办哪。毛泽东有点尴尬地

坐在那里。

江青的话激恼了参加会议的开国元勋。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这位当年威震淮海的三野副政委、总前委成员早已对江青不满，这时更是怒发冲冠。毛泽东不好说江青，他却敢训斥她。只见他一拍桌子，朝江青怒吼道：“胡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五百万解放军的统帅，你竟敢造主席的反！放肆，胡闹！你是什么东西？”

谭震林这一番大吼震得江青脸色发白，牙齿打战。参加会议的元勋们心中暗暗高兴，谁也不出来为江青打圆场。江青把目光投向毛主席，谁知毛主席说了一句“散会”，立刻离开了会场，其他人也纷纷退场。谭震林临走前，还怒视江青一眼，“哼”了一声。

江青无法下台，只好用大哭来掩饰。

从此，江青与谭震林、陶铸的矛盾越来越深。谭震林不是中央文革成员还好办些，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他是必须参加，免不了和江青在会议上吵架。陶铸有时穿军装进来，江青、姚文元就起哄道：“陶铸，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陶铸冷冷地说：“我是原来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我怎么没有资格穿军装？你们在军队里什么职务都没有，姚文元连一天兵都没当，你们又有什么资格穿军装？”一句话说得江青、姚文元哑口无言。陶铸有时穿便装来开会，姚文元又起哄道：“陶铸，你怎么又不敢当解放军了？”陶铸反唇相讥地说：“我不敢？我在东北率军打老蒋的时候，你姚文元在干什么呢？”一句话又把姚文元憋了个脸通红。还是张春桥老谋深算，他在这种时候从不说什么，他明白这只会自讨没趣。陶铸是什么人，早在红军时期就组织过轰动中外的越狱斗争，后来有个作家还根据这个故事写出版了小说《小城春秋》。陶铸东征西杀，和平谈判，率军作战，能文能武，跟他当面斗嘴能讨得了什么便宜。张春桥当面不说，背后却指使一个学生写了批判陶铸的60张大字报贴到前门大街上，立即轰动了北京。

其实江青这个时候还是想把陶铸拉过来，挖苦他、贴他的大字报只是给他施加一点压力，让他知道一点厉害。谁知陶铸抱定主意要保刘、邓，保老干部。江青最后绝望了，便下毒手，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同志托我向大家问好！”咦，陶铸呢？陶铸怎么不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他是刚提拔起来的第四号人物啊，莫非陶铸发生了问题？参加大会的群众立刻听出来了江青的话中话，从此开始，炮打陶铸的大字报越来越多。

毛泽东深居丰泽园，但他对外面发生的事知道得一清二楚。陶铸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自己很不合拍，这一点毛泽东知道得清清楚楚，但他并不同意江青的意见打倒陶铸。搞文化大革命固然要依靠江青这些人去放火，但他也深知这些人只会放火，不会干活。他还需要一批久经战阵考验的老革命家来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光靠周恩来一个人不行，还得有陶铸、谭震林、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刘伯承、谷牧、余秋里去协助他。特别是陶铸，位居第四号人物，是周恩来的有力助手，不能让他垮掉。

但是，陶铸和江青的矛盾日深，也不是个办法，怎么办呢？最好让陶铸和谭震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去外地搞调查，等过了这一阵再叫他们回来，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好，就这么办。毛泽东立即拿起电话通知周恩来，让陶铸、谭震林到外地搞几个月调查，什么时候回京，听中央的通知。

毛泽东的通知由周恩来传达给了陶铸和谭震林。如果陶铸这时下去，事情就好办了。可惜陶铸这时还想着怎样协助周恩来做好工作，所以迟迟没有离开北京，他和江青之间的矛盾又因王任重问题上的冲突而成白炽化了。

王任重本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二书记，善于使用干部，理论水平很高，善于抓大事，每抓必有成功的经验问世，但小事又很放得开，所以他的工作虽然很出色，但还有空暇写诗、拉琴、游泳、写文章。王任重的工作风格和喜欢事必躬亲的陶铸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但由于二人在观点上很接近，所以在中南局时陶铸和王任重很谈得来。

毛泽东对王任重很重视，称他有总理之才，经常找他一起游泳、写诗、谈文章。在省委第一书记中，王任重是和毛泽东最亲近的一个人。即使在中央要员中，也没有什么人能像王任重那样接近毛泽东。1966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一直住在南方，其间还回韶山滴水洞住了一段时间。在韶山时，毛泽东由王任重陪同祭扫了父母的坟墓。由于去得匆忙，没有准备祭品，毛泽东折根墓旁松树上的枝条插在墓前，权当祭品。王任重百感交集，回来后即写了一首诗以抒怀，诗中称毛泽东为“老师同志兄长”，毛泽东看了这首诗后，深以为然，当即夸奖了王任重几句。

毛泽东这么看重王任重，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成立，便把他调来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但是，王任重同陶铸一样，看不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同时，他也是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的，这自然不能容于江青，二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趋剧烈。陶铸唯恐这样下去，王任重会给毁了，便反复向毛泽东提议，还是让王任重回中南局去工作吧。毛泽东几经考虑，最后同意了陶铸的建议，让王任重回中南局工作，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提提意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尚未被打倒的政治局委员都出席了。文革小组全班人马也都赶来了，他们还把小组里的一般工作人员拉来壮大声势，摆出一副要和王任重决一死战的架势，陶铸不禁为王任重担起心来。不过还好，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大轰王任重，说了几句后似乎就无话可讲了，陶铸心中暗暗高兴。不料，王力突然转换话题，朝陶铸开起炮来：“陶铸，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你是叫得最凶的一个，你为什么直到现在还不检查自己的错误？”王力开了头炮，关锋、戚本禹紧紧跟上，江青、陈伯达、康生重点批判，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骂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刘邓的代理人”，声色俱厉，气势汹汹，大有炸平人民大会堂之势。

至此，陶铸才明白了，原来江青一伙已策划好，借用给王任重“提提意见”的机会，专门朝自己发动“集团攻势”，以便打倒自己。但是有一点陶铸还是不明白的，江青要打倒自己，是他们那一伙人的主意呢？还是已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在这危急关头，他极想听到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但是，在现在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出乎陶铸预料之外，三天后中央办公厅即通知陶铸出席政治局会议，通知特别强调“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陶铸不知是福是祸，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参加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一见陶铸就大声问道：“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的错误？”陶铸心里一热，主席是要保我的。毛泽东扫了一眼江青，批评她：“陶铸来中央以后工作忙得很，积极负责，做了许多工作。他是政治局常委，怎么能不经中央正式讨论，就在会议上批判他，说他犯了路线错误。这是违

犯组织原则的，江青就是太任性，随便伤人。”

江青等人被毛泽东一顿批评，个个垂头丧气，沉默不语。回到钓鱼台后，江青大为光火：“老娘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窝囊气呢，陶铸你就等着吧。”张春桥眯眯三角眼，对江青说：“我有个好办法，保管叫陶铸下台。”江青急问：“什么办法？”张春桥咬咬牙说：“逼上梁山！”他看江青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便凑到跟前，放低声音对江青说：“主席要是不保陶铸，事情就好办了。”江青想想，恍然大悟地说：“我明白了。”

江青到底明白了什么，暂且按下。且说陶铸回家后，向夫人曾志高兴地讲了会议的情形，讲到兴奋处，情不自禁地拉住曾志的手说：“曾志呀，主席保了我。”一语未完，电话铃突然让人心惊肉跳地响起来。陶铸拿起听筒，听了几句，脸色大变，扔下耳机，气呼呼地在房里走来走去，嘴里连连嚷道：“反了，反了。”曾志关心地问：“到底是什么事呀？”陶铸气愤地说：“你听听，这简直是天下奇事。广州有一个专揪王任重战斗队，他们抓不到王任重，就抓了一个中南局书记当人质，跑到北京，前几天还叫我接见，今天就改成勒令我必须去见他们，你看这不是反了吗？”曾志提醒他说：“你得小心点，我看这些人后面有大人物支持，小心陷入他们的圈套。”陶铸拍拍胸脯，轻蔑地说：“他们有什么招就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倒要看看他们的手段。”

陶铸按时赶到了中南海小礼堂，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去接见战斗队。小礼堂里挤满了人，一色的红袖章，充满了活力的青春的面孔，一一从陶铸眼前闪过。他们从广州挤坐着火车来到北京，身上满是汗腥尿臭味儿，一见陶铸进来，个个眼里冒出猛兽攫食时才会有的凶光，震耳欲聋的狂叫声似乎要把屋顶掀倒。陶铸忽然有一种感觉，似乎走进的不是一个接见会场，而是进入了一个庞大的狮笼。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大家都知道，现在只有中央文革小组才是毛泽东最亲近的身边人，特别是小组核心人物江青，更是被人们认为是毛泽东的首席代表，他们的一个表态，会让这个大干部倒霉，也会让那个红卫兵组织垮台。因此，红卫兵们被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时，无不欢声雷动，但中央文革顾问陶铸今天却完全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相反，他今天享受到的，是被红卫兵们勒令、录音，是不断地炸响的充满了敌意的口号声。起先，陶铸还耐心地劝解着他们，但这些人哪里听他劝。几个头头扑到陶铸眼前，指着他的鼻子，喊叫着：“我们勒令你立刻回答！快回答！你必须马上回答我们的质问！”陶铸见他们欺人太甚，只差在自己的头上拉屎拉尿，便再也忍不住了，猛地抬起头，怒斥道：“你们这样强迫我，我们还有什么商量的，我对你们的这种作法提出抗议。”

陶铸发了怒，会场顿时安静下来，但紧接着的是更大的喧嚣，“打倒陶铸”的口号声像混浊的恶浪，淹没了小礼堂。会场上乱纷纷的，一些红卫兵冲上来要抓走陶铸，会场上的警卫干部跑过来阻止，红卫兵们又大喊起来，“陶铸镇压革命群众罪该万死！”

就这样，陶铸被围攻六小时后才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离开了现场。是晚，“打倒陶铸”和“揪出陶铸”的大字报、标语、传单顿时贴满了全国。过了四天，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见“专揪王任重战斗队”，一齐正式表态，支持红卫兵小将打倒陶铸。他们的讲话一夜间传遍了全国城乡的每个角落，陶铸一夜间被解除工作，在家休息待命。

对陶铸的问题，毛泽东迟迟没有表态。陶铸和红卫兵在国务院小礼堂闹僵后，江青立即向毛泽东告状说陶铸镇压群众，毛泽东不太相信她的话，知道她嘴臭，便又问周恩来，周恩来说：“不是镇压群众，是陶铸态度不好。”毛泽东也知道陶铸性子爆，便“哦”了一声说：“是态度不太好……”便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但江青并不罢休，接连不断地把陶铸的罪证材料送来。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陶铸，在他看来，江青送来的那些材料都是屁话。他只讲一句话，就可以使陶铸摆脱困境，但这样一来，江青的威信也就扫地而光，以后他还能靠谁去四处点火，那么这样一来他的整个战略部署就将搁浅。

江青这种先打倒陶铸，造成既成事实的做法，使毛泽东大为光火。现在他必须在陶铸和江青之间做出抉择。经过七天的思考，权衡利弊，毛泽东选择了江青。在当天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正式表了态：“陶铸是邓小平介绍的。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

毛泽东讲了话，陶铸的政治生命立即结束。从这天开始，他就被禁闭在家中，同外界失去了所有联系。

陶铸被打倒一事震惊了刘少奇。这一段时期以来，他和他的家庭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撼。先是女儿刘涛和他决绝而去，接着又发生了王光美被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指使一伙人绑架的严重事件。刘少奇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1967年1月6日，北京的天气阴沉而又寒冷，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在中南海的家中议论文化大革命这只怪物，他们看不清怪物的轮廓，但却明白无误地感觉到这个大怪物已张开了血盆大口，要一口吞下他们这个家以及许多人家。正议论间，电话铃响了，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急切地说：“是王光美同志吗？你的女儿刘平平在学校作检查后的归途中发生了车祸，右腿被轧断，现在正在医院抢救。”王光美放下电话，脸色变得灰白，颤抖着嘴唇对刘少奇说：“平平出车祸了，马上要截肢。”刘少奇着急地说：“赶快到医院去啊！”王光美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留过话，叫我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刘少奇生气地说：“什么时候了，还能顾那么多。你不去我去。”源源和亭亭建议说：“我俩先去，爸妈准备一下再来。”刘少奇同意了。源源和亭亭先赶往医院，刘少奇和王光美办了手续，一起乘车出发了。

王光美和刘少奇赶到了医院，只见医院里挤满了清华大学的学生，个个如临大敌，神色紧张。刘少奇走出汽车，到底是多年的党中央第二把手，气势慑人，学生们张皇失措，无所措手足。王光美问道：“平平呢？”源源急忙跑过来说：“妈妈，你快走，他们要抓你。”王光美斩钉截铁地说：“不是王光美的都走！”

刘少奇带着源源和亭亭回了中南海，一路上还惦记着从学校回家去的平平。一进院子，只见平平站在房子门口急切地张望着，刘少奇惊诧地问道：“平平，你的腿……”平平一下扑到刘少奇的怀里，痛哭起来。刘少奇这才知道平平根本没有出车祸，而蒯大富等人把平平扣了起来，然后谎称平平出了车祸，把王光美骗了出来。

周恩来得知这一事件后，派人和蒯大富交涉，要他们把王光美放回来。蒯大富虽然有江青的支持，但也不敢违抗总理的命令，只好把王光美放了回来。

王光美被骗抓，中南海里机关的一些人接连到家里捣乱，使刘少奇陷于深深的不安和痛苦之中。他想，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打倒自己的话，那就不如自己主动辞去一切工作职务，不要因为自己而使家人、战友、党和国家

陷入一场浩劫之中。他拨通了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要求毛主席接见，中央办公厅答应安排。

1967年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小卧车开到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前，一个秘书从车上走下来，对刘少奇说：“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等着你，请上车吧。”刘少奇上了车，随秘书来到人民大会堂。

两位从二十年代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斗争时就一起战斗过来的老战友见面了。刘少奇心情平静，没有了老战友相逢时的激动。倒是毛泽东心情复杂，关心地问道：“听说平平的腿受伤了，好些了吗？”刘少奇淡淡地回答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个骗局。”毛泽东“哦”了一句，不再说什么了，把烟递过来，请刘少奇吸烟。刘少奇客气地道了谢，点上一支烟抽了几口，然后才说起正事来：“我犯了路线错误。经再三考虑，我向主席提出三个请求。第一，这次路线错误责任完全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应尽早把他们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一切职务，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三、请中央批准我去延安或湖南老家务农。”

听了刘少奇的申述，毛泽东沉吟不语。两人都使劲地抽着烟。过了好一会儿，毛泽东才云山雾罩地说：“还是认真地读几本书吧，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可以看看。”刘少奇莫名其妙，看来话只能谈到这里，便告辞了。毛泽东送到门口，叮咛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刘少奇回到家里后，王光美关切地问道：“主席都跟你说了些什么？”刘少奇似为高兴地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还送我到门口，要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王光美沉吟着自言自语道：“这就怪了。按说主席如此恼怒，应该狠狠批评才是，怎么如此亲切，又避而不谈实质问题？恐怕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刘少奇默默地点头，表示同意她的想法。

过了几天，也就是1月16日深夜12时，刘少奇和王光美正准备休息，电话铃声凄厉地响起来，王光美一把抓起电话，问道：“喂，你是谁呀？”电话里对方回答说：“我是周恩来呀。”王光美心里顿时滚过一道热流，哽咽着问道：“是总理啊，有什么事吗？”电话里一片沉寂。王光美连问几声，周恩来才叹口气说：“光美呀，要经得起考验。”王光美坚定地说：“总理放心吧，我会对得起党的。”

王光美放下电话，对刘少奇讲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深夜来电，实属关照。既有考验，定有大变。刘少奇听着寒风在树梢头的呼啸声，对王光美说：“看来我该有个交待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十三回 骂国贼叶剑英断掌京西馆 斥奸雄谭震林怒争怀仁堂

话说毛泽东接见刘少奇后仅过了三天，周恩来即于1月16日深夜给王光美打去电话，要他们准备经受严酷的考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呢？刘少奇原想通过家里的电话和周恩来保持联系，以便及时了解中央的精神。谁知第二天，几个人走进刘少奇的家，二话不说，拆掉了电话。刘少奇和政治局的唯一联系渠道被切断了，此后刘少奇和王光美仅靠几个孩子骑车出去搜集传单了解局势的发展。

这时全国的大动乱进一步升级，上海发生了大夺权事件。在这场反革命政变中，新冒出来一个打砸抢的明星人物，此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王洪文。王洪文曾在部队混过几天，表现平平，转业后在上海一个纺织厂的保卫科当干事。他胆大妄为，野心极大。文化大革命浊浪一起，他觉得这是混水摸鱼的好机会，遂联系一班和自己臭味相投的青年工人陈阿大、潘国平、黄金海等三十多人于1966年11月6日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自任司令。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正式亮相。为了让中央和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的合法性，王洪文率“工总司”群众冲进上海火车站，强占列车，北上请愿。列车行至上海附近安亭站时，被铁道部下令阻留，王洪文遂率其死党在安亭卧轨拦车，沪宁铁路被切断三十余小时，造成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破坏铁路交通的特大恶性政治刑事犯罪事件。

安亭事件发生后，陈伯达大耍两面派，一面通知上海市委要顶住，一面又派张春桥南下和王洪文等“工总司”头头达成五点协议，公开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顿使上海市委处于被围攻的状态。

“工总司”的许多成员原是在本单位不好好上工，专门混日子的一些人。上海广大工人眼见张春桥竟批准“工总司”是合法组织，对此极为不满，耻于同“工总司”为伍，便宣布成立全市性的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赤卫队成立后发展极快，很快便拥有80万人，上海各工厂的生产骨干、工作骨干、劳动模范几乎全部加入了赤卫队。可是“工总司”上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张春桥直接插手指挥“工总司”的行动，下有王洪文等一班流氓无赖带头闹事，这些人不喜欢干活，可专会搞打砸抢，因此“工总司”人数虽少，气焰却非常嚣张。“赤卫队”呢？人数虽然很多，但没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消息不灵，这些老工人老模范过去只知埋头干活，最讨厌打砸抢。两相比较，“工总司”搞起武斗来反处处占上风。1966年12月29日，在张春桥的告密和指挥下，王洪文调集“工总司”十万人向在康平路一带集中的“赤卫队”发动攻击，“赤卫队”完全没有防范，被打得落花流水，康平路上，到处是鲜血。上海工人阶级自1927年4月12日在宝山路遭蒋介石大屠杀后，今天又遭到了工人阶级的敌人的血腥镇压。

康平路事件发生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完全掌握了上海市的权力，上海市委和华东局的主要领导人陈丕显、曹获秋被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被停止工作，大批干部被抓被斗。这就是当时被称为“一月风暴”的上海夺权事件。

上海“一月风暴”事件在全国造成了几个第一。第一个成立了除红卫兵以外的其他群众造反组织，第一个破坏交通运输的特大恶性事件，第一个夺取人民政权的反革命政变。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出现了

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青海省是我国对犯人进行长期劳动改造的主要基地之一，历年被释放安置在省区就业的劳改释放犯竟组成所谓的“红囚兵”反革命组织，杀气腾腾地武装攻击中共青海各级领导机关，告急电报频频传到中央。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武斗和夺权，秩序一片混乱。

毛泽东得到这些报告后，立即把周恩来找来，兴奋地说：“我在前些天就说过，上海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到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场夺权斗争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一场大革命。现在夺权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啊？”周恩来回答说：“一派组织夺了权，另一派又去夺，就那么夺来夺去的。”周恩来的回答使毛泽东明白了，全国已陷于一派混乱中。虽然他是主张大乱的，但有些部门却决不容乱，特别是军队。他颇为焦虑地问道：“军队的情况怎么样？”周恩来焦虑地说：“冲击军队的事连续发生，许多军队高级干部家里被抄，机密文件被抢走。军队院校学生要求开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毛泽东“哦”了一声，没有说话，使劲地抽烟喝茶。

周恩来鼓起勇气，向毛泽东说：“主席，我有个担忧。”毛泽东瞟了周恩来一眼说：“讲嘛。”周恩来字斟句酌地说：“我担心，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这几个老师一倒，林副主席的担子就重了。”响鼓不用重锤，周恩来一席话提醒了毛泽东，他确实担心林彪的担子“太重”，扳着手指头一个个地评说起老师来：“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啊，长征路上，多亏他通风报信，你我才没有人头落地。陈老总，心直口快，从来不在后面搞小动作。向前同志的党性强啊，张国焘要陈昌浩在草地解决我们，是他出面阻止四方面军打我们。聂老总，是个大厚道人啊，顾大局，不揽权。这几位老师谁也不能动，军队也不许去冲击，让剑英搞个东西发下去吧。”

叶剑英得到通知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军委常委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副主席一致提出，要稳住军队，军队不能乱。会议结束后，叶剑英、聂荣臻一起去找林彪汇报。叶剑英说：“我们几个军委常委议了一下，军队要搞个法，要搞个命令，军队的运动要有个限制，不能把军队搞乱。”林彪点点头说：“我在出汗，你们就搞个命令发下去吧。”叶剑英和聂荣臻回来后，立即和陈毅、徐向前商量，起草了个命令发给全军，命令军队不能搞大民主，不能成立战斗队，不能搞串连。

但是，军委的命令下达后，军队照样被冲击，司令员照样被揪斗。各大军区的司令员纷纷来到北京，叶剑英把他们都安排在京西宾馆避难。北京驻军的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来斗去，档案被抢，文件被抄，武器丢失，通讯不灵。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打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报告。每次电话打去，秘书不是说江青不在，就是说江青刚吃完安眠药入睡。叶剑英、徐向前再打电话给林彪；林彪的秘书总说“首长出汗”。眼见得局势越来越混乱，叶剑英、徐向前请来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商量。陈毅生气地说：“不就是个三连连长吗，闯！”大家也都觉得这个主意好，叶剑英说：“就这么定了，我去闯！”徐向前把他拦住：“你是军委秘书长，在家坐镇，我去闯宫。我是军委文革组长，我去最合适。”大家也都觉得徐向前去比较合适。临出发前，陈毅拍拍徐向前的肩，关切地说：“你要当心些啊！”

徐向前带上秘书，坐着红旗车直奔毛家湾，林彪的警卫秘书见是徐帅亲来闯宫，不好阻挡，客气地领他进了会客室。林彪和陈伯达正在会客室里交谈。徐向前一坐下，便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现在军队很混乱，这样乱下

去不行，要是出了乱子，无法向主席交待。”林彪听了眉毛一挑，问徐向前：“那你的意见是怎么办呢？”徐向前果断地说：“要搞几条正式规定，不许成立战斗组织，不许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林彪听着，连连点头，原来他也怕军队出事，毛泽东追查下来，他吃罪不起。徐向前讲完后，林彪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军队不能乱，军委发一个文件，内容就这样吧……”

秘书在旁边打开记录本，林彪口授文件内容：“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二、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三、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四、一切外出串连的军人和职工一律返回部队；五、今后一律不许冲击部队；六、不许冲击战备系统，不许冲击保密系统，严禁强索档案资料，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一律封存；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单位一律进行正面教育。”

林彪口授完文件要点后，问徐向前：“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徐向前摇摇头说：“没有了。”林彪说：“那就请秘书整理一下，另外请剑英、荣臻两位老总来一下，咱们当场定下来。”

陈伯达对林彪口授的这些要点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反对，便起身告辞，向江青告状去了。叶剑英、聂荣臻得到通知后都赶来了，这时秘书已经根据林彪的口授内容写好文件的初稿，在林彪主持下，徐、叶、聂一起讨论了一下，认为七条内容很好，一致表示赞成。林彪笑笑说：“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了，那就还请三位老兄去钓鱼台征求一下中央文革的意见吧。”

中央文革小组已接到了林彪的电话，周恩来闻讯也赶来了，徐向前半路又把陈毅拉上，四位军威赫赫的老帅再加上在军界享有极高威信的首长，一下子把中央文革的气焰压下去了。徐向前讲完文件起草的经过后，江青冷冷地讥讽道：“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但由于这个文件是林彪口授，又是讲军队问题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人不敢在这个禁区胡闹，所以文件很快获得通过。陈伯达把文件一把塞到徐向前口袋里，厌烦地说：“好了，文件已经通过，你快走吧。”

徐向前告辞出来，又驱车到了毛家湾，把文件交给林彪，林彪当即把文件呈报给毛泽东。很快，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了。把文件交给集中住在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司令们讨论一下，将军们讨论后，认为还应再加上一条“各级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不要让他们参加社会上的打砸抢”。徐向前根据将军们的讨论，又进一步修改了文件，形成了“中央军委八条”。文件定稿后，林彪又看了一遍，觉得没有问题了，便和徐向前一起驱车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接过文件，看了几遍，点点头说：“很好，照发。”他拿起红铅笔，在文件上批写道：“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接过批件，感动地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徐向前心里明白，林彪这次不是故意表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套，他无法向毛泽东交待。

从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出来，已是1月28日深夜了，徐向前连夜把文件发了下去。

“军委八条”下达后，部队的混乱情况稍微有所好转，但不久由于林彪和江青的操纵，又开始乱了起来。林彪想通过混乱，把老帅及一、二、三、华四个野战军的主要干部挤出军队，让四野的干部独揽大权。江青在军队中没有底子，她想通过乱，把一批造反派安插进军队，掌握军权，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操纵一些人继续冲击军事机关。

地方上的情况更为混乱，张春桥在上海夺权后，把上海的政权更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马上在外交部引起了反响。如果国家的体制发生变更，马上就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重新承认问题。上海几十万人民不满意张春桥的蛮横和霸道，掀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运动。张春桥搬出中央文革小组的牌子，出动四个连的武装部队镇压了这场运动。陈丕显、曹获秋在危急中被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接到舰队设在上海的基地内保护起来。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全国各省市都在夺权，原来的大批领导干部纷纷被打倒。中央各部的部长们大都被揪斗，工厂停工停产。周恩来挺身而出，指示国家计委发出通知，要求工厂不要停产闹革命，红卫兵不要到工厂串连。通知还没有发出，起草指示的国家计委负责人谷牧被揪斗，连批三天。林彪在一个会上公开骂“工交战线比文教战线更坏”，结果导致国务院抓生产的干部都被揪斗，只有余秋里还能坚持工作。余秋里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一条胳膊，所以被人们称为“现在抓生产的只剩下一只胳膊了”。

这时，康生又操纵一些人把1937年经党中央营救集体出狱的薄一波等六十一名高级干部打成叛徒集团。由于张闻天、王稼祥当时参与了集体决定，康生又指使一些人把他们监禁起来，反复逼供，叫他们承认这件事是刘少奇决定的。张、王坚持事实，说明情况，康生根本不听，又准备把经过周恩来营救从新疆盛世才监狱出来的干部打成叛徒集团，以便顺藤摸瓜，搞倒周恩来。天安门城墙上已经出现了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

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几位元老眼见奸雄得逞，国贼祸乱，个个忧心如焚，都来找李富春。陈毅着急地说：“富春啊，这些家伙要把几个副总理和老师打倒，下一步就要打倒周总理了，这一定是反革命要搞垮我们的党，我们不能不管啊！”谭震林气愤地说：“把毛主席架空了，国家就要大乱了，半个世纪千百万人民大众，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天下要被断送了。”李富春一拍桌子说：“要管，不能让他们这样胡来。”谭震林说：“我当着主席的面已经骂过江青一次了，我还要骂她，看她能把我怎么样！”叶剑英焦虑地问大家：“陈丕显同志来了没有？他留在上海是很危险的。”谭震林一拍胸脯说：“下次开碰头会，我问张春桥，一定叫他把丕显放出来。”

说话间又过去了十几天，日历撕到了2月13日，这一天是预定的中央政治局开碰头会的日子。原来自1966年秋以来，经毛泽东决定，组织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决定党和国家的大事。政治局碰头会的成员有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江青。每次开会，周恩来坐在长桌的一端主持会议，一侧坐的是政治局元老，一侧是中央文革小组，阵线分明。

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也和往日一样，周恩来总理坐在长桌的一端主持会议；他的右侧，一溜排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他的左侧一溜排坐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关锋。双方互相敌意地对视一阵，便都打开文件夹，准备开会。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叶剑英首先站起来讲话，他严厉地质问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要把军队搞乱。你们这样搞，想干什么？”徐向前也激怒地拍着桌子，痛斥陈伯达一伙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支柱啦。我们老了，都不行了吗？难道你们要蒯大富这样的人指挥

军队吗？”

陈伯达、张春桥这些人青云直上，给宠坏了，没想到今天坐在了被告席上。他们叫老师们一阵猛轰，个个张口结舌。陈伯达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劝你们要读点书，看点报，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叶剑英立即嘲讽地说：“我们不读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你们把上海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事，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名，你们眼里还有党中央吗？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你们干的这一套又是什么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开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几个老师又来到京西宾馆开军委会。部队报了很多材料。有的司令员被揪斗犯了心脏病倒下去了，也不把人放回来。叶剑英看完这些材料，怒不可遏，一巴掌拍在桌子上，发出一声巨响。他愤怒地骂道：“野心家！国贼不除，国无宁日！”徐向前也激怒地掀倒桌子，怒吼道：“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毁掉吗？”陈毅也怒冲冲地大发脾气，聂荣臻坐在一旁，大声说：“得跟他们斗，不能就这么完了。”

大家发了一通脾气，坐下来研究问题，叶剑英这才感到手掌钻心般的疼，聂荣臻忙唤来军医诊治，原来是因拍桌子时过分使劲，把掌骨拍断了。

过了几天，也就是2月16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又开会了，开会地点照例还在怀仁堂。下午三时，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来到怀仁堂门口，正好碰上赶来的张春桥。谭震林把他叫住，问道：“陈丕显同志来了吗？”张春桥三角眼一转狡猾地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知道他在推托，训斥他道：“什么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春桥两手一摊，轻巧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指着张春桥的鼻子骂道：“原来打击一大片，都是你干的好事！”

碰头会开始后，谭震林又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来京？陈丕显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张春桥推托说：“群众不答应，我有什么办法？”谭震林打断他的话，斥责道：“老是群众，什么群众，不要党的领导，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是，就要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清华大学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谭震林越说越气，愤怒地站起来，穿衣服，拿皮包，朝陈伯达一伙吼道：“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肥。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怒气冲冲地往外走，忙唤住他：“回来，不要走。”陈毅也叫住他：“不要走，要在里面斗争。”谭震林又回来坐下，朝对面的那一溜人直瞪眼。

陈毅接着发言，他斥责林彪、陈伯达这一伙人说：“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过去在延安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整错了多少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那次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嘛。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谁是反对毛主席的。”

陈毅还没有讲完，叶剑英插进来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去做工作。”余秋里拍案响应道：“叶老总讲得好啊！许多干部被揪来斗去，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那样干法，我就不去！”谢富治辩解道：“你不要和泥。”李先念斥责谢富治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都叫你当反革命给抓了。”

谭震林听到大家愤怒斥责林彪、江青一伙迫害干部的罪行，眼圈有点红了，拍着桌子吼道：“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李先念跟着吼道：“我也哭过三次，前不久总理主持开会，讨论抓生产，我们都来齐了，就是不见‘一只胳膊’来。一问，才知余秋里同志被人揪走了，总理哭了，我们三个副总理都哭了。”

陈毅这时又开了一炮：“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的，他们没有反对毛主席。现在有人要整总理，在延安，总理不是挨整吗？”

周恩来问康生：“红旗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康生推托说：“我没有看。”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把老干部要统统打倒，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康生被问得无话可说。

怀仁堂里老将军们怒斥奸雄时，王力、张春桥紧张地作着记录。会议一散，他们立即根据记录搞个发言摘要送给江青，江青又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完报告大怒，指示江青等人：“要抓军队，要抓地方，经济上要抓铁路、煤炭，要保邓小平。”

第二天，也就是2月18日晚，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成员召来，大发脾气说：“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要刘、邓上台。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反对他们。十一中全会你们都举手通过了，为什么执行起来有抵触呢？”

讲到这里，毛泽东喊了一声在场的叶群，对她说：“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不稳。”说完了又恼火地盯着陈毅等人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和林彪带着叶群，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脾气发够了，丢下一句话走了：“恩来，你来主持，处理中南海怀仁堂的事。”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十四回 赵永夫迎斗狂囚团 王光美舌战批斗会

话说毛泽东听了江青的汇报后，把大闹怀仁堂的老将军们找来大骂了一通，并要周恩来主持会议，处理中南海怀仁堂事件。周恩来是完全站在老将军的立场上的，他怎么会去处理他们。但毛泽东交下话来，不得不处理。他只好召开会议，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批评要注意方式方法”的话，转述了毛泽东对这几位老师多次肯定和赞扬的话，想以此保他们过关。反正毛泽东也没有明确说怎么处理，也不能说他处理不对。但是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不干，他们认为这是把几位老师和副总理搞下去的好机会。搞掉老师，林彪可以完全掌握军权，毛泽东将不得不完全依赖林彪。搞掉几位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进入政治局和国务院，掌握军政大权。两股野心家们各自心怀鬼胎，在打倒老师和副总理这一点上走到一起来了。林彪、陈伯达亲自出马，组织围攻。谢富治带头攻击，其他人紧紧跟上。江青、陈伯达又策动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带领造反派揪斗陈毅、谭震林等老师。周恩来挺身而出，不计后果，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他警告造反派：“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就要挺身而出。你们今天要冲大会堂，我一定要出席，并站在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跨过去。”

这段时间，周恩来经常是日夜工作，不得休息。就在这时，邓颖超又惊闻周恩来的秘书们集体造反，把大字报贴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口。她又急又慌，赶忙跑去看大家都给周恩来提了些什么意见。西花厅的门口已围了几个人，邓颖超一眼看出是几位老师，他们大概是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的。邓颖超走过去，叶剑英回头看见了，赶忙招呼：“大姐快来看，总理的秘书们造总理的反了。”邓颖超三脚两步地走到大字报跟前，只见大字报上写道：

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的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

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

大字报的下面是西花厅办公室秘书们的签名。

邓颖超看完大字报，松了一口气，原来他们是造总理的这个反啊，这个反造得好。她正想和几个老师们谈谈，只见叶剑英生气地说：“总理的这个毛病是得改改了，像他这么干法，就是铁人也得倒下。”他立即要过钢笔，在大字报上签上了“叶剑英”。陈毅要过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李先念、杨德中也都签了名。康生、谢富治这时来了，也假惺惺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大家同是签名，心境大不相同。陈毅等人明白，现在只有总理可以和林彪、江青抗衡，毛泽东不能没有周恩来。早在1957年批周恩来时，康生等人就向毛泽东提议，既然周恩来这么右，把他撵走得了。毛泽东轻蔑地看着康生说：“你懂什么，搞经济建设，你们都不行。搞建设离不开周恩来。”其实岂只是经济建设，国防、科技、外交、治安，哪一样能离开周恩来。下头千条线，线线都通到周恩来这里，这就是力量，康生等人最怕的也就是这一点，别看他们嚷得厉害，国家实权都在周恩来这里。要是周恩来倒下治病，他们不就可以攫取国家实权吗？

陈毅见邓颖超还在聚精会神地看大字报，跟她开玩笑说：“大姐，我们都造总理的反了，你要支持我们的造反行动啊。”邓颖超连连点头说：“支持，支持。我也要造他的反呢。”她要过钢笔，在一张小方纸上写了五条补

充建议贴在大字报的空白处。

邓颖超的小字报贴出来后引起了人们很大兴趣，大家都挤着看起来。忽然，杨德中说：“总理来了。”人们闻声一齐转过头来，只见总理下了汽车，朝办公室走来。平时由于忙乱，大家还不太留心，这时才发现总理一年多来老多了。

周恩来看见办公室门口挤了一堆人，情知有事，走过来一看，原来是张大字报。他仔细地看完了大字报，要过毛笔，在大字报左侧的空白处端端正正地写道：“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当晚，邓颖超敲敲门，检查周恩来“诚恳接受”的情况。周恩来闻声出来，邓颖超关心地说：“恩来，你不能这么拼了。为党、为国家，为这些受迫害的老干部，你得留点时间。你倒下了，陈老总他们怎么办？”周恩来无可奈何地说：“我有什么办法，这么乱，我不出面收拾，谁收拾。唉，我是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林彪江青围攻老师，在社会上立即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一些社会渣滓乘着林彪江青一伙刮的阴风，沉渣泛起，结队成伙，明火执仗，为非作歹。青海省情况尤其严重。这里是国家对罪犯实行改造的基地之一，有许多劳改农场。一些罪犯劳改期满后，由于很难再融合于原居住地的社会生活中去，所以多有留场就业的，或在青海省内被安置就业的。

文化大革命动乱一起，许多没有被改造好的劳改释放犯认为复仇的机会到了，居然在1967年年初组成反动组织“红囚兵”，专门冲砸公安部门、劳动改造农场，冲击警卫驻军。由于这些人原来就是残忍成性的罪犯，所以他们的造反行动显得非常疯狂和野蛮，血腥味十足。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青海省军区下令取缔“红囚兵”造反团。“红囚兵”不但不服从命令，反而砸开两个劳改农场，放出了一千多名劳改犯。这几千名劳改犯拿着抢来的马刀、枪支、铁棍，血洗公安机关、行政机关、医院、民宅、商店，喝得醉醺醺的，狂叫着扑向省城。他们首先血洗了省公安厅，然后扑向省军区大院，沿路大杀大砍，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群众纷纷避往军区大院。

狂囚们包围了省军区大院，立即狂叫着开始了进攻。要在平时，只要有一挺机枪就可以挡住这些罪犯，但现在不行啊。张春桥可以出动四个连的武装部队镇压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但中央文革却禁止部队弹压社会上的打砸抢犯罪团伙。警卫战士们有枪，但谁也不敢下命令开枪。结果，狂囚们轻而易举地夺走枪支，打倒警卫战士，开始向门岗进攻。青海省军区司令员赵永夫下令鸣枪警告，但狂囚们根本不听。他们认定赵永夫不敢违抗中央文革命令向他们开枪，更加疯狂地打倒门岗，冲进院内。院内群众吓得呼天喊地，挤成一团，一场大劫杀眼看就要发生。

怎么办？赵永夫急得头上大汗淋漓，要保护群众就只有开枪，但是开枪的后果又极其严重，说不定自己要坐班房。但是群众的哭喊声提醒了他，不能再犹豫了。他掏出手枪，果断地命令部队：“开枪！”赵永夫下了命令后，第一个举枪击倒扑向一个院内少女的大胡子狂囚。接着，战士们手中的机枪、冲锋枪声响了，匪囚纷纷倒地，剩下的跪下举手投降，赵永夫命令部队把他们全部押往劳改农场审查。

青海事件很快传到北京，赵永夫也立即报告了军委。军委立即回电：“自卫无罪，必须执行八条命令，镇压一切反革命暴乱！”得到军委的认可，赵永夫总算放了心。

过了些天，林彪一伙加紧对老师们进行迫害。3月份，他们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布置批判几位老师，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人都奉令到京开会。赵永夫供职的青海军区属大军区兰州军区管辖，他在兰州军区没有职务，却也得到来京开会的通知。赵永夫这时已经知道前几天军委肯定他的自卫行动的来电是叶剑英和几位老师们议定后发出的，而这几位老师现在都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实际上被停止了职务。军委扩大会议将由林彪和陈伯达等人主持，他预感到不妙。但是这时他还只是以为将会受到严厉批评处分，绝对想不到，他将会在京西宾馆人头落地。

军委扩大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出席了会议。江青首先站起来讲话，她得意地巡视了一下会场，见那些昔日纵横疆场的将军们一个个都坐在台下，听她这位昔日的政治协理员的讲话，不禁感慨万千，深切地感受到了权力的可爱。她拉长嗓门，用破胡琴一般发颤的声音喊道：“大家都认识我吧。京西宾馆这个地方过去我是不能来的，几个老师把京西宾馆占了。可今天，我又来京西宾馆了，那几个老师却一个也没有来，他们都在忙着写检查呢，来不了啦。”林彪立即插话：“我们要把带枪的刘邓路线的代理人统统揪出来，该打倒的打倒，该罢官的罢官，该关的关，该毙的毙。”

赵永夫听完林彪的这几句杀气腾腾的话，不禁冒出一头冷汗。还没有等他定下神来，江青嘶喊起来：“我要控诉，我要代表红卫兵小将控诉杀人犯赵永夫的罪行。”这时，王力把一只大提包打开，掏出一些物件递给江青，江青一边把这些物件往桌子上摆，一边装出悲愤的样子喊道：“大家看啦，这是血衣，这是刺刀，这是子弹头，这就是赵永夫镇压革命群众的铁证！”

康生虎着脸，朝台下大叫一声：“赵永夫来了没有？”赵永夫从座位上站起来，镇定地回答：“来了。”康生一拍桌子，指着赵永夫大骂：“你谎报军情，欺骗主席，欺骗中央，镇压群众，你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也大声地抗辩道：“我不是反革命。他们冲占机关大楼，抢劫武器库，开枪杀人，他们才是反革命。我是迫不得已才采取行动的。”康生一看小小的青海省军区司令竟敢当着这么多战将的面顶他，不禁怒不可遏，训斥赵永夫道：“你还敢狡辩，不把你抓起来你是不会老实的。”康生说完向谢富治作个眼色，谢富治马上站起来宣布：“现在我宣布军委决定，把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逮捕法办。”

几个武装战士闻令冲进会场，麻利地给赵永夫戴上手铐，撕下他的帽徽、领章。赵永夫挣扎着抗议道：“我无罪，我也有材料，你们为什么不看？那么多战士和群众被打死打伤，你们为什么不管？”警卫战士立即用毛巾塞住他的嘴，把他带了出去。

康生在台上同林彪耳语几句，林彪迟疑了一会儿，最后点点头。康生随即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了几句话，站起来走到谢富治眼前，把纸条交给他。谢富治一看，不禁一慌，康生又同他小声说了几句什么，谢富治连连点头。台下的将军们不知道他们几个又在捣什么鬼，个个伸长脖子看他们在台上表演。只见谢富治把纸条夹进笔记本中，站起来杀气腾腾地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利用手中的权力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红卫兵，实属血债累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依据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颁发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和第

六条，判处现行反革命分子赵永夫死刑，立即执行。”

将军们被激怒了，一个堂堂省军区司令，就这么三言两语判了死刑，不行，不能让他们这么胡来。有的将军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熟悉，知道他现在正在京西宾馆值勤，便连忙溜出会场，把赵永夫被判死刑的消息告诉他。傅崇碧心里一惊，马上采取措施，不让人把赵永夫带走，自己赶快拨通徐向前的电话，报告说：“徐总，康生、谢富治判了赵永夫死刑，林彪拍的板。你赶快想办法，时间长了，我就顶不住了。”

徐向前接到报告，立即命令傅崇碧：“要刀下救人，想办法拖住，我立即找总理。”他放下电话，立即拨通周恩来的电话，紧张地报告道：“总理吗？林彪他们要在京西宾馆杀赵永夫，你赶快向主席请示一下吧，现在只有主席救得了他。”周恩来放下电话，一边拨毛泽东的电话，一边恨恨地想，这伙家伙果然心黑手辣，竟敢开刀杀人，今天杀了赵永夫，明天还不知杀谁呢。

毛泽东的电话拨通了，周恩来报告说：“主席，谢富治同志在京西宾馆判了赵永夫死刑，要立即执行。我担心杀戒一开，不知将有多少颗人头落地。”毛泽东闻报大惊：“这不是胡闹吗？你立即通知谢富治，赵永夫的死刑判决取消，如发生问题，唯他是问。”

有了毛泽东的指示就好办了。周恩来立即拨通京西宾馆的电话，命令谢富治：“立即取消对赵永夫的死刑判决，如果赵永夫出了问题，唯你是问。”谢富治狡辩说：“这是林副主席同意的了的呀。”周恩来严肃地说：“不杀赵永夫是毛主席的指示，你敢违抗毛主席的命令吗？”谢富治全身顿时冒出汗来，连说：“立即放赵永夫，总理请放心吧。”

几个小时以后，江青带着关锋、王力来到钓鱼台 12 号楼见康生。江青一坐下便长舒一口长气，解气地说：“今天处决赵永夫，真是痛快，我总算出了一口气。”康生泄气地说：“赵永夫没死，他被总理保下来了。”江青急了，喊叫起来：“怎么？赵永夫没死？这可是你和林副主席点了头的，以后谁还听我们的。不行，一定要杀。”康生指指沙发说：“你别急，先坐下。你想想林副主席怎么会听总理指挥，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原来是毛主席保下了赵永夫，江青顿时傻了眼，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周恩来处理完赵永夫事件后，便赶紧去人民大会堂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正在北京厅等着他，一见周恩来进来，忙问道：“那个赵永夫的脑袋保住没有？”周恩来赶紧回答：“保住了，多亏主席指示及时，他才没被杀掉。”毛泽东听了松了一口气，往沙发上一靠说：“动刀杀人，杀一个军区司令员，不得了啊！千万不能开这个先例，不然我毛泽东就要犯大错误。”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拿出一篇文章的清样看起来，这是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表面上是批影片《清宫秘史》，实际上是批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支持这部影片，多次抗拒毛泽东批判《清宫秘史》的指示。毛泽东准备从发表戚本禹这篇文章开始，在报纸上半公开地点名批判刘少奇。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乃是系列批判的初战，兵法上讲要慎于初战，毛泽东要来清样亲自审阅，修改了一些句子，便发回去让《人民日报》发表。

刘少奇的电话被掐了，实际上已经变成罪囚。4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孩子们在外面把报纸带回来，刘少奇看了后把报纸狠狠地摔在地上，对孩子们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即《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什么

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上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越说越愤怒，孩子们越听越伤心。他们不明白，自己的爸爸——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是个跺一脚神州大地就要抖动的人，怎么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连申辩的机会和权利都没有。他们想，如果毛主席不喜欢他们的爸爸，那就干脆免去爸爸的职务好了。但是偏不，名义上爸爸还是国家主席，一切都没有动，但实际上已形同囚徒，这是为什么呢？

没等刘少奇的孩子们想明白，他们家的生活又发生了大变。4月6日，中南海的一些造反派大喊着口号冲进刘少奇的家，勒令刘少奇从今天开始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改变作息时间。造反派又质问所谓的61个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刘少奇一下子发火了，激怒地说：“这个问题真是岂有此理，他们出狱之事，是党中央批准的嘛，当时日寇就要进攻华北，我们要赶快把这批干部保护出来，不能再让日军把他们杀害。”造反派被刘少奇说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走了。

家里重新安静下来。突然，一个不速之客走来，通知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检查。刘少奇、王光美起先还没有太注意。还是平平了解情况，从清华大学回来报告说：“清华大学蒯大富要组织30万人大会批斗妈妈。”刘少奇一听大为震怒，推开饭碗，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你妈妈有什么责任。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批斗？”

王光美不让刘少奇去，安慰他：“你不要为我担心，我应付得了这个场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刘少奇坐下来，半天没有说话，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半晌，刘少奇才开口道：“光美，平平、源源、小小，你们都过来，我有话对你们说。”王光美和孩子们拥到跟前，刘少奇摸摸孩子们的头，悲凉地说：“孩子们，我是过不去这一关了。人家逼我当反革命，我连个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林彪反对过，江青反对过。我知道江青恨我。当年她和主席结婚时，我们政治局禁止她干预政治，她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进行报复。你们已经知道，从去年八月以来，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发展得更厉害，现在把错误都一古脑推到我身上，我成了人家推托错误的替罪羊。”

讲到这时，刘少奇猛咳一阵，又接着说：“我的日子看来不多了。你们记住，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王光美早已泣不成声，她绝望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刘少奇坚定地说：“要有信心，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你们要做好迎接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坚决地活下去，永远做人民的儿子。”

刘少奇讲完遗嘱，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

突然，房子外面响起杂乱的脚步声，房门粗暴地被推开，涌进三十几个清华大学的学生，正是蒯大富派出来的打手。为首者凶狠地说：“王光美，跟我们走吧。”王光美拢拢头发，昂着头，跟他们走了。

1967年4月10日一早，通往清华大学的路上挤满了各种载人的车辆和行进的队伍，批斗王光美的三十万人大会今天在清华大学举行。会议开始后，

蒯大富下令：“把王光美押上来。”几个清华大学学生押着王光美上来，一个学生头头把旗袍递给王光美，命令她穿上。王光美不穿，上来几个人对她一顿脚踢拳打，硬把旗袍套在她身上，又在她脖子上套上一串用乒乓球串起来的大“项链”。王光美知道这肯定是江青的鬼主意。原来毛泽东出访苏联以后再未出过国，江青也因此不能随访出国，对于经常随刘少奇出国访问的王光美非常忌妒。出于外交礼仪的考虑，王光美当然不能身穿干部服出访，必须稍加修饰，于是王光美每次出去总穿着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旗袍，脖子上戴一条小项链。江青是容不得别人比她多一点好处的人，当时无计可施，这次可以尽情报复了。

批斗会开始了，蒯大富这些人轮流质问，王光美作答。

问：你要揭发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的滔天罪行。

王：同意派工作组是由当时的中央常委会决定的。当然毛主席不在，刘要负主要责任。

问：刘少奇对清华作了什么指示？

王：刘少奇对清华指示很少。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针对的是谁你清楚吗？

王：他暗指的是刘少奇。

问：你对此怎么看？

王：我在少奇身边工作几十年，觉得你们提的事实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王：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六、七月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

清华大学的头头们以为三十万人可以把王光美吓得瘫在地上，但他们想错了。王光美是何等样的人，早在辅仁大学念书时，就是学生中很有影响的人物，以后投奔革命，东征西杀，什么场面没有见过。今日批斗会上，她舌战群凶，竟使他们无话可问，批斗会一时进行不下去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十五回 掩秽行收蓝苹丑闻 宣浩气辩伍豪佚事

话说清华大学蒯大富组织了三十万人批斗王光美，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明眼人都看出来，蒯大富等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王光美是为了批刘少奇。他们想王光美是一个妇道人家，这么大的批斗会一定会把她吓瘫，到那时还不是问什么，她答什么，可以弄到刘少奇的许多材料。蒯大富可真是看轻了王光美。批斗会上，王光美面对三十万人，神色自若，舌枪唇剑，或答或辩，滴水不露，弄得批斗会开不下去了。蒯大富一看急了，亲自上来批斗她，喝道：“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王光美反驳说：“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蒯大富又喝问道：“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王光美冷冷地回答说：“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王光美的回答又使蒯大富张口结舌。其实，蒯大富也是个极有心计、反应灵敏的学生。清华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蒯大富又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文革之前，他的学习成绩很好，文革一起，又成为清华的头号人物，没有两下子是爬不上这个地位的。那么为什么他说不过王光美呢？王光美的每次回答总是那么无懈可击呢？蒯大富也许明白，也许不明白，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阴谋，那些事只能在背后说，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而王光美的回答则完全是根据事实，这些事实大家也都知道，以致于无法批驳她。

清华大学批斗会一完，很多人不禁佩服王光美的大智大勇，坚贞不屈。过去他们只认识穿着旗袍的王光美，现在他们才知道了王光美的厉害，红卫兵小报把批斗会上的问答都报道了出去，社会上的人们也都为王光美的答辩叫好。

批斗王光美没有捞到便宜，造反派又加紧从精神和肉体上摧残刘少奇、王光美，他们的家被抄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把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别人，准备被捕。很快，一队武装士兵来了，把刘少奇拘禁在前院，把王光美拘禁在后院。接着，又一队工人走来，在前院和后院之间砌起一道高墙，刘少奇真正成了一个囚犯，监狱就是他的家。

紧接着，《人民日报》又开始批判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是刘少奇在延安时期写的，以后又重印几次，全国党员几乎是人手一本。中央文革小组已经组织了一个写作组写了题为《 修养 的要害是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文章。毛泽东看到文章的清样后，立即召集中央常委会议进行讨论。其实，这时的中央常委会已名不符实。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等常委被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就是陈毅、叶剑英等那些老师也一概被排除。自大闹怀仁堂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取消，中央文革代替了政治局。因此，这时召开的中央常委会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会。文章是中央文革组织的，讨论者又主要是中央文革，自然很快就通过了。

文章通过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陆续走了。周恩来被留下来，毛泽东要和他商量“五·一”节谁上天安门的问题。这件事周恩来已有准备，他掏出一个名单递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仔细地看起来。

排名单，在这时的政治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五·一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报纸是要报道的。谁在名单中有份，那自然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或者是毛主席认可的人，红卫兵就不能随便动他。所以毛主席很重视这个名单。

周恩来自然也明白这个名单的厉害，排名单时费了很大的劲，下了很大的决心把一些人列了进去。

毛泽东仔细地看名单。周恩来有些担心，生怕毛泽东把那几位老同志的名字勾掉。不料，毛泽东看到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的名字时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很满意地点点头，在名单上面画个圈，表示同意。

从丰泽园回来，周恩来立即让秘书打电话通知这些老帅登天安门城楼。这些天来，老帅们连连被批斗，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虽未被揪被打，但也是身心憔悴。五一节被批准登天安门，他们感到极大的欣慰。这一段时期，一直在暗中保护他们的王震等几位将军，也纷纷去电话向他们祝贺。

周恩来安排好了老同志登天安门城楼的事，又打电话请傅崇碧来，商量转移老干部的事。傅崇碧闻风而动，周恩来放下电话不一会儿，傅崇碧就过来了。周恩来问了一下特监的情况，傅崇碧如实作答。周恩来知道现在能使这些特犯们有一个相对安静稳定的地方休息就很不错了，为这傅崇碧还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呢。周恩来表扬了傅崇碧几句，问他：“现在贺老总发烧，301医院又不好去住，你看北京军区的医院能不能住？”傅崇碧说：“五棵松那里有我们警卫一师的医院，比较安静，我看能行。”周恩来说：“好，你亲自去落实，药品不够，找我的保健医生。”

贺龙住进五棵松医院后，经过治疗，很快退了烧。

这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江青耳朵里。文革开始以来，江青想整的很多人都叫周恩来给保起来了，住进了部队营房。红卫兵虽可揪斗，但由部队监视着，不能乱来。江青恨透了傅崇碧，但他是执行周恩来的命令。江青明白，要把这些老干部整死，就得把周恩来搞倒。同时她也知道，周恩来是她夺取党和国家核心权力的最大障碍，她要当女皇，也必须坚决除掉周恩来。为了实现政治野心，她把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延安和西柏坡时对她的照拂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但是，要打倒周恩来谈何容易，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的一个主要支点，失去了这个支点，权力制约系统就要失去平衡，就将发生可怕的事件，毛泽东是决不会答应的。要打倒周恩来，就必须找到一块坚硬的石头才行。

五一节刚过，江青一伙又操纵北京师范大学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攻击陈毅等人，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江青苦于找不到过硬的、一下子可以打倒周恩来的材料。突然，5月12日，秘书给她送来了一封信，要她亲启。江青最近经常收到这样的材料，她漫不经心地打开信，看了一眼信和材料，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认真阅读起来。

信是天津的一些大学生写来的。1966年年底以来，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个被整垮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在政治上寻找出路，一头钻进天津和全国的图书馆，找出了蒙着灰尘的建国前的旧报纸翻检起来。他们翻检什么呢？原来南开大学建校较早，文、理并重。学生们来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懂得了从报纸上搜集研究资料，由此也知道三十年代旧报纸上有一些共产党员被捕、处决的报道。他们这时想起来，报纸上也有可能有一些叛变的共产党员的自首书，只要把他们揪出来，不就是一大功吗？

南开学生很快就在报纸上发现了刘澜涛等61人在抗战初期出狱的报道，他们自以为发现了重大秘密。其实，刘澜涛等人出狱是中共中央集体研究后营救出的，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都参与决策，毛泽东也没有反对，

这是有文件可查的。但是江青一伙为了打倒刘少奇，闭着眼说瞎话，把刘澜涛等人打成叛徒集团，当众表扬了南开学生几句。这些学生更得意了，到处钻图书馆、档案馆，大揪叛徒。一时间，叛徒集团到处都是，极大地损坏了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无数在狱中或白区坚贞不屈的老革命被迫害致死。

现在，南开学生又有了新发现，他们在上海《申报》、《时报》等旧报纸上发现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就是周恩来在觉悟社时抽号定下的化名，当时周恩来就在南开大学读书。南开出了个周恩来，南开人都引以为荣，伍豪之名，谁个不知，哪个不晓。这些学生发现这则启事后，以为又捞到可以往上爬的政治资本了，他们立即把伍豪等启事抄下来，并写了一封揭发信送给江青。

江青接到这封信后如获至宝，亲手给林彪、周恩来、康生写了一封信：“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信写完后，她把抄件夹在信里，让人送给林彪、周恩来、康生阅读。信发走后，江青高兴得睡不着觉，想着此事办好后，要好好夸奖一番南开的这伙人。

林彪在党内的资历较浅，另外，他掂来掂去，觉得从各方面考虑，不能让江青爬得太快，所以对江青的信不哼不哈。康生是完全知道这件事的经过的，当时，他就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临时中央特科工作。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康生两次对这个事件作过说明，指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可是，现在他却默不作声了。他有他的想法，他不愿开罪江青，再说，如果真能搞倒周恩来，他也说不定还能捞到些好处，他要再看看。

周恩来看到江青的信后，怒火中烧，知道这是江青给自己的通牒，但他这时忙于处理内蒙古问题和四川问题，无暇写信驳斥江青。四川和武汉的驻军自介入文化大革命参加三支两军以来，遇到了一些麻烦。他们觉得支持大部分群众的合理要求，稳定社会秩序是部队三支两军的主要任务，但中央文革小组却偏要他们去支持少数打砸抢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打砸群众，而且冲击军营，抢劫武器，战士多人被打伤。四川驻军忍无可忍，在宜宾地区实行反击。这下子可不得了啦，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向毛泽东告状说成都军区司令员廖汉生、成都军区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出动部队镇压群众，制造了所谓的宜宾惨案。廖汉生、李井泉被撤销一切职务，调来北京。周恩来被授以处理善后之责，日夜找部队和群众组织的人谈话，稳定四川形势。这期间，内蒙军区的战士又来京请愿，周恩来又多次接见他们，讲清形势，处理问题，一直忙到5月18日才算忙出个头绪来。于是在秘书的帮助下，他开始反击江青的挑战。

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略知一二，但并不十分清楚。因为他是1931年底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上海的报纸上刊登伍豪启事则是1932年2月，其时他已经在苏区工作两个多月了。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上海报纸上刊出“伍豪启事”以后党中央采取的反击措施。

那是1932年2月底，上海地下党通过交通员给瑞金的苏区中央局送来了上海出版的《时报》、《新闻报》等报纸，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人打开报纸一看，原来上面刊登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大家不禁被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卑鄙的造谣手段激怒了，周恩来早就到中央苏区来了嘛，什么时候又跑出一个伍豪来了呢？毛泽东等同志商议后，决心进行反击。1932年2月，

苏区中央局决定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布告。布告说：“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在苏区中央局反击的同时，周恩来、毛泽东等人也通过交通得知还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陈云同志也在临时中央的领导下，亲自组织反击。临时中央特科这时已查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即“中统”）驻沪调查员黄凯和“中统”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合谋伪造的，张冲执笔，黄凯派人到申报馆送登。申报馆广告处律师看了启事后说：“启事说伍豪等二百四十二人脱党，但启事上只有伍豪一个名字，启事显然有漏洞，不能刊登。”启事遂被压下。但2月17日，《时报》却首先登出来了，《新闻报》也登出来了，这两家报纸当时经费紧张，正缺钱用，刊登这则启事，收到大额广告费。

本来，申报馆不愿意刊登启事，完全是报馆自己的事，申报馆不想挣这笔广告费。但国民党当局不干，派出上海新闻检查处官员督促刊登。申报馆无奈，只好刊登了“伍豪等脱党启事”，《时事新报》也接连刊登。

在上海临时中央的领导下，陈云派人去申报馆交涉，要求刊登“伍豪启事”，实际上这则启事是陈云派人代写的。申报馆老板史量才和总顾问陶行知自然知道“伍豪脱党启事”和“伍豪启事”的背景，他们商量了一会，采取了个妥善的办法，以广告处的名义在报纸广告栏上发表启事。启事称：“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这则启事登出后，为了进一步澄清事实，陈云又请申报馆法律顾问法国律师巴和刊登声明，说明真相。经许以重金，巴和律师即以周恩来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3月4日的《申报》上登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内称：“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字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里，一面翻阅着报纸，一面编写“伍豪脱离共党启事”出现的前前后后的大事记。顿时，三十年代在上海领导特科反击顾顺章叛变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浮现在眼前，这场斗争和“伍豪脱离共党启事”有直接关系。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得到打入“中统”内部、任“中统”头子徐思曾的秘书钱壮飞的紧急报告，连夜转移了全部有关机关，切断了顾顺章熟知的一切联络渠道。这时周恩来、康生（当时叫赵容）得到情报，得知顾顺章在上海的亲属准备向敌人告密，已经和国民党特务机关取得了联系。这太危险了，因为他们掌握和了解党的许多机密和领导同志的情况以及中央机关地址。周恩来和康生商量后决定组织特科消灭这些凶险的敌人。1932年5月，特科秘密处决顾顺章家属共16人。此年11月，参加特科这次处决行动的号为“老先生”的王世德被捕叛变，供出了这次处决行动和埋尸地点。国民党遂下令挖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在胶济路、

武定路修德坊 6 号，在新闻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 91 号，挖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 16 人。上海各报对于这样的重大新闻自然是非常重视，不但详细报道，还配发了照片，顾顺章看到报纸上的消息，破口大骂周恩来、赵容，悬赏大洋三千元，缉拿周恩来、赵容……

周恩来想着，编写着，真是往事如烟，浩气长存。他编写好大事记后，又把报道这些事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 年 11 月和 12 月的报纸，《申报》1932 年 1 月和 2 月的报纸分别装订成两本合订本，然后坐下来给毛泽东写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是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月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关于“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案，毛泽东是清楚的，他觉得这是组织上早就澄清了的事，是国民党的造谣污蔑嘛，所以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适逢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听到这件事后，来电询问，毛泽东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连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将军尚臣不明白三十年代初上海临时中央及特科面临的艰险复杂的政治斗争环境，更不用说年轻一些的人了。周恩来的报告和材料送到后，他立即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同时，毛泽东也感到江青指使一些学生查报纸，找材料，仅仅依据国民党报纸上的一些造谣污蔑，就把一些高级干部打成叛徒完全是胡闹，别有用心。他立即通知中央又革小组，起草规定，禁止学生诬陷高级干部。六月中旬，这个通知经毛泽东审阅后发了出去。

江青妄想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打击周恩来，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没有损伤周恩来的一根毫毛，反而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实际上等于把南开学生、也就是把江青批了一顿。江青坐 F 来，又仔细捉摸起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来，看还能不能再找个空隙下蛆。想着想着，她忽然想到一件可

怕的事。红卫兵翻遍旧报查叛徒，就不会看到报纸上的那些报道她当年在上海滩丑行的新闻和照片么？扮演妓女，为蒋介石祝寿演出，还有那些争风吃醋的风流韵事。三十年代初期的蓝苹，虽然在上海滩上只是一个三流女演员，但却擅于弄出一个接一个的桃色事件，是上海小报播弄黄色新闻的热点女演员。还有那最要紧的，蓝苹被捕叛变，在报上刊登自首启事。江青心里明白，自己搞周恩来是无中生有，但自己叛变自首却是铁证如山。既然红卫兵能找材料整到周恩来头上，自然也会整到她江青的身上，怎么办呢？

正当江青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北京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傅崇碧来到钓鱼台，求见江青。说起来，江青和傅崇碧还有过一段友谊呢。那是蓝苹刚到延安的时候，傅崇碧和她一起排练演出过文艺节目。然而在文化革命中，傅崇碧对她是能躲则躲，主席夫人啊，不好惹呢。江青见傅崇碧平时躲着她，今天突然主动上门来找，赶紧请进来，毕竟他是北京卫戍区司令，站在关键性的岗位上。傅崇碧进来后，取出一包材料递给江青说：“这是上海寄来的一包材料，我想还是由江青同志亲自处理吧。”

江青接过材料，抽出几份一看，有蓝苹为蒋介石祝寿演出的剧照，有江青的桃色新闻……江青脸色一沉，把材料拢回口袋，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个星期后，江青在钓鱼台的寓所召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蒯大富、王大宾，由于造反有功，聂元梓已荣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他四人也都成为常委。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也被江青叫来一起会见“五大领袖”。

人到齐后，江青阴冷地说：“告诉你们，现在有人整陈伯达、康生和我的材料。”突然，她圆睁怒眼，凶狠地说：“今天，我把公安部长、卫戍司令叫来，就是要叫你们知道，哪个敢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哪个敢整老娘的黑材料，老娘就抓他！”

会场上一阵静默，江青盯着大家，厉声问道：“你们谁整过我的材料？”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十六回 毛泽东莅汉保军区 独立师封湖扣王力

话说江青得知有人整她的黑材料，立即把北京的几个造反组织大头头找来，把他们训了一通。蒯大富等人自然是不肯承认整过江青的材料。江青问不出所以然，又把气撒向傅崇碧，既然他把材料给自己送来，肯定看了材料。想到这里，她朝傅崇碧瞟瞟，狠狠地说：“谁整了老娘的材料，我叫他不得好死。”

傅崇碧从楼里出来，问谢富治说：“江青同志这是骂谁呢？”谢富治两手一摊说：“谁知道。”两人还要再谈几句，谢富治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抱歉地对傅崇碧说：“崇碧同志，中央最近要我和王力同志到四川去，李井泉被打倒后那里的问题比较多，我得赶紧找王力商量一下，不便奉陪了。”谢富治匆匆握别傅崇碧，去找王力商量入川的事去了。

谢富治、王力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入得川来，先后到了成都、重庆等地，接见造反组织头头，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及成都军区商议了许多事项。7月14日凌晨，谢富治突然接到中办电报，让他们即去武汉准备迎接毛泽东主席莅汉。谢富治看了电报后，立即同王力、余立金乘飞机赶到武汉，海军政委李作鹏马上派人把他们接到宾馆。谢富治、王力到了宾馆会议厅，只见会议厅里人坐得满满的，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会议，为毛泽东主席莅临武汉作准备。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负有安全保卫的重任，周恩来免不得多嘱咐了几句。

毛泽东专列南下行程的消息不断传来。7月14日晚上，毛泽东的专列到达武汉。车站上已经戒严，随毛泽东专列南下的中央警卫团的一师部队已经占领了车站各处要地，严密戒备。毛泽东从专列上走下来，同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亲切握手，随后率随行来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和总理一行驱车前往宾馆。这时虽然已是深夜，但武汉市依然酷热逼人，大街小巷，摆满了露宿街头的市民们的竹床、凉椅，一队队佩戴“百万雄师”袖标的战斗队在大街上刷写大字报、大标语，广播高音喇叭也不时突然传出“通告”“通令”，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部队巡逻在大街小巷。七月中旬的武汉的政治气候，也如同这个城市特有的高温酷暑一样滚烫灼人，一场政治大决战已经在这里开幕了。

毛泽东在车里注意观察着街头的动静，一边同汪东兴交换几句意见。这一个时期来，毛泽东不断接到江青等人的报告，说武汉形势严重，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纵容支持独立师镇压革命造反组织“工人总部”，给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配车发枪，武汉军区已武装对抗起文化大革命来了。毛泽东不太相信江青的报告，又征询总理的意见。总理感到武汉问题在全国比较突出，必须集中力量解决，迅速稳定武汉形势。毛泽东从不同的渠道了解了情况后，决定亲自去武汉视察一下，一来是亲自坐镇解决武汉问题，二来也是想再畅游一次长江。

毛泽东在宾馆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立即召集周恩来、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谢富治和王力首先汇报了一下在四川检查工作的过程。由于四川问题已被解决，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再作更多的讨论，毛泽东一下子把话题转到武汉问题上来。谢富治、王力又是首先汇报他们来武汉后所了解到的情况，其他人也接着说了说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毛泽东对他们的报告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只是指示大家，“工人总部”应该平反，“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军区对两派都应支持。毛泽东讲了自

己意见后，当场指定周恩来总理负责主持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都要予以很好的配合。

会议散了以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连夜草拟了一份发言提纲，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了一遍，觉得符合自己的意思，便叮嘱周恩来说：“解决武汉问题的关键不是别的，是要陈再道改变只支持一派的态度。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周恩来点点头说：“陈再道这个同志很耿直，他解散工总，也是受我的一次讲话的影响，责任在我，我尽力做工作，让他转弯子。”毛泽东笑笑说：“那好，陈再道我是一定要保的。”

从主席那里回来后，周恩来便让秘书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军区领导叶明、孔庆德、29师政委张昭剑、武汉军区空军司令员刘丰等军区师以上有关军官开会。谢富治、王力因负有协助周总理解决武汉问题之重任，也来到会场上听取汇报。汇报会从7月15日晚开始，一直开到18日，开了整整四天，陈再道、钟汉华全面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周恩来对武汉问题的认识更明晰了。

原来林彪上台后，一直在想办法排除红军时期红二、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出身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一、二、三野战军出身的干部，重用红一方面军和第四野战军出身的干部。当然用的是紧跟自己的，不紧跟自己的非但不用，还要去掉。其他几个野战军的干部只要表示愿意紧跟自己，也照用不误。1967年初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都是原来四野的军长。几个大军区中，他也不断在安插自己的亲信。但这些大军区司令资格很老，战功显赫，毛泽东又很信任，很难动。林彪就挑动造反派去冲击军区机关，造成事端，然后再动手解决。有林彪作后台，造反派冲击南京、成都、武汉、济南等大军区机关。军区内配属的空军司令有的也不听军区领导的话，如武汉空军司令刘丰就按照吴法宪转达的林彪的指示，不听陈再道、钟汉华的招呼。

上海“一月风暴”刮起时，由于林彪和江青的支持挑唆，从北京南下的造反派和武汉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占领了长江日报社所在的红旗大楼，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在大街上游行示威，挑起武斗，社会秩序大乱。武汉军民强烈要求军区采取措施，制止打砸抢事件。这时，军委的“八条命令”已经下达，陈再道当即下令抓捕打砸抢坏头头朱鸿霞等人，解散“工人总部”，有效地制止了打砸抢抄抓的活动，稳定了形势，保护了大批干部群众。

林彪、江青等人看到武汉形势开始稳定，急谋对策，最后商定由王力起草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由林彪审定发布。这十条命令基本上推翻前面发布的军委“八条命令”。“十条命令”的发布，又给造反派打了气。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造反派就到军区司令部支左办公室张贴大字报挑战，接着在武汉串校游行，大呼口号要揪出“武老谭”。江青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挑唆说：“成都、武汉，都是问题比较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武汉地区的造反派遂提出“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的口号，在武汉到处挑起事端，大搞武斗，甚至绑架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武汉群众对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十分愤恨，组成战斗组织“百万雄师”，迅速发展成拥有120万人的组织。“百万雄师”同造反派的观点完全相反，认为湖北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武汉军区大方向是正确的，大多数地方干部是好的，反对搞乱社会秩序，反对冲击解放军。由于观点不同，“百万雄师”和造反派的冲突日益激烈。但造反派打砸抢不得人心，越来越孤立，被“百万雄师”

围剿得四处躲藏。还是陈再道怕出问题，每每派出部队解围。部队虽然对陈再道的命令想不通，但军令如山倒，只好忍着气，解劝“百万雄师”把他们放掉。

周恩来听完陈再道等人的汇报，心情沉重，深深感到这个工作不好做。从感情上讲，他是同意陈再道的看法的。但毛主席已有指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按毛主席指示的办法解决武汉问题是唯一现实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武汉的形势还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陈再道说不定会被打倒，那将是周恩来最不愿意见到的结局。

正如周恩来预见到的那样，陈再道不肯承认是犯了方向错误，不愿检查，不给“工人总部”平反，不放掉朱鸿霞。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我来武汉，不是为了打倒你，而是保护你们来的。主席也是保护你们来的。主席动身时还对大家讲，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陈再道不知道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主席已定了，倔犟地摇摇头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没有什么可检查的。”谢富治当即拍桌子训斥陈再道：“你们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不转变，你们考虑。”陈再道也拍了桌子，毫不客气地顶道：“你这是胡说，‘三钢三新’好，又有你们中央文革捧着，我们军区保护着，为什么武汉人民都跑到‘百万雄师’里面去了？”

谢富治被驳得哑口无言。两位二野的将军曾经先后作为陈赓大将的副手协助过陈赓的工作，又长期在刘邓麾下并肩率兵作战，所以谢富治也不敢过于对陈再道放肆。王力不管这些，见谢富治败下阵来，大声对陈再道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陈再道的副司令员韩东山立即驳斥王力：“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谢富治听了这话，瞪圆了眼睛，恶狠狠地指着韩东山的鼻子骂：“你好大的胆子，敢反对林副主席。”陈再道拦住谢富治的话头，冷冷地说：“不要乱扣帽子。”周恩来见他们要吵起来，连忙劝开。

会议正进行中间，突然有参谋进来报告说：“武汉街头，‘三钢’‘三新’正在大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到汉。”会议暂停，只听得远远传来口号声，“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来到武汉”，“谢富治、王力同志是毛主席派来的客人”，“打倒武老谭，揪出陈再道”。周恩来眉头一挑，不满地问谢富治：“我告诉过你们，不要公开露面，你们为什么公开露面了？”谢富治诡辩说：“主席让我和王力同志协助你解决武汉问题，我们得看看大字报，了解了解情况呀。这么热的天，又不能戴口罩，一出去就给人认出来了。”周恩来严肃地说：“既然你们的身份公开了，那你们就得出去做他们的工作。在中央解决武汉问题期间，大家不要搞游行，要创造一个联合的气氛嘛。”谢富治答应道：“我们一定按总理的指示办。”

当夜的会散了后，谢富治、王力即去造反派各据点做工作。谁知他们俩人根本不守信用，一到造反派的据点里，谢富治就登上讲台为造反派打起气来：“我和王力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来看望你们，你们的大方向全然没有错，我们全力支持你们。”造反派听了，欢呼雀跃，感谢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谢富治、王力向造反派频频招手致意。

从造反派的据点出来，谢富治和王力又到了“百万雄师”的总指挥部。

总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热烈欢迎他们到来，谢富治却沉着脸命令道：“把你们负责人的名单开一个给我！”总指挥以为谢富治要找大家汇报，忙开了一个十三人的名单给他。谢富治把名单往口袋里一揣就再不理他们了。王力跑到前面来斥责他们：“你们把人集中在据点里搞武斗是错误的。”总指挥礼貌而又悲愤地说：“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一回去就挨打。只好暂住在这里。”王力讥讽地说：“你们‘百万雄师’不是号称有一百二十万人吗？不是在武汉市占绝对优势吗？你们怎么还不敢回去？”总指挥回答说：“全市来说确实是这样，但就部分工厂来说，我们占少数，不敢回去。”王力蛮横地命令：“你们必须得回去。”总指挥这才看出来王力原来不是看群众组织来的，而是逼降来的，不客气地回答说：“首长叫我们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声色俱厉地斥责道：“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你们有什么权利管人家。”总指挥听了王力这话，不禁十分恼火，大声反驳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被驳得哑口无言，气得指着“百万雄师”的总指挥说：“你、你……你好大胆，你等着吧，走！”

谢富治和王力气恼地走了，总指挥立即召集各部门、各下属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如实地讲了谢富治、王力逼降的过程。这些“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个个气得大叫起来，当即跑回去向本部门，本战斗队作了传达，“百万雄师”的百万群众都大骂谢富治、王力，连夜书写大标语、大字报贴到武汉大街上。顿时，武汉大街上满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始，哇喇哇喇”，“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斗”，“王力下连当兵去”，“王力到工农群众当中来”的大标语、大字报。“三钢”“三新”见了，也纷纷上街贴感谢谢富治、王力支持的大标语、大字报。他们自以为有中央文革支持，贴大字报、大标语时又随意覆盖“百万雄师”刚贴出的大标语、大字报，“百万雄师”当然不平，走过去干涉，往往发生斗殴。武汉形势不但没有和缓下来，反而更加紧张起来，犹如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桶。

几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武汉军区的汇报会结束了，在周恩来的耐心说服下，陈再道钟汉华明白了周总理的良苦用心，答应写检查。周恩来高兴地说：“好嘛，我带你们去见主席吧，我明天要回北京了。我走了以后，希望你们尽快解决武汉问题。”

毛泽东已经在宾馆等着了。周恩来带着陈再道一进来，毛泽东就问：“你们想通了没有啊？”陈再道气鼓鼓地说：“我们有错误，要检查，但我们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怕个嘛子，现在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小孩子偷个苞米也是路线错误。”毛泽东招呼说：“来，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陈再道等人把椅子往前挪挪，蛮有兴趣地听毛泽东讲起故事来。毛泽东抽口烟说：“我给你们讲——”下面就是毛泽东讲的这个故事。

原来文化革命前，毛泽东去河南视察，偶然碰见中共许昌地委书记纪登奎。此人方脸大耳，相貌忠厚，谈话朴实，毛泽东与他很说得来。此次离京南下，眼见各地干部都被批斗，不觉想起了纪登奎。这时河南省已经由省军区军管，毛泽东召见省军区司令时，提起了纪登奎，问道：“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省军区司令听了心里一惊，连忙吩咐手下：“赶快把纪书记接

来。”手下人不明白是哪个纪书记，省军区司令瞪了一眼说：“就是纪登奎同志。唉，你笨，办不了事，我亲自去接吧。”

省军区司令为什么改变主意，要亲自去接呢？一是要让毛泽东高兴，二是纪登奎早已被关起来批斗，现在毛泽东突然要见他，而且称“老朋友”，说不定要提拔，省军区司令可以用亲自去接这种方式，化解仇怨，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省军区司令来到纪登奎关着的地方时，见一群造反派正批斗他呢。纪登奎坐着喷气式，屁股撅得高高的，汗珠直从头上往下淌。省军区司令“噌”地登上台去，扶起老纪，流着眼泪说：“老纪，我来迟了。”又训那些造反派说：“纪书记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竟敢冲击，好大的胆子，把他们的名字单位记下来，回来跟他们算帐。”

省军区司令扶着纪登奎从台子上下来，马上就有理发员来理发修面。浴池师傅已把浴池打开，请纪登奎去洗澡。几个士兵又拿来了全新的夏军装和军帽，帮纪登奎穿起来。纪登奎经这样一番打扮，戴上黑边眼镜，顿时跟刚才判若两人，分外精神，一副大干部的派头。纪登奎不知道自己交了什么好运，一下子从一个阶下囚变成座上宾，但又不敢多问，只好随省军区司令上了大红旗。在车上，省军区司令才告诉他：“毛主席到了河南，要见你呢。”纪登奎顿时心跳加快起来，原来是毛主席点名要见自己，怪不得这些人一个个忽然客气起来。

毛泽东见了纪登奎，一下子伸出手来，边握手边问：“纪登奎，老朋友了。”纪登奎恭敬地问候说：“主席好！”毛泽东拉他坐下，问道：“这一向怎么样啊？”纪登奎轻松地说：“无非是坐喷气式。”毛泽东又问：“坐喷气式的滋味怎么样啊？”纪登奎笑笑说：“没有什么，就跟做广播操一样，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泽东听了高兴起来，站着，把腰弯下去，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大家看了哈哈大笑，赶紧过来把主席扶住，毛泽东欣赏地看着纪登奎说：“干部们要都像你这样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就好了。”

毛泽东讲完了故事，问陈再道：“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你明白吗？”陈再道“嗯”了一声说：“我明白，主席是叫我们正确对待群众。要是犯了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毛泽东摇摇头说：“那可不行，你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就下不了台。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陈再道建议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王力气呼呼地说：“百万雄师不听中央文革的话。”毛泽东安慰陈再道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毛泽东此晚和陈再道一直谈到10点钟，随后陈再道和谢富治、王力、刘丰把周恩来送到机场。周恩来临登机前再次叮嘱大家努力解决好武汉问题，随后乘飞机返回北京。

周恩来一走，没有了约束，谢富治、王力更加为所欲为了。他们干脆戴上“三钢”“三新”的袖章，到造反派的据点、工事里窜来窜去，慰问武汉伤员。造反派特地召开紧急大会欢迎谢、王。王力在大会上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小将们，你们放心，武汉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最快，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迫、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讲完话后，在谢富治的安排下，刘丰

等武汉空军负责人挨个儿跑到台上表态，表示要坚决和造反派站在一起。

谢富治和王力的讲话点燃了武汉即将爆炸的政治空气。第二天，也就是7月19日，造反派的所有广播台都打开了，无数的高音大喇叭在武汉三镇播放着谢、王的讲话，广播车在街上跑来跑去，呼喊“揪出武老谭”、“打倒陈再道”、“解散反动组织百万雄师”等口号。武汉军民听了，大为震怒，一张题名为“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的大字报出现在街头。大字报直斥王力以极左面目出现，在全国大搞武斗，大混乱，大流血，大破坏。大字报提问道：“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大字报呼吁“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三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7月19日，武汉军区党委会常委会议召开，陈再道、钟汉华在会上作了检查。下午3时，武汉军区召集师以上干部，请谢富治、王力讲话。王力这时轻狂到了极点，傲慢地对这些将军们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

王力正讲得起劲，突然从大街上传来阵阵沉雷般的呼喊声。陈再道大惊，忙派人出去打探，原来是“百万雄师”反对王力的大游行开始了。王力听了，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可是紧接着军区大院门口涌来了独立师和29师的大批战士，大声呼喊要谢富治和王力接见他们，解释清楚王力在武汉水电学院的讲话是什么意思。

陈再道怕王、谢出事，赶紧把他们从后门悄悄地送到东湖宾馆。这时军区大院门口已排列了一百多辆汽车，几千名独立师的战士和“百万雄师”群众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负责人，王力凭什么就把“百万雄师”打成保皇派组织，质问陈再道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陈再道等人见战士们义愤填膺，即委托几个领导做战士的工作。陈再道绕道来到东湖宾馆，对王力说明了军区大院的事，希望他们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事态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王力听了，理都不理，听任事态发展。转眼间两个钟头的时间过去了。谢富治醒来，知道情况发生变化，埋怨王力早不叫醒他。这时，“百万雄师”的大队人马包围了东湖宾馆，嚷着要找王力。王力吓得躲了起来，陈再道和谢富治出来在草坪上会见他们。谢富治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一看形势不好，虚与委蛇，答应下午会见他们。“百万雄师”的群众也就准备走了。

突然，宾馆又冲进来几百武装战士，多数是独立师的。原来他们在军区大院等了半天，不见王力出来，后来才听说陈再道把王力护送到东湖宾馆，他们遂追到东湖宾馆，在东湖一带设下岗哨，务必要抓住王力。他们冲进宾馆后，误把陈再道当做王力上去就给陈再道一顿枪托，警卫人员连忙护住，连叫：“这是陈司令，是陈司令！”战士们方知抓错了人，便连忙搜寻王力。一个“百万雄师”的群众发现王力跑回了房间，便带路去抓王力。战士们找到王力后，要他到军区大院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北航红旗战斗队随王力来的几个学生大耍威风，辱骂战士，战士们不客气地回敬了一顿。一不做、二不休，他们把王力抓出来，塞进汽车，往军区大院驶去。

究竟王力性命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七回 示信任周恩来单身赴汉 顾大局陈再道戴罪进京

话说 1967 年 7 月 20 日凌晨，王力被武汉军区独立师的几百名战士从东湖宾馆抓走，带到军区大院，要他回答军区战士们的质问。毛泽东当时就住在不久的东湖宾馆的另一处馆所。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立即跑到毛泽东的住所，添油加醋地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听说独立师“哗变”，抓走中央代表，十分恼怒，当即通知陈再道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被战士打伤，不好行动，又要坐镇东湖宾馆，保护毛泽东的安全，走不开，便由钟汉华去找王力。钟汉华离开东湖宾馆，驱车去军区大院，只见沿路无数的大卡车载着“百万雄师”和驻汉部队武装游行，游行车辆几乎占满了武汉三镇的大街。钟汉华站在长江大桥上放眼望去，只见车流滚滚，红旗如海，枪刺如林，呼声如雷。武汉市内“百万雄师”和部队的高音喇叭一齐播放着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毛泽东的这首七律《过江》是 1949 年 4 月底百万解放大军雄师强渡长江，解放南京后毛泽东有感而写的。武汉“百万雄师”即从毛泽东的这首七律诗中摘取了“百万雄师”四个字作为自己的组织的名称，既有气魄，又含义深刻。

钟汉华驱车驰向军区，一路是游行示威的武汉军民，广播车的播音员领着呼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打倒王力！”“中央派人来，王力滚下台！”“周总理到武汉，王力靠边站！”“欢迎周总理到武汉！”

钟汉华的汽车挨着游行车队缓缓行驶，好不容易才到了军区。王力站在院子里语无伦次，满脸惊恐地回答着战士们的质问。钟汉华和军区其他几个负责人叶明、孔庆德走出来劝说战士们放掉王力，战士们执意不肯。直磨到中午时分，大部分战士回去吃饭了，钟汉华才想法把王力偷出来，送到 29 师师部。师部政委张昭剑也紧跟着来到 29 师师部，受军区的委托，专门保护王力。张昭剑回到师部，屏退闲杂人员，悄悄地对王力说：“首长，你处境危险，必须跟我走。”王力怀疑地问：“你是……”张昭剑说：“首长，你放心吧，我是 29 师政委，独立师抓你，我是反对的。”王力连说：“好，好。你路线觉悟高，我一定把你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这时，远远传来闷雷般的口号声，王力已是惊弓之鸟，听见口号声浑身发抖起来。张昭剑吓唬他：“公检法、百万雄师、独立师要来抓你，已经逼近师部，外面的喊叫声就是他们的。”王力一听，吓得快要瘫在地上，张昭剑叫来两个战士扶着王力上了洪山，躲了起来。

陈再道得知王力已被救出，便报告了毛泽东。这时毛泽东的馆所里气氛非常紧张，中央警卫团部队已在院里修起了工事，架起了机枪，戒备森严。汪东兴、杨成武、谢富治等人紧急磋商应变的措施。这时军官进来报告，邱会作已经来到东湖，有万分紧急情况面见毛主席。汪东兴等人连忙吩咐“有请”。邱会作满头大汗地走进来，大家叫他赶快脱去制服凉快凉快，邱会作却死也不肯脱。大家十分奇怪，见他执意不脱，也就不勉强了。汪东兴告诉邱会作：“主席正在休息，你稍等一会儿。”邱会作知道毛泽东昼眠夜作的习惯，也就坐下来和大家商议一下毛泽东转移的有关细节。可去的地方有长沙、上海、南昌，但到底去哪里，还得要主席定夺。

下午五时，毛泽东醒了，汪东兴立即安排邱会作见毛泽东。邱会作见了毛泽东，说：“主席，我这趟来是担着天大的担子。”他一边说，一边从贴身的汗衫内取出一封汗水湿透了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完信，取了支烟抽起来。邱会作小心地说：“林彪、江青同志派我来送信，叫我一定把信亲自交给主席。江青同志叮嘱我，要我一定把信送到，否则提头来见。林彪和江青担心主席的安全，请主席转移，最好去上海，张春桥已经到上海去了。”毛泽东将信将疑地说：“有那么严重吗？走，去哪儿？看看再说吧。”邱会作又请求说：“林彪江青说请主席见信回他们几个字，以使他们放心。”毛泽东说：“信就不写了，你回去同他们说一声就是了。”

到了晚上八时，“百万雄师”和驻汉部队的大游行仍没有停止的迹象，千万道汽车灯光划破夜空，无数汽车喇叭声有节奏地响着，“嘟——嘟——嘟嘟，”远远听来，就成了“打——倒——王力”。汪东兴、邱会作等人再一次劝毛泽东赶快离开武汉，向上海转移，毛泽东同意了。汪东兴、谢富治立即叫来武空司令刘丰，布置转移事宜。深夜二时，刘丰派来的空军警卫部队到了东湖宾馆，毛泽东坐上一辆空军的普通汽车，由刘丰等几个人护送，悄悄地离开东湖宾馆。沿路行人谁也没有注意这几辆军车，汽车一直开到王家墩机场才停下来。这时，一架空军的专机已经隆隆启动。邱会作钻出汽车，又一次向准备登机的毛泽东讨回信，毛泽东摆摆手说：“不写了，不写了，你回去同他们说说。”

毛泽东为什么不写回信呢？原来毛泽东并不相信武汉军区真有兵变企图，如果写回信，信中免不了要对武汉军区兵变表态，那么林彪、江青就可以以他的信为依据对军队下手，那样一来说不定真会造成部队的激变，真正危害到毛泽东的事业和人身安全。当然，走还是要走的，毛泽东也在提防事情发生变化。他一路从东湖出来，除了“百万雄师”和部队在街上有秩序地游行外，并未看到封锁交通、盘查行人、密布岗哨这些兵变时必然要采取的措施。他们坐的几辆汽车也是沿途顺利，没有什么人上来检查，毛泽东就更不相信武汉兵变之说，也更加不给邱会作回信了，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

毛泽东一到上海，张春桥立即前来迎接，毛泽东把汪东兴等人叫来商议武汉问题。这场事变到底是不是兵变是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个问题。张春桥一口咬死这是一场兵变，毛泽东怀疑地说：“不是林彪他们说的那样吧，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走得出来吗？这都是他们搞的，我在那里，为什么不和我通气呢？”听得出来，毛泽东对王力在武汉的做法很不满。

不论对武汉这场事变的看法如何，但问题已经发生了，总得解决，毛泽东把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了周恩来。7月20日下午4时，周恩来乘专机从北京起飞，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问题。飞机平稳地飞行着，大概到下午5时就可可在武汉王家墩机场降落了。吴法宪这时已接到林彪密令，要他设法使周恩来见不上毛主席。吴法宪接今后，两眼一转，跑过来报告周恩来：“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总理，我已命令改变航线，在山坡机场降落。”周恩来生气地说：“航线改来改去会出危险的。”见事已如此，他也就只好同意了。

专机徐徐下降，周恩来俯视机场，只见机场上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他问吴法宪：“这是怎么回事？”吴法宪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为了防止兵变，空军空降部队已经占领机场。”周恩来摇摇头说：“不要搞这么紧张嘛，我就不信陈再道会搞兵变。”飞机降落后，周恩来走出座舱，只见

机场上一片刀光剑影。吴法宪要调空降部队保护周恩来进城，周恩来不要，随周恩来来汉的两个中队的中央警卫团部队也被周恩来留在山坡机场，他只带了两名卫士就单身赴会了。

山坡机场离武汉市足有六十里地，周恩来乘汽车赶到东湖宾馆时，谢富治告诉他，主席已前脚离开武汉去上海了。周恩来暗叫一声“糟”，主席若在武汉，可以随时找主席商量，武汉的形势可以很快稳定下来，现在主席走了，问题就难办多了，林彪、江青可以任意插手武汉，把问题搞复杂。

周恩来住进东湖宾馆后，“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部队还在游行。周恩来把陈再道等人召来，责令他们把王力送回东湖，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和军队代表坐一架大飞机去北京谈判，尽快把武汉形势稳定下来。但是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却故意和周恩来对着干，尽量制造事端，把武汉搅得更乱。

王力是当时武汉问题的焦点，武汉军区负责人派人去 29 师师部接王力，张昭剑等人拒不交出王力。陈再道等人闻讯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不交出王力，武汉军区无法交帐，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刘丰已探知王力在张昭剑那里，他秉承吴法宪的旨意，决定把王力转到空军司令部来。刘丰一步窜到 29 师师部，厉声问张昭剑：“张昭剑，形势明摆着，你是听陈再道的话，还是听毛主席的话？”张昭剑机敏地说：“我听空军的。”刘丰命令说：“那好，你赶快把王力送到空军司令部来。”张昭剑赶快把王力从山上请下来，护送到武汉空军司令部。7 月 22 日凌晨，李作鹏、刘丰又护送王力到山坡机场。刘丰向吴法宪打电话表功，说自己如何在满街独立师士兵的枪口下亲自把王力接了出来等等，吴法宪又立即把刘丰的话报告了林彪。

武汉空军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他把李作鹏、刘丰和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叶明、孔庆德等人找来，宣布叶明、孔庆德住到 29 师师部跟前的武汉军区指挥所去，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武汉空军仍由空军和军区双重领导，武汉空军要听军区的话；责成李作鹏迅速转告陈再道，赶快表态，争取主动。周恩来的想法是只要陈再道表了态，他就可以出来做工作，保住陈再道。但是李作鹏根本没向陈再道传达周恩来的叮嘱，陈再道也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也没有想到要去表态。林彪就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首先通过李作鹏由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部队发电报，要驻汉海军表态，于是驻汉海军发表“严正声明”，声称“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兵变”。游戈在长江上的东海舰队的军舰把炮指向武汉，舰上的广播喇叭里喊着：“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在江岸上游行的“百万雄师”和驻汉部队也用高音喇叭回骂，真是两军对阵，泾渭分明。驻汉空军违抗军纪和周恩来的命令，也跟着表态。张昭剑夺取 29 师军权，宣布 29 师脱离武汉军区。周恩来闻讯大惊，严令张昭剑一定要保护好叶明、孔庆德。张昭剑表面答应，放下电话就令人把孔、叶二人赶出指挥所，叶明被早已等在那里的造反派抓住，打了个半死，最后被部队救出，送往医院。

周恩来眼见林彪直接插手武汉问题，李作鹏这些人根本不听他的话，陈再道也不表态，便向远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方略。周恩来接到返京的中央通知后，便先让谢富治和王力坐飞机返京，自己也随后乘飞机回北京。7 月 22 日下午，飞机从山坡机场起飞，王力和几个北航学生俯视着江城，7 月 20 日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历历浮现在眼前。北航的一个学生问：“首长，下一步我们该干什么呢？”王力说：“干什么？揪军内一小撮，先从武汉军区开刀。”

飞机飞到北京了，但机场通知飞机不要降落，先让总理的飞机降落。王力很奇怪这种安排。飞机在机场上绕着圈，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的专机过来了，在机场徐徐降落。周恩来下了飞机一看，机场上已聚集了数万人，无数横幅上写着“欢迎谢富治、王力同志胜利归来”。周恩来奇怪了，王力他们不是比他早飞半小时吗，怎么还没有到？江青从欢迎的领导人中走过来说：“总理，谢富治、王力的飞机就要降落了，你不欢迎他们吗？”周恩来这才明白江青他们的鬼花招，原来是用这种办法逼自己欢迎谢、王，壮大欢迎声势。他很气愤，但不想在这种小动作上与他们过多的纠缠。他明白，武汉这场暴风骤雨一起，还不知以后形势出现多大的变化呢，还不知有多少军队干部要遭到冲击呢，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自己得忍辱负重。

谢富治和王力回到北京的当天，林彪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把武汉“七·二〇”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改组武汉军区，把陈再道、钟汉华和独立师师长牛怀臣、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等武汉军区主要干部都调到北京来。

7月23日凌晨3时，陈再道等15人接到了去北京“开会”的命令。这时武汉军民的大游行还在继续，如果陈再道振臂一呼，这些人完全会听从他的调遣反对中央文革小组，但是这样一来，内战将起，后果严重。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国家民族，陈再道决定徒手赴京。临行前，他安排了自己的后事，要家人不要难过，永远跟共产党走。

陈再道驱车去机场，他打开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新闻。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已经胜利回到北京。据新华社消息……”秘书要关掉收音机，陈再道拉住他：“别关，听听他们有什么计划。”陈再道听着广播，又向车外望去，武汉军民的大游行一点也没有因此而停下来，解放军指战员戴着“百万雄师”的袖章，军容整齐地驱车前进，不断高喊着：“打倒王力”的口号。陈再道心一热，两滴眼泪掉下来，心里默念着，亲爱的战友们啊，我再也不能带领你们战斗了，我是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可你们呢？王力他们能放过你们吗？

机场是空军的地方，陈再道一到机场，刘丰立即把警卫部队赶了出去，随陈再道来的警卫部队只有29师师长率领的一个排，寡不敌众，当即被刘丰出动机场空降部队缴了械，师长被扣了起来。陈再道和随后赶到机场的武汉军区干部都被刘丰下令软禁起来。

去北京开会的干部到齐后，刘丰命令陈再道等人 and 他们的秘书、警卫上了飞机，他亲自带领一排空降部队上机押送。7月24日，凌晨三时，飞机抵达北京，陈再道一行被北京卫戍区军官接到京西宾馆。陈再道到宾馆时，发现宾馆内外岗哨密布，显然是增加了守卫部队。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给陈再道等人安排好了房间，悄悄地对陈再道说：“你就放心地住着吧，总理已命令宾馆严密封锁消息，增派了警卫部队，有事我会关照的。”陈再道感激地说：“总理想得真周到。”

陈再道这时心力交瘁，想好好睡一觉，还没有睡熟，外面传来吵闹声，傅崇碧紧张地冲进房间，一把拉起陈再道就跑，把他塞进一架电梯，电梯立即上升，在中间停下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忽然，电梯间的电灯熄灭了，开电梯的战士向陈再道解释说：“三军造反派要冲进来抓你，傅司令员要我

们把你藏在电梯里。”

造反派怎么消息这么灵通？原来刘丰一下飞机，就把陈再道到京的消息透给了吴法宪，吴法宪立即告诉了文艺口造反派。他们冲进京西宾馆，到处搜寻陈再道，傅崇碧赶紧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担心地问：“这个办法保不保险？能不能想办法叫造反派退去？”傅崇碧为难地说：“造反派不听我的啊。我没有办法了，最好能让谢富治来一下。”周恩来说：“好吧，我来想办法。”周恩来要通了谢富治的电话，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现在造反派冲进了京西宾馆，你去劝他们退走，不要让陈再道出问题。”谢富治在电话里哼呀哈的，推托不去。周恩来火了，声色俱厉地说：“我不管了。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去向主席交待。”谢富治一愣，转而一想，陈再道出了问题，毛泽东发怒追查下来担待不起，于是跑到京西宾馆劝说造反派退走。在造反派眼中，谢富治是刚从武汉脱险胜利归来的英雄，他的话岂有不听的，于是造反派很快就退走了。

文艺口造反派刚退出，三军造反派又包围了京西宾馆，要揪出“陈大麻子”，一队一队的游行队伍从京西宾馆前面的大街上走过。江青、叶群、关锋、戚本禹叫上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坐了几辆小车，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给三军造反派打气。按照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的命令，全国各大城市陆海空三军和群众一道游行，声讨陈再道。7月25日，林彪登上天安门，参加首都百万军民举行的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大会。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留心林彪、王力的举动，大会开完后把他的一班心腹召来密授要略：林彪当接班人，很多人不服，红军时四方面军保留下来的干部多，大军区司令中，武汉、南京、福州几个军区司令都是四方面军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随后他们成立军事情报组，准备再大干一番。

7月26日上午，中央开会要解决武汉问题了。陈再道接到通知，通知还附了中央发给武汉军区的复电。这份复电毛泽东已经审定，毛泽东的批语是：“林、周及中央文革，拟复报如下，请酌定。”陈再道再往下看，复电共五条，其中第二条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陈再道看出，自己的名字下面的同志两字是毛泽东特意加上去的，他不禁深为感动，就这两个字，救了陈再道一条命。

中央常委碰头会于7月26日上午在京西宾馆会议厅举行，中央文革成员、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蔡炳臣、巴方廷在第一排站着，接受审问。

会议一开始，先是由谢富治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在武汉“蒙难”的经过，指着陈再道的鼻子大骂：“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着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

谢富治讲完话，吴法宪紧接着发言，他破口大骂陈再道是叛乱头子，是钻进革命队伍里的蒋介石，是解放军的败类……周恩来见他满口胡说，打断他的话说：“讲主要的。”吴法宪不听，还是破口大骂，又把徐向前也扯进来：“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给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

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要负责任。”徐向前站起来斥责他：“胡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嘛！”徐向前说完，写了个条子给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愤然退场。

徐向前退场后，陈再道想为自己辩解一下，吴法宪不等他说完，领着刘丰几个人跑过来。这时周恩来出去解决一个问题去了，吴、刘等人便对陈再道等人拳打脚踢，摘去他们的帽徽领章。接着一些服务员也利用休息的空隙对陈再道进行武斗。周恩来在休息室知道后骂了一声“荒唐”赶过来制止，那些服务人员早溜掉了。周恩来回到休息室把吴法宪狠批了一通，吴法宪有些沮丧，江青却把他拉到一边夸奖说：“吴胖子是造反派，很有造反派的精神。”

吃过晚饭后，批斗会继续开。陈再道已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小时，实在受不了，便向康生求情道：“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让我坐下来吧……”康生恶狠狠地瞪着陈再道，训斥他说：“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革命，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京西宾馆的批斗会开完后，林彪亲自在第2天主持军委会议，撤销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的职务，任命曾思玉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陈再道当即被送往北京卫戍区特监，实行监护。

紧接着，林彪又下命令，宣布独立师为叛军，撤销番号，调离武汉解散。东湖宾馆的多年为毛泽东担任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被武装押送农场。“百万雄师”被解散，根据谢富治提供的名单，其负责人都被逮捕。驻军和造反派大抓大打“百万雄师”和支持过“百万雄师”的干部，武汉市被抓数十万人，6万人被打死打残。武汉，这个美丽的江城，已陷入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六十八回 保机密杨成武种祸 乱部署王八七入狱

话说“七·二〇”事件后，陈再道、钟汉华处境危险。徐向前因为过去是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是陈再道的老上级的缘故，被林彪打成陈再道的黑后台，被迫离开中央常委碰头会，独居家中，形同软禁。7月26日中央常委碰头会结束后，很快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时值武汉军区改组，军队问题突出，谁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就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问题了。当然，和以往一样，出席建军节的招待会的人员名单照例要由毛泽东审定。

武汉“七·二〇”事件的前因后果，毛泽东心里像明镜似的十分清楚，他恼火陈再道不听招呼，但并不认为武汉“七·二〇”事件是场兵变。到上海后的当天，毛泽东没有休息，一个劲地问张春桥等人：“情况有林彪说得那么严重吗？如果陈再道搞兵变，我们能这样顺当地离开武汉吗？你们知道兵变是怎么回事吗？”

第二天，毛泽东饭后在住所的林荫道上散步，又问跟随在旁边的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杨成武回答说：“原先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杨成武说的是实话。红军时期，他一直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工作，任军团第一师第一团政治委员，率军在长征路上打开天险腊子口，使红一方面军和中央从此口北上。他同杨得志、杨勇是红一军团的著名虎将，号称“三杨”。抗日战争时期，杨成武又随由红一方面军改编的115师政委聂荣臻元帅（原红一军团政委）开创晋察冀边区，任军区第二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聂荣臻所部改编为华北野战军，他任华野三兵团司令员。陈再道呢，红军时期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当兵，从战士当到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由四方面军改编的129师工作，长期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指挥下作战，曾任陈赓大将为旅长的386旅副旅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二野二纵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和陈再道同为人民解放军的几十名战功显赫的上将中的两员，但因长期在不同的战略区活动，所以并未谋面。建国后，各路大军会师，1955年两人同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才熟识起来。

毛泽东听完杨成武的一番解释后又问：“你说说，陈再道会反对我吗？”杨成武肯定地回答：“老陈是个粗人，只会打仗治军，性子又直，遇见看不惯的事就说。他对王力有点意见，但对主席那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们军队干部都最清楚，没有主席，能有我们人民军队的今天吗？不但陈再道不会反对你，其他军队干部也不会反对你。”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说得不错，陈再道是不反对我的。他要是反对我，只要在东湖摆上一个营，我们就不能动弹了，还会这么大摇大摆地出来。”

毛泽东说完后，又默默地散起步来，时而双手摆来摆去，活动一下身子。忽然，他又问杨成武：“陈再道现在在哪里？”杨成武回答：“不清楚。”毛泽东停住脚，吩咐道：“你去问一下总理。你告诉陈再道三句话，一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杨成武回答道：“是，我马上报告总理。”

第二天，杨成武去向毛泽东报告工作，正碰上毛泽东同新华社摄影记者老刘开玩笑：“老刘啊，我听小吴说你搞独身主义，和老婆不在一个床上睡觉，这是怎么回事啊？”老刘惊讶地说：“呀，这样的小事主席也知道了。我那老婆也在新华社工作，她参加了对立面组织，我就不理她了。”毛泽东抽着烟，乐得哈哈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同志哥噢，这可使不

得。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嘛，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不要冷清了同志妹哟。”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秘书送来了报纸，毛泽东打开报纸，脸就沉下来，指着报纸上林彪用毛笔字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手迹照片，问大家：“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的话很幽默，但这次没有一个人笑了，这可涉及到主席的亲密战友、副统帅林彪。文化大革命中，不知道有多少人因为说了一句对林彪不够尊敬的话而被捕入狱。1966年冬，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女英雄舒赛因为贴了林彪的大字报被谢富治下令逮捕，震动京城朝野，谁个不知，哪个不晓。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当然也熟知此事，还怎么敢议论林彪。

毛泽东批评完林彪的题词，又批评起各地塑造他的塑像的事来：“让我白天黑夜站在那里，日晒雨淋，受饥挨冻，替他们看大门。”他又嘲笑地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望望沉默着的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不要宣传个人，要喊马克思主义万岁，喊马列主义万岁，不照马列去做是要吃大亏的。”

毛泽东的这番话讲得很厉害，听得人惊心动魄。大家都明白，自己已经涉足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毛泽东的这些讲话是第一次在一个小范围内批评林彪。毛泽东之所以会对他们讲，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这一时期，毛泽东心情有些烦躁，他想在明年就结束文化大革命，但林彪、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总是制造事端，逼他表态，他对林彪不满起来，也有了更多的戒心。毛泽东心情不好总想找几个熟人说说，这和平常人心里不痛快时想找人聊聊是一样的，但毛泽东不好对其他人说，只能找身边的人说说。

杨成武听着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心里着实吃了一惊。从这时起，他就给自己立个规矩，这些话绝对不能从自己嘴里露出去，那可是掉脑袋的事。

毛泽东看到杨成武进来，知道有要事汇报，便把他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杨成武汇报了毛泽东交办的保护陈再道的任务，便又提起一件紧要大事来：“有人不赞成将‘八一’当建军节。首都有些高校已成立联络站，要把秋收起义的九月九日定为建军节，这事不知如何处理，总理特向主席请示。”毛泽东一下子把正端着的茶杯往茶几上一墩，骂了一声：“完全是胡闹，这些人懂个屁。‘八·一’、‘九·九’，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嘛，定八一为建军节是我1933年当中央政府主席时定的。他们不晓得，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方性的。‘八·一’是建军节，只要我活着，这个就不能改。”

毛泽东停停又说：“今年建军节规模要大，老帅都要参加。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看总司令是红司令。剑英是吕端大事不糊涂啊，草地上亏了他。陈毅心直口快，直爽可爱，是个好同志啊。还有聂荣臻，那可是个顾大局的老实人。1945年林彪出关，他一下子抽了几万部队让林彪带着出关，晋察冀部队都快抽空了，几十年了，他对此事一字不提，有功而不要功。徐向前嘛，草地上一句话就堵住了张国焘的追兵，有大功于老夫。他们都要出席招待会，位置要前。”

杨成武准确无误地记住了毛泽东的话，乘飞机返回北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这时“八一”建军节招待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周恩来派了秘书速速通知各位老师。考虑到老师们可能没有准备，周恩来又让秘书随带去理发师。秘书们到老师家里后，一面给老师修面理发，一边传达中央指示。老师们理

完发，换上礼服，直接坐车去了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突然接到叶群的电话，请他务必来一趟，有要事相商。杨成武放下电话，按时赴约。对于林彪，杨成武心里是很尊敬的，老上级，能打仗。延安时，军队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平型关战役林彪负伤去苏联治疗，斯大林很赏识他，曾向中共提出用五个师换林彪参加苏联军队的卫国战争指挥工作。这个说法一直没有得到证实，但林彪能打仗，会治军则是大家公认的。杨成武心里也明白，罗瑞卿下台后，中央任命自己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与林彪的举荐不无关系，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嘛。

叶群为什么这么急着请杨成武一叙呢？原来事出有因。1967年以来，不知是谁最先发明两个口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很快便风行开来，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单位，组织开各种大大小小的会议时必要首先呼喊这两句口号。谁知到了此年5月，却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岔子。那天，为纪念毛泽东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演出，演出的节目不外是《长征组歌》、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等。毛泽东和林彪也观看了演出。大幕拉开，男女报幕员手捧《毛主席语录》，男报幕员举着小红书喊道：“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泽东忽然用臂肘碰碰身边坐着的林彪，笑着对他说：“下面该你啦。”果然，女报幕员紧接着举起小红书高呼：“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毛泽东这一碰一语，似有意似无意。不过，林彪却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浑身不自在。第二天，他即让叶群给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转达林彪的意见：请中央发出通知，今后全国各种聚会，会上只许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不要喊“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也许是林彪觉得这样还不足以剖白自己，过了些天，也就是这年6月16日，他又亲自给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近一个多月来，我看了三次演出，每次演出中，都有“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这两个口号并提的情况。我认为“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为了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突出毛主席的伟大作用，树立毛泽东的绝对威信，不宜提“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口号。只有突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符合于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需要和客观实际。今后一切演出，一切会议，一切文件，一切报刊以及其他各种宣传形式都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盼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们今后帮助注意这一点，并希望将我这封信转发到县团级，由他们传达到所有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

信发出了，林彪仍不放心。叶群也不放心，他们急着想知道毛泽东近来对林彪的态度。最近“七·二〇”事件闹得天翻地覆，涉及到许多军队高级干部，毛泽东心里的底牌是什么，这只有通过跟随毛泽东去南方的人才能打听到。杨成武是跟随毛泽东去南方的，他的职务决定了他是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的角色，又是红一方面军的老人，新提拔的代总长，向他问一下不是最合适的吗。但此事林彪不便出面，还是由叶群约谈恰当些。

杨成武一到叶群那里，叶群端糖倒水，极为热情。寒暄一阵后，叶群即把话引入正题，问杨成武：“主席最近讲到林总什么了没有？”杨成武心往下一沉，迟疑了片刻说：“没有啊，主席最近忙着武汉事件，没有讲到林总。”叶群早已看出了他的迟疑，断定毛泽东肯定讲到了林彪，便装着无意的样子

说：“林总现在很忙，早想把你那个代参谋长的‘代’字取掉，好帮他多做些工作。红一军团的英雄团长，不用你还用谁呢？就是不知主席是个什么态度……”

杨成武明白这是叶群在向他暗示不要忘了林彪的知遇之恩。但主席的那些讲话是何等重要，可以说是现在中国的最高机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怎么能向别人泄露这个机密呢？杨成武艰难地摇摇头说：“主席确实没说到什么。”

叶群不讲话了，脸一下沉了下来。

杨成武走了以后，叶群又拿起电话要通了空军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的电话，对吴法宪她不必客套了，拿起耳机就问：“胖司令啊，你和余立金谈得怎么样啊？”余立金是新任命的空军政委，前一段随主席南下，也是“八一”前夕才从上海飞回来的。叶群紧握着电话，只听吴法宪在电话里气呼呼地骂道：“这个余立金真坏。他一回到北空家里，我就登门拜访，他不谈。我打电话问他，他不谈。我请他向林副主席汇报，他说没有汇报任务。我从晚上缠到白天，又从白天缠到晚上，好话说尽，他就是不理，说主席、总理指示，没有汇报任务，这个人不能在空军呆。”

叶群放下电话，立即向林彪去汇报，两人密谈了很久。

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后，武汉造反派出动几万人到南京、福州大军区和一些军队机关“揪带枪的刘、邓”，清华大学、北航红旗也派出战斗队和他们一起冲击军区机关。军械被抢，战士挨打，连运送武器到越南的援越列车也被抢劫，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被造反派揪出在太阳底下罚站，军队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

王力从武汉回来后，成为风光一时的英雄人物，志高气满，受康生的指示，写了《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鼓动“揪军内一小撮”。此时的王力，到处讲话，到处捣乱，却没有想到“盈则亏，满则溢”这句古训。8月7日，他又接见了外交部造反派，外交部是周恩来严厉禁止夺权的部门，毛泽东也多次保护外交部长陈毅。造反派不懂得他们闯入了禁区，反要求中央文革接见。王力接见时为他们打气，要他们猛冲猛斗，肯定他们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王力装作气愤地问：“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为什么不能喊？”他指着一个造反派头头说：“二十几岁的人为什么不能当外交部长？”

外交部造反派见王力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欣喜万分，回来后立即根据王力的讲话记录印传单，写大字报，把王力的讲话到处宣扬。这时，为了宣传上的方便，对于过长的政治术语常常予以简化，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简化成“走资派”，还有“三支两军”等，外交部的造反派为了简化字语，方便运用，遂把“王力同志8月7日的讲话”给简化成了“王八七讲话”，人们就再不叫王力的名字了，而称他为“王八七”。

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八七”的鼓动下，果真夺了外交部的权，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封闭了部党委。他们以外交部的名义向驻外机构发出指示，命令大使扫院子、打扫厕所，炊事员主持会谈，向驻在国提出种种荒唐要求，出尽洋相，丢尽面子。

8月下旬，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各地军队被围攻的告急电报雪片般飞来，毛泽东大吃一惊。他又看了《红旗》杂志十一期社论，才知这股逆风恶风的来源，不禁大怒，提笔在杂志上批道：“毒草”，“乱军”，“还我长城”，然后把杂志退了回去。

当天晚上，林彪住所一片紧张气氛，原来毛泽东把林彪送审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退回来了，文件上所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句子都给批上“不用”。自1959年以来，林彪还没有碰过这么大的钉子。很显然，毛泽东已洞悉林彪“揪军内一小撮”的险恶用心，林彪明白这一点，顿时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此件不发，也还属内部工作讨论范围，但他的宝贝儿子“老虎”——林立果已经以“红尖兵”的化名写了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发表了，万一追究起来，那可是躲都躲不开的。

林彪到底是元帅，政治斗争经验丰富。他思前想后，估计毛泽东还不会因此而将他和中央文革小组端掉，那么就有办法了。

林彪主意定了以后，正想叫叶群到钓鱼台去探探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哪知江青、康生、陈伯达比他还着急。《红旗》杂志十一期社论是中央文革小组搞的，毛泽东追究的话，先要追查他们。叶群的电话还没有打过去，江青的电话倒先打到林彪这里来了，原来他们商量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个妥善的办法，只好向林彪请教。

叶群听到秘书报告江青来了电话，喜出望外，连忙去接。江青在电话里说：“对于主席的批评，林副主席的意见是如何落实？”叶群说：“副主席反复学习了主席的批示，认为主席的指示很重要，一句顶一万句，要认真落实。林副主席请江青同志查查，看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有问题没有。”江青顿开茅塞，立即回答：“我明白了，请转告林副主席，我们马上去查。”

江青放下电话，即把陈伯达、康生找来，传达了林彪的指示精神。他们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告诉他们去找替罪羊。他们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几个人排了排队，准备抛出那么一两个用处不大的人去顶罪。

人选还没有定下来，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学着国内的样子办报，登了许多港英当局极为反感的文章，港英当局担心《大公报》《文汇报》的宣传会在香港引起混乱，便以“违警”为名逮捕了两报的一些记者，消息传到国内，外交口造反派联络了数万人到英国代办处门口示威游行。周恩来闻讯后，即命陈伯达、王力去劝说群众撤走。陈伯达、王力故意拖着不去，外交口的造反派以为中央文革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便冲进英国代办处放了一把大火，把英国代办处变成了火龙阵，然后扬长而去。这件事在国际上影响极坏，许多外国政府以为中国人要排外了，纷纷考虑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中国驻英使馆受到了严格的监视和限制，许多驻外人员遭到殴打。

与此同时，十几万人围住中南海要揪刘少奇，无数高音喇叭对着中南海喊叫，周恩来甚至无法办公了。照此发展下去，造反派说不定也会冲进中南海，那时可真叫天下大乱了。

周恩来坐镇北京，眼看局势失去控制，要想刹车，必须对中央文革小组实施休克疗法，先抓起地位较低，又最敢讲话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但是这是何等样大事，没有毛泽东点头，周恩来连一个也动不了。于是，周恩来写了一封报告，建议对王力等人采取措施，并让秘书附上“王八七讲话”和英国代办处被烧等材料，派杨成武再去上海向毛泽东请示。

杨成武到上海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的形势，毛泽东让把材料留下，先看看材料再说。过了两天，杨成武奉召来到毛泽东办公室，毛泽东把批件交给他，吩咐说：“你回去告诉总理，就说我说的，王关戚是小爬虫，是坏

人，立即抓起来。”杨成武拿着毛泽东的批示，登上飞机，连夜飞回北京，向周恩来呈交了主席的批件。周恩来让秘书召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出示了主席的手令。江青、陈伯达、康生听了，如雷震耳，毛泽东竟从中央文革小组开刀了！而且抓的第一个人就是不久前还被视为英雄的王八七，他们不禁个个汗流浹背。周恩来当即宣布了纪律，部署了行动计划。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就到8月底了。王力近几天轻闲起来，中央文革小组有事也不找他了。他正感到奇怪，突然来了通知，让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他的车前面走，后面就跟来了一辆小轿车，没见过世面的王力一点也没有发现这个异常现象。

车子到了人民大会堂，王八七来到会议室，只见会议室气氛严肃、紧张，没有往日开会时的议论风生。过一会儿，关锋也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坐在那里，个个面若秋霜，对进来的王力和关锋理也不理。

周恩来看看表，宣布：“现在开会。奉主席指示，王力、关锋是坏人，立即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顿时瘫了，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眼睁睁地看着几个军人全副武装地冲进来，“咔嚓”一声给自己戴上了手铐……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六十九回 恶极生悲王关戚忽为小爬虫 尽职克守杨余傅顿成阶下囚

话说王力、关锋被捕以后，全国冲击军队的现象顿时被刹住了。9月29日，杨成武陪毛泽东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要求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总参谋部一些人写的题为《大树特树毛主席绝对权威》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总参政治部领导写的，署名为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文章写好后送给杨成武，由他送给尚在上海市的毛泽东审阅。杨成武是搞军事的，对这种理论上的问题把握起来有一定困难，便在到达上海后送给毛泽东审阅。过了些天，毛泽东把文章退了回来，在上面批写着：“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杨成武随后把文章寄北京，送交陈伯达和姚文元。此后，杨成武就把这个事忘了，没想到陈伯达“酌处”的结果，是要以他杨成武的名义发表。杨成武感到奇怪，明明这篇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怎么能以他杨成武的名义发表呢？便一口拒绝。

陈伯达见杨成武不接受“酌处”的结果，便搬动林彪，要林彪给杨成武下令，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林彪即要叶群给杨成武打电话。叶群要通了杨成武的电话，东拉西扯几句才转到正题上：“林总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总参的那篇文章。”杨成武为难地说：“林总的命令我当然得服从，可是那篇文章不是我写的啊。”叶群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党根据需要，可以决定以党员个人的名义发表党的重要文章。”杨成武无奈地说：“理论上我是外行……”叶群打断他的话，不容解释他说：“行了，就这么定了。”

于是，以杨成武署名的“大树特树”的文章登到了《人民日报》上。毛泽东很恼火，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指着报纸上的这篇文章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文章居然登了出来，标题就是错误的嘛，权威是在斗争中形成的，不是想树就树得起来的，形而上学，陈伯达干的好事。”杨成武看主席这么生气，深觉愧疚，连忙检讨：“主席，我同意以我的名义发表，犯了严重的错误，请主席批评。”毛泽东指着杨成武说：“这不是你的事。”

康生、杨成武都不敢说什么了。毛泽东望着窗外，一口接一口地抽烟。过一会儿，毛泽东才放缓语调说：“怨不得我生气，这不是个人小事，是关系到马列根本思想问题，要学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此次谈话后，毛泽东余怒未息。12月18日晚，毛泽东亲自出席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一坐下就点陈伯达的名字：“陈伯达，你是怎么搞的，书读得越多越蠢，糊涂到何等地步。你要大树特树谁啊，我看是树你们自己。你不是号称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怎么连标题中的问题也看不出来？你和姚文元搞这篇文章，塞给杨成武，我是不相信你们这些写文章的人，你们搞的那个标题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江、陈、康坐着叫毛主席训，一句话也不敢说，他们感到近来中央文革小组老是出事。不久，一件更倒霉的事又来了。

且说王力、关锋反党乱军，在外交部制造事端，出动十几万人围住中南海，打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即被逮捕入狱。这是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严重警告。免死狐悲，江青、陈伯达、康生虽是十二分的不愿意，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王、关被戴上手铐带走。

1967年腊残冬尽，转眼就到了1968年。此年1月，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戚本禹加紧整理周恩来的材料。从 1967 年以来，戚本禹就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大整周恩来的材料，组织了“五·一六”兵团，专门攻击周恩来总理，他们甚至把攻击周恩来的大标语贴到天安门的城墙上。王八七和关锋被捕以后，他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一意孤行，继续为非作歹。他绝对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四个月前就已对他的政治生命划上了句号。

电话铃骤然响起，是中央文革小组打来的，通知他去钓鱼台开会。戚本禹急忙锁好材料，坐车来到了钓鱼台。陈伯达、康生、江青已在会议室坐着，令人刺眼的是谢富治也在这里。戚本禹进来，他们理也没有理他。康生见人都来齐了，便站起来宣布：“戚本禹反对中央文革，分裂党中央，是刘、邓派到中央文革内部的小爬虫。根据政治局决定，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几个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冲进来，麻利地给戚本禹戴上手铐，把他带走了。

江青、陈伯达、康生坐在会议室里，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最后康生打破沉默：“王关戚是刘、邓的小爬虫，现在发现了，是个大好事，我们中央文革的威信更高了。从现在开始，对王关戚的批判要提小爬虫，充分揭露他们和刘、邓、陶勾结，钻进中央文革内部，破坏中央文革的行为。”江青点头同意。陈伯达已被王关戚连续被捕吓得六神无主，这时也不敢再乱出主意了。

处理完了戚本禹的问题，江青又坐车去毛家湾。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的地位上升得比火箭还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下子成为在全党全国说一不二的人物。毛泽东看她太轻狂，有时点她一句：“江青，你是个纸老虎。我一死，人家一指头就能打倒你。”

江青每次被毛泽东批评后，一种深深的恐惧袭上心头。她想到自己的地位虽很高，但并没有多少实权，要抓权就要抓军权。可是军队是林彪的禁苑，怎么去插手呢？她想了好久，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先夺首都卫戍大权，二是控制军委办事组。夺首都卫戍大权她已有一个计划，控制军委办事组却非要经过林彪点头同意才行。

江青进了毛家湾林府客厅，叶群热情地把她接进来。林彪迎出来，把她让进客厅坐下，叶群亲手端来各色糖果，香茗冷饮，摆了满满一桌子。在刚过去的毛泽东追查反军的暴风骤雨中，两人携手合作，渡过了这场暴风骤雨，现在相聚，分外亲热，互道寒暄，气氛极为融洽。

说了几句闲话，江青切入正题：“林副主席，现在军队的问题很复杂。为了揪出张再道、李再道，中央文革小组想更好地得到林副主席的直接指示，以后军委办事组是不是也应该多向中央文革小组通通气？”林彪一听就明白了，原来江青是要军权来的，这可办不到。林彪没有客气，一口回绝了江青的要求：“主席没有这个指示啊。”江青诡秘地笑着说：“看来林副主席是不想让中央文革多管军队的事啊，那好，以后我就不看军队的文件了，也不希罕顾问的头衔。敬宜呢？我最近又收到一封信，谈起敬宜的入党问题，真烦人。”林彪听出了江青的话里的挟制味道，不禁大怒。他，四野的统帅、常胜元帅、国防部部长，岂能受江青这样一个女人的奚落，顿时大喊：“叶群，叶群！”叶群从未听过林彪有这么大的嗓门，大吃一惊，急忙赶过来。林彪指着江青说：“叶群，你给我把江青请走。”说完就跑进屋里去了。

林彪对江青每次都是非常客气，今天敢撵江青，也是看出中央文革小组数人被捕，势力大挫。叶群却比林彪想得更实际，亲不亲，一家人哩，江青可不是能得罪的。她一屁股坐到江青跟前，歉疚地解释：“副统帅最近心情

不好，听说王、关被捕，要我好几次给你打电话，肯定中央文革小组揪出王、关是一个大胜利。江青同志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我好好向你学习……”江青的面子挣足了，也高兴起来了，对叶群说：“有人又告你的状，我给撕了，不过你得早点找到证明人。”

江青走了以后，叶群对林彪说：“我的那个事怎么办？你得给我想想办法呀。”林彪摇摇头说：“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又不能给你写证明。”叶群哭起来。林彪所得心烦，便说：“关键是有权，有权就好说话，无权就不好说话。你怕什么，你要是担心的话，找找熟人，我也让吴法宪杨成武给你写两个证明。”

吴法宪很快就写了个证明，现在就只差杨成武了，叶群打电话把杨成武请来。已是早春3月，毛家湾的林府里还烧着暖气，天气还冷哩。

林彪迎出来和杨成武握手，笑容可掬，把他让进沙发坐下，叶群端来了糖果，连说：“请吃，快吃，到这里如同到家，还客气什么。”叶群让过茶水以后给杨成武丢个笑脸：“你们有公事，我就不打扰了。”说完翩然而去。

林彪看了杨成武局促的样子，解释说：“今天请你来也没有什么大事，你不要紧张。主要是叶群的一点小事，她很早就入了党，也有当年经手人写的材料，但是还没有一个有影响的领导人写个证明，你不是同叶群挺熟吗，就请你写个证明吧。”

在林彪看来，这只是一件小事，举手之劳，甚至可以说是林彪在向他示宠，试想一下。杨成武为叶群写了入党时间的证明材料，林彪还不是对杨成武信任有加，他总不能对能证明叶群身份的人下手吧。但是杨成武这个人办事挺认真，叶群自称入党是1936年，那年叶群在北平，杨成武则刚从江西长征到达陕北，怎么能证明叶群入了党呢？所以杨成武连连推辞：“这不行，林总你知道，1936年我俩都在陕北，叶群同志还在北平，我怎么能证明她这时入了党呢？”

林彪不悦地站起来说：“可是，叶群同志不是很快就到了延安了嘛，她的情况你当时就了解嘛，你不是常来我窑洞聊天吗？”杨成武还是不愿写：“那只是听叶群同志自己说。”林彪听到这里，也就不再说了，看了杨成武几眼，似乎杨成武是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

杨成武从毛家湾出来，心里慌慌的，自己已经数次得罪了林彪，看来今后林彪不会给自己好脸子看，可是，这样做不正是尽职尽责吗？想到这里，杨成武心里坦然了许多。回到家里，他泡了一杯茶，准备放松放松，电话铃突然叫起来。他拿起耳机，对方通知他，立即去钓鱼台国宾馆开会，有重要的事情商议。杨成武顾不上休息，放下电话便驱车前往钓鱼台。

会议由周恩来总理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寻找丢失的鲁迅手稿。原来今年年初，鲁迅先生的未亡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报告原收藏在鲁迅博物馆的鲁迅手稿丢失。鲁迅是中国的大文豪，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气。三十年代，他写了许多杂文骂国民党，陈赓大将在苏区作战负伤后，曾去上海治伤，鲁迅先生还秘密会见了，询问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许多情况，准备写一部反映红军斗争的小说，终因对苏区的生活不熟悉作罢。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鲁迅先生还曾给毛泽东发过贺电。毛泽东写文章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许广平本是二十年代鲁迅任教于女师大时的学生。鲁迅逝世后，她继承丈夫的遗志，长期做着校订整理鲁迅遗稿的工作。建国后，国家把鲁迅原在

城里住过的故居改建成鲁迅博物馆，鲁迅的手稿就收藏在这里。现在鲁迅手稿却突然不见了，这还了得，毛泽东立即批示周恩来主持追查工作。

周恩来讲了事情的过程，宣读了主席的批示，便指定由杨成武负责追查手稿，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公安部长谢富治协助。杨成武挠挠头说：“这到哪里去找啊！”周恩来鼓励说：“想想办法，先从接触过手稿的人查起。”

杨成武叫来傅崇碧商量了一阵。傅崇碧对这方面的情况熟悉些，便提议：“先去问问戚本禹，从那里肯定能得到线索。”原来傅崇碧经常接触中央文革的这帮人，见他们动不动就谈起文物字画，看来都挺在行的。鲁迅手稿藏在鲁迅博物馆，一般人怎么能去拿走，当然是有权势的人才能拿走。当今最有权势的就是中央文革这些人。傅崇碧判定，手稿就在他们手中。

杨成武、傅崇碧一行到了秦城监狱，把戚本禹从狱里提出来。呀！才两天未见，戚本禹就憔悴成这个样子了。只见他身穿黑色囚服，胡子拉碴，弯腰驼背，一下老了十岁。但是戚本禹的这副可怜相并没有引起傅崇碧的多少同情，他亲眼见过戚本禹在批斗大会上操纵造反派残害老干部，许多老干部想有特监那么一个相对有法制的地方躲躲还不可得呢。

傅崇碧看看杨成武，杨成武点点头：“开始吧。”傅崇碧便亲自审讯：“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戚本禹答道：“是我取走了。”傅崇碧心里一喜，果然如此。他又追问：“放在什么地方？”戚本禹答道：“我交给中央文革了。”傅崇碧又问：“谁让你取的？”戚本禹回答说：“江青同志。”

手稿的下落总算搞清楚了，一切都不出傅崇碧所料。杨成武急忙拉了傅崇碧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听了报告，赞扬他们办案迅速，要他们抓紧时间破案。既然手稿已经有了下落，杨成武回军委去处理一些问题，把稿子取回的任务就由傅崇碧带人去完成。

手稿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里，要去拿稿子必须先通过江青。傅崇碧打电话到钓鱼台，江青不在，江青的女儿肖力（李讷）接了电话。傅崇碧打完电话，便和工作人员坐了两辆北京吉普车赶往钓鱼台。在钓鱼台门口，傅崇碧让车子停下来登记。按规定，傅崇碧的座车可以自由出入钓鱼台，但另一辆吉普车要登记。登记完毕，陈伯达从里面打来电话，傅崇碧的两台车可以进来。

傅崇碧驱车到了中央文革会议室楼口，同姚文元打了招呼进了会议室。一会儿，江青来到会议室，见会议室有五名军人，顿时冲傅崇碧喊道：“傅崇碧，你竟敢带人冲击中央文革驻地。”傅崇碧莫名其妙地说：“我是来汇报的呀。”江青冷冷地问：“手稿在哪里？”傅崇碧说：“就在中央文革保密室里，你把保密员叫来一问就可以知道。”保密员被叫来了，江青命令他：“傅司令员有话问你，你不要胡说。”保密员说：“是。”傅崇碧就问他：“鲁迅的手稿是在你那里吗？”保密员说：“是啊，在我那里，整整四大箱，保存得好好的。”

闹了半天，江青就是贼。江青恼羞成怒，大骂保密员是大坏蛋，命令士兵把他抓起来，随后命令人把箱子抬下来。整整四只箱子，打开一看，全是鲁迅手稿。傅崇碧当众把四只箱子封起来，又放回中央文革保密室，随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立即报告毛泽东，鲁迅手稿找到了，经封存后又放回中央文革保密室了。

江青当众出丑，岂能善罢甘休，再说，她早想搬掉傅崇碧，让副总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她把杨成武找到钓鱼台，气冲冲地命令道：“傅崇碧带人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这样下去中央文革的安全都没有保证了，

你去批卫戍区，批傅崇碧。”杨成武想，不就是傅崇碧当众捉住了你的贼手，你要整傅崇碧嘛，便顶了一句：“不行啊，我和卫戍区隔着几层，不能越过北京军区直接去批卫戍区。”江青一点也不退让：“你是代总长，你去！”杨成武也火了：“我不去，我没有下命令冲。”

江青听惯了恭维话，哪里受得了这口气。杨成武走后，她脚一跺，便去找林彪了，两个人密谋了很久……

3月23日凌晨，这又是一个多事的凌晨。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用电话把空军政委余立金叫醒，通知他到家里来一下，有要事相商。两天前，吴法宪曾对余立金说：“我在军委办事组忙得很，空军的事情主要靠你了，有些事不用请示我，该办的，能办的你就办了。”

余立金却不敢擅自作主，正好趁此可以向他请示一些问题。

余立金和吴法宪的两栋小楼都位于北京京西宾馆跟前的空军大院的首长住区内，相距不到五十米，余立金就没有叫秘书和警卫员跟着。快到吴法宪家时，突然冲出四名军人，用手电照住他的眼，麻利地给他戴上手铐，推进吴法宪家的客厅里。吴法宪在灯光下左瞧瞧，右瞧瞧，嘲笑地问：“余立金，你的神气劲哪去了？”余立金大声抗议：“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吴法宪冷笑两声说：“晚了，我宣布，经毛主席批准，逮捕大叛徒余立金。”

在余立金被捕的同时，一队军官来到警卫杨成武住处的部队营房，宣布紧急集合，立即开拔的命令。警卫部队以夜间紧急集合姿态开到景山开始休息。警卫部队开走后，一连部队又开进来。不过他们可不是接防来的，而是逮捕杨成武来的。部队开进来，立即把前后厅、楼梯口封锁了，所有的服务人员和家人都集中在客厅里。

杨成武吃了安眠药已经入睡，根本没有觉察到这场飞来横祸。他被人从睡梦中推醒，睁眼一看，床前站着邱会作和李作鹏。见他醒来，李作鹏命令道：“快起来，穿上衣服，跟我们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说是去开会，后面却站着几个全副武装的战士。杨成武以为发生了武装政变，训斥邱会作、李作鹏：“你们要有点党性，不要当骗子。”邱、李也不说话，跟着杨成武走下楼来，朝人民大会堂驶去。

这时，北京卫戍区八十多名团以上干部已被召集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等待林彪和周恩来及中央文革的接见。傅崇碧接到通知，也赶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卫戍区主要干部齐集这里不禁有些奇怪。这时，周恩来走过来，招呼傅崇碧说：“你到这儿来。”傅崇碧料想自己要出事了。果然，他们刚坐好，林彪走进来宣布：“现在宣布中央决定，调傅崇碧任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免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说完，立即走了出去。

傅崇碧明白，这是明升暗降，说不定比这更糟糕。小会议厅里只有他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两人相对无言，都在等待着什么。

周恩来随林彪接见了北京卫戍区干部后回到了小会议厅，服务员端来几碗面条，周恩来端给他一碗：“吃吧，吃饱了好走路。”傅崇碧不满地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就这么调了我的工作。”周恩来也不说话，温和地看着傅崇碧，似乎在说：有什么委屈就对我说吧。傅崇碧看到周恩来把筷子在面碗里搅来搅去，无情无绪的样子，知道周恩来也为他的调职而难过，总理太难了，不能再让他作难了。

想到这里，傅崇碧站起来问：“总理，我可以走了吗？”周恩来点点头

说：“走吧，要经得起考验，要相信党，相信人民。”说完，他紧紧地握住傅崇碧的手，使劲地晃了几下。

傅崇碧出了人民大会堂，坐进轿车，两位高大的军人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轿车飞快地朝机场驶去。

傅崇碧前脚刚走，杨成武后脚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室。周恩来、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都坐在沙发上。杨成武被押进来坐下，林彪就宣布：“由于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要排挤地位和他差不多的人，勾结余立金，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夺谢富治的权，中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一切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

林彪刚讲完，江青、陈伯达等人就一拥而上，大骂杨成武。他们骂足了，叫来士兵把杨成武押走。杨成武坐车到了机场，立即被押上一架飞机，飞到武汉，又坐车到了东湖宾馆，不过可不是住客房，杨成武被押到地下室关起来。

傅崇碧飞到沈阳后，被送到一所小楼，这里照样有秘书、警卫员，不同的是他们的任务不是为傅崇碧提供服务，而是看着他不许下楼。过了六七天，才有一位将军来看他，傅崇碧一见来人，顿时欢欣异常。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七十回 林彪改军委密结集团 江青当阎王请吃烧酒

话说傅崇碧被押送到沈阳后，被关在一栋小楼里，不许下楼。六、七天过去了，忽然一位老军人来访，傅崇碧心里一喜，原来是当年朝鲜战场上的老战友。老军人坐下就掏出一张傅崇碧和叶剑英、陈毅、聂荣臻的合影照片，指着照片上的几位老帅劝道：“老傅，你只要对他们反戈一击，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傅崇碧冷笑两声，原来是叫他害人来的。他讥讽地说：“我不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吗？怎么还有个出来工作的问题？”老军人气恼地说：“我是为你着想，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你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傅崇碧发火了，撕开衣服，指着朝鲜战场上留下的枪伤说：“小子，往这儿打，当年美国人、日本人、蒋介石没打死我，你来打死我吧。”老军人气得说不出话来，指着傅崇碧的鼻子“你……你……”了一阵就走了。

老军人同北京派来的人向林彪汇报了谈话的经过。傅崇碧名义上是调任，林彪和江青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但却可以把傅的亲信抓起来进行报复。依着江青的意思，是要把傅崇碧整死的，但林彪却另有想法，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江青不好硬插手，也只好作罢。

那么，林彪有什么想法呢？原来他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有了看法。

杨、余、傅被打倒后，林彪和江青分享了胜利的果实。“二月怀仁堂抗争”事件发生后，徐、陈、叶、聂被剥夺了军委领导权，他们的职务虽然没有取消，但军委日常工作由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领导。先是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看守小组”，这个小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四人组成，吴法宪总负其责，林彪完全控制了军委。不料，一个月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提议，改组军委看守小组，组建军委办事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林彪不久又把自己的党羽李作鹏塞进办事组。杨成武也可算是红一军团的老人了，林彪着意拉拢，不料杨成武软硬不吃，不上贼船，这对于林彪是个很大的威胁，林彪这才下决心去掉杨成武，改组军委办事组，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并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任命吴法宪为副组长，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为组员。

黄永胜可算是林彪的基本干部，从井冈山时期就在红一军团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率部队来到东北，在林彪指挥下作战，是四野十三兵团司令员，与林彪关系特别密切。林彪南下视察，他都要从广州专门跑来迎接。杨成武一倒台，林彪特意把他从广州军区司令员任上调来任总参谋长。李作鹏是原红一军团干部，建国前是四野43军军长，吴法宪、邱会作也都是四野出身的干部。黄、吴、叶、李、邱不仅是与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而且一直与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与林彪结成了一个军事小集团，现在军委办事组完全由这个小集团包了，成了林彪的一统天下，林彪总算如愿以偿了。

唯有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的任命林彪不太满意。说起来温玉成也是四野出身，所以当江青提出由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时，林彪也就同意了。怎知温玉成走马上任后，不走帅府路线，而走夫人路线，跟江青靠得很紧，还动不动就在军委办事组里和黄永胜等人较劲。林彪听了黄永胜的汇报后才知用错了人，但他有中央文革撑腰，一时间不好动他。

林彪还没有想出搬掉温玉成的办法，江青却首先向军委办事组开刀了。

这个江青也不是等闲之辈，对政变亦颇有研究，深知首都卫戍司令这个位置的重要，古往今来，有多少政变都是由首都禁军司令充当主角。温玉成上任后，江青在军界里掌握了两张牌，一是卫戍司令，一是公安部长。林彪身为副统帅，他的行动也还要受卫戍司令、公安部长的制约，因此，江青觉得自己的底气足了，开始向军委办事组开刀。俗话说，擒贼先擒王，江青先向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开刀了。江青看得很清楚，黄永胜这些人到军委办事组后，和林彪叶群抱得很紧，对她江青理也不理，今天就要让他们尝尝她的厉害。

在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江青突然向黄永胜发火了：“你们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向我封锁消息？你们变更军政部署，为什么不向我报告？难道中央文革就不能管军队的事吗？”江青的话不仅让黄永胜吃了一惊，也让周恩来吃了一惊。江青有什么权力指挥军队？她这是要夺军权嘛。黄永胜一是有毛泽东的明确指示，二是有林彪作后台，不软不硬地顶了她一句：“江青同志，你误会了，我们这是按主席的批示办。主席指示军队的事只报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江青没想到黄永胜竟敢顶嘴，勃然大怒：“你还嘴硬，我宣布从现在起，你和吴法宪不准参加中央常委碰头会。你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的事取消，由总理、康老、文元和你们谈话，清理思想。”众人吃了一惊，江青一不是政治局委员，二不是政治局常委，居然对总理、康生下起命令来了，好像周、康二人不是政治局常委，而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办事员似的。

林彪、叶群得到黄永胜的报告后，又惊又气，叶群连连问林彪：“一〇一，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怎么办？你该出来讲讲话呀。”林彪没有说话，沉着脸回到自己那间神秘的卧室里。叶群等了半天，不见林彪出来，急忙推门去问。林彪只说了一句话：“一动不如一静。”叶群不得要领，又催问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呀？”林彪诡秘地招招手：“你过来，我给你解释……”

原来林彪已看准了，江青这次非吃亏不可。黄永胜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是早已通知了阿方的，阿方已做了充分的准备，黄永胜若违约不去，那阿方就会提出抗议。这是国际交往的大事，岂可因江青的一句话就变更。周恩来是主管外交的，他肯定会把此事报告毛泽东。江青在国内胡闹可以，如果闹到国际上，影响了毛泽东的部署，毛泽东是要发脾气的。所以与其出去和江青对着干，还不如静坐观变。

林彪看得还真不错，迫于外交礼仪，周恩来不得不去找毛泽东：“主席，黄永胜去阿尔巴尼亚访问一事已通知了阿方，行期在即。江青同志忽然提出取消黄永胜出访，主席的意见是……”周恩来没有把话说完，毛泽东已有不悦之色，周恩来讲了事情的经过后，毛泽东果断地指示：“江青，不要理她。”

周恩来把黄永胜找来，告诉他：“出访日期不变。江青同志那里你们也要解释解释，消除误会，我带你们去见江青同志，去了慢慢讲。”周恩来带着黄永胜、吴法宪到了钓鱼台。江青明白他们是负荆请罪来了，但仍不依不饶地训斥他们：“你们军委办事组，目无中央，目无中央文革，这样下去还得了，啊？”江青训完了，周恩来问黄永胜：“你们很快就要出访了，准备好了没有？”黄永胜赶紧接上话茬：“准备好了，不知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没有？”江青“噢”了一声，闹了半天，她的话一点也没有用，黄永胜还是要走啊。她冷笑两声说：“你走吧，中央文革管不了你的事。”果然，黄永胜出访时，中央文革小组没有人去机场迎送。阿方不知这是什么原因，接待上也就有些保留。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中央文革没有人去机场，很是恼怒，

立即把周恩来找来，吩咐他说：“江青不像话，要开江青的会，叫她做检讨，马上就开。”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气恼地抽着烟，心里骂江青越来越不像话了，她是存心给自己丢脸，不批她一下还得了。毛泽东知道中央常委碍于自己的面子，不会认真地去批江青的，最多是江青装模作样地检讨几句就完了。不行，毛泽东坐起来，写了个条子：“中央常委不要纵容江青，江不对的要批评。”条子送到会场时，江青正轻描淡写地作检讨：“我对黄永胜的讲话是出于爱护他，但方式方法不大得当……”周恩来打断她的话，宣布道：“主席有指示：中央常委不要纵容江青，江不对的要批评。”江青听了，放声大哭。批评会也就进行不下去了。其实，就是江青不哭，别人也不会对她怎么样。

中央常委碰头会结束后，黄永胜立即打电话给叶群：“主任，江青挨主席批了。”叶群说：“你来一下，亲自向首长汇报吧。”说完，走进林彪的房间说：“你看得真准，江青这次可是碰了个大钉子，我已经通知黄永胜亲自向你汇报。”林彪点点头，脸上浮现出一丝少见的笑容，欣慰地说：“黄永胜就是比胖子强，这次顶得好，没有辜负我的培养，是个人材，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叶群奉承说：“你选的人嘛，哪还有错。不光是黄永胜，吴、李、邱三人也都是忠心耿耿，说一不二。”

说话间，黄永胜来了。林彪笑咪咪地握住他的手，又让叶群把吴、李、邱也叫来，设宴庆贺。宴席上，六人频频举杯，共祝胜利。灯光下，叶群细细看去，吴法宪五短身材，又胖又矮；邱会作过于劳作，损伤元气，瘦弱不堪；唯有黄永胜身材魁梧，气粗嗓高，浓发乌黑，满面红光，颇有英武之气，不觉怦然心动。

此后，叶群常打电话约黄永胜来毛家湾，略施小技，就让这位战功赫赫的将军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不料隔墙有耳，她和黄永胜的电话竟被人录了音，谁敢在老虎嘴上拔毛呢？不是别人，正是叶群的宝贝儿子林立果。

林彪和叶群有一女一子。女儿名林立衡，林彪叫她豆豆。儿子名林立果，林彪叫他老虎。文化革命开始以后，林彪和叶群一商量，决定把豆豆和老虎放出去锻炼锻炼，让他们见见世面，好将来为官做宦，继承父业。这个任务当然是交给亲信吴法宪了。吴法宪巴不得多为林家做点事，便提出让林立衡和林立果到上海空军去锻炼，由上海空军政委江腾蛟负责照顾，叶群立即表示同意。原来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蹲点搞社教时，江腾蛟就常携厚礼来探望，叶群也就格外对他热情，从此江腾蛟就与帅府挂上了钩。

豆豆、老虎到上海后，江腾蛟看林立衡身体瘦弱，就把她安排进了杭州空军疗养院，由杭州空军驻军负责人陈励耘照顾她；把林立果留在自己身边，让他结交沪杭空军将领，熟悉沪杭空军部署，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曲意巴结。林立果从小在林彪身边长大，熟悉上层，极力了解军队情况，物色干部，组成自己的势力，以便将来掌权之用。

林立果在沪杭锻炼一年多，吴法宪又把林立果调到空军司令部，让他到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同时又指定办公室的两位处长王飞、周宇驰协助他，林立果顿时成为空军司令部的特殊人物。他身无一官，但是吴法宪却还要经常向他请示工作。林立果异常骄横，尽力在空军中培植自己的势力。黄、吴、叶、李、邱的这些异常动作自然逃不过江青的眼睛，但她上次挨批后，自知现在还不是夺取军权的时候，现在的头等任务还是打倒刘少奇，于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刘少奇立案上来。

刘少奇这时已处于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的非人待遇中。还在去年、也就是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开始被中南海的一些人批斗。这天，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一百万人的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中南海的一些人就在刘少奇家的院子里批斗他，以呼应广场上的大批判。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几个大汉反扭双臂，推搡到院子里，把他们的头使劲地朝下按，坐喷气式。刘少奇挣扎着不愿低头，立即遭到脚踢拳打；他们的几个孩子也被人押着在旁观看，最小的孩子看着凶暴的人群怒吼着扭打自己的父母，吓得大哭起来，拼命逃跑，马上被人抓住。刘少奇较大的一个孩子源源勇敢地推开那些打手，把小小抱过来，看着那些打手行凶。

刘少奇这时已被打得鼻青脸肿，腿被打伤，鞋被打掉。王光美挣脱打手，扑向刘少奇，紧紧地拉起刘少奇的手。有人把他们冲开，但两双手又紧紧地拉在一起。刘少奇王光美手拉手对视着，用目光互道永别。一个人冲过来，把一幅漫画套在刘少奇脖子上，从旁边看去，刘少奇套在绞索里，红卫兵的拳头和笔尖正好对着他的头。

批斗完了，刘少奇被推回他的办公室。他按铃叫来了机要秘书，这是他最后一次行使国家主席的权力。秘书进来后，刘少奇吩咐他：“我抗议对我的这种批斗，你把我的意见记下来反映上去。”他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着“国家主席”那一条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维护宪法的尊严，要罢免我也要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使我是一个公民，判的罪也要由司法机构来执行，我抗议这种践踏宪法的行为。”秘书当即写好汇报上去。第二天，刘少奇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抗议对他的迫害，正式提出辞去国家主席，声明“我已失去自由”。

刘少奇的这封信转到江青那里，江青看了看，冷笑着把信撕得粉碎，扔在电炉上烧了。

从此，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武装战士在门里门外站满了岗，刘少奇只能住在前院，王光美和孩子们只能住在后院。王光美被强迫背砖劳动。刘少奇没有人照顾，每当去食堂时只能自己扶着窗台蹭着移动。这天，刘少奇又弯着腰，扶着打伤的右腿一瘸一拐地扶着墙挪动着。忽然，他感觉有人在看他，抬起头一看，原来是三个孩子满眼热泪地远远望着他。刘少奇心碎了，家破人伤，周围都是仇恨的目光，孩子们是多难过啊！不，要挺起来，不能让孩子们看着他这个样子而难过！刘少奇苦笑着放开双手，想伸直打伤的腰，一阵剧烈的疼痛反使他跌坐在地上。孩子们看见顿时哭喊着“爸爸”。看守人员喝斥道：“哭什么，回去。”过了几天，一辆卡车来到刘少奇家的后院，把他的孩子们抓上汽车，赶出了中南海。这天晚上，一队武装士兵坐着吉普车又闯到刘少奇的后院，为首的军官对王光美宣布：“王光美，你被逮捕了。”旁边的两个士兵立即给她戴上手铐，押上了吉普车。

从那时以来到现在，也就是1968年的仲夏，刘少奇因备受精神、身体的摧残，已衰弱不堪。这天起来，他穿衣服，因手臂被打坏，一件衣服穿了一个小时。中午，他到食堂去打饭。从住房到食堂只有三十公尺，刘少奇扶着墙，足足蹭了五十分钟才挪进食堂。食堂工作人员看到刘少奇来打饭，先呼喊了一阵口号：“打倒刘少奇！”然后才把剩菜剩饭打给他，刘少奇端着饭，在食堂里坐下来，他的手不听使唤，把米饭弄得满头满脸都是。

到了晚上，刘少奇突然发起高烧来，监守报告了上面。二十多分钟后，立刻有一队医生护士赶来抢救。要是往日，刘少奇看病，医生总是先用听诊

器把他打几下，喊一阵“打倒刘少奇”才开始给他看，刘少奇拿了药，护士一边用针头在他身上乱扎，一边恶狠狠地骂：“扎死你个赫鲁晓夫”。但今日来的这些医生、护士不一样，不喊口号，不打人，认真看病，认真打针。监守不满地责备道：“你们对刘少奇还满有感情的嘛。”带医生来的一个干部扳下脸，训斥道：“你胡说八道什么，快滚开。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很好地监护刘少奇，他要出了问题，我要你的脑袋。”监守碰了个钉子，赶快退到一边。医生、护士看完了病后，负责干部又留下一名医生在这里守诊，其他人都走了。

监守不明白上面为什么变得对刘少奇这么关心起来。人走了，他向留下的医生提出了这个疑问。医生拍拍他的肩说：“老兄，看来你是不懂。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要让他活着看到他被开除出党。”监守这才明白了其中的奥妙，也就适当地给了刘少奇一点方便，刘少奇瘫在床上，一天天地挨日子。

要开刘少奇的会了，江青一方面派人给刘少奇治病，让他不要在会前死去，一方面亲自指挥督促刘少奇专案组加紧逼供，一定要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把王光美定成特务。在此之前，他们已把肝癌末期的原辅仁大学代理秘书长张重一教授抓进监狱，逼他证明王光美是特务。张重一被关进监狱27天即死去。在27天中，江青、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这位垂死的老人突审21次。张重一教授不想陷害王光美，江青骂他是“花岗岩脑袋”，命令突审。在阴森恐怖的突审室里，张重一因病疼得在床上乱滚，突审的人围住他的床大声喝问，见他实在不行了，命令医生输液抢救，在抢救时又在突审。张重一回答着呻吟着，始终没有乱供“王光美是特务”。但是江青把这些语无伦次的话经过加工，把它变成了证明王光美是特务的口供。到了1968年春夏，江青更着急了。为了拿到稍微像样点的材料，她命令把中共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王世英抓起来突审，逼他指认刘少奇是叛徒。王世英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一口拒绝专案组的要求：“你们要的东西我写不出来。”专案人员拥上狠揍他，问他“写不写？”王世英愤怒地反抗道：“枪毙我也不写。”专案人员恶狠狠地冷笑道：“我们偏不让你死，要让你活受罪。”

专案组向江青报告了王世英拒不写材料的情况，江青呼地站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问：“他不写，你们是干什么的？要狠狠地斗，集中大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死就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这些专案人员已是狠毒的了，但对江青这蛇蝎一般的狠毒心肠还感到头皮发麻，看江青说“阎王请他吃烧酒”时，咬牙切齿，满眼凶光，十足是一个女阎王。在江青的威逼下，专案组对王世英日夜不停，轮番逼供，终于使他死在狱中。

张重一、王世英都被江青请吃烧酒去了，崔月犁又接到了阎王请吃烧酒的请柬。崔月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做党的地下工作，是地下市委书记刘仁的副手。当时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这是美国出资办的一所教会学校，特别重视英语的教学，学生们的英文水平很高。当时叶剑英作为中共首席代表在北平军调部工作，因为要和美国军调代表打交道，特别需要英文翻译，崔月犁就介绍王光美去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的英文翻译。由于有了这段历史，崔月犁被江青请去吃烧酒。

崔月犁被铐到刑讯室里，只见灯光幽暗，阴森可怖，四、五个大汉站在周围，个个狰狞凶狠。主审者拍一下桌子，喝问道：“崔月犁，你老实说美

国在北平的特务机关在什么地方？”崔月犁回答：“不知道。”主审者又问：“东四六条门牌有多少号？”崔月犁平常也不留心这些，只好回答：“不知道。”主审者冷笑一声：“请他吃烧酒。”几个大汉扑上来对他一顿狠揍，一边打，一边命令崔月犁数数。崔月犁无奈，从1数起，数到38，这些人命令：“停下。”主审者冷笑一声：“好，你终于供出来了，美国特务机关在东四六条38号。我再问你，你和杨承祚是怎样指使王光美打入军调部的？”崔月犁绝望地说：“我不认识杨承祚，王光美到军调部那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哪里是把特务拉入党内。”主审者一拍桌子：“死到临头，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请他吃烧酒！”大汉们又一拥而上，把崔月犁打倒在地，主审者命令：“背百家姓，不背，还有更厉害的烧酒。”崔月犁只好背起百家姓来：“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蒋沈韩杨……”刚背到“杨”，主审者就命令：“停！你承认认识杨承祚，知道杨承祚是怎样介绍王光美作特务的。你是怎样指使王光美打入军调部的？”崔月犁连喊：“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主审者努努嘴说“…他烧酒还没有吃够，再请他吃烈性的。”那些打手一拥而上，脚踢拳打，一个人猛踢他的下巴骨，崔月犁一阵剧疼，不觉昏死过去。

江青不断地“请吃烧酒”，伪证也就不断地制造出来。江青对请吃烧酒的成绩很满意，不断地在材料上批示督促。这天，她接见中国京剧团等演她剽窃他人作品搞的“样板戏”的演员们时自我吹嘘道：“你们不知道啊，我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接见你们的啊。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我还得重挑，还得重弄。我憎恨，我愤怒。我告诉你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啊，终于搞清了，刘少奇是个大反革命啊！”

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搞好后，林彪拿去审阅，9月20日，他给江青写信，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结论，“向出色的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江青收到林彪的信，自然是非常得意。不料，她突然接到报告，10月5日上午，刘少奇突然大哭起来，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会不会是有人向刘少奇露了风，如果这样，刘少奇万一愤而绝食什么的，那大会上就没有了靶子，安排好的计划就要出现漏洞，主席责怪下来如何了得。江青下令彻查是谁透的风。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七十一回 陈少敏独作骇世举 张志新勇为真理言

话说 1968 年 10 月，江青得到报告，说刘少奇在 10 月 5 日大哭一场。江青怀疑有人给刘少奇透露了风声，下令彻查，查来查去，并没有查出什么。正在查的时候，刘少奇在 10 月 5 日又大哭一场。一日之内，大哭两场，经监守报告，原来是刘少奇痛哭国家遭到浩劫，法制遭到践踏，人民遭受苦难。江青掌握了这些情况后，知道刘少奇没有听到要开他的会的半点消息，这才放了心。她心里非常痛快，几十年的气一下子出了，还能不痛快。她下令专案组加紧起草文件，准备向扩大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

1968 年 10 月 13 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已有 71% 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现在能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只有 40 人，不到全部中委 97 人的一半。不到法定人数，只好“扩大”，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都被“扩”了进来。既然是名正言顺扩进来的，那就不是旁听、列席，而是正式会议成员，都有表决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叶群、吴法宪这些文革新贵，不仅被“扩”了进来，还都成为会议分组的各组长，领导中央委员，真乃荒唐至极。

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之时，全国形势已有了新的变化。自 1967 年 1 月上海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以来，历经两年的努力，全国除台湾以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按照中央的指示，大批解放军军管了各个要害部门。1968 年中央又决定把工厂的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各个单位，工宣队和军宣队联合管理各基层单位。红卫兵运动已落下帷幕，各大学学生都已经有许多“毕业”，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军队农场和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学生该“毕业”的也都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号召，被动员去了农村插队落户，北京火车站每天都挤满了去黑龙江、内蒙古农牧区插队落户的中学生。每当知识青年的列车开动之时，车上和站台上一片哭喊之声。但不论怎样，文革初期那种乱哄哄的现象已没有了，城市恢复了平静。那些过去毛泽东不喜欢的大干部，死的死、关的关。刘少奇危在旦夕，邓小平在家软禁。毛泽东想打倒的都打倒了，想提拔的都提拔了，按说是“形势大好”，但是毛泽东却并不是很高兴。他已感觉到全国人民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怀着深深的不满，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对此怀有深深的忧虑，如果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被人们否定，被历史抛弃，那将是他一世英名的莫大遗憾。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讲话中，不是喜气洋洋地祝贺胜利，而是首先要求大家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扩大全会的与会者自然明白主席的苦心，马上通过决议，一致赞同毛主席的意见，肯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虽然全会通过了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决议，但毛泽东心里并不踏实，以后又不断提起这件事，而且调门一再降低，从“完全是必要的”降到三七开，这且不说。

且说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到最后一天，也就是 10 月 31 日，开始表

决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表决的方式是举手表决，谁如果不同意，那么立即会被发现。在这样的气氛中，谁还敢不举手呢？自然是要一致通过了，不料，有一位中委还就没有举手，这位中委的名字叫陈少敏。

陈少敏是什么人？提起她的名字来，无人不晓。战争年代，她曾直接领导一个地区的工作和武装斗争，腰佩短枪，威震敌胆。建国后长期从事工会工作，先后担任过纺织工会全国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第八届中央委员，是正部长级干部。像她这样功劳大，资格老，职务高的高级女干部在全党还是不多的。

陈少敏对文化大革命是不满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一开始，她就对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在分组会上围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不满，不同意在会上点名批判朱德、陈云、邓子恢。康生注意到了陈少敏的不满情绪，特意把她找到自己在会议的住处谈话。一开始，康生对她非常热情，招待甚周，亲手把一杯香茗递给她：“少敏，喝一杯香茶，先消消火。”陈少敏接过茶杯，喝了一口。康生点燃一支香烟悠然自得地吸了几口。他相信，凭着自己的智谋和手腕，收降一个女干部易如反掌。

康生故作亲切地向陈少敏跟前挪挪，关心地问：“少敏，你来开会，家里都安排好了吗？孩子们都好吗？”陈少敏点点头说：“谢谢康老，孩子们都好。该下乡的都下乡了。”康生“噢”了一声，叮嘱说：“那你得多关心关心，儿走千里母担忧啊。”陈少敏没有说话。康生又说：“咱们都得向主席学习，为了革命，主席献出了多少亲人，在朝鲜战争中，毛岸英同志又光荣捐躯。”陈少敏眼圈红了。康生趁热打铁说：“现在主席这么大年纪，亲自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还不是为了防修反修，让咱们不吃二遍苦，你要理解主席的苦心才是。”康生停下来喝口茶，似为诚恳地说：“应该承认，文化大革命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这是刘少奇的余毒作怪，不应算在文化大革命的帐上。只要把刘少奇的余毒肃清了，这些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所以你得对开除刘少奇党籍有个正确态度啊。”陈少敏还是不作声。康生问了三次，她还是不表态。康生火了，批评道：“陈少敏，你不要执迷不悟，你要想想这样做的后果。你说，你对开除刘少奇是个什么态度？”陈少敏抱住头说：“康老，你让我回去想想。”康生说：“回去好好想想，一定要想通，我可是为你好啊。”

10月31日，大会开始对开除刘少奇的决议进行表决。康生环视会场，只见会场上的人们都举起了手，特别是那些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们，一个个都把手举得高高的，唯恐主席台上的人看不见。只有陈少敏把右手压在胸前，全身扑在桌子上。康生再一次提醒大家，实际上是提醒陈少敏：“注意，现在开始计票。”但陈少敏动也不动，实际上是投了反对票。可是大会宣布的结果却是“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表决结束后，康生把陈少敏叫到自己的住处，恶狠狠地问她：“我给你打招呼了，你为什么还不举手？”陈少敏理直气壮地答道：“这是我的权利。”康生冷笑两声：“权利？你真是不可救药，你走吧。”

全会结束后，陈少敏回到家里，把孩子们召到一起，心情沉重地说：“孩子们，我最近可能要被捕。你们记住，我被捕是因为在全会上没有投票。我被捕后你们要好好想办法活下去。”

当天深夜，两辆吉普车开到陈少敏的住所前，从车上下来几个军人，敲陈少敏家的门。陈少敏问道：“谁？”来人答道：“查户口的。”陈少敏明白了，打开门，伸出双手说：“请吧。”那些人也不说话，给她戴上手铐押走了。

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了，刘少奇并不知道他已被开除出党，相反，监守人员奉命严密封锁消息，任何人都不得透露此事。何时通知，由上面决定。原来江青已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日子让刘少奇知道这件事。11月24日，这已是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整整二十四天的日子。一早来了几个专案组的干部，他们进了刘少奇的房间，看看刘少奇的病情，但并不问一句话。最后其中的一人大声命令监守，实际是说给刘少奇听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你们要加紧监视，不得出半点问题。”刘少奇一听，急问：“什么？你们说什么？”那些人看看在床上挣扎的刘少奇，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走了。刘少奇顿时气得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吐血。他看看墙上挂的日历，猛然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他顿时明白，这些人是专门来给自己传递这个消息从精神上再进一步折磨自己的，不禁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监守看到刘少奇大叫一声，忙唤来医生。一量血压，血压竟达到260/130，体温升到40℃。医生简单地抢救了一下，刘少奇醒过来了。监守问他：“你听清楚刚才中央来人的话吗？”刘少奇睁着眼，一句话都不说。医生问他：“你感觉怎么样？”刘少奇还是一句话都不说。从此以后，刘少奇再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表示抗议。

邓小平的日子也不好过，他的五个孩子都被赶走了，家里只剩下他和夫人卓琳、继母夏培根三人。长子邓朴方原在北大读书，文革一起被北大学生摔下楼，导致伤残，此时尚在医院中。

陶铸呢，他自从被揪出以后，一直被监禁在家，不时遭到中南海造反派的批斗，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每天被监守押送到中南海西门看大字报。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以后，他被认为是“黑后台”，被中南海造反派揪出去批斗，他的夫人曾志也被人把胳膊往后一扭押去陪斗，直到很晚才回来。他们一进家，发现房里一片凌乱，箱子被撬开，柜子被砸开，所有私人的照片、信件、笔记本都被查抄一空，衣服、用品扔得满地都是。陶铸和曾志淡漠地看着大抄后的破家，懒得去收拾。

当夜，屋外一阵吵闹，一队警卫战士喊叫着冲过来。队长问陶铸：“是什么人在爬墙？”陶铸是听到了吵闹声，但他确实不知道是什么人在爬墙。警卫煞有介事地喝问陶铸的随从：“院子那边就是春藕斋，主席常来这里散步，要出了问题还了得！”随后他命令增加监守，由原来的四个人增加到一个班，接着一个电工赶来给陶铸的睡床上方装了一个大电灯泡，陶铸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床顶上方装这么大的灯，这不浪费电嘛。

陶铸住所（准确地说是监所）晚上有人爬墙，威胁到春藕斋安全的消息被传播出去了。下午涌来一群中南海造反派批斗陶铸，他们按住陶铸的头，让他坐喷气式。陶铸却不愿意低头，挣扎着把头往上抬。造反派见他如此倔强，从背后给他一拳。陶铸猛地挣脱束缚，扭头怒斥打人者：“你敢动手打人！”造反派仗着人多，又是打陶铸，哪里还有什么顾忌，对陶铸又是几拳，打得陶铸口里流血，边打还边骂：“就打你个狗陶铸，你怎么着。”陶铸把一口血水吐在打人者脸上，怒吼着：“你他妈才是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孙子。”

你们敢放开手，老子就敢跟你拼。”造反派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厉害的反抗，不禁有些胆怯。挨了骂，又不敢把陶铸打死，他们只好自认晦气，灰溜溜地走了。

江青 1968 年 3 月得知此事后，下令加强监守，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人。对陶铸的监视骤然升级，来了两个班的士兵分成几班，日夜监管。无论什么时候，陶铸的身边总有三个武装士兵在监视着。一个站在门口，一个站在屋中，一个就紧贴着陶铸，像影子一样粘在他的身边，使陶铸每时每刻都处在严重的敌意之中。这是阎王江青新发明的一种精神折磨法，使你的精神没有一刻放松的时候。入夜了，一切进入黑暗，在瞑瞑夜色中陶铸总可以休息一下了吧。不，这时，监管士兵把屋子的灯打开了，也把安在陶铸睡床上方的灯打开了，此灯正好位于头部上方，耀眼的灯光刺激得陶铸根本无法入睡，“影子”又贴在床头嬉笑打闹。随着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召开，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百万人批斗刘、邓、陶大会，陶铸和刘少奇、邓小平一样，也在家里遭到批斗。回来以后，陶铸就头昏眼花、呕吐，但没有人给他诊治，过了好长时间一检查，发现陶铸竟患了癌症。

那些在特监里的特犯虽然有了一个暂时休息的囚室，但他们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审讯，每次批斗审讯总是被毒打一顿。

首先说说彭德怀吧。他自 1959 年从庐山上摔下来以后，一直在挂甲屯隐居。1965 年 8 月，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一个月后，毛泽东办公室来了电话，通知彭德怀到人民大会堂去。彭德怀放下电话听筒，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离开政坛六年了，六年来，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重新出来工作，但他明白，这只是个难圆的梦。但是，现在这个梦马上就要圆了，他怎能不欣喜流泪呢？

彭德怀刮了胡子，换上了整洁的制服，坐着红旗车到了人民大会堂。彭真告诉他，中央决定他去成都任“大三线”副总指挥。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打来电话，约他到中南海来见面。

自庐山一别，转眼六年。六年之后又要与主席重逢，彭德怀真是万分高兴，他的秘书司机也都喜气洋洋，都以为是熬出头来了，要重见天日了。

车子在丰泽园门口停下来，警卫战士立正向他行庄严的军礼，彭德怀也举手还礼，手竟因激动而有些发颤。他进了丰泽园，毛泽东已站在颐年堂门前迎候着他。彭德怀几步跨过去，握住毛主席伸过来的手，两位老战友互相端详着，几十年征战打江山的历史在他们脑海里一幕幕闪过，两人都激动不已，半天说不上话来。

还是毛泽东打破了沉默：“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所以就给你打了电话。晓得你要来，早在这儿等着，你终于来了，请！”

两人一坐下，毛泽东埋怨起彭德怀来了：“老彭啊，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也不给我来电话，也不写信？这不好嘛。你有什么话应该给我说嘛，像在庐山一样骂娘也行啊。”彭德怀解释说：“我是想着主席忙，我又没有工作……”毛泽东插话说：“工作的事，中央已研究了。现在苏修在边界开始增兵，越南是炮火连天，东南沿海不平静，老蒋总想反攻大陆，要准备打仗啊。中央决定在西南加紧建设后方军火生产基地，你去担任副总指挥吧，将来打仗了还可以带兵去打仗。”

彭德怀担忧地说：“主席，我去西南。只是我这灰头土脸的样子怕做不好工作。”毛泽东点点头说：“你说的也是，中央发个通知，这个问题也就

解决了。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现在看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对你看来是批评过了一点，等几年再给你纠偏吧，你自己也要振作起来噢。”

两人正说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来了，刘少奇紧紧地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主席一直记着你，我们都希望你振作起来！”邓小平也握住彭德怀的手说：“老彭，你去西南好好干吧，为人民立新功。”

从中南海回来没有多长时间，彭德怀就去了西南就任大三线副总指挥。他在那里工作没有多长时间，文化大革命就来了。1966年12月，江青、戚本禹亲自指挥北航红旗战斗队等造反组织去成都揪彭德怀。周恩来知道后，怕彭德怀落在红卫兵手里，命令成都军区和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随护彭德怀到了北京，由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出马，安排在特别监狱里。

特监里也不是世外桃源，彭德怀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斗争，肋骨打断、胳膊拧坏，胸部闷疼，回到监所后才能得到数天的休息。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彭德怀得知刘少奇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不禁百感丛生，心中暗想，老夫怕是不能活着走出特监了。

现在再来看看贺龙吧，贺龙被关进特监以后，周恩来坚持准许他的夫人薛明在特监陪伴。由于心情不愉快，生活条件差，贺龙得了糖尿病。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成了囚犯，常常悲愤地拍墙大骂林彪：“你这个害人的三连连长，你为什么不让别人革命呢？你为什么耍整人呢？”傅崇碧在时，警卫部队对他比较照顾，傅崇碧被押往沈阳后，警卫部队也换了。林彪、江青指使专案组加紧对贺龙的迫害，贺龙病情严重恶化，想喝碗水都不给。这时薛明也被他们撵走了，贺龙在下雨时，拖着病体接了一碗雨水，被警卫一拳打翻。

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谭震林虽然没有被打倒，但处境也很困难。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被打成反党集团，分组揭批。聂荣臻被弄得发了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刘伯承因身体不好也住在这里。两人见了面，刘伯承叹口气说：“老兄，这下你可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去了。”叶剑英想来医院探望，没有得到批准。叶剑英只好打电话给聂荣臻的夫人表示慰问。周恩来得知三老四帅被整得很紧张，在一份简报上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黄永胜、吴法宪被林彪派来向“三老四帅”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每传达完一个，便又传达林彪的指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三老四帅’）把身体搞好，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在这年四月召开九大。毛泽东坚持“三老四帅”都要进中央，那当然都要当代表了。陈毅被分在上海选区。张春桥在上海搞了一阵子鬼，上海便给陈毅寄来了履历表，并附有一信。信中说：“遵照最高指示，我们上海几十万党员一致推举你为右派代表参加九大，履历表随信寄去，填写完毕，急速退回。”

秘书看了来信气得要撕，陈毅挡住他说：“且慢。”他拿过信看看，轻蔑地说：“既然今天上海选我作右派代表参加九大，那说明我陈毅还有一点代表性嘛，却之不恭。”

林彪、江青这么整老干部，激怒了人民，他们用种种巧妙的办法同他们斗争。张春桥把陈毅作为右的代表。但陈毅因指挥过解放上海的大战役，又担任过上海市长和军管会主任，在上海人民中威信极高。张春桥、王洪文在

会上骂陈毅，人民群众就会下大讲陈毅战功赫赫，文武双全，陈毅揭露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的，是陈毅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毛泽东请回来的等等。静安区一个党员在小组会上攻击“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立即被群起而攻之，挨训达三个小时。其他一些老同志也都受到上海人民的拥戴。张春桥们要批朱德，许多工人说“我从小就知道朱德的扁担（红军时期，朱德经常与战士一起从外挑粮进山。为了防止战士们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不让他挑粮，朱德特地在自己的扁担上刻上名字。这个真实的故事建国后被选人小学课本）。”张春桥们要攻击聂荣臻，上海许多知识分子、工人就说“聂荣臻乃是一贯正确的”。弄得张春桥们没有办法。干脆抛开党组织，按着造反派组织系统（即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往下传达。

全国很多党员和群众也都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主动起来和林彪斗争。1969年五月，东北盘锦大地上出了个敢和林彪、江青对着干的大英雄，她的名字叫张志新，是个娟秀的青年妇女。张志新，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原是中共辽宁省委文艺处的干部。文化大革命起来后，她也跟着热血沸腾过一阵，但不久就发现了问题。那些为共和国的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文臣武将怎么一下子都成了罪人，国家大乱到底是谁在搞鬼，为什么法制全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重大的损失。她想来想去，觉得这里面有鬼。她对人说：“现在毛主席身边那几个可靠吗？对江青、叶群这些人不能信任。”

天哪！这是什么话。按照谢富治搞的公安十条，这是马上要坐牢的。有的人好心劝她放弃这些想法，张志新说：“我考虑的不是个人对与错的问题，我想的是大是大非问题。”

果然，张志新很快被送进了学习班（即批斗班）。到了这里，张志新不考虑个人问题，照样大批林彪、江青。她公开宣讲，林彪鼓吹的“顶峰论”（林彪自1965年以来，一直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错误的，“对林彪没有什么信赖”。她问道：“江青说这个叛徒，那个是特务，她自己怎么样？”

不久，有些搞专案的人来把张志新找去，要她交代问题。张志新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小时，听得这几个人心惊胆战。最后，他们把记录交给张志新看，郑重其事地问她：“这些是不是你的观点？”张志新翻阅完后肯定地说：“是我的观点，不过你们记得不完整，我可以再给你们写一份。”她立即写了一篇长长的补充材料，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送给了来人。这些人小心地把材料放好，然后坐车走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七十二回 孙玉国初战珍宝岛 柯西金又开友谊线

话说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张志新，眼看奸臣当道，忠良被害，国家受损，人民遭殃，感到一个共产党员这时不出来为真理斗争还算什么共产党员，于是挺身而出，经常痛斥林彪、江青。按照当时执行的公安十条，议论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犯有这种大罪的人，不枪决也得判无期。到了1968年，毛泽东批发了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全国又都在学柳河，干部、教员都去了各种各样的干校。辽宁省委的干部自然也不能例外，都去了锦州附近的盘锦垦区的五七干校，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这时张志新对林彪、江青的面目看得更清楚了，放言批判林彪、江青，终被逮捕入狱。她被捕后的命运如何，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陈毅等人被作为右的代表准许参加九大，张春桥还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把陈毅拉到上海批判、消毒。毛泽东在11月12日批示：“此文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如此一来，陈毅岂不是要被张春桥拉到上海批斗打倒么。全国各省区都“参考”起来，你揪叶剑英，我揪徐向前，那“三老四帅”眼看着都要给打倒了。

且慢，就在这时，中苏边界线东端的中国领土珍宝岛上，连连响起苏联军队入侵的枪炮声和装甲车的隆隆声，紧急军情十万火急地传到北京，中南海大本营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亮到很晚。要打仗了，得有个大本营参谋小组，就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斯大林身边有个由朱可夫等几位元帅组成的参谋小组那样。这个参谋小组既可以帮助统帅部署作战计划，又可以代表统帅指挥一个大战略方向的作战。这个参谋小组的人选自然非得是威望很高的军事将领才行。罗荣桓元帅已经作古。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只有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朱德九大元帅才有资格进这个小组。九大元帅中，朱德年纪已大，刘伯承眼睛快要失明，彭、贺关在特监，毛泽东对他们成见很大，要出来工作那是不可能的。林彪已是副统帅，看来不能屈就。身体尚好，能出来工作的只有陈、叶、徐、聂四人了。现在他们正被作为“二月逆流”的干将遭到批判，如果能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将他们组成参谋小组，一可利于备战，二可使他们得到保护，岂不是两全其美。

周恩来在西花厅反复思考了半天，觉得这个方案肯定能得到毛泽东同意，便走出西花厅，踏着1969年2月的春雪，向丰泽园驱车而去。毛泽东也正在思考这个问题。周恩来进来后，毛泽东放下《楚辞》，问道：“恩来，北边的事情得有人专门抓一抓了，这件事还不能随便找几个人，你看谁来抓好呢？”周恩来缓缓地喝了口茶说：“自然是林副主席了。”毛泽东点点头说：“不错，不过他一个人忙不过来，还得有人帮着干才行。”周恩来说：“黄、吴、李、邱是军委办事组的，自然应该帮林副主席了。”毛泽东摇摇头说：“他们还有一大堆具体事呢。我是说要找几位作战有经验，现在又没有具体工作的同志。”

周恩来拐弯抹角地探明了毛泽东的意思，这才似有意无意地说道：“那几位老总怎么样？反正他们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把他们组成一个军事小组，专门研究北边的情况，把他们讨论的结果每周报主席参阅。一旦打起来了，也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毛泽东抬抬手，又慵懒地放下，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好吧，就这么办吧。你去告诉他们一下，另

外就说我说的，叫他们把身体搞好。”

成立参谋小组的事就这么定了，参谋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紫光阁五承殿。第一次会议召开那天，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驱车来到五承殿，大家一见面就又发起牢骚来。徐向前瞧瞧大家说：“咱们这股‘逆流’又聚到一起了。那位四期生又该想法给咱们寻顶新帽子了。”陈毅头一摇：“好嘛，再来两顶吧，看还能把我陈毅压趴了不。”

四位老师正发着牢骚，周恩来进来了，一看大家都已到了，满意地笑着说：“几位老总到得很准时嘛。我今天带来个人，你们认识一下吧，这是熊向晖同志。”熊向晖过去曾在军队工作过，建国后被调到外交部，当过驻英国代办，前不久又被调到总参谋部任一个部的副部长，几位老师当然认识他。熊向晖走过来，恭敬地向几位老师问了好，老师们也热情与他握手。

周恩来宣布开会，首先讲了讲边界上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说起中苏边界，不能不提到《尼布楚条约》和《瑷珲条约》。原来现在苏联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在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清朝中期，俄国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侵入这些地区。当时清朝政府在这些地区筑有尼布楚等城，驻有军队，俄国侵略者远道而来，被清军打得大败，在尼布楚城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承认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是中国的领土。

清朝政府到了晚期，政治腐败，列强连连派来舰队挑衅，清军每次都是大败。清朝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俄国侵略者一看有机可乘，卷土重来。1850年秋，沙俄骑兵侵入庙街，中国士兵英勇抵抗，终因朝廷腐败无能，指挥无方，归于失败。沙俄骑兵占领庙街，改为尼古拉耶夫斯克。1854年，沙俄舰队又闯进黑龙江，清朝政府软弱无能，连连败北，被迫于1858年与沙俄代表穆拉维耶夫在瑷珲订了城下之盟，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拱手送给沙皇俄国。

消息传到莱茵河畔，引起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愤怒。不久前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在地图前比划着议论远东传来的这一惊人消息。马克思愤慨地说：“强盗，他们把妇女推在江里，把婴儿杀死，是一伙十足的强盗。”恩格斯在地图上比量着，惊讶而愤怒地说：“卡尔，你看看这块土地有多大吧，它等于法国和德国加起来的总面积。”马克思量了量，点点头说：“是的，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说，沙俄是一个更危险的敌人。当西方列强在争着占据中国东南的一些小岛时，沙俄却已经悄悄地夺去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恩格斯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人没有祖国。”

半个多世纪过去以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列宁记住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1920年9月27日，他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第一届苏维埃人民代表宣布：“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现在我代表苏维埃政府郑重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地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苏维埃代表们对列宁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列宁的这一决定没有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边界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提上议事日程。随着中

国反对苏联政府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的开始，中苏两国关系开始恶化，苏联政府在中苏边界陆续增兵，陈兵百万。苏联军队不断派出小分队手持大棒侵入中国领土打伤中国战士，打死中国边民，不断地在边界制造事端。到 1969 年 3 月，苏联军队在边界制造了近五千起边界事件。

到了 1969 年 2 月，苏联军队骤然加紧边界上的骚扰活动，中国的珍宝岛上不断传来苏军装甲车的隆隆声，边界形势陡然紧张起来。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 0.74 平方公里，该岛本与中国大陆相连，由于江水长年累月的冲刷，才形成江里一小岛，每到枯水季节，水落石出，珍宝岛又与中国大陆连成一片。该岛 1915 年形成，两头尖，中间宽，形似古代的元宝，故人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珍宝岛。早在岛子形成之初，便有中国渔民上岛居住捕鱼。此岛四周林木环绕，乌苏里江中马哈鱼成群，与岛子相连的中国大陆虎林县境内森林茂密，物产丰盛，棒打狍子瓢舀鱼在这里一点也不是神话。珍宝岛历史上归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是虎林县虎头村的一部分。守卫珍宝岛的是合江军分区公司边防站，公司乃是离珍宝岛不远的一个小村的村名，边防站就设在这个叫公司的小村里。站上共有四十多名军官、战士，站长名叫孙玉国，瘦长脸，大眼睛，个头中等偏上，格外精神。他 1961 年入伍，任公司边防站站长以来，指挥部队与入侵珍宝岛的苏军进行了 22 次的说理斗争，斥退了他们的挑衅。

苏军为什么在珍宝岛加紧挑衅活动呢？原来建国以后，中国政府坚持认为沙俄据以割去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中国领土的《璦琿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愿意和苏联政府解决边境问题，前提是苏联政府必须承认《璦琿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建国初期，中国一边倒，中苏友谊不断升温，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中苏两国的客轮相遇时，船上的中苏两国乘客总是热情地互相招手致意，在苏联莫斯科和中国北京之间，还架设开通了友谊电话热线，以方便两国领导人随时磋商重大问题。这条热线电话线路被人们称为“友谊线”。当时边界问题并不突出。

1959 年开始中苏交恶后，边境问题一下子突出出来。1960 年，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苏联政府建议边界谈判。1963 年，中国政府又向苏联政府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边界冲突的建议。苏联政府不仅不承认《璦琿条约》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反而拿出沙俄政府单方面绘制的《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其实，1861 年《中俄北京条约》签定后，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上界线，并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的水界。既然中苏两国现在根据不平等条约，把原来是中国的内河的黑龙和乌苏里江作为边界线，按照国际法，理应以江河的主航道的中心线为水国界。珍宝岛正好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当然是中国的领土。沙俄政府当年绘制的附图，是一张比例尺小于百万分之一的地图。地图既为沙俄政府自己绘制，图上穿过乌苏里江的红线也只能表示该江是中俄两国的界河，根本不能表明珍宝岛在江中的位置。中国政府据理力争，苏方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的归属，不得不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水界。

苏联在谈判中没有占到便宜，便想通过武力来夺取。在珍宝岛的对面苏联境内，苏联设有边防总站和边防站，人数多达 200 多人，装备有坦克、装甲车、汽车、直升机，而中国边防站不仅人数少，装备更是无法和苏军边防

站相比。

几位老师听完周恩来的说明和熊向晖的介绍，也着实感到情况严重。周恩来说：“为了加强战备工作，我向主席建议，请你们来组成一个统帅部参谋小组，就如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朱可夫元帅一样，专门研究战备工作，供主席和中央参考。主席已同意了，不知大家有什么高见？”陈毅气呼呼地说：“有副统帅嘛，还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右的代表嘛。”叶剑英劝解说：“老陈，你就不要提那个黄埔四期生了，今天是总理给我们布置任务，不要辜负了总理的苦心嘛。”周恩来笑着点点头：“既然各位老总愿意参加，那我们这个小组正式成立，就由剑英同志召集吧，熊向晖同志兼任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工作。”

小组成立后，情报源源不断地向小组送来。苏联境内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交汇处的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大军云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的陪同下，亲临哈巴罗夫斯克的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检阅新组建的空降部队。是日，只见两发红色信号弹升入空中，随之机声隆隆，一百多架重型直升机拔地而起，机群掩蔽了日光，如一大团阴云飞了过来。紧接着，十几架火力突击直升机向假设的中国军队阵地开火，一时间，炮火连天，子弹如雨，硝烟弥漫。在火力突击直升机的强大火力掩护下，一百多架直升机次第降落，空降兵从机舱里冲出来，呐喊着冲上“中国军队”阵地。勃列日涅夫感动得眼泪直往下流，不断地赞叹道：“太好了，太伟大了。”苏联远东军区司令洛西克上将也热泪滚滚，对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嚷道：“你看见了吗？勃列日涅夫都流眼泪了，你应该给我们更多的飞机。”格列奇科一口同意：“洛西克将军，我比你更激动。我马上下令调一大批最新式的米24直升机给你们，让中国人尝尝远东军区的厉害。”

中国军队比起苏军来装备差远了，面临敌军压境的严重局面，珍宝岛上的边防军人心怀祖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3月2日，孙玉国带领巡逻队又上岛了。这时沈阳军区已调派部队来到珍宝岛附近的公司边防站，支持孙玉国。中国巡逻队来到岛上，还没走几步，只听得一片轰隆声。只见从对岸的苏联境内开来几辆装甲汽车，从冰冻的江面上向珍宝岛开来。装甲车开到珍宝岛的东侧，从车上跳下一大帮子苏联军人。往常苏联军人越境挑衅，总是大背着冲锋枪，手持长木棒追打中国军人。今天则不，一律手端冲锋枪，一下车就摆开了战斗队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孙玉国指挥的巡逻队包抄过来。孙玉国情知今日不同以往，激战就在眼前，立刻命令部队：“注意，做好战斗准备。”战士们“唰”一下都把大背着冲锋枪端到手，孙玉国看苏军包围上来，地形对我不利，果断地命令部队向后退去。苏军紧追不舍，一齐端起了冲锋枪。孙玉国叫声“不好”，命令部队：“趴下！”就在这时，一串子弹飞了过来，几个战士倒下了。孙玉国怒火填膺，举起冲锋枪射击，战士们紧跟着开了火，苏军倒下去一片。

孙玉国这里打成一片，岛的其他地方也响起了枪声，一个苏军指挥小组被歼灭。中国边防军由于苏军偷袭，猝不及防，也伤亡惨重。不管怎样，由于中国指挥部布置得当，孙玉国在前方指挥得力，中国边防部队挫败了苏军的入侵偷袭，打了个胜仗。

捷报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去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主席，沈阳军区肖全夫来电。今天早上，入侵珍宝岛的苏军开枪偷袭我边防部队，被我边防部队击退。苏军被打死30人左右，我们有19个战士阵亡。”毛泽东一下站

起来，气愤地说：“他们真动手了！好吧，来吧，我们不怕，怕也没用，他要打，我们奉陪到底。”周恩来补充说：“我们的边防战士太可爱了，机智勇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次胜利，沈阳军区肖全夫和前线指挥所指挥有方，珍宝岛所属的虎林县公司边防站站长孙玉国在前面临机处置，措施得当。”毛泽东动感情地说：“珍宝岛，珍宝岛，岛上最有价值的不是珍宝，而是战士的牺牲精神。请孙玉国同志参加九大吧，让部队讨论一下。我想见见他。”周恩来欣然赞同：“我也正想向主席提这个建议呢。珍宝岛的英雄出席九大，让英雄在会上作报告，对全国人民是个很大的鼓舞。孙玉国在珍宝岛上和苏修斗争了好几年，斥退了苏军几百次挑衅，他代表珍宝岛的边防部队也最合适。”

周恩来和毛泽东又商量了一会，秘书拿来了四帅军事研究小组的报告，毛泽东详细地看了报告，作了批示，让周恩来组织实施。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立即要通了沈阳军区前线指挥员肖全夫的电话：“肖全夫吗？主席已经看到了前线的报告，主席很激动，高度评价了前线将士的牺牲精神，传令嘉奖前线部队。根据主席的指示，党的九大筹备组决定特别增选珍宝岛前线将士代表参加九大。我们建议孙玉国同志作为珍宝岛前线将士代表，你的意见怎么样啊？”耳机里传来肖全夫哽咽的声音：“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关怀，感谢党的关怀，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我们珍宝岛边防战士头可断，血可流，祖国寸土不能丢。”周恩来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激动地说：“祖国感谢你们，人民感谢你们。现在请你们注意，一、我们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提高警惕，防止苏修扩大事态。如果他们还要打，应坚决予以有力的回击。二、努力争取冲突不要扩大，用广播通知苏联边防站，让他们把打死的苏军尸体运回去。三、对陈绍光、王庆容、于庆阳等烈士要隆重安葬，要做好家属的优抚工作，要在部队宣传烈士的功绩，教育部队继承烈士遗志。”肖全夫的话在耳机里响起来：“请总理放心，我马上向部队传达。”

珍宝岛一战，苏联军队吃了亏。远东军区调兵遣将，图谋报复，哈巴罗夫斯克的饭店旅馆住满了军官，新调来的大批坦克飞机塞满了街巷花园，一个更大的侵略行动在远东军区司令部酝酿成熟。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临街的104扇窗户全部被砸毁，苏联人又把墨水瓶扔向大使馆的房子，使馆房屋的墙壁被墨水溅污得脏乱不堪。

苏军的入侵行动和对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罪行激怒了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在3月2日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3月4日，北京市人民围绕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抗议苏军入侵珍宝岛、打死打伤我边防军人。苏联使馆人员从未见过这么壮观的游行场面，以为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惨剧又要重演，吓得要死。实际上周恩来责成谢富治早做好了安全工作，游行的人群排山倒海般地涌来，口号声如夏季的炸雷一样在使馆上空轰响，但没有一小块小石子之类的东西从人群中扔出来。苏联大使馆里没有飞进来一粒小石子，一个墨水瓶，一个臭鸡蛋。游行持续了整整五天，秩序井然，大使馆没受到丝毫损坏，世界都叹为奇迹。

日历撕到了3月15日，近4点时，苏军又大举入侵珍宝岛，在岛上设下埋伏。天亮后，孙玉国带领巡逻队登岛巡逻，直向苏军潜伏的榆树林走去，潜伏的苏军眼看着孙玉国一行越来越近，个个高兴，举起了枪。孙玉国这时突然命令部队站住，他仔细地观察后，发现榆树林地物有变，知道苏军已有

埋伏，带领部队走开了，在雪地里隐蔽起来。苏军指挥官、边防总站站长列昂诺夫上校命令苏军几十名步兵追歼孙玉国。装甲车冲过江面，遭到在岛上冰雪里潜伏了一夜的于洪东分队的痛歼。苏军在榆树中的潜伏部队没有想到中国部队也在这里埋伏了部队，只好从冰雪里出来支援。不料想，肖全夫指挥中国江岸上的两个炮群一顿猛轰，苏军十几个士兵被打死，一辆装甲车被击毁。

列昂诺夫上校看攻击受挫，命令三辆坦克、三辆装甲车正面冲击。由苏军边防站站长杨辛中校率四辆坦克迂回穿插，企图切断中国军队江岸与岛上的联系，将岛上的孙玉国、于洪东指挥的部队一举歼灭。

苏军的炮火准备开始了，许多门大口径火炮齐射猛射，无数炮弹从苏联江岸上的炮阵地飞来落到珍宝岛上，被炮弹炸起的冻土和碎木像冰雹一样落下来。在炮火的掩护下，苏军的坦克和装甲车冲了过来，孙玉国率巡逻队开枪抵抗。由于岛岸太高，苏军坦克爬不上去，便停在江面，用坦克炮支援步兵冲锋。孙玉国等人在前面用机枪火力把苏军步兵全打趴在地上，于洪东指挥各排用火箭筒打苏军装甲车。激战中，有人大喊：“坦克从后面冲上来了。”于洪东转过头一看，只见四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绕过了岛南端，从中国内河的江面的冰面上迂回过来。于洪东指挥反坦克炮反击，炮弹准确地落在苏军坦克身上，却没有钻透坦克，苏军坦克质量确属上乘。这几辆坦克正是杨辛指挥的坦克，刚才的一炮也正好打在他乘坐的坦克上。炮弹虽然没有炸毁坦克，却也震得杨辛昏头昏脑，他没有详细观察路况，便指挥坦克一马当先朝于洪东部队冲过来。

坦克轰隆隆地吼叫着，眼看就要压过来了，于洪东和边防战士们不断地用炮火阻击。苏军坦克毫不在意，继续冲来，突然“轰”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杨辛中校的坦克的履带被炸断，瘫在那里。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用炮猛轰苏军其他几辆坦克，苏军坦克急忙后退，慌乱中压碎后面的装甲车，苏军装甲车里的士兵作了同伴的压死之鬼。于洪东则避开被打瘫的苏军坦克的射角，爬上坦克，拉开车盖，丢进去一颗手榴弹，盖上车盖，车舱里一声闷响，杨辛中校和几个坦克手被炸得四分五裂。

列昂诺夫损兵折将，再次整顿兵马，指挥二十多辆坦克冲过江来，又被中国的反坦克炮和反坦克雷阵压制住。这反坦克雷不大，也就是一个拳头大，却很厉害，杨辛中校的坦克就是压上了一颗反坦克雷被炸瘫的。珍宝岛边防部队把雷裹上白布，放置在江面上，大雪一盖，如同江面上密密麻麻的雪团，根本分辨不出哪是雷，哪是雪团。苏军攻击再次受挫。列昂诺夫恼羞成怒；又重整兵马，准备指挥七十多辆坦克冲过江来，突然一颗炮弹飞来，正好落在列昂诺夫呆着的指挥所顶上，一声炸雷，列昂诺夫和指挥所的其他军官都一命归天。

珍宝岛暂时平静下来了。

苏联党和政府的首脑在经历了珍宝岛之战后重新研究对中国的政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经过这次达曼斯基岛（珍宝岛）一战，我们摸清了中国军队在边防上的布防。这么大的战斗，中国没有出动一辆装甲车作战，说明他们部队的配备重点不在边界，而在纵深，这是一个防御的架子，而不是进攻的架子。我们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同中国开战势必要进入中国，短期内进展顺利，但最终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会极大地削弱我们同美国抗衡的力量，不如向毛泽东建议谈判，避免边界发生冲突。”勃列日涅

夫同意柯西金的看法，并建议说：“柯西金同志，你为什么不直接同毛泽东交谈呢？”柯西金愕然：“这怎么可能……”勃列日涅夫提醒他说：“你忘了，五十年代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了一条友谊电话线路，现在你可以利用这条线路直接同毛泽东通话嘛。”柯西金兴奋地搓搓手说：“这倒是个有趣的办法。十年不用了，我试试。”

3月29日晚8点30分，北京电话局的女话务员一边聊着天，一边嗑瓜子，时不时漫不经心地接插着电话。突然，那条久置不用的友谊线的红灯突然亮了，一个小姑娘接上机子，问道：“喂，你是谁呀？”对方答道：“我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我要和毛泽东通话。”小姑娘一听是“苏修”头子，怒斥道：“呸，不要脸，侵略者，修正主义分子，也要找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通话，你配吗？”耳机里又传来对方的声音：“找周恩来总理也行，我要和你们的周总理通话。”女话务员斥责道：“你做梦吧，我们中国人民堂堂正正，不和苏修讲话，打倒苏修！”喊完口号，这位小姑娘一下子扯掉电话，得意地嗑起瓜子来。

机房勤务员（主任）见她喊口号，感到奇怪，问这位话务员：“你在对谁发火呢？”女话务员说：“还有谁，柯西金呗。”勤务员问道：“哪个柯西金？”女话务员不屑地白了他一眼：“还有哪个柯西金，就是新沙皇呗。”勤务员不信：“你骗我吧？”女话务员不耐烦地说：“向毛主席保证。”勤务员顿时脸色煞白，向军代表办公室跑去。不一会，局里的军代表五、六个人和勤务员向机房快步走来，人人脸上都是一副严肃而紧张的表情。他们走到那位小姑娘跟前，军管会主任问道：“刚才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来电话找毛主席吗？”小姑娘爱理不理地说：“是啊。”军代表又问：“是你把他骂了一通，扯断了电话？”女话务员自豪地说：“是啊，我把柯西金臭骂了一顿。”军代表沉下脸来，命令道：“立即把她撤下来，隔离审查，听候处理。”两位随来的女干部立即把她扯出来带走。这里军代表紧张得满头大汗，下令：“立即接总理，快！”电话接通了，军代表报告：“总理，刚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找主席和总理，被话务员骂了一顿，扯断话路。”这时接线厅里静静的，周恩来恼怒的声音清晰地从话机里传出来：“啊，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要擅自处理？你们是犯罪，犯杀头之罪！”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

第七十三回 古怪事江青成中委 荒唐案林彪进党章

话说周恩来得到北京电话局报告，得知柯西金打电话来要和毛泽东通话，但被无知而不守纪律的话务员切断的事情后非常生气，严厉申斥了北京话务局。但仔细一想，这也不能全怪那个话务员。文化大革命一起，所有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烂，阻拦火车、切断交通这样严重的犯罪行为不但不会受到惩罚，反被认为是造反有功，受到重用，那么一个话务员切断柯西金的电话为什么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呢？所以周恩来接着又指示，北京电话局应当以此为教训，对员工加强教育，不要过多地追究话务员的责任。

隔离室里，那位切断柯西金电话的小话务员嚶嚶而哭，她实在想不明白，北京和全国人民每天都不知喊多少遍打倒新沙皇的口号，自己喊了几句，怎么就大祸临头了呢？她正哭着，军代表们走了进来。军管会主任走到她面前，劝她别哭了。小话务员还是泪水涟涟。军代表不劝了，问她：“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祸吗？”小姑娘张大恐慌的泪眼，嗫嚅道：“惹祸？”军代表说：“是的，你的这一举动可能导致几千万人死亡。”小姑娘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说不出话来，但眼神的意思明显是“有那么严重吗？”军代表耐心地解释说：“是的。你想想，柯西金启用这条多年不用的线路，找毛主席通话，自然是想通过最高级的通话达成协议，避免边境冲突。而你呢，一下子切断电话线，等于关死了谈判之门，这会使新沙皇铤而走险，对我国发动战争。战争一打起来，就不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这会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啊！你严重干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论罪是个死罪。”小姑娘吓得哇哇大哭，连连喊叫：“我不是有意的呀！我不是有意的呀！”军代表说：“你不要紧张，总理有指示，这事不能全怪你，不要追究你的责任，关键是要吸取教训，加强纪律性。你回去上班去吧，好好想一想，写个检讨。”小姑娘见一场大祸顿时云散，不禁感动得哭了起来：“总理……”

周恩来得到报告，得知此事已妥善处理，也就放心了，但一想到避免战争的一个绝好机会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给断送了，不免遗憾万分。这时秘书送来了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周恩来又埋头看起文件来。文件中特别重要的是九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这个名单内部已讨论过多次，直到现在还不能定下来，只好继续磋商了。

此年，也就是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会场和代表驻地的京西宾馆戒备森严。京西宾馆位于北京城西，距天安门广场有十里之遥，前临长安大街，刚修通的北京地下铁路正好从这里通过。宾馆内部有一座很大的高级礼堂，可坐一千多人，礼堂旁边是高达九层的高级大楼，代表们住宿、开会都完全在宾馆内，便于警卫。这个宾馆隶属中央军委，安全措施非常严密，九大选这里作会场，是非常恰当的。

4月1日上午八时，中央首长陆续来到京西宾馆，大红旗高级轿车一辆又一辆鱼贯而入。门口警卫战士肃然立正，迎着进来的高级轿车敬礼。由于车辆很多，战士敬礼的右手好长时间都没有落下来。宾馆大楼的电梯也运行不停，男女服务员奔来跑去，一片紧张气氛。忽然，一群服务员聚在电梯口，口里嚷着“老师来了，看老师”。一会儿，电梯口的红灯亮了，电梯门打开，朱德、李富春、陈毅从电梯里走出来。这些服务员知道他们在挨批判，不敢上前亲近他们，但都肃然而立，恭敬地向老师们行注目礼。朱德慈祥地向大家招招手，率领李富春和陈毅到了休息室。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等十几个

将军和几个士兵代表正在闲谈，一见朱德进来，马上跳起来喊了声口令：“立正！”朱德等人向大家招招手：“坐下坐下。”便进入里间去了，一个士兵问道：“首长，他们都是老右，你们给他们立正干什么？”韩先楚轻蔑地瞅他一眼，骂道：“你懂个屁！”

下午5时整，京西宾馆礼堂里已经坐满了代表，会场上静悄悄的，大家瞅着主席台，等待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忽然，会场里响起了“东方红”的乐曲，代表们如听到了口令，一齐站起热烈地鼓掌。在悠扬的东方红乐曲和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从主席台的一侧走出来，不断地向大家招手致意。林彪在稍后一点摇着他撰写前言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是小红本，再后面隔一小段距离是周恩来，他胸前佩戴着有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几个字的长方形小徽章。令代表们吃惊的是，周恩来面容清瘦，比以前瘦多了。在周恩来后面的是陈伯达、康生、董必武、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在主席台上依次就座。陈毅等三老四帅则被安排在台下第一排坐着。

毛泽东站起来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上顿时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掌声，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掌声口号声差点把大礼堂的顶盖掀掉。不过，这座礼堂质量特好，从外面是一点听不到里面的声音的。行人从这里匆匆走过，看到士兵沿宾馆围墙持枪警戒，知道这里正在召开重要会议，但绝对想不到是开九大。

十分钟过去了，毛泽东把手往下压压，代表们又安静地坐回到座位上。毛泽东微笑地望望代表，大声讲道：“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移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林彪作政治报告。报告很长，这是林彪正式亮相，叶群十分重视，来会场前又给他吃药，又给他打针，但林彪仍然显得体力不支，念政治报告时气喘咻咻。花了近一个小时，林彪终于把政治报告念完了，已累得浑身大汗，瘫在座位里。他望望旁边议论风生的毛泽东，想到自己虽然已被写进党章草案，成为法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以自己虚弱之体，还能等到自己接班的那一天吗？

林彪的政治报告作完以后，代表们分小组讨论政治报告。4月14日，代表们又集中起来开始表决。照例是毛泽东讲话，照例是掌声如雷。林彪又接着讲话，照例是气喘咻咻，照例是喊一大堆口号。接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讲话。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现在已经是大队所在的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他仍头戴白毛巾、身穿黑色对襟袄，以表示自己还是老农民本色，王洪文讲话后，他也发了言。大家都一致表示拥护政治报告，拥护党章。

接着，大会宣布：“珍宝岛英雄孙玉国同志发言。”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只见孙玉国身穿新军装，潇洒利索，走到讲台前，“啪”一下向主席台左右的首长敬了个军礼，又向会场全体代表行了个军礼，才掏出发言稿。会场里一片啧啧的赞叹声，这么英俊潇洒，真不愧为珍宝岛的英雄。

大会发言完了，毛泽东宣布：“现在开始表决，同意林彪同志作的政治报告的举手！”只听“唰”一声，代表们一齐举起了右手。毛泽东看看会场，宣布“一致通过”。接着毛泽东又开始主持表决党章：“同意党章的举手！”又是“唰”的一声，全体代表又都高高举起了右手。毛泽东看看会场，宣布：“一致通过。”会场上又爆发出炸雷一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有很多新的内容，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把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写进了党章的总纲：“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综观中外共产党史，还从未有过在自己的党章里写上接班人的名字的事，真是荒唐至极。

政治报告和党章一通过，剩下的事就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了，这是九大的高潮。林彪和黄、吴、叶、李、邱为一伙，江青和陈、康、张、姚、谢为一伙，互相之间开始了紧张的角逐。文化大革命搞了近三年，现在到了重新分配权力的时候了，双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劲。但毛泽东心里有数，把内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工作直接握在自己手里，具体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康生协助。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复杂的工作。在4月14日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瞧瞧左边坐着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又瞧瞧右边坐着的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心里思忖着，一边是文革新贵，一边是开国元勋，文革新贵都有毛泽东和林彪的支持，自然是都非进政治局不可，自己的任务，应该把那些老同志尽量拉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以尽量减少文革新贵对国家的破坏。但是，据说胡耀邦、李志民、帅孟奇这些老同志还没有检讨，不检讨，那些文革新贵能让他们进中委么。

会散了以后，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对胡耀邦说：“你们做个检查吧，也好取得大家的谅解，进九届中央委员会，好为党工作。”大家没有说话，都把目光转向胡耀邦，等他拿主意。

胡耀邦个子矮小，貌不惊人，但极有主意，他是湖南浏阳县人，受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影响参加革命，1933年1月被调到瑞金中央苏区儿童局工作。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后又改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四纵队、三纵队政委，后又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指挥解放四川战役，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1952年，经邓小平推荐来到北京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二书记。丰富的革命斗争阅历使他对是非的判断力极强。当周恩来动员他写个检讨应付一下那些人时，他也知道这是周恩来的好意，但他不想写检讨，头一摆，倔强地说：“不写，没有错误，写什么检讨。”其他人一看胡耀邦不写，也都不写了。周恩来没有办法，只好摇摇头走开了。

周恩来回到西花厅后，熊向晖又来报告：“总理，四位老师经过研究，认为苏军在边界上的兵力虽然由原来的二十几个师增加到了五十五个师，百万大军陈兵边界，但不可能大打起来。”周恩来拿过四老师的研究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我也是这么个看法，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我要马上向主席报告。”熊向晖走了，周恩来拿起电话，要通了丰泽园，问道：“主席休息了吗？”卫士回答道：“主席没有休息。”周恩来说：“我有重要情况报告主席。”卫士进来请示毛泽东：“总理有重要情况报告。”毛泽东点点头：“好，立刻请总理过来。”

周恩来坐着红旗车到了丰泽园门口，卫士已等在这里，见总理下车，过来要替总理拿公文包，周恩来笑着婉谢：“谢谢，你们已经很辛苦了，我怎么能让你们拿公文包呢？你们责任重大，一定要把服务工作搞好，全国人民

都会感谢你们的，”卫士一阵心热，总理啊，你总是对同志这么关心，这么体谅。

毛泽东在书房里正在等着周恩来，见他进来，指指沙发说：“请坐，有什么重要情况呢？”周恩来说：“四老师有两个结论，一个是苏军在边界陈兵百万，但不会大打；一个是尼克松上台后，对华政策有了松动，打开中美冰冻多年的关系的时机已到。”周恩来的这两个消息给毛泽东带来了喜讯，毛泽东脸上泛起了一阵红光，竟然很少有的催促起周恩来了：“快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先说说第一个结论吧。”周恩来喝了一口茶水说：“四老师为什么认为苏军虽然在边界陈兵百万，但大打不起来呢？他们认为，苏军的战略思想从来重视集中优势兵力，实施重点突破，达到战役速决。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攻克柏林、出兵我国东北都是集中百万大军进行突击。现在苏联战略重心在欧洲，他们主要是同美国抗衡，要抽出几百万兵力同我国大打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喝了几口茶，毛泽东又催问道：“那么第二个结论呢？怎样解释？”周恩来放下茶杯说：“苏联最近搞了个亚洲安全体系，收买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橡胶，吸引日本开发西伯利亚的石油。交换的条件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同意苏联的舰船通过马六甲海峡，日本同意苏联舰船通过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这就严重地触犯了美国利益。尼克松上台后，为了打中国这张牌，以同苏联争斗，好几次讲话表示愿意同中国接触。最近，尼克松还转托刚上任的法国驻华大使捎来了口信，愿意同中国谈判。陈老总建议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中美关系有了突破，就会大大加强我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站起来，兴奋地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夸赞四老师道：“这四个老总啊……姜还是老的辣噢。看来，我还得给他们再压压担子。”周恩来看出，毛泽东对四老师的这两个结论很赞赏，便把四老师的困难讲了出来：“九大上，有些人对四老师的做法不大妥当，上海给陈毅同志写了封信，说是选他作右的代表，他们的日子不太好过，恐怕很难承担起更多的工作。”毛泽东又窘又恼：“还有这事？谁说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这就是一个创造，完全是胡闹。什么右的代表，我就爱和右派交朋友，你看我要和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握手言欢了。毛泽东说完，放怀大笑起来。

周恩来看毛泽东兴致很好，便提起酝酿中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来：“主席，这四位老师进不进中委？我和康生同志研究了半天，还是想先请示一下主席的意见。”毛泽东在沙发上坐下来。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周恩来：“你的意见呢？”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我的意见是四老师都进中委。万一林彪同志病了，他们还可以出来抵挡一阵子。不然，我们临时到哪里去找人呢？”毛泽东默然，一股劲儿地吸着烟，半天没有说话。周恩来以为毛泽东生气了，哪里知道毛泽东突然一挥手，果断地说：“三老四帅都进中委，一个也不要拉下，谁要不同意叫他来和我辩论。”

周恩来又提出江青的问题：“主席上次指示江青不要进政治局，康生同志建议江青同志还是进政治局好。”毛泽东这次可是生气了：“我说了，我坚决不同意，我不能同江青共事，你们要她当中委，我就不干，她也不能进政治局。”

毛泽东一再反对江青进政治局，林彪也急忙表态：“不同意叶群进政治局。”不知怎么的，林彪现在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三老四帅仍然留在中央，是为什么呢？是牵制自己吗？他细细看了一下预定的政治局委员名单，元老

派占三分之一，文革小组占三分之一，再就是自己和黄、吴、叶、李、邱了，明摆着这是一个互相牵制的构局。既然要牵制，那就是说毛泽东对自己还不放心。林彪一想到此，又开始出汗，不得不格外小心。

江青、叶群得知自己有被挤出政治局委员的圈子的危险性，顿时慌了手脚，四处活动，江青有中央文革一帮人给自己摇旗呐喊，她再想着把黄、吴、叶、李、邱拉过来，就稳稳当当地可以拉够选票了。江青找到黄永胜，恳切地说：“永胜同志，我看你能力很强，我要选你当常委。”黄永胜也很想当常委，但算来算去，知道常委是落不到自己头上的，江青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现在却主动要选自己当常委，无非是要自己投她一票。黄永胜客气地说：“江青同志，我的能力不够，但我要给你投一票。”江青满意地走了。

黄永胜跑到毛家湾，气呼呼地对叶群说了江青拉选票的事，临了说道：“谁选她呀，那么狂，我就看不惯。”叶群一跺脚，指着黄永胜连说“大错，大错”。黄永胜愕然，问叶群：“我错在哪里？连主席都反对她进政治局呢。”叶群又一跺脚，连说：“蠢蠢！”她看黄永胜还不明白，便贴着他的耳朵说：“你想想，江青进政治局，主席怎好说同意，当然是要做做姿态了。你可不要给个棒槌就当针（真）。再说，江青不进政治局，我还能进政治局吗？反过来，江青进了政治局，我一定也能进得了政治局。为什么？总得有人陪衬陪衬呀！所以，她就是王八蛋，你也得选她，为了我；明白吗？我的傻将军。”黄永胜连忙把她抱住说：“我明白了，一定照你的话做。”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叶群拿起电话耳机：“喂？啊，是总理！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副主席已经睡了！你明天写封信来，好，我明白了，我一定转告。”叶群放下耳机，未等黄永胜问，就主动告诉他：“总理刚才来电话，要送政治局委员名单给副主席看，叫我挡住了。”黄永胜奇怪地问：“为什么呢？”叶群不耐烦地说：“我怕总理来了，副主席为了表示谦虚，一下子把我的名字勾了。”黄永胜恍然大悟，敬佩地说：“我看你应该当常委才是。”叶群故作羞涩地说：“你别抬我了，我是一朵玫瑰花，无人采。”黄永胜拥住她说：“我来采嘛！”

第二天一早，周恩来把名单寄到毛家湾，叶群打开看了一下，见江青和自己的名字都在上面，便令秘书拿去给林彪圈阅。秘书进到里间，对闭目养神的林彪念了名单，林彪一句话也没有说，用右手食指在空中划了个圆圈，表示圈阅了。

经过反复的较量，4月24日，九大代表选出了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届中央委员会又选出了政治局委员，委员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有董必武、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李先念、陈锡联；有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有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李作鹏；还有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纪登奎、李雪峰、汪东兴。

叶群当了政治局委员，办的第一件大事是命令秘书们到北京饭店、前门饭店、京西宾馆三个九大代表们的住地为女儿找驸马，为儿子找皇妃。这时九大使命虽已结束，但代表们还得学习座谈九大的意义。叶群指挥着找来找去，发现几个小伙子长得漂亮，身材也好，可一打听，都已结婚了。一个秘书倒是发现了个姑娘，非常漂亮，是学毛著的积极分子。叶群忙把吴法宪找来，要他扮演一个关心青年人的老首长去摸摸姑娘的底。吴法宪领命出来，立即把姑娘找来，问了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姑娘也老老实实地说了一些自己参加九大的感受。吴法宪突然问道：“结婚了吗？”姑娘的脸一下红了，

低声说：“没有，我要好好为党工作，不想过早结婚。”吴法宪夸奖道：“很好，不过如果有合适的人的话，也可以考虑。”

吴法宪找姑娘谈话的时候，叶群、秘书们和林立果都藏在里面看，叶群对这个姑娘很满意。姑娘走后，叶群问道：“老虎，你觉得怎么样啊？”林立果一扭脖子说：“不怎么样。”秘书把他拉到一边说：“这姑娘挺不错的。”林立果语出惊人：“主任找的人我都不要，她是想在我身边安个人，控制我。”秘书们一听，不禁面面相觑，这哪里有点母子的亲情呢？大家懒懒地回了毛家湾。

秘书回来得正好，王光美专案组送来了专案报告，请林彪批示。林彪这次倒很干脆，拿起红铅笔批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第七十四回 周恩来签密令释放美国客 尼克松破密码内定核战计

话说九大后，林彪为了树威，判处王光美死刑，立即执行。文件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惊，杀戒一开，不知多少颗人头就要落地，这还得了。他拿起铅笔在文件上重重地写了四个大红字：“刀下留人”，然后把文件退给了周恩来，嘱他去办。周恩来立即把谢富治叫来，给他看了主席的批示，叮嘱他：“当年晋绥杀了王实味，主席雷霆大怒，不知道批评了多少次。王光美要有什么事，你去向主席交待。”谢富治当然知道王实味这件事。王实味原在北平读大学。抗战军兴，王实味来到延安，被分配做文学研究工作。一个从北平旧大学来的知识分子，初到延安这个陕北的山沟沟里，当然会感到很习惯。于是，王实味在延安的党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野百合花》的文章，发了发牢骚，引起了军队干部和地方老干部的不满。1942年延安大整风，开始批评《野百合花》，后来又有人揭发王实味是托派，王实味遂被关押起来。1946年国民党发动了内战，延安即将成为前线，王实味被转移到当时是后方的晋绥解放区，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的监狱里。当时由于是战争环境，随时要准备转移，晋绥公安总局请示康生（康生当时是中央社会部部长，专管肃反工作），康生指示立即处决王实味。于是，在一个傍晚，晋绥公安总局的几个青年武装人员，手持大刀，把王实味提出来，秘密处决。当时毛泽东知道后发了大火，要他们还王实味，可是人头落地不能接上。为此，毛泽东左批评，右批评，中共高级干部，哪个不知，谁个不晓。所以谢富治接到毛泽东批示后立即去秦城监狱视察，一点也不敢怠慢。

谢富治来到秦城监狱，找来了狱长等负责人，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然后去监房视察。狱长带他来到王光美的监房前，谢富治通过观察孔往里望去，只见王光美坐在自己的小床上一动不动，若不是他预先知道这是王光美的监房，他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王光美。

谢富治回来以后，把视察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知道王光美至少是现在没有了生命危险，便放心了。但是他立刻又得到报告，说刘少奇生命垂危，周恩来赶紧打电话，从医院抽了两名护士去看护。

忙完了这些事，周恩来站起来，在办公室的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这个沙发是毛泽东送给他的，说来也许有人不信，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没有沙发，周恩来办公必是坐在办公桌后的藤椅上，累了就在办公室里走一圈算是休息。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就让办公厅给自己做沙发时，多做了一个单人沙发送给周恩来，周恩来总算有沙发坐了。

周恩来坐在沙发上，一阵疲劳感占满了全身，这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周恩来明白，文化大革命使自己的身体大大地超前透支了。自1966年以来，他很少睡过一个像样的觉，常常被红卫兵缠住“解决问题”，一谈就是几小时，甚至一天一夜。还有，要想办法维持工农业的生产，要提防江青、林彪这帮人射来的明枪暗箭，要想法保住那些老干部。而当他这样做时，还得经常注意研究毛泽东的想法，尽量利用毛泽东的支持去做好这些事。还有援助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几十万出国作战的工兵和高炮部队，十几亿、十几亿的援越物资，哪一样不得周恩来去操心安排。有一个时期，美国轰炸厉害，粮食运不进越南，周恩来命令把大米装进塑料小口袋，封死后放到湄公河里往南漂去，越南人民能捞到多少就算多少。中国的新式武器出来，先装备越南。越南的土地上，到处堆着山一样高的大米、弹药。六管高炮、新式机枪

遍地都是，越南的民兵也都是一色的冲锋枪。还有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总而言之，国家的千头万绪的具体工作，都得周恩来去安排，他怎能不老呢？

周恩来坐下来，唤来秘书：“给我泡一杯六安瓜片茶。”秘书奇怪地问道：“六安瓜片茶并不有名嘛，喝它干啥？”周恩来叹口气说：“你不知道呀！抗战初期，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叶挺将军送给我一筒六安瓜片茶，最近我经常想到叶挺将军，也就想到了六安瓜片茶。”

秘书泡好茶端来，周恩来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要通了乌鲁木齐部队司令员龙书金的电话。乌鲁木齐大军区是新组建的，主要管辖指挥驻在新疆的部队，司令员龙书金原任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乌鲁木齐军区不久。电话要通后，周恩来嘱咐道：“龙书金吗？边界情况怎样？没有大事？我告诉你，外交无小事，你要严密注意边界上的情况。我以前曾给边界哨所、军区发过一个通知，边界上发生的外交纠纷动态，不论大小，哨所要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外交部，军区司令员必须要一一过目签字。你刚到新疆，可能不熟悉这个规定，要赶快把文件找出来读读，必须按规定严格执行，不能误事噢！”龙书金在电话里说：“放心吧，总理，我一定严格执行规定。”

龙书金放下电话，“嘿嘿”了两声。九大时，他曾拜访过林彪，林彪暗授机宜：“边界上打点仗，对军队有好处，也能提高你的地位。”回来以后，龙书金就按照林彪的话干起来了。

中苏边境共长一万余公里。由于中部是中蒙边界，故中苏边境线可分为东线与西线。东线主要是苏联的俄罗斯与中国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接壤，西线主要是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靠近西线边界的是塔城、阿山、伊犁三个专区。这里水草丰美，风景宜人，原来两国牧民驱羊过界放牧乃是常事。中苏关系紧张以后，苏联边防军用大马力拖拉机在边界上犁出了一条宽十多米的松土带，用以检迹，若有中国边民越界牧放羊群立即开枪。苏军更凭借武力经常越过边界到中国境内挑衅。各哨所的报告像雪片一样向乌鲁木齐军区司令部飞来。起先，龙书金还一一过目，后来不耐烦了。在广州军区副司令任上，那是多么轻松舒服，现在虽然升任大军区司令，却每天面对一大厚沓的边情报告，他哪有兴趣读这些。再说这些报告不过是报告这里牛羊走失，那里情况异常，他不耐烦了，干脆命令下面不要再送报告给他了。司令发了话，谁还敢多言，从此报到军区的边情电报一来就被锁到文件柜里。

六月的乌鲁木齐市，凉爽宜人。这时瓜果上市，千里飘香，异域风情，独具魅力。龙书金游兴大发，吩咐准备车辆，畅游天池。天池在天山主峰博格达峰之下汇聚峰上融化的雪水，成一月牙形高山湖泊。龙书金坐车沿盘山公路而上，路宽仅能容一车通过。各山口有专人拦截过往车辆，上午上山，下午下山，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车越走，路越窄，山越高。从车窗里往下望去，千山万岩均在脚下。经过五个小时的行驶，汽车终于在近午时分爬上了天池，只见一池如镜，湖面上倒映着雪山、森林。龙书金观赏一番，遂命人摆开酒菜。游山的维吾尔族姑娘在东不拉的琴声中跳起了龟兹古舞，花裙翻飞，长辫飘舞，龙书金这时才知新疆本是好地方啊！

就在龙书金上天池的时候，周恩来仍在考虑着边界问题，毛泽东也不断地发出指示，周恩来连电龙书金：新疆要出问题，要龙书金加倍注意。

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周恩来又在苦苦思虑陈毅提出的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建议。怎样打开呢？朝鲜战争、炮击金门、越南战争，两国积怨太深了，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台阶，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个台阶呢？

天遂人愿，7月初，一份紧急报告从广东飞来，落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前。报告称，广东抓获了两名乘游艇侵犯中国领海的美国人。周恩来看到报告，心中一喜，机会终于来了，他严令广东迅速查清上报，没有他的指示，绝对不许在报纸上提这件事。

广东省公安局很快查明，这两个美国人是来香港度假的美国学生，在游海时误入中国领海。周恩来接到了广东省公安局的报告后，又反复核对了有关资料，批示：“立即放人。”并指示新华社写一条消息，客观报道此事，绝对不许在消息中用一些骂人的字眼。

两位美国客人被礼送出境，新华社的消息也非常客观平静。

尼克松立即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但什么也没讲，只是立刻责成国务院宣布放宽对中国贸易和美国人去大陆旅游的限制。于是，一批一批的美国探险者好奇而不安地进入中国大陆。中美关系在悄悄地升温。

周恩来对此很高兴，但同时又对新疆很担心，形势这么复杂，龙书金应付得了这个局面吗？

龙书金不知道，他在登天山时，边界哨所的十万火急的告急电报一封接一封飞来。原来塔城军分区近来注意到苏军在边界有异常情况，每到夜间，就能听到从苏联境内传来的坦克马达声。中国巴克图哨所升起五星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哨所会谈的信号，然而苏联哨所一反常态，没有反应。塔城军分区把这一重要情况报告了北疆军区。北疆军区立即报告龙书金，报告苏军有异常举动，建议停止例行巡逻，弄清情况。龙书金正在山上，自然是看不到这个报告了，但悲剧就在这时发生了。

8月13日上午，中国边防巡逻队一行33人又开始例行巡逻。突然，六辆苏军坦克，300名苏联军人从埋伏点冲出来，围攻中国边防军人。接着四架直升飞机飞来，扔下几颗汽油燃烧弹，中国军队阵地全部成为火海。塔城军分区，北疆军区已接到巡逻队的无线电话报告，这时都在紧急寻找龙书金请示方略，自然是没有任何结果。一团中国部队赶到出事现场时，苏军早已撤走，烧焦了的33名中国军人的尸体遗留在戈壁滩上。

败报传到北京，周恩来大惊，连忙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正在睡觉，卫士不愿通报，周恩来严厉地说：“你们赶快叫醒主席，误了事是要掉脑袋的。”卫士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发脾气，料想有特别重大的事情要向主席汇报，便进去推醒了毛泽东。毛泽东硬被推醒，大为光火：“我两天没有睡觉了，睡个把小时都不行？”卫士说：“主席，是总理让我们把你推醒的。”毛泽东一下坐起来：“总理？他在哪里？”卫士说：“已经来了。”毛泽东吩咐：“快请进来。”毛泽东为什么一听说“总理”马上就改变态度了呢？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不是天塌下来的大事，周恩来是决不会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的。从建国到现在，这样的事总共没有几回，今天总理这样做，一定有了非常紧急的情况。

周恩来一听说“请”，三步两步地走进来，不等毛泽东发问就报告说：“主席，新疆边界上出事了，我们一个排让苏修偷袭打死了，简直是奇耻大辱。”毛泽东也吃了一惊：“竟有这事？我前些时还特别关照过龙书金，西北要出事呢。”周恩来愤愤地说：“现在有些人是嘴里喊着听毛主席的话，实际上主席讲的许多话根本不听。出了这么大的事，一个排叫人家包了饺子，可就是找不到司令员。”接着，周恩来把事情经过简要介绍了一下。说是

简要，因为电报是龙书金打来的，许多情况都被他压下了，报来的只是边界上的战斗经过，而这个经过又还是开头部分和战后目睹记，是怎么打的，现在还无法确知，所以只能是个简要情况了。

听完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深深地被震撼了。大敌当前，前线司令官竟是这般玩忽职守，视战争为儿戏，各级主管又是如此职责不清。遇事推诿。这不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吗？毛泽东拿起红铅笔，在龙书金的电报上狠狠地写了一行字。毛泽东把批件交给周恩来，斩钉截铁地说：“查！派出军委调查组，从军委办事组黄永胜查起，查龙书金、查王恩茂，查个水落石出，贻误战机者斩！”

周恩来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后，向林彪通报了情况。林彪不敢阻拦，周恩来遂组织军委调查组，飞赴乌鲁木齐市调查。忙完这件事后，周恩来又布置熊向晖，请四帅研究组密切注意苏联和美国的情况，防备苏修将战争升级。

由于军情紧急，四帅军事小组的例会增加了。没有几天，熊向晖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吗？今天四帅要研究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想请你一道讨论。”周恩来一口答应：“好，我马上就来。”

紫光阁五承殿，今天周恩来和四帅讨论的中心课题是如何看待美国《华盛顿明星报》的一条消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消息称苏联大本营通过缜密的研究，决定对中国的所有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如果苏联的目标能够达到，那么苏联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

这条消息真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一般中国人看不懂也看不到这条消息，但世界其他国家却为这条消息而深深不安。当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了两颗各为一万吨当量的原子弹，杀死了几十万人，迫使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现在中、美、苏的核武器的当量都是几十万吨、几百万吨。苏联对中国实行核打击，中国当然也要进行报复。中国核武器虽少，但有那么几颗落到莫斯科、基辅的话，也够苏联受的。另外苏联对中国实行核打击时，安知不会走火，把核弹打到美国的军队头上。那样的话，美国当然不会缩首挨打。如此一来，一场核大战就要降临。按现在核大国的核武器当量总量，用世界总人口去除的话，每个人都可摊到25吨。一场核大战过后，紧接着就是因核战而形成的核冬天，核弹爆炸引起的尘埃将遮蔽太阳达三年之久，三年之内地球上将是寒冷与黑暗，到底还有多少人类和生物幸存下来，实在是很难说了。

在《华盛顿明星报》的这条新闻面前，世界战抖了。

怎样对待这条新闻呢？四老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周恩来和熊向晖也不时插话。

首要的问题是这条新闻是否可信的问题。熊向晖一直从事国际研究，对美国新闻媒介的激烈竞争当然是比较了解的。他知道，美国新闻媒介为了提高发行量，经常发表一些未经证实的国际新闻。他怀疑地说：“《华盛顿明星报》的这条消息，会不会是报老板搞的一个噱头？”叶剑英摇摇头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苏联要和我们打一场地面战争的话，至少得投入400万军队，还很难有胜利的把握，苏联领导人不会不明白这一点。打一场核战争，对我国的重要军事目标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对苏联来说费不了什么大事，因此现在存在着很大的苏联对我们搞突击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立足于打核战争。”

周恩来嘉许地朝叶剑英点点头说：“剑英说得有道理。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如果苏联有这个意图，那一定是属于最高机密，美国的报纸怎么会知道呢？”陈毅说：“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苏联要对我实行核打击，首先要取得美国的谅解。不要说美国在亚洲有30万军队，美国还怀疑苏联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呢。所以美国看来是反对苏联实行这一计划的。另外，尼克松政府也急于联合中国与苏联对抗，因此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直接告诉我们不好办，便通过报纸放风，这是美国政府常用的一种手法。”

周恩来叫大家议来议去，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他用笔敲敲桌子说：“我看这个问题现在基本清楚了，勃列日涅夫的手已经按在核按钮上了，现在我们的工作是要研究一下各种应急方案。”

聂荣臻走过来，把一大幅地图摊开来让工作人员钉在墙上。他用指挥棒指着地图说：“总理你们请看，这是苏联设在赤塔和扎维塔亚的军事基地，这是苏军设在蒙巴拉巴什的军事基地，这几个基地都是苏军的导弹发射基地。他们如果从这些基地发射导弹对我国袭击的话，那么导弹飞到东北哈尔滨、鞍山、沈阳等重工业城市的时间几分钟就够了，打到北京也超不过十分钟。这就是说，导弹作战，双方能用来躲避准备的时间只有五、六分钟。”

聂荣臻是中国导弹部队的元戎，他的话自然是有很大的权威性的。徐向前担忧地说：“这就危险了，为了确保主席的安全，九、十两月主席可以离开北京到南方去避一避。”

周恩来感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特意在这几句话的记录下面划了几道红线。座谈会结束以后，他立即来找毛泽东汇报。丰泽园因要修理，毛泽东已搬到中南海东南的一所新居，房子里有个游泳池，大家据此给这所西洋式的宅第起了个名字叫“游泳池”。

周恩来进了“游泳池”的客厅，向毛泽东汇报道：“主席，今天剑英他们议了一下，觉得《华盛顿明星报》的报道似为可信，确实存在着苏修对我国的重要目标实施核打击的可能性。”毛泽东放下《明史》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原子弹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的办法是两条：一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想扔，我也准备扔，看谁能吓住谁；二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周恩来看看《明史》明白了，毛泽东这一句话是从明史的一个故事引伸而来的。

原来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朱元璋也投军反元，逐渐自成一系。当时朱元璋看到陈友谅等起兵反元的人纷纷称王，也想称王。时有谋士朱升献策，建议朱元璋不要急于称王，以缩小目标，巩固根据地，加高加固城墙，在自己的根据地内发展生产，广积粮草，再徐图发展。朱升的这个建议合起来共九个字，乃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思忖的样子，便主动告诉他：“深挖洞，从现在开始，大家都挖防空洞。此事我讲了多少次了，大家就是不听，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噢。广积粮，要藏粮于民，部队走到哪里，都有饭吃。我们在战争年代就是这个办法。淮海战役，国民党士兵为一个饼死好多人，我们的战士却是顿顿白馒头加红烧肉。不称霸，这是给美国说的，也是对世界说的，现在不称霸，以后强大了也不称霸。”

周恩来佩服地说：“主席分析得太好了。四位老总分析了一下，认为苏修袭击的时间极有可能是国庆节。今年的集会是不是不搞了，主席在这个期间是不是先离开一段时间？”毛泽东又摇头，又摆手：“不，不！那怎么行

呢？会一定要开，我还要上天安门。”周恩来一听脸就白了，几十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一旦导弹飞来，疏散的时间只有几分钟。毛泽东笑笑说：“当然我们也得搞点名堂，来它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怎样？”周恩来拍手赞成：“主席的这个主意好极了。”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全国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全国城市乡村都开始构筑地下避弹室，防空洞，统一组织，包干到户。560 万中国军队全部进入一级戒备状态，连队喂养的猪羊一律宰杀吃掉，各级首长都进入指挥位置，日夜值班，枕戈待旦。中国导弹部队都已做好了发射准备，地面导引站都已开通，中国的战争机器隆隆地开动了。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到报告，和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几经商量，认为这场核战争将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尼克松问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办呢？”基辛格说：“你忘了，总统先生，1962 年加勒比海危机中，肯尼迪总统为了让苏联撤出驻在古巴的导弹部队，用破译的苏联的密码，发出向苏联本土 134 个重要目标进行核打击的命令。当年由于赫鲁晓夫把导弹撤出古巴，肯尼迪总统没有用这张牌，现在总统先生可以用这张牌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续回。

